

告別總參謀部（羅宇回憶錄）

作者 羅宇

1



發行人：金鐘

出版：開放出版社（OPEN BOOKS）

2015年9月20日初版 2015年10月13日第二次印刷 定價：\$120 港元



● 羅瑞卿、羅宇父子。

内容提要

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心腹大将，执掌公安和总参大权；林彪是毛向全党宣战的接班人，文革展现毛林罗的生死大搏杀。结果罗成为祭旗、林叛逃身亡、毛则死于众叛亲离。在这场三雄决斗家破人亡浩劫里幸存的革命之子罗宇，亲历悲愤、觉醒和思考，写出他见证的残酷而荒诞的内幕。最后，在六四枪声中逃出魔网，奔向自由人生，和香港女星狄娜结为终身伴侣。

本书是一位中共第一代子女最有反叛精神和独立个性的心灵记录。有鲜为人知的大内秘闻，包括邓杨顶级家族的贪污腐败、权力核心的阴谋狡诈、总参人事的乌烟瘴气和江青、叶剑英、杨尚昆等人的私生活，也不乏对党国命运的深刻反思。作者文笔朴实，描述生动，直抒胸臆，复活中国 20 世纪最震撼的一段红色历史现场。

目 录

3

出版引言

序言

父亲与家人（图片）

和狄娜在一起（图片）

第一章 磨难虽多心无暇（自传）

- 1、出生在延安王家坪
- 2、父母自杀如晴天霹雳
- 3、文革入狱，1972 年生日回家
- 4、爸爸翻案复出，任军委顾问
- 5、翻案风，一串串
- 6、周恩来去世
- 7、毛去世，四人帮被抓
- 8、邓极力推爸爸做总参谋长
- 9、帮爸爸当秘书
- 10、妈妈开刀，拿掉一叶肺
- 11、爸去德国治腿，一错千古恨
- 12、总装备部的太子爷们
- 13、在美国做军售，被人告状
- 14、小罗瑞卿，敢顶副总长
- 15、六四无眠小虫咬，一夜听枪声
- 16、六四后，只有选择离开

第二章 帼馨和我

- 1、第一次见面：买雷达制导导弹
- 2、情定巴黎，告别体制
- 3、意大利念旧，欣然出国
- 4、发射澳洲卫星
- 5、民航大标，看透朱镕基
- 6、香港遇险，欧洲安家
- 7、「A」弹交货
- 8、ATR
- 9、迦利略计划

附录：中国航空工业的是与非
底子是俄国牌

周恩来与「斯贝」发动机

军机发展，核心在发动机

热衷飞机，扼杀民族工业

第三章 开国皇帝毛泽东

- 1、每星期都见毛泽东
- 2、毛把个人安全交给「罗长子」

- 3、伴君如伴虎：上海会议真相
 - 4、打天下胜了，坐天下败了
 - 5、我看毛泽东的兴亡
 - 6、评毛的专家们
 - 7、文革：毛向全党宣战
 - 8、传统深厚的「成王败寇」
 - 9、没有朋友，也没有家庭
 - 10、战略和理论错误
 - 11、代毛行使生杀大权
- 附录：外国人难懂中国人一例

第四章 见证邓小平及其家人

- 1、「牌桌上的话都不算数」
- 2、上海会议「死无对证」
- 3、只有邓小平想着罗瑞卿
- 4、毛泽东留下的局：三足鼎立
- 5、邓一句话：「军队的事还得罗瑞卿来管」
- 6、邓小平签署六四作战令
- 7、发展硬道理，贪污变成中国特色
- 8、军火生意两派分赃窝里斗
- 9、邓搞修正主义，只做不说
- 10、为什么要「一国两制」
- 11、比较苏共，愈显邓改革半心半意
- 12、两岸的民主和独裁

第五章 我接触的将帅们

【林彪一家】

- 1、和林立果的友谊
- 2、林彪和毛一样信奉独裁
- 3、林彪推父亲当总参谋长
- 4、七千人大会毛林合谋倒刘
- 5、突出政治与大比武的分歧
- 6、毛说罗瑞卿搞错了，却不平反
- 7、林豆豆编织林彪被绑架神话
- 8、中国的大敌仍然是封建主义
- 9、为林彪设想上、中、下三策
- 10、林彪若成功，中国会怎样？

【叶剑英及其子女】

- 1、文革前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 2、说动华国锋放邓小平出山
- 3、重新认识逮捕「四人帮」事件

【朱德、刘伯承、陈毅、罗荣桓】

- 1、朱老总对毛：有意见，不吭声
- 2、刘帅一家对邓小平贪功非常不满
- 3、陈毅对文革深恶痛绝
- 4、罗荣桓女儿来家痛哭道歉

【彭德怀和父亲】

- 1、文革中饱受虐待，遭遇最惨
- 2、百团大战彭罗曾有不快
- 3、中南海文工团与父亲无关

【贺龙元帅】

- 1、贺龙之死：千真万确的谋杀
- 2、贺鹏飞主持总参装备部鸟烟瘴气

【聂荣臻和徐帅】

- 1、徐帅：西路军悲剧故事的传人
- 2、将军们：战场的明星，坐天下的小人

第六章 我认识的周恩来、邓颖超

- 1、早期周恩来和毛泽东有生杀之怨
- 2、罗瑞卿事件，周不敢得罪毛林
- 3、周恩来哲学明哲保身积郁成癌
- 4、周恩来的治国之才未能发挥

第七章 和胡耀邦的几次谈话

- 1、在胡耀邦家发牢骚、骂文革
- 2、反映核电站和买导弹不置可否
- 3、谈到「新思维」的一丝微笑
- 4、胡赵和毛邓的根本区别

第八章 和杨尚昆父子的交往

- 1、杨尚昆有小情妇，被夫人认可
- 2、毛整刘少奇为何拿杨尚昆开刀？
- 3、迟浩田阴差阳错当上副总长
- 4、耿飚当军委秘书长，也是不管事
- 5、军队文革坏人多，清理「三种人」
- 6、向猛子探听军内高干情况
- 7、杨绍明在其父死后，疯了
- 8、迟浩田成为第3号六四战犯
- 9、1987年洛杉矶最后一次见面

出版引言

这本书是关于两代人的故事：中共军中荣辱与共的两父子。

父亲罗瑞卿——毛时代三大权力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三者居其二。曾任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竟一夜间成为文革的反党首犯，不惜跳楼以死抗争，终于死在腿伤医疗时。

儿子罗宇——在父荫下长大，清华大学毕业。文革中因父之名而入狱五年，也是一样的刚烈倔强。父复出，荐入总参谋部负责兵器装备，和领导人的三大女婿共事，不愿同流合污，1989 六四后，分道扬镳而离国，遭中央军委开除军籍开除党籍。

时代背景则是毛泽东、林彪、罗瑞卿关于党军最高权力的大搏斗。结果三家都在文革前后家破人亡，陪葬的是山河破碎，苍生涂炭。

三十多年来，随着有限度的非毛化，记录 20 世纪最严酷的共产极权主义的各类出版物，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已经不可计量，有真假难分的官史，有良莠不齐的野史。礼失求诸野，个人回忆录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香港成为这类非官方著作的集散地和总经销。著作者大多为「不同政见者」、受迫害者和反对运动成员，鲜少来自中共权力核心和军机中枢的圈内人士。我以为，罗宇先生是值得留意的一位。

仅以中共第一代巨头毛、刘、周、朱、陈、林、邓而论，其后人除却官场、商场，就是庸琐一堆。有谁交出过有如斯大林女儿回忆录那样的历史考卷？罗宇本书的价值有待评议，但是他那出污泥而不染的洒脱，或如他所说，其父被毛林整得死去活来，而未参与一场完全脱离人民利益的权力斗争，那是全家的欣慰，这种悟性又有几人？

罗家过去的特殊权势，形成罗宇在大学时代已有的独立思考和林彪家、邓小平家、杨尚昆家的渊源。经由铁窗反省和总参历练，终于在六四惨案后实现人生的飞跃。而陪伴父亲的最后几年，是他承续乃父政治经验的独特机遇。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信息来源」。出版社习惯于回忆录作者的文风和历史学家有所区别。

当一个有悠久的史记传统的民族，记载真实被谎言与暴力骑劫六十余年之后，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废墟的瓦砾中寻找那些发光的还有热度的碎片。罗宇的书涉及中国政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探幽索隐，直言不讳；也写出一个高干家庭的毁灭与再生，他们的泪水和哀乐、保守执着与激愤、连同神秘的爱情，未曾渲染地展现一个空前混乱离谱的时代的场景，不乏精彩段落，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

我们尊重作者的感受。在其心路历程的自白中亦有若干宏观史论，鞭打中国封建主义遗毒甚为给力。（人物出场多有背景介绍，恕无加注之必要。加「按」处，为编辑部所作）

明年是「文革」发动 50 周年（1966-2016）。整肃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1965 年 12 月，已届 50 年，那是文革的前哨战。半个世纪如风消散，多少往事尽付东流。我们以谦卑的心情将本书贡献给拒绝遗忘的读者。

开放出版社总编辑 **金钟**

2015.9.12 纽约

狄娜序言

「惊天地，泣鬼神」，这句话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形容震砾心灵的事迹和文章之极点。

然近二十年中，这句形容词却变得甚为普遍，如果你翻阅有关新中国的历史、政权的报导和回忆录，不难读到几乎每篇文章都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情节。亦从来没有任何政权中的直接和间接的参与者，（包括德日纳粹和苏俄革命）会写如许多的「回忆」、「报导」、「传闻」。但大部分文字是申诉、控诉、揭露、痛斥和造谣。而能够身受其害却客观地自我检讨，公平分析，最重要的是展望未来，以中国前途、人民未来作为目标而写，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

梁帼馨

2008 年于葡萄牙



罗瑞卿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



文革中罗瑞卿、郝治平夫妇被揪斗

第一章 磨难虽多心无暇

（自传）

10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经黄埔军校、北伐，加入红四军、长征，任延安抗大校长，内战中杨罗耿兵团政委。1949年任公安部长十年，授大将，1959年任副总理、总参谋长，推行大比武，1965年12月上海会议遭毛林整肃，后自杀重伤，文革陷「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批斗。1974年复出，1977年任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8年8月在西德医疗时心脏病逝世。夫人郝治平。育有3子4女。

十三年前，当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我总是想一个问题：如何向读者交待作者？我以为如果读者不知道作者的背景，对读者是不公平的，于是我用了很大的心思写了一篇非常可笑的开场白；写好之后，我把它丢在一边，认为根本不可用。现在我决定就用我的真名实姓来写，顿感无债一身轻。

1、出生在延安王家坪

我姓罗名宇，1944年11月18日出生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我的父亲是罗瑞卿，母亲是郝治平。我出生时，隔壁窑洞是林彪、叶群和他们刚出生五个月的女儿林豆豆；前面是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妈妈；后边是刘志坚、刘兰英夫妇。据刘兰英阿姨告诉我，当晚大家在打牌，母亲忽感不适，于是父亲急忙牵马掌灯，单骑过延河去请医生。天黑路滑，延河冰凌，待把医生请来，我已哇哇坠地，于是父亲起名猛猛。由于没有准备好，我猛然冲入这个世界，所以康妈妈、刘兰英阿姨等忙着一团，叶群也送来了包婴儿的布片和林豆豆的一件小棉袄。叶群曾不止一次跟我说：「你一生下来就是我们豆豆的棉袄裹着的。」

1945年日本人投降，八路军占领张家口，华北军区司令部即设在此。聂荣臻任司令兼政委，爸爸任副政委兼十九兵团政委，即毛泽东电文中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飆兵团。当时美国人在延安有个联络组，经常有美国C-45运输机来往延安和北平，我们有高级干部让他们带一下，他们也从不拒绝。爸爸说，当时开飞机就像开吉普车，只要有机场，地图上一指，路过就点下地，甚至没机场，有块平地也落下来了。爸爸就是这样搭美国人的飞机去了张家口，妈妈带着我和姐姐从延安出发去张家口。聂帅（授衔后，大家都称聂荣臻为聂帅）的夫人张瑞华妈妈骑一匹牲口，妈妈骑一匹牲口，再一匹牲口驮两个小筐，一边是姐姐，一边是我。妈妈说，临行前煮几斤鸡蛋，把蛋黄搓成粉粉，装在小罐里，喂我时就煮点开水，调成糊糊。四个小战士跟着，从一个解放区到又一个解放区，一路有人接，有人送，走了几个月。我当时根本不记事，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张家口，户县，打太原，住进阎锡山的公馆，进北京，我就断断续续记事了。

在户县，妈妈当子弟小学校长，我不够年龄上学，就放在附属的托儿所。一天我自己偷偷跑出来，从子弟小学到家，一条直路，但是路中间站着一头牛。我走到牛跟前，牛看着我，我看着牛。由于路很窄，我也不敢绕碰上牛走过去，

正在我犹豫不决时，阿姨发现少了一个小孩，急急忙忙追出来，在牛前面把我抱回去。总之，我从小就是有名的淘气。刚进北京，我五岁，在北京饭店，杨成武喊我小王八，我喊他大王八。

小学、中学，大学我在清华自动控制系。1965年11月「上海会议」，我们小孩并不知道，但我明显的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首先爸爸根本不出门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从我记事起，爸爸就很少在家，现在则一天到晚在家。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寒假我写了一篇日记，其中有这么几句：最近为什么爸爸哪也不去？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和林总有些矛盾？如果真有，也没什么，毛主席还在嘛。

2、父母自杀如晴天霹雳

1966年春节，有中南海怀仁堂的戏票，二姐和我说去，爸爸知道了很紧张，问哪来的票？妈妈拉着爸爸赶紧说：中办发的嘛，你不去，小孩愿意去就去嘛！爸爸不吭声了。我则很奇怪，过去爸爸从来不过问这些芝麻小事。二姐和我还是真的骑着车子去怀仁堂看了戏。寒假过后，我们仍正常上学。三月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家，只见妈妈不见爸爸，我当然就问。妈妈把我拉到楼上爸爸办公室，还没坐下就抱着我痛哭。我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怎么了，妈妈却哭的喘不过气来，过了好一阵，才抽抽搭搭地说：「爸爸有罪，爸爸跳楼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妈妈又说：「我也有罪，我也吃安眠药自杀，让组织救过来了。」

一时如晴天霹雳，我真不敢相信妈妈说的，但我并没有垮，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天垮下来我也要顶住的感觉。我问：「现在哪？」妈妈说：「在医院！」我说：「我去看爸爸。」妈妈惊讶地抬起头看着我，说：「你还敢去看他？」我说：「为什么不敢，他是我爸爸。」听我这么说，妈妈稍稍平静了一点，我说：「你们这都是怎么了，有话慢慢说，毛还在呀！」妈妈叹口气，说：「好多事你不知道，我以后也不能告诉你，这是组织纪律。去年上海会议，他们说爸爸反林总；现在开会，又说爸爸反毛主席。爸爸想不开就跳楼了，跟我都没说一声。」我说：「爸爸反毛主席，鬼才相信。他们说什么，他们去说，毛主席还在嘛。人家逼你死，你就要好好活着；人家逼你死，你就去跳楼，岂不亲痛仇快。」

我虽然极度的震惊，但我并没有乱了方寸，我从小在父母的保护下，不知世事之险恶，突然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唯一想的是，安慰母亲，保护好母亲，安慰父亲，保护好父亲，只要人在就好办。其实我当时有多傻，我能保护谁？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第二天，我去北京医院看父亲，门口坐着警卫，他们知道我来，我也懒得理他们，径直走进去。父亲看到我，并无惊讶表现，我知道他们已经告诉了父亲我今天来。

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父亲流泪，这是第一次，父亲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们。你要照顾好妈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不要管我了。」我打断父亲的话（我很少打断爸爸的话，以前也不敢），说：「你永远是我的好爸爸，唯一不该的是这一次，为什么要这样，有话慢慢讲，主席还在嘛。你真走了，孩子们谁管啊？」爸爸仍流着泪说：「唉，好多事你不懂啊。」我说：「我是不懂，你以前也不跟我讲。我只懂一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好活着，什么事都能说清楚。」

这时爸爸好像有点惊奇地看着我，好像在想，这孩子在想什么？其实，我当时想的就是一定要活下去，爸爸要活下去，妈妈要活下去，活着就好办，就这么死了，有多冤。至此，我每星期六照常回家，看好弟弟妹妹，星期日去看爸爸，然后回学校。我尽量给爸爸讲些外面发生的事，讲些想让他开心的话，但爸爸则很少说话。这种日子也没过多久，到了六月，报上注销了五一六通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了。学校已经停课，我告诉爸爸，我也写了大字报，很多同学很同意我。我觉得父亲心情很沉重，大概我们父子两人猜到事情不大妙，但又都不愿提什么反党集团。这之后，「组织」就下令不许我去望父亲了。我们父子再见面，就是六年后的 1973 年 1 月，我从监狱放出来后两个月，在阜外医院。

文革开始后，我是黑五类，所以一天也没有参加红卫兵，一天也没造反，一开始就是逍遥派。当时父母的工资仍照发，妈妈拿到钱告诉我，「组织」说：「只能花一百块。」我说：「甭理他，该花多少花多少，你的工资，又不是花别人的钱。」每星期我从学校回来，上街买两只烧鸡，回来煮一锅挂面，和妈妈、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起吃一顿。妈妈虽然有时也悄悄给我点钱，但大部

分钱都按「组织」说的，放在那锁好，直到「组织」把她抓到监狱去，把钱也统统拿走。三个小的饿得没饭吃，到街上偷东西吃。文革之后，大家聚到一起说这一段，妈妈总说：当时真傻，怎么就不知道把钱留给你们。我们则说：你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关监狱都不用捉。

我是逍遥派，又还有点钱，一开始串连，马上跑，登泰山，登华山。后想五岳都去一下，但交通马上堵塞了，于是去了一趟青海，看了塔尔寺，又去了一趟新疆。那时大家都去城市造反，华山、泰山根本无人，确实闹中求静，忙中偷闲，领略了一番一览众山小和自古一条路。1967年春节过后，由于火车根本挤成一团，我决定骑自行车南下，当时小弟弟13岁，亦随我南下。我们一行四人，从北京到天津，沿运河南下，日行夜宿，随遇而安，吃农家粮，住农家屋，到扬州，过镇江、无锡、苏州，然后坐火车送我弟弟及其他两同学回京。我又坐火车过南京，登中山陵，游未名湖，返苏州。从苏州自行车自己上路，到上海，轮渡宁波。从宁波骑车南下，过南溪，游雁荡山，到温州，沿瓯江到金华，过鹰潭上火车回了北京，前后五个月，行程八千里，我都没计算过。

回到学校，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组织的革委会早垮了台，什么刘邓陶、杨余傅、二月兵变、八月逆流，一天一个样，小报满天飞，一天一个大流氓，一天一个大叛徒，政治局，书记处，元帅，大将，没一个好人，除了毛、林、周、康生、陈伯达，还有一个李先念。我当时跟几个人说，「大家都是反革命，革命是谁搞成功的？」「我就不相信毛会把班交给林。」这两句话，当时就够杀头的，但这几个人真没出卖我，反革命越来越多，各路太子自然也越来越多的变成黑五类，我这首席黑五类太子却无所谓了，别人可能觉得是死老虎了，打新鲜的才有意思，江青隔三差五出来鬼哭狼嚎一次，周恩来振臂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陈伯达呱呱乱叫，中国人讲话还要中国人翻译，这是一个全党、全军、全民发疯的年代，是全党、全军、全民说谎的年代。

我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但大难临头，我是逃不过的。1967年下半年，复课闹革命，我这样的逍遥派最欢迎，革命没我的份，复课则不排斥我。到1968年1月25日，离春节还有几天，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已经和妈妈通了电话，说下午就回家，准备过春节，由于一个仪器不够用，轮候误了点时间，要不我

早走了，突然实验室门口来电话，说有人找我（我们实验室外人不准进，只能电话讲话），我问谁，答：中央二办。我想，中央二办找我干什么，是爸爸那儿有什么事了。长长的走廊，走五分钟才出来，看到我一个同学陪着一个小青年来在等我，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小兵没穿军装。我问找我干嘛，答：「首长在宿舍等你。」我说：「我回家了，不回宿舍。」那小兵说：「无论如何回趟宿舍，我们一大堆首长老远跑来。」我问身边的同学：「多少人？」同学答：「好多，三辆汽车。」我想这么大阵仗，那回一趟吧，于是说：「好吧，回一趟吧！」一路上我观察这个小兵，他始终把一只手插在裤袋里。我想他是握着一支手枪，如果我拔腿就跑，他就可以开枪。我心里好笑，我干吗要跑？何况真要跑，我从实验室其他门早走了，还会等到现在？后来我认清专案组真面目后，再回想这一幕，觉得项目组实在狠毒，他们可能很想利用年青人的无知、冲动失去控制，可以名正言顺一枪毙了你而不负任何责任。

回到宿舍，一看坐满军人，其中有一个爸爸的秘书，总参作战部的一个上校，邓汀。我看到邓汀，问他：「邓秘书，你来干什么？」邓汀也不答我，只是对另一个做了一个眼色，我想是验明正身，告诉那个家伙，不错，这是罗瑞卿的儿子。那个家伙猛然站起来，大声吼道：「我们是中央二办项目组，现在逮捕你。」他们大都以为我一听到「逮捕」二字，会吓瘫了，但是我轻蔑的看了这个家伙一眼，轻坐下，我说：「你吵什么！你中央二办有什么权力逮捕人？逮捕人正公安局的事。」这几句话虽然轻，但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那家伙磕磕巴巴说：我们...我们...，然后又指着另一个「他是公安局军管会的人，这是公安局军管会签发的逮捕令，你签字吧。」我说：「签字是什么意思？如果签字是说我有罪，我同意你逮捕，我不签。如果说签字是遵守法律，我可以签。」那个家伙没想到这小毛头还这么多法律问题，不耐烦地说：「有没罪进去说，快签吧！」我说：「有没罪进去说，这是可以的。」于是画了押，他们没上手铐，两个人坐在我两边，就进了监狱。

项目组拿我的东西，看到一只大木箱，中国式的那种大箱子，他们以为抄到了什么金银财宝，打开一看，就是一箱子书，其中有「资本论」。

3、文革入狱，1972 年生日回家

进了监狱之后，关在一个斗室之中，刚开始也有点激动，特别是想到妈妈，

又过春节了，眼睛发酸；又想男儿有泪不轻弹，不能落泪，尤其在这种地方。

开始几天连续审问，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什么事可以逮捕我，所以有问必答，还有什么「快说清楚快回家」之类的话，再向下就越来越不对头了，什么你爸爸有没有讲过反林彪的话啊？有没有讲过反毛主席的话啊？明显的逼供。大概也就在第三天，我猛然拍桌子大吼一声：「你们是封建法西斯！」把这帮人吓了一跳。我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们拿纸来，我写信给毛主席、周恩来，你们中央二办是封建法西斯，是国民党。」这帮人吓了一跳，说：「你敢骂我们中央二办。」我说：「我不仅敢骂你们，我还敢写你们，拿笔来。」他们不敢给我纸和笔，我越发看出他们是做贼心虚，至此之后，半年时间也没来过一次。

我关在监狱里，没衣服穿，没被子盖，没东西吃，好在冬天进的监狱，穿了一件皮褸，否则真要冻死。刚开始，饿得想啃木头；三个月之后，什么饿的感觉也没有了，但是给多少东西，我吃多少东西，有时偶尔汤里有块骨头，也是嚼碎吞进去。半年没换一次衣服，半年没洗一次澡，半年没见一次太阳。我在这半年时间里，从放风上厕所时在走廊偷了一瓶墨水，在我的一本毛泽东进集的上、下扉页上，写了一封长长的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历数专案组的罪状：虐待、逼供信。我写这个东西大约写了三个月，因为要随时避开狱卒不定时的监视，必须在狱卒掀开监视孔的布帘前，把墨水藏好。写好之后，我敲敲门，狱警开门，问：「你干什么？」我说：「我有一封信给毛主席、周总理。」狱警不解的看着我，因为监狱里的规矩，没给你纸笔你写什么信。我看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把书给他，说：「写在书上了。」他把书拿走没多久，来了一大堆狱警，气势汹汹地说：「你敢偷墨水！」我说：「我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项目组为什么不许？」他们也回答不出来。有几个家伙一来摆出一幅要动粗的架式，看我义正词严，也没趣地溜走了。第二天，专案组几个家伙也来了。在门口说：「好哇，你敢骂我们。」我说：「我早骂了你们，我现在是写给你，让你有证据。」我说：「我还特别写明了，如果我死了，就是你们害死的，我不是自杀。」一大堆狱警围着，专案组的几个家伙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又理屈词穷，转了几个圈就走了。

自此之后，待遇逐渐有所改善，一个月洗一次澡，一个星期放一次风，学校的被褥也拿来了。到1969年初，突然东西多得吃不。打开门，随便装，但我

肠胃功能已大大减弱，根本吃不下东西，又不好好做，比如黄豆，做豆腐或磨豆浆多好，就给你煮煮，人能吃多少？到 1971 年夏天，专案组的人提审，说：现在宣判，你反林副统帅，盗劫国家机密，现开除团籍，送劳动教养，以观后效。」我这时是一点都不怕他们了，我说：「你们是哪级法院？我要上诉。」他们也不理我，拿起本子就走了，虽然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开始交恶，批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检讨。但明显的感到项目组心不在焉。在城里二监、一监三年半，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但也有好处，在监狱里避开了武斗，外边很多同学莫名其妙就斗死了。

1971 年 6 月我被送到长城脚下延庆砖厂（劳改农场），到后先吃了一碗红烧肉，已经三年半没吃过了，然后把我带到一个房子里，也没铁窗，送我的人掉头就走了，门也开着。我看着门想了好一阵，门没锁，我是否可以出去呢？后来我决定还是出去。走出门，看看两边，也没人，对面一排十几间房，住着警察，我们这边十几间房，隔壁两间有十几个人，进进出出，我一人一间，其他都空着，一看就不像监房。我看没人管我，觉得很好笑，刚刚还在监狱，现在怎么没人锁门了，不管它了，我拿个小板凳，坐在院中央，只穿一件小裤衩，晒太阳。

六月的太阳，别人躲还没处躲，看我光着膀子晒，很奇怪，一个警察走过来，笑着问：「干么哪？」我说：「三年半没晒太阳了。」也不知他听懂没听懂，他笑笑走开了，人还挺和善，不像凶神恶煞似的狱卒。过一阵，一个自称「教导员」的老头来看我，把我那箱书也抬来了。那老头也没多少话，我说：「我没事，他们是封建法西斯，乱抓人。」老头指着那个大箱子，说：「这一箱子书都是你的？」我说：「是过去三年半我一直向他们要，他们不给，也也是我说他们是封建法西斯理由之一。」老头站起来，并不搭我的话茬，说：「在我们这儿不会有虐待」，就走了。至此，我就开始读书，一大箱书足有三尺厚，有资本论，史记，读到吕后篇，好像看到江青。

没三个月，「九一三」了，十一报纸看不到「林副统帅」，知道林彪一伙肯定出事了，但不会想到如此彻底。再过一阵，消息通过隔壁劳改释放犯传来了，说林彪摔死在蒙古。我就写给专案组，我骂道：「你们都到哪去了？你们

不是说我反林彪吗？林彪现在去哪儿啦？告诉你们，当时我说你们造谣，现在我还说你们造谣，我没那么英明伟大。」

教导员看了我写的东西，无可奈何的笑笑，我说：「你笑什么？」

他说：「你可真行，那时他们说你反林彪，你说你没反；现在大家都反林彪，你还说你没反。」

我说：「本来就是嘛，你以为他是给你戴高帽啊！」教导员又重提：「你的事我们不管，我们只管人。」我说：「你放心，我现在根本不用你看，你现在赶我都赶不走了。」老头突然问：「你怎么不给家里写信啊？」我说从捉人的第一天我就要写信，四年了，项目组一直不许。我说我不知兄弟姐妹去哪儿，兄弟姐妹也不知我死活。他说：「你写，你写。」我说：「往哪儿写？」他说：「你写，我给你递。」当时，兄姐都不在北京，弟妹也都赶去上山下乡，几经周折，收到我的信，大家惊喜万分，然后哥哥、姐姐、妹妹、弟弟才陆陆续续来看我。小弟弟分开时 13 岁，再见面已经 18 岁，长得比我都高，根本认不得了。他们也带来了父母的消息，原来我一直想父亲凶多吉少，但弟妹告诉我，二老都还行，也都去看过了。形势看起来逐渐会好起来，再愚蠢也会知道罗瑞卿这案子肯定是冤案了。

一直到 1972 年 11 月 18 日我的生日，原先讲好弟妹来看我，早上起来，教导员匆匆走来说：「快收拾收拾，回家了。」我说：「回哪儿家？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赶也赶不走我。」他说：「专案组来人了，在办公室等你呢。」我走到办公室，看只有一个穿军服的，是原来审问我时坐在最旁边记录的小官，其他都是穿便服的，不认识，后来他们说他们是公安局的。我坐下之后，那个穿军服的家伙说：「我们今天来接你回家，先送你回清华，然后回家。」我说：「没那么容易。你先说清楚你为什么抓我。」那个小官看着我说不出口，我于是破口大骂，骂他们是封建法西斯、国民党、沙皇。总之，把过去骂过的从头骂一遍，骂他们不给我书读，不给我报看，不给东西吃，不给衣服穿，骂得那个小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一句话说不出来，骂得我都累了。旁边两个自称公安局的人出来打圆场，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说：「现在不说这些了，先回家。今天是你生日，弟妹还在家等着哪。」教导员也上来打哈哈说：「从前的事我不知道，可你在我这儿没挨过饿，没受过冻。」

我想骂这些小猫小狗实在也没用，他也不是决策者，还是先回家吧。实际是先回到清华。当时清华是四人帮的天下，什么工宣队，军宣队，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仇视林彪集团，也仇视一切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于是又有一番恶斗，后面再写。

4、爸爸翻案复出，任军委顾问

1973年1月回到地安门两个多月，去看爸爸，在阜外医院，腿伤残了，一只脚截了肢，父子八年不见，我强忍着泪，说些宽心的话：「大家都活过来了，一个人没少，姐姐还多了一个儿子，你多了个外孙。」父亲也强忍着泪，甚至说了一句：「你说的对，要活着，活着就能讲清楚。」我心里想，有什么不清楚的，毛心里比谁都清楚！

过一阵子又去看妈妈，在秦城监狱，姐姐的儿子刚满月，也抱去了。我捧了一大把花，接见时间过后，项目组一个家伙恶狠狠地对我：「以后不许带花。」当时有个公安部的老人，黄翠英，我们从小就认识，管监狱的，我对黄翠英说：「监狱规定不许带花吗？」黄翠英狠狠地瞪了项目组那个人一眼，说：「带就带吧，还能关几天啊！」

但形势发展的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快。四人帮在阻挠，汪东兴在阻挠，周恩来实际上也并不积极，因为毛1971年就发了话，说我们有些事办错了，比如罗瑞卿。有了这句话，周恩来实际上1971年就可以解除爸爸的监护。翻案的动力主要来自邓小平。邓小平1972年底回到北京后，着力翻案，而罗案是最容易翻的一个。

1973年大半年时间爸爸住在301总院13病室，爸爸在这头，彭德怀在那头，再后来，虽然门口坐一个兵，我们小孩也可以陪住。我当时在工厂当技术员，弟妹轮流值班五天，我值班星期六晚、周日。每次去医院，都听到对面彭德怀在骂娘、摔盆子、砸碗。彭总也无亲人，也无人去看，至到1974年去世。

向父亲宣布解除监护当天，我骑自行车从郊外到城里，先去胡耀邦家，然后去妈妈一个朋友吴珍阿姨家，然后去刘少奇儿女的家，然后去第一任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两个儿子佩公、佩荣家报喜，这些人都是我们在困难之时经常交往帮忙的人。爸爸解除了监护，妈妈却还关在监狱里，于是爸爸给毛、周写信，说：「我都放了，郝治平还关着干么？」

这封信上去不久，1974年1月，一天我回到地安门的宿舍，一个人没有，桌上留张条：快去白广路总参三所。我猜是妈妈，骑上车飞奔，到白广路，果然三个弟妹和妈妈抱着一团，每人都挂着泪水，却强着笑容。当晚一个单元三间小屋，妈说：「睡在地上也要睡在一起。」好在招待所匆匆忙忙把对面一个单元腾空，安顿下来，妈问，爸爸呢？我们说：「在医院。」妈妈说：「我明天去医院。」我们说：「还要缓一缓，两人都要准备准备。」妈问要多久，我们说：「一个星期。」

于是一个星期，三个小的和我天天给爸爸做工作，说明天妈妈说不定就出来了。三个小的还跟爸爸打赌，说如果妈妈明天出来了，你请我们吃烤鸭。爸爸说：「那没问题。」爸爸问我：「三个小的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呀，妈妈说不定明天就出来了。」爸爸说：「你敢保证？」我说：「差不多。你不是说你都放了，还关她干什么！」这么说了几天，妈也等不及了。我们说：「好吧，明天去医院。」

第二天，医生护士拿着氧气袋在门口值班，我告诉爸爸：「妈妈已经回家了，已经几天了。」爸爸问：「在哪儿啊？」我说：「已经来了。」正说着，妈妈走进来，一下坐在床边，就要看爸爸的伤腿，爸爸拉着妈的手，说：「我很好，没什么，你受苦了，我对不住你。」我们就在旁边劝，说：「今天是好日子，不说这些，说些高兴的事。」

直到今天，三十年过去了，我都不敢想这一段，不敢写这一段，一起笔，泪就忍不住。解除监护时，陈毅已经不在了，张茜也重病，妈妈去看了看，回来说，人已经不行了，也没几天了。

春天，回到白广路住处，隔壁是张爱萍，很快邓小平通过张爱萍传过话来，说让罗写个报告，什么也别说，就说去福建治腿，我来交给主席。爸爸写了之后，很快毛批下来，空军派一架飞机送爸爸去福州。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待父母为上宾，住在汤井巷，和他们一个园子。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夫妇三天两头来看。后来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皮定钧跟爸爸说，要上山打游击，我们抬着你。可惜皮叔叔1975年演习时直升机坠毁身亡。

1974年，我们全家生活比较平静，父母在福建养病，弟妹也回了城，由于邓小平力争，到1975年八一建军节前，毛签发了任命父亲为军委顾问的命令，

一天杨成武派人来找我到他家，这是从上海会议后第一次见到他，一见到我就抱着不放，说这么多年多么惦着我们，他们全家受了多大的苦，他有一个女儿也死了。我心想，你那么惦着我，我在地安门、白广路这几年，你当副总长，怎么没见你来看看我们？总之，说了一大堆亲切的话，然后言归正传，说毛主席批了，请爸爸出来当军委顾问，他现在派一架飞机去福建接爸爸，本来他应该去，但是忙，走不开，要我去代他问爸爸好，他说，「我派人随你去，你有什么事就吩咐他们办，总之，一切要安排得最好最好。」

我实际上心里已经很烦这种人的表演。我心想，上海会议你是什么嘴脸？三月京西宾馆会议又是什么嘴脸？现在又亲成这样，这能是一个人吗？哪幅嘴脸是真的？或者根本就没有真的？

我去福州接爸爸，爸爸身体、精神明显好多了，妈妈也很高兴，说爸爸天天锻炼身体，用中药治腿。当时廖志高夫妇、皮定钧夫妇，还有一些副书记、副司令一大群人来送别，大家一起吃饭，爸爸还稍稍喝了点酒。虽然大家都很高兴，爸爸终于恢复了名誉，但是北京发出来的消息又使大家很担心。毛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周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四人帮猖狂的不得了，邓孤掌难鸣，廖和皮千叮咛万嘱咐，说开完招待会就赶紧回来，还是在福州好，不要住在北京。

回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十年前在此开「三月会议」，一帮昔日共同打天下的战友，杨成武、萧华、刘志坚……一下都变成了疯狗。父亲悲痛气绝，撒手人寰，老天爷看不过，扶了一把，父亲身残命尚在，经历了多少磨难，十年一梦。罗瑞卿又回来了！此时毛泽东的威信已一落千丈，老百姓不敢说，并不是不敢想：刘少奇是你毛泽东选的，你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又选了林彪，结果林彪背信而去，摔死在蒙古，你毛泽东还有什么英明伟大？打天下，好不容易这么多志士仁人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坐了天下，你却为了一己之私利，挑动元帅斗将军，将军斗元帅，斗的一个天下大乱，老百姓也跟着受苦。

我推着父亲坐在轮椅上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周恩来身体已经不行了，江青也不便露面。其他的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却到了，两帮人员，泾渭分明。一帮是华国锋为首的文革发迹派，一帮是邓小平为首的文革翻案派。文革第一案是彭、罗、陆、杨，罗翻了案。文革最大的走资派，

刘、邓、陶，邓翻了案。跟着邓小平，罗瑞卿上台的一串串干部，当然都需翻案。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一帮老家伙，好坏先不说，但都是能人。文革起来的这一帮，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好东西，而是在于他们不是能人，他们哪斗得过这帮老家伙！

开完招待会，就去看邓小平。邓小平的思路很明确，就是聚集力量，准备毛泽东百年之后，和四人帮斗。邓小平当时对形势的估计稍稍乐观了一点，没想到毛泽东临终还是听了「四人帮」的话，把邓小平打入冷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后话。

5、翻案风，一串串

看完邓小平，回来后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想去看看。周自己没接电话，让秘书打电话来，说：「总理身体不好，明天又要动手术，总理说，你们来看看小超吧。」秘书是不敢用「小超」的，所以这里传的是周的原话了。于是去看邓颖超。邓颖超说：「恩来让我带两句话给你们：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一切恩情集中在毛主席身上。」

我心想，我的上帝，这可怎么集中啊！当然，这种场合没我说话的份，我也不会说任何得罪邓妈妈的话，但我后来确实把我的想法告诉过爸爸。爸爸听后真生气了，说：

「你什么都有意见！」我看他真火了，也不敢吭气了，但我始终也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批评，什么都有意见也不好？妈妈则不吭气，但我明显的感到妈妈并不觉得我说的一点没道理。

然后又打电话给朱老总，康妈妈接的电话，说：「你们来吧。我们现在就住在你们过去住过的新六所。」天啊！1965年上海会议后，我们在城里的房子在修，我们在新六所住过。可是这么多年了，康妈妈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新六所住过！去到新六所，老总颤颤悠悠的走到厅里来迎。爸爸行动不便，下了汽车又要坐轮椅，又要上台阶，非让我扶他站起来不可。老总看到了，慢慢悠悠走过来捺着不让动，说：「你不方便，不方便，算了。」我猜爸爸是想给总司令打个敬礼，他从医院出来那天，让汽车走去天安门广场，给主席打了敬礼才回家，一个要起，一个捺住，老总是九十多了，我说：「别争了，爷爷都站不稳了。」（我们从小喊朱老总爷爷），康妈妈也来扶，妈妈也来扶，一行人慢慢

悠悠才走进去，坐下来。

朱老总健康虽大不如前，但头脑清清楚楚，说：「上海会议我就说，罗瑞卿是反革命，我不相信」，又说：「你看现在，成什么样子，这么大的国家就你一家子管了？」明显是冲着毛的，爸爸也不敢应什么。朱德、罗瑞卿私下议论毛泽东，传出去还了得？！临行，老总还要送，怎么留也不行，又颤颤悠悠送到门口，看着上了车，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我事后想，可能老总也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所以非要送到门口。在我的心目中，朱德两口子 and 周恩来两口子就是不一样，要说慈祥可亲，都慈祥可亲，可就是不一样。

回到京西宾馆，值班室的人说：「叶帅打来电话，他在底下会议室开会，请罗顾问过去一下。」我推着轮椅从主楼走到会议厅，一开门，看到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一大堆人都在，看到爸爸，一溜跑过来，华国锋拉着爸爸的手，说：「我是华国锋。」爸爸 1959 年陪毛回湖南老家时，华是湘潭地委书记，拉过一遍手，说：「叶帅在里边等你。」我又推着爸爸往里走，到了另一个会议室。一开门，好大一个厅，黑糊糊的，叶一个人坐在最里头。我推着爸爸过去，叶对我说：「猛子，你在外边等爸爸。」我随他的参谋走出来，也没谈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叫我进去，叶问我：「妈妈好吗？」我说：「好。」又问我：「你还没当兵啊？」我说：「没，我昨天已给邓伯伯写了报告，要当兵。」他说：「好。」又说：「好好照顾爸爸。」然后又突然冒出一句：「选宁断了一条胳膊，你爸爸断了一条腿。」我也没应他，心想，这是哪儿和哪儿？（选宁是叶剑英的儿子，做到总政联络部部长，凯利公司董事长，授少将衔到退休。文革时在农场劳动被机器卷掉一条胳膊，前不久香港东周刊封面报导他老婆投资九亿港币经营澳门赌场。）

折腾了一个星期，来看的人越来越多，宾馆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接待室人满为患，宾馆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我只好告诉宾馆，你们只能把来访的人姓名记下来，劝大家回去，罗顾问实在是身体很不好，见不了这么多人，另一边我们瞒着父亲，不告诉他。但也瞒不住，有一天他问我：「门口有很多人找我啊？」我说：「是啊。这么多冤、假、错案，现在你出来了，人家想有个包青天。」爸爸说：「我是什么包青天。」然后又说：「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我说：「告诉您也没用，这么多人，认识的，劝劝也就走了，越不认识，越劝

不动。」爸爸说：「那都不见总不大好吧。人家有冤啊！」我说：「我的冤你听完了吗？妈的冤你听完了吗？人家现在就等着抓你们这些人的翻案风呢！」妈瞪了我一眼，说：「不许这么跟爸爸说话。」然后又说：「实在是人太多，一时也不能管，卓琳告诉我，邓的策略是一个一个翻，翻大案，像你这个彭、罗、陆、杨文革第一案；罗翻了案，跟着罗当反革命的公安部一串、军队一串，不就都翻了案。刘、邓、陶，邓翻了案，刘、陶早晚也得翻。」妈又说：「我也只见了刘秘书的老婆，刘秘书在文化大革命整死了，就因为当了两天你的秘书。我也只能告诉她，很快会平反的。」爸爸问：「哪个刘秘书？」我说：「就是金秘书去四清时，代金秘书班的，国防工办的那个刘秘书，我也是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我说：「还有李章奇、梁惠兰两口子。李章奇关了好几年监狱，我在监狱还见过他。」爸爸妈妈一起惊奇的看着我，爸爸说：「你还看见过他，你怎么看见的？」我说：「人家把窗户都漆上白漆，我摩开一条缝，天天没事就往外看。有一天，突然看到李章奇从窗户下走过去。」妈妈说：「看看你这儿子，在监狱里还这样，这要让人抓住，不得打一顿。」我说：「还好，一监还有点爸爸老公安的传统，不许打人。」

看看北京确实没法住，也没个家，我和妈商量，还是听廖志高、皮定钧的，回福州，跟爸爸一说，也同意。于是打个报告给军委，派架飞机送爸爸回福州。王震、王季青两口子来看，王震指着王季青阿姨说：「她身体不好，医生让她洗温泉，听爱萍说你们汤井巷温泉好，你带上她行不行？」爸爸说：「当然行，廖志高是地主，我是喧宾夺主了。」王震是粗人，说话声音好大。文革前我们并不很熟，一年多前，爸爸还没解除监护，他让秘书伍绍祖（后来因为法轮功事件下台的体委主任）找到我，让我去他家吃饭，他说：「你爸爸是好人，很快会出来工作。」一顿饭，翻来复去就讲这一句话。

途中，爸爸说在南京停一下，想看看南京大桥。飞机降在南京，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政治局委员，避而不见。政委廖汉生（杨尚昆的妹夫）来迎，把爸爸送到南京国宾馆，毛过去住的楼，爸爸都很熟，一看停在一号楼，就说：「不行，不行，这是主席的房子。」廖说：「有什么不行，外国人都住，中国人更可以住，反正空着。」爸爸坚决不肯，不下车。廖就要往下抬，妈妈不吭气，我就说：「就你知道主席住过，我们也不知道，来了，就听廖叔叔的嘛！」

廖汉生说：「猛子说的对，来了就听我的。」爸爸看看拧不过我们，只好下车。廖汉生把爸爸送进房子，说你先休息休息，我晚上来跟你一起吃饭，咱们吃大闸蟹，说完就走了。我们推爸爸进去洗手，休息。我听到妈妈小声埋怨爸爸：「就你多事，什么主席的房子，主席有多少房子？住哪儿不一样。」爸爸却不吭气。

晚上，廖汉生大摆宴席，爸爸也很高兴，还喝了一点茅台。杨绍京也在，我问他：「杨叔叔在哪儿？」他说：「给送到山西一个什么县里。」我问：「怎么样啊？」他说：「还行，只是吃东西不大习惯。」我问：「李妈妈呢？」他说：「在一起。」我说：「你们不去陪陪啊？」他说：「小二、妞妞轮着去，他也去过。」我说：「这些人有什么必要关监狱，你把他放在大街上，他也不知道往哪头走能到家。」

第二天，看了长江大桥，就回了福州。我随飞机回了北京。杨成武打来电话，说：「猛子，邓副主席批准你参军了，你去哪儿？」我说：「总参装备部。」他说：「那好，赶紧办手续吧。」手续办了两个月，到10月我刚穿上军装，风声就不对了，11月就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给隔离了，免去一切职务。杨成武脸色马上变了，说：「你不能去装备部了。」我问：「怎么了？」杨成武说：「你是邓批的参军，不把你退回去就是好的。你去装甲兵吧。」我一听，这口气，还有什么说的，去就去吧。装甲兵当时司令是原成都军区司令黄新庭，政委是原军事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副司令贺普年，都是打倒后刚站起来的，对我都很亲切。

6、周恩来去世

到年底，妈妈打来电话，说：「北京风声很紧啊？」我说：「是啊。」妈妈又说：「中医说让爸爸去上海看看西医，照照片子。爸爸已报告了军委。福州军区值班飞机送爸爸去上海，你能不能先在上海打个前站？」我说：「行，我跟黄司令请个假。」于是我坐火车去上海。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热火朝天。我安排好军队的延安饭店，就去机场接飞机。飞机没落地，看到又来了一队小车，上边下来了一个老副市长，已投靠四人帮。我们过去经常来上海，此人也熟，他看见我，就过来说：「罗顾问来上海，一定要住在市里，正是锦江饭店。」我说：「军队的饭店，已经安排好了。」他也不理

我，径直走向飞机。爸爸、妈妈看到他都非常吃惊。（后来爸爸告诉我，这次来上海，根本没通知地方，不知他们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到人家地盘上了，人家还能不知道？）他还是那句话，说无论如何，罗顾问要住到锦江去。爸爸看看我，我说：「军队那边已经安排好了。」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不吭气。爸爸无可奈何的笑一下，说：「我这次是来看医生，本不想麻烦市里了，现在你盛情难却，就住市里吧。」于是一行人上了市里来的车，直奔锦江饭店。锦江饭店实际上分两部分，两个塔楼是大家称的饭店。隔了路对面还有一个大园子，是给毛泽东准备的，也属锦江饭店，但不对外开放。汽车径直开入大园子，这次爸爸一声不吭了，任他们送到哪就哪。安顿之后，爸爸对妈妈和我说：「你们不是说到了人家这儿就听人家的嘛！」

我说：「是啊，到了南京，听廖叔叔的；到了这儿，就听四人帮的。」爸爸马上阻止我，说：「胡说什么！」又把我拉到跟前，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这里是人家眼皮底下啊。」我也小声对着他的耳朵说：「主席都说四人帮了。」爸爸使劲摇摇手，不让我再说下去。

刚刚说如何安排看医生，传来周恩来去世的消息。爸爸心情很沉重，说：「我要回北京参加总理追悼会。」我打电话给北京，请军委派飞机来上海。军委办公厅主任在电话巾恶狠狠地说：「中央有规定，外地的人一律不准来京参加追悼会。」我告诉爸爸，爸爸大发脾气，说：「你要通电话，我跟他说。」电话要通了，爸爸在电话中大声斥责这个主任，说：「我是军委顾问，我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你报告军委，就说你派飞机就派，不派飞机我罗瑞卿坐火车回北京。」说完就把电话摔下。

妈妈和我看爸爸发这么大火，就劝他，何必跟这些小人发脾气。爸爸说：「岂有此理。」我说：「他也不过是传个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陈锡联。」但是第二天军委办公厅就来了电话，说接罗顾问的飞机今天就到上海。我赶紧告诉爸爸，爸爸说：「他们现在承认我不是外地人了。」又匆匆忙忙收拾回北京，爸爸说：你打个电话谢谢人家，告诉他们不要送了，我开完追悼会还回来看医生。」

回到北京，开完追悼会，爸爸心情一直很沉重，比起半年前，整个形势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送灵的那天，爸爸非要去，我说：「人家也没通知，我们

也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你去了，车往哪儿停？往哪儿开？你行动又不便，反正要走长安街，不如就在京西宾馆送好了。」妈妈也劝：「人都走了，再送也是走了，在哪儿送都一样，总理在天之灵知道你送他就是了。」

好歹劝住了，从早上等到下午才看到灵车慢慢驶来。我看爸爸老泪纵横，妈也掉着泪，我也哭了。虽然我对周恩来有些看法，但我也知道，他实在是很难。真的在他的位子上，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比他做的还好，我想个人没有，我也看不到有任何其他的人有。

丧事办完之后，爸爸跟妈妈说：「要不要去看看邓大姐？」妈妈说：「这个时候，还缺咱们？」爸爸想了想说：「也好，你给赵玮打个电话就行了。」赵玮是邓颖超的秘书，妈妈打过电话，说：「我们这次就不去看大姐了，多多保重。」赵烽说：「也好，大姐这几天谁也不见。下次你们回来再联系吧。」于是又回上海，看医生。又去无锡、苏州住了几天，都是住「毛泽东的房子」。由于这一带毛过去经常来，爸爸也陪过好几次，所以讲了很多故事，后面要写的「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我所知道的林彪」、「我所知道的上海会议」等等，很多就是这个时候讲的。

周走了，毛那儿一点动静没有，邓又隔离了起来，叶剑英那儿也没个招呼，突然冒出个华国锋当总理，也不知道主席葫芦里卖什么药。我跟爸爸说：「贺普年副司令提过几次，说现在这个样，我不如出去躲躲。」爸爸说：「往哪儿躲？」我说：「当兵啊，干部下连当兵，离开北京。」妈妈说：「也好，省得有个风吹草动，让人家一网打尽。」爸爸想想说：「你没当兵就当官，这不好，我赞成下连当兵。」我说：「我坐了五年牢啊！」爸爸说：「别常把五年牢挂在嘴边。」妈妈接上来，说：「你回去就跟贺副司令说说，去当兵吧。」然后又补充说：「人家不是给爸爸、妈妈补了一点工资吗？你回去分一分，一个孩子一份，都分散吧！别又一锅端了。」我说：「多少留点吧。」爸爸妈妈都说：「留什么？我们俩不需要钱。」皮定钧又派值班飞机把爸爸接回福州，我就火车回了北京。

7、毛去世，四人帮被抓

正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前，我也去天安门，撞见耿飊的爱人赵兰香阿姨。那时谁也不敢去看谁，怕人家说串连，右倾翻案。小赵阿姨一看到我，就说：「爸

爸、妈妈好吗？」我说：「还可以，在福州。」小赵阿姨说：「去福州好，别回来。」匆匆说了几句话，掉头就走，像怕别人看到。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后，风声紧了，又到处抓去过天安门的反革命。我一回去上班，就找贺普年副司令，我说：「爸爸也同意我去当兵，你说去哪吧。」贺说：「张家口坦克六师，师长可以，你去那儿当兵吧。」当时叫干部下连当兵，手续办了很长时间。

到了八月，说可以去了，突然传来朱老总去世的消息，我又得去福州接爸爸妈妈回来参加朱老总追悼会。参加完追悼会，爸爸住在 301 医院检查身体，就地震了。我们住在白广路，我冲进妈妈房间，拉上妈妈就往外跑。满楼的人都跑到园子里，妈妈跟别人说：「我还没搞清怎么回事，猛子就把我拉出来了。」我们住在最低层，楼上好多人都来不及穿衣服就跑了出来。我又赶紧跑进去，拿了一些被单之类的给大家，然后我跟妈说：「我得去医院看看。」我叫上司机，就直奔 301。到了 301，看到老头们都在院子里，什么事没有，我就劝爸爸还是回福州。

结果刚回到福州，又传来毛去世的消息，又去接爸爸妈妈回北京参加毛的追悼会。追悼会那天，军委办公厅通知，军委顾问就在天安门广场，不带随员，没有椅子，身体不好就别去了。当时，陈再道（原武汉军区司令，上将），王建安（原福州军区副司令，上将）都是顾问，身体还好，就谭政（原总政主任，大将）身体很不好，谭听这口气，只好说：「那我去不了。」爸爸说：「我得去。」我说：「你有轮椅，我推你去，他总不能不让我去吧。」妈说：「特别讲明不带随员，那我也去不成了。」我说：「你就别去了，在天安门广场上，也不知要站多久，那么大太阳，你哪受得了。」所以妈妈也没去，我们开车去中山公园，车停在中山公园正门里边。下的车来，两个照顾爸爸的小战士也不能走了，只有我推着爸爸从正门里出来，过了金水桥，就在最前边是我们的位子。过了一阵，看到陈再道、王建安也走来，他们从车停的地方，走了好大一阵才过来。我说：「陈叔叔，这么大太阳，你们不如在门洞里等等，开会时再来。」陈再道说：「哪行啊？人家说，现在就要各就各位。」他们俩走过来，看看时间还早，周围的人都坐在地上，他们也只好席地而坐。我心想，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些南征北战的老将军打天下时，你王洪文还穿开裆裤呢！现在你却当什么副主席。过了好长时间才看到华、叶、李先念和四人帮一行等走出来。

我心里虽然对毛有看法，但不要说毛了，就一般人，送人家走时也不是想人家的不是。文革前我们敬他如神，爸爸随他征战一生，当时总觉得，毛在，情况可能还好点。如果四人帮当了权，情况会更糟，我还是毕恭毕敬送他的。

开完追悼会，爸爸妈妈就催我回部队，我说：「我总得送你们回福州啊！」爸爸说：「不用了，你快走。」我知道他心里想的还是妈妈说的这句话：「别让人家一网打尽。」但又不愿意说出来，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就回部队了。结果刚到部队没几天，团面参谋跑来铺，说：「北京有电话找你。」那时电话很难打，团部离我们连好远，气喘吁吁跑去，一拿起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妈说：「快回来，马上回来！」我吓了一跳，问：「怎么了？」妈赶紧说：「好消息，电话里不能说，快回来！」我怎么想，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反正妈说是好消息，所以我又星夜赶回北京。

一到京西宾馆，看到爸爸妈妈合不拢嘴，这几年我真没见过他们这么高兴过，妈妈抱着我说：「告诉你，四人帮给捉起来了！昨天爸爸去开会，传达了，华主席英明伟大啊！」我一听，当然很高兴，爸爸突然对妈妈说：「昨天怎么没看到邓大姐，你打个电话问问。」妈妈打过去电话，这次是邓妈妈自己接的。妈妈说：「大姐，高兴吧。」邓颖超说：「高兴什么？」妈妈一听，不对劲，说：「你还不知道啊？」邓颖超问：「知道什么？」这显然是还不知道。爸爸听到妈妈和邓颖超的通话，就把电话接过来，说：「大姐，我们去看看你吧，好消息！」邓颖超说：「快来，快来！」

我们又匆匆忙忙赶到中南海西花厅，一说完，邓颖超说：「这么大事，都没人告诉我，他们把我这个老太婆忘了。」赵炜在旁边，当时的中办主任是汪东兴，邓对赵炜说：「你去问汪东兴，为什么昨天不通知我去开会。」我们说了会儿别的话，赵炜走来，说：汪主任让我给大姐陪个不是，说昨天底下的人忙中有错，忘了通知我们，说他现在派人把文件马上送来。」邓非常不满的说：「什么底下的人忙乱，就他汪东兴忘了我。告诉他，罗瑞卿现在在我这儿，都告诉我了，还要他的文件？」我们告辞出来，邓妈妈一定要送到门口，一路走，一路说：「还是你们想着我。」

回到京西宾馆，我说：「我送你们去福州吧。」妈妈说：「不用了。你杨勇叔叔现在也在这儿，他身体也不好，也想去福州看看中医。有架飞机送他，

他约爸爸从武汉、广州转一圈去福州。」爸爸说：「你还是回去好好当兵，我这儿的事你不用管了，你杨叔叔身边也有人，不会有什么事的。」

杨勇是文革前的北京军区司令，文革中搞的很惨，腿也打伤了，恢复工作后，发配到新疆当司令。当时新疆军区也是大军区，后来妈妈跟我说，一路上什么场合杨勇叔叔都坚持让爸爸走先。一次，广州军区欢迎晚会，爸爸说：「你是司令，你先走。」杨勇说：「你是总长，你先走。」爸爸说：「那是以前的事了。」杨勇说：「从前也好，现在也好，军委顾问，你也得走先。」满礼堂官兵鼓掌欢迎，他们两个在门口让来让去，妈妈说：「别让了。」林斌阿姨说：「当然总长走前头。」杨勇说：「我推你走。」父亲坐轮椅，他腿又不好，所以爸爸只好让小战士推着走在前头。

不懂中国政治的人，看了这段，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懂中国政治的人，才知道这就是中国文化表示尊重的方式。一路上杨勇还是总长长，总长短。爸爸说：「不能叫我总长了，现在的总长是邓。」杨勇说：「邓只是挂个名，你还是我们的总长。」那时邓还隔离着，大家都盼邓小平能快些出来工作。

8、邓极力推爸爸做总参谋长

1977年，我继续当兵。刚开始还强调继续批邓，我在大学没入党，到这时候才入党，入党志愿书上还要写上批邓。回北京休假，就找毛毛。毛毛那时住在他公公贺彪的家里。贺彪是二方面一个将军。我在电话上问毛毛：「怎么样啊？」毛毛说：「好多了。」我说：大家都希望爷子出来呀！」（私下我们都称邓为老爷子，他的子女也如是称。）毛毛说：「是啊，叶在推动这件事，华那传过来的话，要写个检讨。老爷子现正在写检讨。」我说：「检讨就检讨，只要能出来就行。」毛毛说：「是呀，大家都这么说。」

当时我们都把检讨当手段，出来当目的。我们拥护邓小平出来，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兴，并不是拥护邓出来当皇帝。但他自己出来的目的是要当皇帝，就像毛泽东的革命一样。参加毛泽东革命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并不是拥毛当皇帝。但毛自己的目的是当皇帝，所以，革命成功之后，真正的仁人志士就越来越失望。

夏天到了，由于叶剑英的努力，说服了华，中央传达了邓的检讨，恢复邓的一切职务。邓暂时住在西山，爸爸也从福州回到北京，一回到北京，就去西

山看邓，妈妈和我把爸爸推进房子，问候一番，不等邓赶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走，我们走，就你们俩留着。」

我和楠楠、毛毛去另一个房间聊天，彼此问问过去一年的情况。毛毛突然说：「贺平你不认识，现在也在当兵，还得请罗叔叔帮忙安排安排。」我说：

「爸爸是个顾问，什么事也不管啊。」毛毛说：「老爷子早讲了，他这个总参谋长还得罗叔叔当。」我说：「爸爸的身体可大不如前了。」毛毛说：「行动不方便没关系，坐在屋子里指挥就行了。」我说：「我们老头的脾气，坐在屋子里指挥恐怕难。」毛毛又冒出一句：「罗斯福不也坐轮椅嘛。」我没应她，心想，哪能跟罗斯福比。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走进来，说老爷子找大家都去吃饭，今天中午留罗家一起吃。走进餐厅邓、卓琳阿姨、爸爸、妈妈都坐在那了。邓说：「今天高兴，喝一杯。」爸爸说：「医生让我少沾酒，猛子代爸爸敬邓伯伯一杯。」邓自己斟满一杯茅台，就把酒瓶往我这边一推，楠楠、毛毛就把瓶子传过来，我也自己斟满一杯，然后说：「好，我代爸爸妈妈敬邓伯伯一杯，祝邓伯伯身体健康。」我一饮而尽，邓也一饮而尽，然后说：「我一餐就一杯，大家自己夹菜，自己饮酒。」卓琳阿姨就给爸爸夹菜，毛毛就给我夹菜。桌子好大，谁也够不到谁。妈妈说：「卓琳你坐，卓琳你坐，都自己来。」

高高兴兴吃完饭，告辞出来，在回来的车上，我把毛毛说的当总长的事告诉爸爸。爸爸说：「邓也说了，我说我有点力不从心。」邓说：「非你不可，力不够，少管点是非事，把住大事就行了。」邓的作风是举重若轻；爸爸的作风是举轻若重。我唯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我知道妈妈也是同样担心。

接着就是十一届党大会，华、叶、邓时代，爸爸又当了中央委员，后来爸爸告诉我：「开完中委，第一次常委会，邓提出：我这个总长还得给罗当。汪东兴不干。邓说：好，你不同意，让罗当总政主任。（张春桥抓起来后，总政主任空着）。汪还是不同意，邓发火了，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军队这么多事，我怎么管的过来！让罗当军委秘书长，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定了！」

当时（1977年8月），华是主席，叶、邓、陈云、汪只是政治局委员，是副主席，叶、陈都支持邓，华站在中间，汪就挡不住了。汪东兴为什么最怕罗瑞卿出来，我在后面再写。

其实，总长、总政主任、军委秘书长对邓来讲是一样的，就是夺陈锡联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权。军委秘书长的命令一下来，邓找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的首长来，只说一句话：「常委定了，今后军队的事就是罗管。」

9、帮爸爸当秘书

第二天，文件就像雪片一样飞来。当时，连个秘书也没有，也没家，还是住京西宾馆，只好由我和妈妈来拆信封，我粗略看一下，摘我认为较急、较重要的送爸爸看。没两天，妈妈当着爸爸的面，把文件一摔，说：「我不干了，我为什么干？我还没有平反呢！」文革前，爸爸的办公室有五个秘书，妈妈是办公室主任，我就催军委办公厅赶紧派人来。先来一个作战部副处长，一看这架式，干了两天不干了，托病请假。我又催再派人来，这样作战部来了个处长金耀鸣，来了一个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公安部的李广祥又推荐了陶驷驹，又找回一个老警卫员赵文岐当秘书，好歹办公室走上正轨了。

叶剑英办公室打来电话，说：「邓搬到米粮库为邓新造的房子去住了。叶帅告诉汪东兴，罗还没房子，宽街二号就给罗住，你们去看房子吧。」宽街二号我去过，进去一看，汪东兴把一切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连一块窗帘都没留。正看着，叶选宁来了，我说：「好大的房子。」选宁说：「又嫌它大了？」我说：「哪能嫌什么，这得感谢叶伯伯。」选宁说：「这儿的好处是邓朴方坐轮椅，修房子时就考虑轮椅哪都能去。」又说：「这个汪东兴，搬的这么干净。」我笑笑，说：「人家心里有气啊！」选宁说：「不管他，我找军办的人来，该添什么，添什么。」

我回去告诉妈妈，还得过一阵子才能去住。晚上我跟爸爸说：「你看你这儿这么多事，我是不是先不去上班了。」爸爸说：「不行，我正要跟你说呢，这么多天你不去上班很不好。现在我这儿人也齐了，你明天还是回你的装甲兵上班。」我知道，这些事不用驳嘴，听父亲的就是了。妈妈则不高兴了，帮我说话：「他要是去上班啊，你的文件就堆满一房子了。」爸爸不吭气，爸爸对我们小孩很严厉，但对妈妈总是让三分，特别是重新团聚之后，事事依着妈妈，好在装甲兵离京西很近，我白天骑自行车上班，晚上回来还可以照应照应爸爸的事。

后来我又去找邓楠，我说：「我们老头实在是力不从心，不如我给邓伯伯

当个秘书，这样多少还能帮点忙。」楠楠说：「我去跟老爷子说。」过了好大一阵，在去广州的路上，卓琳找到妈妈，说：「猛子跟楠楠说的事，老爷子知道了。老爷子说，他知道猛子是好意，但是老爷子有个原则，不用干部子弟，希望你们能理解。」妈说：「理解，理解。老爷子的原则是有道理的，这都是猛子自己的主意，他什么事都是自己的主意。」

1977 年到 1978 年的冬天，爸爸妈妈在广州，和叶、邓准备军委扩大会议，过了春节后回到北京。

1978 年 3 月，要进行核试验，装甲兵领导对我说：「你没参加过核试验，去参观一下吧。」我说：「好。」回去告诉爸爸，爸说：「你去吧。我和妈妈过两天去 301 检查检查身体。」我离开北京时，爸爸妈妈已去了 301。坐火车三天三夜，刚到马兰基地，还没住进招待所，基地值班参谋就跑来找我，说：「你是罗参谋吧，北京有电话找你。」从招待所坐汽车到基地值班室，电话上是金秘书，我说：「什么事？」金秘书说：「有急事，你快回来。」我说：「又怎么啦？」金秘书说：「电话上不好讲，今天有一架飞机送参观的人去马兰，你就坐这架飞机回来，都安排好了。」

我放下电话，问值班参谋：「今天北京有架飞机来？」他说：「已经落地了，在等你。」我说：「我得给招待所打个电话，请个假。」电话要通了，我跟领队说：「北京有急事，让我回去，我只好请个假了。」他说：「知道了，你回去吧。」然后就急急忙忙往机场赶，一架三叉戟停在那儿，我一上机就起飞了，就我一个乘客，不到三小时，落在西郊机场，金秘书在等着我。我在飞机上想来想去，感到不妙，一坐进车，我就问：「是不是检查身体查出了什么？」他说：「是啊，你妈妈的肺片上有个阴影，所有专家都看了，都说要动手术，要拿掉，愈快愈好，他们不敢去跟秘书长说，让我去说，我说：我初来乍到，你们是医生，应该你们去说。说来说去，我说：找你回来吧。」一见证实了我的估计，我顿感万箭穿心，心想：「老天啊！这是怎么了？刚刚好一点，为什么又这样？」眼泪也止不住往下掉。金秘书看我如此激动，也不敢吭声。过一会，我说：「不关你事，那爸爸不知道我回来了？」金秘书说：「不知道。医生们都在等着哪，咱们先去看医生。」到了 301，蒲院长一大帮医生都在，情况也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其实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报忧。我说：「行，我去说。」

心里我想的，还是那句话：天垮下来，我顶着。

10、妈妈开刀，拿掉一叶肺

然后我去爸爸病房。爸爸一个人在灯下看文件，看见我进来，非常奇怪，问：「咦！你怎么回来了？」我尽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医生们有点事，不敢告诉你，让我来说。」爸爸一听就感到不妙，放下笔，说：「怎么啦？是不是妈妈检查身体查出了什么？」我说：「是，肺上有个阴影，专家们都看了，说要动手术，赶紧拿掉。」听到这儿，爸爸的泪水落下来，我赶紧说：「这还不知是什么，就是肿瘤，也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还是转移。」因为妈妈在监狱积劳成疾，动过一次手术，乳腺癌，所以大家特别紧张，又说：「李冰院长说，总理的几处癌都是原发的。」李说上李克农的女儿那去，她是肿瘤医院的院长，我们都认识。

我东说西说，主要是想分散爸爸的注意力，说了一阵，爸爸问：「妈妈还不知道？」我说：「不知道。」爸爸问：「那怎么告诉她？」我说：「妈妈那没事，我告诉她。」爸爸很奇怪地看着我，说：「什么叫妈妈那儿没事？」我说：「妈妈在监狱做过一次手术，都挺过来了。现在条件这么好，这么多医生，妈妈没事，只是你不要太.....」，「伤心」二字我没说出口，就打住了。爸爸明白我的意见，也没怪我，就说：「那你明天跟妈妈说？」我说：「我明天去说，你先休息吧。」于是照顾爸爸上床休息，我担心爸爸伤心过度，心脏病发，于是交代医生、护士特别注意。我也住隔壁。父亲病房的门是打开的，我们不时轮流听听里边的动静，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妈妈。妈妈见到我也是一脸好奇，等我说道：「医生有点事不敢告诉你。」她马上明白了，说：「检查出了什么？」我把阴影的事说了一遍，妈却出奇的安静。她说：「没事，动就动吧。监狱里都动过手术了，现在还怕什么。」又问：「爸爸知道了？」我说：「我昨天回来的，告诉了爸爸。」妈妈说：「你应该先告诉我，咱们去看爸爸吧。」我说：「你真没事？」她说：「当然真没事。」于是向爸爸病房走去，两人见面，再说没事，爸爸眼圈也是红红的，妈妈说：「你看你，我都没事，你还这样。」爸的时间安排的紧紧的，爸爸对我说：「看起来，你还得回来照顾照顾妈妈。」

于是安排妈妈手术，制定方案，手术那天，我守在外边，爸爸仍是一早进

城开会。切片化验，说是恶性，按预案整叶肺切除。

手术进行大半天，妈妈推出手术室，送入加护隔离病房。我就和医生商量，我说：「爸爸日理万机，实在太辛苦，你们能不能报给他，就说是良性肿瘤，减轻一点他的负担。」医生们说：「这个我们可不敢。」我说：「不是让你们负责，我负责。蒲院长也在这儿，话都说清楚，治疗方案也是按恶性的，报告也是写恶性的，爸爸反正不会看你们的报告，只是报给他，我说是良性的，你们站在一旁不吭气就是了。」医生们还是不吭气，蒲院长也说：「猛子，这个难！」

医生们虽然没有答应，我还是打个电话给城里的金秘书，我说：「手术完成了，很顺利。肿瘤是良性的，你报告一下吧。」晚上回到医院，爸爸很高兴，说快让医生来汇报，结果左叫不来，右叫不来，爸爸就生疑了，说：「良性是好消息啊，怎么不来呢？」然后看着我，说：「你又搞鬼了吧？」然后叫金秘书，说：「你去呀，告诉他们，没事，有什么说什么。」医生们来了，站在那儿个吭气，我说：「瞒不住了，你们说吧。」「不用瞒了，你们说怎么办吧。」医生们说了一大堆放疗、化疗的事。等医生们走了，我对爸爸说：「咱们坚决不做放疗、化疗。」爸爸听我口气如此坚定，不满的说：「你懂什么！」我说：「我虽然不懂医，但我懂化疗、放疗是好坏通杀，把人的健康摧垮了，还治什么病。」

爸爸听我头头是道，口气缓和了，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找中医，中医虽不能百分之百，但总有希望。」爸爸问：「你知道什么中医吗？」我说：「听说有个于仁存，对癌有点办法，在中医学院。」等妈妈恢复一点，妈妈也同意我的意见，说：「我们刚出来时，我去看张茜（陈毅元帅的夫人），头发都没了，就是放疗给放的。」所以后来妈妈做了一点点放疗，非常微量，根本没有做化疗，就主要是吃于仁存的药，辅助一些大雁功、气功，二十六年了（到2003年），已到了八十二岁，说话底气好足，散步可以散半个小时，在北戴河还要下海游泳。我在电话上说：「人要服老，过了八十就不要下水了，在岸边走走就行了。」所有人见了妈妈，都说：「奇迹啊，真奇迹！两次大手术，经历那么多磨难。」

这个时候，卓琳也住在医院检查身体，爸爸妈妈让我去看看。我去看她，

她招呼我坐在床边，非常亲热的口气说：「猛子啊，妈妈恐怕不行了，你们小孩照顾爸爸，再周到，也不如妈妈。你们得想想给爸爸找个妈妈才好啊。」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我心想，我妈没死呢，你这是说什么呀？当然我再猛，我也不会对她发脾气，我也没应她，叽里咕噜说了几句注意身体之类的话，就出来了。后来妈妈恢复的很好。我把这个话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她真这么说的？」我说：「我还会造她的谣。」妈妈说：「这个卓琳，莫明其妙。」

1978年，春暖花开，妈妈手术后需要休养，就都住到西山。聂帅也在西山。一天，我二姐峪书和我随爸爸妈妈去看聂帅，因为住在一起，常来常往的，但峪书是第一次。聂帅一看到峪书，马上把她捉过来，说：「六六年你来我家看我，我没见你，对不起啦。」这一下把大家都惊住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们的事，没人说一声对不起。聂帅实在没做任何落井下石之事，怎么突然间说声对不起，而且是对晚辈，也不合礼仪呀！大家一时惊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不容易缓过来。峪书说：「聂伯伯，这都是啥时候的事了，你还记得。」聂帅还要往下说，大家乱哄哄的阻着他不要说了，「那时候的事，不说了，不说了。」但聂帅这声「对不起」，对我却是终生难忘的。

回来的路上，我对峪书说：「你可真了不得，老师都说声对不起。」爸爸问峪书：「怎么回事？」峪书说：「六六年文革刚开始，我们一帮军工学生回北京，我和几个干部子弟去聂帅家，没见着，我们根本不知道门口的人有没有通报。这么多年了，我都不记得了，没想到聂帅还记得。」我说：「人和人真是不一样，你看杨成武，来京西宾馆看爸爸，两口子一见面就哇哇的哭，说他们一个女儿死了。岳母临死时想吃个鸡蛋都没有，好像世界上就他们家最惨。至于他上海会议说了些什么？三月京西宾馆会议说了些什么？只字不提，他的发言是作为中央文件附件发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说过一声对不起吗？」

萧华、刘志坚过去多熟的人，到了上海会议，也都是翻脸不认人，说谎造谣，都是中央文件。现在见面了，也没一个人说声对不起。」我言犹未尽，话锋一转，又说：「叶帅也一样，作诗骂爸爸，见面了不也没事儿一样。」到这儿，爸爸不高兴啦，说：「好啦！你谁都评论。」妈帮着我，说：「评论的对不对，我看就对。」爸爸不驳妈妈，只是说：「多记着人家好的，别总说坏的。」妈说：「咱们什么时候不说人家好的啦？」我赶紧平衡平衡，说：「爸爸说的

对，叶帅有实际行动表示谦意了，这房子不就是叶帅问汪东兴要的！」

11、爸去德国治腿，一错千古恨

爸爸当了秘书长之后，还是不能坐在房子里指挥，越行动不方便，越要到处走。北京的东边、南边是平原没山。毛过去说：「敌人来，就从海上来。东边、南边要堆山，山里修好工事，储好粮食和水固守，延长敌人进攻速度。」现在想想这些战略方针，根本是天方夜谭，但那时还是最高指示。爸爸再接手管这些事时，山已经堆好了。爸爸说：「去看看堆成什么样子。」杨勇（爸爸一上任，就把杨成武调离总参，去福州当司令，把杨勇从新疆调回来当常务副总长）、秦基伟（从昆明军区司令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取代陈锡联）、伍修权（文革前，副外交部长，打倒后再站起来，到总参当副总长、情报部长）、徐信（北京军区副司令，杨勇说：他是造反派）一大帮人陪着去，这是1978年。

坑道很窄，轮椅抬不进去。爸爸拿起手杖就要自己走，劝也劝不住。一天下来，我都累的筋疲力尽。回来的车上，爸爸说：「我这条腿可拖累了我。」我说：「也不一定哪儿都要看。邓伯伯说，坐在屋子里指挥就行了。」爸爸没理我的话，说：「钱信忠这几天来看过我，说德国有办法，搞人造股骨颈。」

钱信忠是当时的卫生部长，也是老人，打倒后站起来了，但当时爸爸却信他。他在德国考察，看到海德堡骨科专家用人造股骨颈，治愈老年人粉碎性股骨颈骨折。因为爸爸的股骨颈被林彪的狗医生无端端切除了，所以爸爸的腿永久性伤残了。中医生能减轻痛，用肌肉紧紧抱住大腿骨，但要站起来，必须要有股骨颈。德国人的办法是把粉碎的股骨颈拿掉，装上一个人造的，一头插在大腿骨，一头固定在盆骨上，这样人就可以重新行走了。

钱信忠回国后，就来找爸爸，说：「你的腿，德国人能治。」我一开始就犹犹豫豫，因为第一，我对开刀总是忌惮，剑伤刀伤都是伤；第二，德国人一摔，就住医院，就动手术。爸爸这多少年了，经过中医治疗，德国人根本搞不清历史，也搞不清现状。后来证明，确实手术时间比预定时间长了好多。这也是引起心肌梗塞的主要原因。妈妈也犹犹豫豫，说：「现在刚好一点，我也才动完手术，别着急，咱们慢慢商量。德国情况也不明，人生地不熟的。」但是爸爸这次是谁的话也不听了，竟然没跟妈妈商量，就自己给军委写了报告，要去德国治腿。妈妈知道了，大发脾气，冲着爸爸说：「说好了慢慢商量，你怎

么就把报告打上去了？这事可急个什么！」说完，坐下就呜呜的哭。

爸爸一看妈妈哭成这样，自然不知如何是好，我也心乱如麻。按说，爸爸实在不该跟谁也不说，就把报告送上去了。但我现在也不能顺着妈妈的话，我只好先来个缓兵之计，我说：「爸爸是着急治腿，也不能怪爸爸，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动不动手术到了德国再说。」我这个主意其实也不对，缓了一时之急，并不可能解决问题。你想，国内都劝不住，到了德国还能挡得住？不管怎么样，当时气氛稍稍缓和了些。当时，我的儿子毅毅不到三岁，是化解紧张气氛的天将，赶紧把孩子抱来，毅毅抱着奶奶说：「奶奶不哭。我都不哭，你还哭！」一下把爷爷奶奶又逗笑了。报告很快批下来，别的人都是画圈同意，只有徐向前元帅批了一句：「不如把外国医生请到国内来治更安全，请酌。」后来，妈妈常说，这事要是听了徐帅的，也好啊！

于是开始决定去德国的班子。我告诉军办，妈妈和我都去。爸爸知道了，说：「你们都别去。」妈妈一听，又炸了，说：「林彪四人帮弄得我们妻离子散七、八年，现在怎么啦！为什么都不去？我就要去。」我也坚持去，妈妈支持我，说：「反正一架飞机送你，也不多猛子一个。」爸爸说：「我去治病，老婆孩子都带着，人家会说话。」妈妈说：「我们坐监狱时，怎么没人说话？」总之，争来争去，爸爸还是不让我去，我没办法，找随行的医生，一个外科陆主任，一个内科王主任，都是很熟的人。我千叮万嘱咐，到了德国并不是就做手术，千万别忘了爸爸有心脏病。

其实，医生们也是尽了责了。他们说，他们从头到尾看了一个有十年心脏病史，比爸爸大十年的老太太做了手术，完全愈复了，才下决心做的。8月2日的手术虽然比预计的长了很多时间，但还是顺利的。手术后爸爸推入加护病房，人也清醒了，还跟医生说了话。使馆第一个报喜的电报也发来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打了电话给邓办的王瑞林，说：「看到电报了，一切顺利。」王瑞林说：「报了，老爷子也很高兴。」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我在办公室上班，王震的儿子打来电话，说：「你看到电报了。」我说：「看到了，一切顺利。」他说：「唉呀！你还不知道啊！第二个电报。」我说：「怎么啦？」他说：「不好了，罗伯伯出事了，去世了。」

我一听，头脑轰的一声。我支撑着走出办公室，骑自行车回到宽街，问金

秘书、陶秘书：「德国又有电报？」两个秘书看着我，不敢吭气。我说：「不用瞒我了，我已经知道了。」我要去看邓。说完，叫上司机就走。金秘书跟着我，从宽街到米粮巷五分钟。王瑞林在门口迎着，我径直走进去。邓在打牌，我走到邓面前，说：「邓伯伯，我要去德国接爸爸。」邓说：「去吧！」我转身就往外走，还没走出来，听见邓在后面大声叫王瑞林：「办手续，办好手续。」王瑞林跑回去应，我则快步走出来，坐上车就回家。

一进门，大妹妹在那里等着，问怎么了？我抱着大妹妹放声大哭起来。我说：「不该啊！我们不该让爸爸去德国。」大妹一听，当然也明白出事了，也哭起来。当时家里只我们两个。我还是强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我说：「哭也没用了，当务之急是赶紧去德国接妈妈。」部办又打来电话，说：「再去一个女孩，一男一女去德国。」下午，陆陆续续就有人来家里吊唁。卓琳阿姨带一大帮子女也来了。第二天晚上，我和大姐去机场。毛毛和贺平来送，说：「爸爸妈妈让我们来送一下。」我说：「谢谢啦！」也无多话，上了飞机，就起飞。飞机在夜空中向西飞去。

我想，这件事从头开始就错、错、错，一个错接一个错。我每次想挡都没挡住。以后我也经常跟人说：「医生有千有万，找哪个医生可是你自己的事了。找对了就是福，找错了就是祸。这次就是错信了钱信忠这个庸医，所以铸成大祸，一时错成千古恨呀！」飞机落地，医疗组在等，我说：「妈妈怎么样？」王主任说：「不大好啊，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怎么行？」我和姐姐赶紧上车往使馆赶。见到妈妈，人是非常虚弱，精神恍恍惚惚。护士说：「泪都哭干了。不行啊！得吃东西。」我和峪田走到床前，我说：妈妈，我是猛子。峪田和我来接你了。」妈妈睁开眼，说「你们来了啊。」我说：「邓伯伯让我们来接你回家。」妈妈欲哭无声，说：「是妈妈不对，妈妈不该让爸爸来德国。」我说：「不说这了，爸爸在天之灵也得让你好好保重，先吃些东西。」

我示意护士把滴定葡萄糖那些东西先拿走，喂了妈妈一点牛奶。我和峪田坐在两边，摸摸妈妈的手啊、脚啊、头啊。妈妈迷迷糊糊睡一阵，醒一阵。过了大半天，妈妈问：「几点了？」我说：「下午了。」妈问：「你们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早上到的。」妈说：「那你们快去休息吧！」我说：「不如吃点东西啊。」妈说：「好。」于是把东西摆上来，扶妈妈起来。稀的、软的

吃了一点。之后的两、三天，峪田和我轮流守着。医生、护士也一大堆，逐渐好一些了。我对妈妈说：「医生们汇报了，你别再想这些事了。你看我们是不是还是早点回家？」妈说：「回吧。」于是安排运灵柩事，峪田和我去海德堡。我们扶着父亲的遗体，将遗体装入灵柩，护送去机场。灵柩到达机场，妈妈已在飞机上，灵柩抬上飞机，我们就起飞了，前后不到一个星期，飞机落在西郊机场，天下着倾盆大雨，邓小平一众人等迎灵，以后好多年，每年八月三日都是倾盆大雨，我就在想，天也哭啊。

12、总装备部的太子爷们

开完追悼会，我们陪妈妈还在西山住。原定我九月初要随王定烈（空军副司令）一个空军代表团访问英国。我那时已在总参装务部空军处，这是文革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穿军装的代表团。中国传统，儿子要戴孝一个月，空军问我，还去不去？我问妈，妈说：「去，出去看看好，看看人家什么样子。」这次英国考察三周，大开眼界。我们的航空工业还是俄国人五十年代的水平，人家则突飞猛进了二十年。回程在巴黎停一周等飞机（那时一周几班，只飞巴黎，不飞伦敦）。打电话给曾涛大使，因为他曾建议爸爸来法国，所以妈妈让我问候一声。但当时曾涛根本心不在焉，哼一句，哈一句。我想，这可真是人一走，茶就凉。爸爸刚走的那几年，邓小平那儿还经常关照，卓琳也时不时来走走。夏天去北戴河，也一起在五浴场游泳，天天见面。邓 80 岁生日（1982 年），妈带我们一小群去祝寿照相，照片现在还在那儿，那时杨尚昆也来了。到 1984、1985 年就渐渐远了。到了 1989 年「六四」，就一刀两断了。

从英国回来，除了感到差距太大，还感到须会说话（英语）。学英语这件事，起因还在毛 60 年代学英语。爸爸妈妈也说，主席学，我们也得学。李章奇到爸爸那儿当秘书，还有一项职责是教英文。我上中学，分到俄语班；我想，主席都学英语了，我还学什么俄语，于是申请调到英语班。（贺鹏飞当时就没申请调班）大学虽然通过了英语考试，但那时重读不重说，现在十几年了，一个英文字母没读过，于是申请去外交学院进修一年，把英文拾回来。老处长崔文波非常支持我。回来之后，有一次见美国人，外事处派不出翻译，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老处长说：「还找什么翻译，你不就是翻译。」我说：「我才学了几天不行！」老处长说：「说什么不行，上了阵就行。」果然，我这鸭子上

架，第一场下来，还都说通了，我特别高兴。

1982年，张廷发（空军司令）打报告要求引进法国的幻影 2000。我们组团赴法国试飞幻影 2000。试飞员是空军的葛文镛。当时，人家的飞机已经计算机化了。我们的飞行员第一次见这种飞机，我问老葛：「行吗？」老葛说：「没事，副驾驶位，跟着转转。」回国后论证，科工委不积极，因为他们没利益，另外美国的关系也在逐渐打开。张爱萍倾向跟美国人合作，于是他们报了一个天文数字给军委。我知道国防科工委是扯淡，只想把邓吓住，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钱，而且什么事都是逐步办，不可能一步办。但我对法国的技术确实有怀疑。法国人一切东西都标新立异，从体制上就不是国际标准，真要进去了，可就全盘受法国控制了。当时我虽然还能跟邓说上话，但我自己都不肯定的事，我跟他说什么？！

法国人争取了十年，中国人还是不买，只好卖给台湾，中国人又大叫。那时我已到了香港，我说：「你们不买，又不让人家卖给别人，讲道理吗？」后来台湾揭发行贿，说还有一笔钱付给邓的家族，换取不制裁法国。过去我曾经说这是天方夜谭；现在我则觉得也不一定就是空穴来风。前两年朱镕基访法，说：「你们不要卖给台湾军火，有什么都卖给我，我有两千几百个亿美元。」我说：「这哪像个大国总理啊。小学生都不如，狗屁不通！」后来，好几个参加过幻影 2000 谈判的法国人都问我：「你当时为什么不帮我们？」我说：「你们法国政治上独立，不跟美国跑，这我支持，但技术上搞标新立异，我则不恭维了。技术上还是要搞国际标准，你的好，别人自然会随你；你的也不见得好，你最好随大家。」我又说：「我也不是法国派，也不是美国派，我是中国派。」

幻影 2000 不了了之，1983 年又派我去俄国考察直升机。到了俄国，俄国人什么也不给看，就在莫斯科等着。空军的人说，俄国人就是有酒，什么都成；没酒，什么都不成。我虽然能喝一点酒，但也不可能像俄国人那么喝，我只喝茅台、五粮液；他们则只认二锅头，我又不会说俄语。当时朱老总（德）的女儿女婿在使馆当参赞，我去看了看他们，我说：「我在这儿没用，我要回去了。」当时所有人都争着出国，赖着不走，我又标新立异，自请早归。

1984 年，余秋里（总政主任）突发奇想，说要找文革前的大学生，送军事学院学一、二年，出来当军事指挥员。我又被送到军事学院，到了一看，一大

堆熟人，刘帅的儿子太行，陈赓的儿子知建，王平的儿子，学习一年，我的成绩最好，每次答案、方案，都是得分最高。毕业考试，出了一道最容易的题，教员也不愿大家分数低，自己不好看，我按我的想法，纵方向布了一个军！教员一会儿走过来看，一会儿又走过去，左点点，右点点。我知道，他的答案是横着摆。但我绝对不会改的，交上去，得个最低分。别人问我：「你怎么搞的？」我说：「有什么怎么搞的，横着摆有横着的道理，纵着摆有纵着摆的道理，不一定那个就一定对；真打起来，分高的不一定赢，分低的不一定输。你们看，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打不过土包子嘛。」张震的儿子张小阳，几年之后对我妹妹说：「我和你哥哥是军事学院同学，那时我就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我妹妹说：「当然不一样。」

也是在军事学院，传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大队政委念完文件后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家可能都难以理解，所以要好好学习。」问有谁要发言，我站起来说，我就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坐了五年牢，我的思想里早就彻底否定它了。我说：「如果你难以理解，那可能由于你在文革中是支左的。」我知道这个人是个文革暴发户，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刺他一下，他则只能装聋作哑。

1985 年回到装备部，提副处长；1986 年提处长。贺平在另一个专做军火生意的处（军贸处）也同时提。贺鹏飞由于有王震、余秋里在后面推，提得比我们快，我们当处长，他已是部长了。王震、余秋里是二方面军的大将，贺龙是二方面军的头，他们「举贤不避亲」，但贺鹏飞实在算不上「贤」。上学时是二分学生，我们一起考大学，他考不上，在清华附中又复读一年，所以低了我一级。贺鹏飞智商不低，只是心术不正，聪明不往正道上用，我出国之后，我的新夫人对我说，贺鹏飞的眼睛是一泡混水，你的眼睛是一泡清水。我非常吃惊说：「你还会看这。」她说：「当然了，要不怎会喜欢你。」我过去从来不知道这些事，回想一下，确实，我过去总觉得贺鹏飞看人怪怪的，却不知怪在哪里，现在想想，就是怪在一泡混（浊）水。

贺平则是智商不高，忙着捞钱，手段又不高，身边搞了几个吹牛拍马之徒，弄得四面楚歌，怨声载道。当时装备部号称「三大女婿」，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的女婿都在装备部。这些人的兴趣在做生意，捞钱。贺鹏飞对装备一窍

不通，兴趣主要也在捞钱，其次就是分哪几辆小车，送录像机，装无线电话，不务正业，装备部保利公司这一摊，乌烟瘴气。当时李光（原装备部部长，后当过一下保利董事长）都劝我：你不能跟他们缓和缓和？他也没指名道姓「他们」是谁，但大家都明白在说什么。我说：「我有什么不缓和的，我又不沾他们的边。」

这时张爱萍那儿和美国人说好了，改装我们的「歼八二」，我就去找杨得志总长。我说：「装备部的人都在热火朝天的做生意，人家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人家，『歼八二』是我主管的项目，现在要向美国派出一个联合联络组，我不如去美国，既是干点实事，也是学点技术。」他知道我对好多事情不满意，说：「听说你有好多意见。」我说：「我的意见也不一定对。」他说：「有些话都传到邓、杨的耳朵里了。」我说：「给邓、杨耳朵传的还不就是贺平。」我知道，杨得志是好意，但我从来是看得上的事，就是看得上；看不上的事，就是看不上，不管他是谁。杨看我一点没变，也不再往下说，就说：「你找我就是去美国？」我说：「是。」他说：「好，我赞成。我跟贺鹏飞说。」第二天，贺鹏飞来处里，说：「向美国派联络组的事，你们提人选。」我说：「去的人要能说英语，处里我的英语最好，我去吧。」他说：「好，你写报告吧。」这样，我带着葛文镛等四人，1986年11月赴美。

13、在美国做军售，被人告状

我到美国后，经过一段调查研究，跟美国的对外军事销售署（FMS）部门的上上下下打交道，给国内写的第一报告建议歼八二（美国人起名「和平珍珠」计划）工程用美国贷款。我告诉国内，按美国法律，对外军事销售，因为为美国制造就业机会，可轻易获6成贷款，这样我们出4成，一来缓解经费一时不足之困，二来如果万一做不成，美国人损失6成，我们损失4成。这个报告，空军赞成，送给军委，军委没批。后来，第二点不幸言中，「六四」后美国人制裁，我们已花了一亿美元，飞机都扣着不还，直到老布什下台前，才把飞机还回来。一亿美元，买了一堆废铜烂铁。这种事，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可是在中国，无人负责，无人引咎辞职，无人破产。我后来提起这些事时，还跟妈妈说：「什么希望工程，还哄你们这些老太太捐钱。他邓小平少买两辆奔驰，不就什么都齐了。」在美国，我就是尽心地工作，争取中方的最大利益。

比如，火控中心计算机，原有对地功能，美国人不给，要拆掉该功能，还要多交付钱，因为拆也要人工费，我就跟美国人谈：「不给，你不用拆硬件，你软件有锁，你不开锁不就行了。这样，价不变，而且放眼未来嘛；过几年，你给了，你把锁打开就行了。」美国人说：「你们把我们的密码解了怎么办？」我说：「你对你的密码要有信心；否则你银行的钱别人不就随便去拿了？」这些事，贺鹏飞、三大女婿不会有兴趣，也不懂。他们那时在忙着和沙特阿拉伯做战略导弹的生意，卖了6发还是8发液体燃料、射程一千公里的东风3型导弹给沙特。那是我知道的当时他们捞的最大的一笔。

原因也很简单，他们这帮人不会英语，做事总要用翻译，这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在美国，由于国内人员来来往往，小道消息都传过来，可见贺平这些人智商实在也不够，大概后来他也感到不妙，又找了一帮香港烂仔来做军火生意，偷运AK-47步枪去美国，被美国海关截住。那时邓小平已奄奄一息，江泽民看这么下去不行，找张万年跟贺平说：「你要么当装备部长，要么当保利总经理，二者择其一。」贺平还是抱着保利不放，等邓小平死了，江泽民把军队的生意关了，保利也就名存实亡。

年初，胡耀邦由于赞成邓小平退休，没等到党代会就被邓赶下台，然后就传出来，下届党大会，赵紫阳当总书记，兼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当国家主席，兼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举荐他弟弟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我身在美国，对这些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还有点怀疑。我总想，不会吧，邓真昏到这种程度了，杨尚昆就不避嫌？到年底，所有传言都证实了。1987年是中国宪政最黑暗之年，由批判文革，批判终身制而得到的一点点民主曙光被邓小平的老年痴呆狂扑灭，中国重新走入黑暗。直到今天，江泽民仍是用1987年邓小平的规矩统治中国，谁也奈何他不得。在中国历史上，邓小平的1987年体制就是他的皇帝宣言。

1987年中，杨尚昆访美，Lockhead总裁在洛杉矶请他吃饭，也请了我。吃完外国饭，我去他的总统套间看他，他说：「外国饭吃不饱，还是吃点中国饭。」大使已经从护照上知道今天是他80岁生日，已准备了酒席庆祝，于是又吃了一顿中国饭。我也给他祝寿。吃完饭，他问我：「怎么样啊？」我说：「主要是人员不行，各个单位来的人都是靠关系，什么事也做不了。我刚来时，又

是组长，又是翻译，又是司机。」他说：「有这样的事？」我继续说：「航空部，原歼八二总设计师退休了，我说，好啊，来我这儿，我就要他，他最懂歼八二了。但航空部不派他来，派个莫名其妙的副局长。科工委，一个在美国学习过的工程师，我点名要他，不派，派个一句英语不懂的人，说是谢光的人。」杨问：「谢光是谁？」我说：「科工委一个副主任。」当时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聂帅的女婿）也在。杨问丁。丁说：「这事我不知道，我回去查查。」但是我还没把这帮废物赶走，自己却先被赶走了。1988年1月，党代会开完了。新军委、新总参都出炉了。我突然接到国内一个电报，让我回国述职。我回一个电报，说有一个代表团一个星期后来开会，我开完会和代表团一起回。第二天，华盛顿使馆武官来电话，问：「收到电报了？」我说：「收到了。」问：「几时回？」答：「我已告国内，开完会随代表团一起回。」武官说：「不好吧。」我说：「怎么不好？」武官：「他们急啊！」我问：「急什么？」他也答不上来。我觉得有点奇怪，打个电话织大妹妹，我说：「有点怪呀！」我妹妹说：「没什么怪的，新班子嘛，想听听你的汇报。」我说：「你告诉一下妈妈，我觉得有点怪。」但是我妹妹却没有告诉母亲。

虽然我有点觉得奇怪，而且国内的谣言通过空军又传回来。由于是谣言，我也并不害怕。我跟空军试飞员的科研部长葛文镛说：「如果有人造谣，你替我证明吗？」老葛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我于是买票返中国。当时中航一下买不到，英航飞过香港最快。旅行社说：「你必须到英国使馆办签证，否则万一赶不上飞机，在香港进不去，没办法休息，就得在机场坐一夜。」我说：「要多长时间？」他说：「至少一星期。」我说：「算了吧，国内一天两个电报催，这算什么理由？」

一、两天后，我就踏上归程，结果在西雅图等机，迟了二个小时。到香港，果然没赶上最后一班飞广州的飞机。航空公司安排旅馆，香港当局却不让入境。我把香港海关大骂一顿，把航空公司也大骂一顿：但一切无济于事。我在机场坐了一夜，一会儿，一个警察过来看看你的机票。第二天，我又当着众人把香港当局大骂一顿。港英警察也不还嘴。我有骂的自由；他们有不让我进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

回到广州，妈妈在机场接我。回到家，我打电话给装备部部长贺鹏飞（贺

龙的儿子)，说我到广州了，第二天回京。他在电话中说：「不用急，休息一星期吧。」当时他妈妈薛明也在广州休息，就住我们楼下。打完电话我就更奇怪了。一天两回电报催；回来了，又不着急了，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广州休息一个星期，妈妈看我忧心忡忡，觉得奇怪，问我，我说：「我总觉得不大对头。我在美国已打电话让朵朵（大妹妹）告诉你。」妈妈说：「她没有告诉我。」

回到北京，到装备部去见贺鹏飞。他一见我就奸诈阴森地一笑，说：「我们有情报，美国人要整你，所以紧急把你召回。」我听后虽然完全出乎我预料之外（没人告我状，也没人说我不好），但并不外露，毕竟我觉得他们在搞鬼，只是不知道什么鬼而已，现在清楚了，我笑笑说：「第一，我不相信你有什么情报；第二，美国人也不会无缘无故整我。我在美国一切明来明去。在美国，打官司要凭证据，不是胡说八道一句就可以定罪叛徒、内奸、工贼。」他看我这么凶，马上溜，说：「情报是情报部的事，我只是奉命行事。过几天，徐信（管情报的副总长）、何其宗（管装部的副总长）找你谈。」

我说：「不汇报了？」他说：「不汇报了。」我又问他：「是不是有人告我的状？」他答：「没有啊！」我又问：「是不是对我工作不满？」他答：「没有啊！都好，都好。」至此，我全明白了。

科工委派给我的副组长，由于什么都不干，也不会说英语，按派出规定根本不合格，因此我要求国内把他调回。此人为了留在美国，天天告我的状。华盛顿大使馆有科工委一个「军贸组」，对于「和平珍珠」计划不归他们管有一肚子气，于是矛头就对准了我。

此人的刁状就通过「军贸组」的电报告到国内，然后通过空军的管道又传回给我。我和老葛准备好了一切辟谣的证词。但我们没想到，国内杨尚昆、徐信、贺鹏飞这帮人比我精多了，他们知道靠这些刁状整不倒谁，于是就想出了「情报」这一计，一来这是保护你，二来情报管道又是保密的，无需解释。共产党的内部天天主要精力就在这些内斗的事上。对富国强民的事，兴趣不大。至于杨尚昆为什么要整我，我时至今日仍不明白。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在「我知道的杨尚昆」里再慢慢道来。

14、小罗瑞卿：敢顶副总长

1988年春节前，两个副总长找我去谈。何其宗根本不说话，因为他是一个1962年的四川兵，比我大不了几岁，到北京之前，是14军军长，对北京这些事，他根本不清楚。主谈是徐信，这是一个坏家伙，文革中是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杨勇（当时北京军区司令员）说他是造反派，但此人官运亨通，文革后当了北京军区副司令。杨勇死后，又当了副总长。他把赵紫阳的女婿从北京军区带到总参给他当秘书。1988年，杨尚昆组织新总参，杨得志退休，杨尚昆点了被杨得志免了职的迟浩田回总参当总长。徐信排第二副总长，名单报到赵紫阳处，赵办把徐信的名字由第二提到第一。

两个副总长找我这么一个小处长谈话。他还是说他那一套，有情报，美国人要害你。我也是我的一套：你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情报，美国人为什么要害我？我和徐信你来我往，唇枪舌战。何其宗一边坐着不说话，他大概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处长这么不给副总长面子。

在共产党内，一般就是上面说什么，底下哼哼就是了，哪有公开顶嘴。邓小平就是出类拔萃的典范。他对毛泽东，对华国锋，都是先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老爸则没学会这一套，所以我大概也没学会。谈来谈去，不得要领，徐信站起来说：「好吧，你不信就算了，我也没什么说的了，我先走了。」他走之后，我问何其宗：「没人听汇报了？」何说：「我听。」我把美国那边的情况简单说了说。何是陆军小兵出身，根本听不大懂空军装备的事，所以我也不用谈细节和跟美国人的技术争论，我知道他也无心听，我也无心讲。

言归正传，我回来了，干什么？他说：「这要等杨副主席怎么说！」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杨尚昆的事。徐信没胆子编个情报就把我调回来，何其宗也没本事安排我干什么，于是我就悬空了，闲散在家，没人理了。妈妈从广州回来，听了之后，说：「这个杨尚昆发什么疯，我们也没有得罪他。」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我得罪了他，还是老爸过去得罪过他。去年，他在美国过八十大寿，我还给他祝了酒。」过春节，总参新班子来看望妈妈。迟浩田带着所有副总长来。我陪妈妈见他们，说的全是废话，一句我的事也不提，因为我们知道跟他们说没用，还得找杨尚昆。

过了春节，就找杨尚昆，任何时间找都说不在，也不接电话，也不约时间。妈妈急了，说：「走，我们去找宋任穷。」当时宋任穷好像还是中组部部长。

到了中南海宋任穷家，把我的故事讲了一遍，宋两口子听完后，说：「我们宋彬彬也是这样。」宋彬彬就是文革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戴红卫兵袖章，毛给她改名宋要武的那位中学生；文革初，打死校长、老师，传有好几条人命；文革后期，进了大学，一改革开放，自己跑到美国，坚决不回国。邓小平的女儿邓毛说她在美国表现不好，要把她调回国。但她是个学生，并不是干部，谁也调不动。于是邓毛设计了一个骗局，说宋任穷病危，要使馆调宋彬彬紧急回国探视。此计因为涉及要用「宋任穷」为理由，必经由政治局通过，宋是政治局委员，报告送到宋这儿，宋看邓当时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报告上也有批示同意，于是大笔一挥，批完全拥护。这样，华盛顿中国使馆即找到宋彬彬，将其骗回国。宋彬彬回国一看，宋任穷好好的，于是知道是骗局，大哭大闹，说：「我再也不来见你们。」一个人于是跑到深圳，千方百计又走了。我们过去还真不知道这个故事。

宋两口子讲完，妈妈说：「我要找杨尚昆，他不见。」宋说：「好，我来帮你找。」说完拿起电话就找杨尚昆。没有一分钟，对面传来杨尚昆的声音：

「老宋，你找我干什么呀？」

「老杨，郝治平在我这儿，她要找你。」说完，就把电话递给妈妈。

妈妈说：「杨副主席，我们猛猛怎么了？」

杨：「没怎么呀！」

「那为什么从美国回来就没人理了？也没工作。」

「真的吗？我不知道呀，还回去当处长嘛！」

「杨副主席，这可是你说的。」

「没问题，我说的。……」

接下去就是你好，我好。第二天，命令就下来了，任命罗宇为总参装备部航空装备处处长。我又官复原职了。

从美国回来，折腾了三个月，对杨尚昆有什么乐趣，我完全不知道。但是贺鹏飞、贺平这些小爬虫，可能是乐了一下。我则心灰意懒，萌生去意。复了原职，我仍主管「和平珍珠」计划。我们跟美国人每三个月、半年要开一次会，一次在中国，一次在美国。美国人来，我接待；到美国去开会，贺鹏飞就千条理由，万条理由不让我去。我去找何其宗，说：「这样怎么工作？你们还怕美

国人害我？」何其崇也不答我的话，他说：「小罗，你的事，我也不清楚。」我知道找他说也是为难他，于是又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我说：「徐信说美国人要害我，我根本不信。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和平珍珠」都是航空装备的最大一个项目。像现在这样，不让我去美国开会，怎么工作？」

写好报告后，我去找杨尚昆的大儿子杨绍京，此人比较重情谊，在杨家并不得宠，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事还得找杨叔叔。」他说：「没事，你给我！我交给我爸爸。」此事后来听说在杨家还引起了分歧，小二和妞妞指责绍京大哥，说：「你为什么把猛猛的报告放在爸爸的桌上？」绍京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把猛猛的报告放在爸爸的桌上？」杨家三个孩子，我的年龄和小二（绍明）相仿，从小一起玩，妞妞和我大妹妹一样大，在美国时，我去纽约开会还专门请她吃饭。那时她已结婚，丈夫也在装备部保利公司，她却带了另一个美籍华人男人一起来，吓了我一跳，也不敢问是谁。

不管怎么样，我的报告是递给了杨尚昆。杨批给装备部，让装备部做我的工作，还是不要去美国。贺鹏飞是部长，他不敢找我谈。那时迟浩田拍邓小平的马屁，把贺平也提了副部长。贺平是只抓钱，他知道我不好惹，也不理我。还有一个副部长曹刚川（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曹是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学生，留过苏联炮兵学院，留苏时和刘华清（就是后来当了中央常委的刘华清）结了深厚友谊。我1977年到装备部时，曹是个老参谋，十几年相处，感觉此人还忠厚。我在美国时，他已是副部长，访美还专门叫我去陪他几天，问长问短。他找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因为他也知道，理都在我这边。杨却让他往另一边做工作，他就实话实说：「你写给杨副主席的报告，杨副主席批给我们，让我们做你的工作，别再要求去美国了。」我还是我的老道理，我说：

「『和平珍珠』是我处、也是全军最大的合作项目，你让我管这个项目，又不让去美国，这怎么管？所有参加这个项目的中国人、美国人，都觉得好奇怪。在中国开会，我是主谈；到美国开会，我就不在了，好多事不知找谁谈。比如我们买了意大利的导弹，这是我主谈买的，现在要用美国的火控系统发射意大利的导弹，硬件软件一大堆技术问题，将来打出去打不准，是意大利人的责任？还是美国人的责任？还是中国人的责任？你找不找我负责？」他没想到他说一句，我这几十句等着他，就说：「你的理，我清楚。你能不能想想别人的

理。」我说：「徐信的理？根本是胡扯淡！」此话在总参内部广为流传，也传到邓、杨耳朵里；所以从杨尚昆那儿又传出话，说我是「小罗瑞卿」，才是个处长，就敢骂副总长；杨当然知道我是指徐信骂尚昆。这话传到妈妈耳朵里时，妈妈对传话的人说：「小罗瑞卿有什么不好！」其实当时总参内部也没人愿淌这滩浑水。当时的情报部长（现在的副总长）熊光楷我很熟。我去问他，他说：「我可不知道这个情报。」

15、六四无眠小虫咬，一夜听枪声

谈话没结果，日子继续往前混，三大女婿（赵紫阳的女婿，当徐信秘书没几天，就转到装备部来抓钱）、王震的儿子王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忙着抓钱。我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话碍眼；他们是做贼心虚，我是盛气凌人。1989年春，耀邦突然去世，学生们开始上街，我是公开地同情学生，反对贪污。但我也没去天安门广场，我的几个旧同学总去，我就托他们带话给学生，我说：「事情要适可而止；否则的话，就是亲痛仇快。我虽然不同意赵紫阳的很多经济政策，如价格双轨制，官办公司，但赵不同意戒严，则是好的。学生们如果继续无策略地闹，把赵闹下台，中国政治就要大退步。」

可惜当时是群龙无首，或者根本是群虫无首。六月巴黎航展，五月初贺鹏飞突然跑到我办公室，说：「今年为什么不去看看航展？」我说：「好啊，我们组团吧。」他说：「别组团了。航空部有个团，何文治带队，你参加好了。」我办好了手续，当时外访的事都是贺平管。他找一个参谋（叶正大的女儿叶莲），叶挺将军的孙女，给我定机票定日程，订于六月四日出发。三日，我就跟部的领导贺、曹、贺说了再见，明天我就去巴黎了。当时形势其实并不紧张，广场上也剩千把学生。虽然赵已辞职，但传达几次邓、杨的指示，都明确讲，绝不开枪，绝不流血。

三日晚到四日凌晨，我睡在爸爸以前的卧室，彻夜不眠，有小虫咬我，这个房间从来没有虫子（这次咬我是空前绝后）。我坐过监狱，下过农村，对付过臭虫，打开灯来看，什么也没有，可是身上满是红肿，这时就听到建国门方向，「哒！哒！哒」我想，今天有什么事，放什么鞭炮？！床上无法睡，我就到爸爸的办公室，也是客厅，睡在沙发上，还是咬，一夜就无法睡，一夜就听到「哒！哒！哒……」这之前，我对人间之外的事，佛、神、鬼、前生、后世

这些事都是不信的。这件事情之后，再说起这些事，我只说我不知道。我再也不说我信或者不信了。

早上起来，妈妈说：「你怎么啦？」我说：「一夜没睡，虫子咬。」妈妈说：「哪有虫子，你说什么呀？」我说：「你看。」拿出胳膊给妈妈看，都是一个一个大红肿。妈妈也觉得奇怪得不得了。

这时工作人员吃完早饭回来了，说街上烧了军车。我一听，就紧张了，想昨天晚上可能是枪响吧。我跟妈妈说：「我得快走，要不就走不了了。」我叫上妈妈的司机，开上车就直奔机场。我们住在东城宽街，无需穿过长安街，所以顺利到了机场。实际上，我的飞机是晚上。妈妈后来告诉我；我刚走，机关就打来电话找我。妈妈说，罗宇已经走了。我在机场旅馆待了一天，晚上临上飞机，看中央台新闻，说粉碎了一次反革命暴乱。飞机上没有几个人，几乎是空的，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心里有数，邓、杨终于撕下了脸皮，向学生开枪了。蒋介石从南京撤退时，学生上街，蒋介石都没敢开枪。毛泽东对付天安门广场的群众，也不过是组织另一帮群众（工人）用大棒子打伤几个人。我脑子里很乱，从毛去世支持邓小平复出到今天，看起来邓不过是另一个篡权之君而已。中国共产党中兴无望。

我们这次参观航展，说是个团，实际上各个单位各走各的。何文治（航空部副部长）两星期前就去了德国，从波恩去巴黎。我到了巴黎，没有中国人来接，只有法国人来接。到了旅馆，打电话去使馆，武官说：「我们根本出不去，使馆让抗议的人围上了。」我说：「我一切按照日程活动。」打开电视，全世界都在播邓、杨镇压学生的血腥场面。我坐在电视前，看着军人发疯一样坐在车上，随便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愚蠢的军队，好人带着学好，坏人带着学坏，疯人带着学疯。希特勒的军队，东条英机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都是封建的军队；封建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罗马尼亚的军队比中国的进步，所以齐奥塞斯库命令军队开枪，国防部长宁死不下命令。当保安部队向群众开枪时，军队即调转枪口向保安部队开枪。俄国的军队也进步，所以后来搞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也没搞成。台湾的军队现在也已经国家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家化的一天，中国才有希望现代化。

我虽然硬着头皮继续访问，但法国已开始抵制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军队。

航展开幕，我就被拒绝参加，接待我的是法国前驻华武官，此人很友好，把一切公开活动都改为带我去参观工厂、公司，躲开记者。在他控制范围内，总算平平安安按原定日程访问。6月底回到北京，没想到贺鹏飞和贺平就翻了脸，说我「逾期不归」，让我「停职检讨」。我当时就跟他们拍了桌子，我说：「机票是你贺平买的，日程是你贺平定的，我怎么逾期不归了？！我不会检讨什么，你也不用停我的职，我辞职！！！」说完我把访问日程往桌子上一丢，扭头就走了。

此事不仅在装备部，而且在总参引致震动，谁也没想到我会辞职；而且总参有史以来，除我父亲上海会议后按周恩来指示辞了总长，还没听说过谁辞职的。大家都是拼命找官当。我回到办公室，找参谋来口述一份几行字的辞职报告：自1975年邓主席批准我参军，十五年来努力工作，上无愧对父老，下无愧对子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提请辞职。签了字，我就直接送给何其宗。何其宗把报告扣下，找我谈。

何说：「这件事就算了，由我承担责任。他们说你『逾期不归』，我也没有核实，就同意了『停职检讨』，现在你回去上班吧。」

我说：「何副总长，此事就不能算了。打从美国回来，我就觉得大贺、小贺根本不对劲；这次是我一点错没有，他们还敢当面扯谎，下次什么事如果我有点错，还不整死！」

我又说：「上次徐信说他有情报，我说他胡说八道，但我没证据；这次大贺、小贺当面造谣说谎，可是铁证如山。」

他说：「美国的事你还记着。」

我说：「我是得理不饶人，记一辈子。」

何其宗也没办法，但还是压着报告不批。他觉得很奇怪，我这个位子多少人垂涎，罗宇怎么说扔就扔。曹刚川也来劝我：「这么点事怎么就走了？何副总长不是已经承担责任了吗？」但我走的决心已定，「六四」之前我跟邓、杨之间还只是「分歧」；「六四」之后则是决不能跟邓、杨同流合污了。但要走也不容易，现在好，大贺、小贺发疯，主动发难，我当然揪住不放。又经过几个回合，我坚决不回去上班，只是催何批我的报告。何看我是真要走，报告压了三个月还是批了。何一批，迟浩田、徐惠滋、徐信都批了。

但我是辞职，还要军委批，军委是谁？就是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他被杨尚昆「举贤」当了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此举无人不骂，邓小平却出来讲话，说举贤不避亲。过了几年，同一个邓小平，又把杨家兄弟一起赶下台，这时就都不贤了。）报告送给杨白冰，无回音，我就去找胡耀邦的女婿刘晓江，此人当过刘华清的秘书，后来调到总政干部部，我说：「你帮着催催。」他说：「你真要走？」我说：「没法不走。」刘晓江当时也牢骚满腹。（现在混得不错，当了海军副政委，全靠曾庆红。胡耀邦为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平的反，对曾家有恩。曾庆红到北京后，为江泽民谋划，捧胡打赵，原因有二：一是耀邦反正走了，不是现实威胁；二是胡对曾家确实有恩，耀邦的遗孀李昭阿姨背着江泽民，并不说江泽民好话。）他说：「我帮你催催。」

总之，三个月之后，九月辞职总算批下来了。总参看到军委批件，给我开了介绍信，我离开总参，在个民办大学挂了个教授的名，申请护照出国。护照十月底拿到，当时我的儿子和他妈还在美国读书，按照国内的规矩，最方便的是申请探亲，按美国的规矩探亲就是「移民倾向」，一个朋友甚至联络了一个美国参议员，邀请我参加老布什就职一周年庆典，美国使馆就硬是没给我签证。几经周折，1990年6月我随一个中国代表团去了欧洲，然后在欧洲留了下来，拿了居留证，开始新生活。

16、六四后，只有选择离开

几年后，我在香港碰到当年美国驻北京使馆的一个副武官，他来办公室看我，我对他说：「美国不是朋友。」

他说：「为什么？」

我说：「朋友就是最需要帮助时能给予帮助的人。当年我在北京，无非是一个签证，美国却不帮。」

他说：「米切尔上校给大使写了备忘录，但签证部门不买账，所以没办法。」

我说：「除了土著印第安人，所有美国人都是移民，可是使馆那些小土豆随便就给别人戴一顶『移民倾向』帽子，而且好像就成了一条罪，入了另册。」

我又讲给他我对美国人的评价和印象：「美国人刚开始交往给人天真、开放的印象，这是好的一面；但美国人最遭人恨的是自大无知，以为凡事天下老子第一，特别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像银行一样，一下雨就收伞。」

「我当官的时候，你们美国人对我笑脸相迎；我刚当民，你们就变了脸。我在美国使馆签证处见到的，都是不可理喻的蠢蛋。你们说你们是民主的国家，但你们的签证部门对官和民的嘴脸，却和专制国家差不多。当年有一个蠢得不能再蠢、丑得不能再丑的美国女人，天天就在接待室走来走去，找中国人麻烦。全体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丑女人，我不明白你们的国务院为什么要把她派到中国来。总之，美国人和我在八九年是结了怨的。」我骂，美国武官听着，并不驳嘴。确实，那个丑女人人尽皆知。

当年周围的人，曹刚川从副军，现在当了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贺鹏飞当了几天海军副司令（一天海军没当过），夭折了，人死了，就别说坏话了，我还给他母亲发了唁电。

贺平当了几天装备部部长，走私 AK-47 去美国，江泽民也救不了他，邓还没死，赶出总参；邓死之后，江、朱把军队做买卖停了，「保利」也名存实亡。

我的几个副处长，后来都当了总装备部的副部长。有人传过话来：要是不走，现在还不起码当个总装副部长！我说：军委副主席我也不当啊！这话是的确确，清清楚楚的。我辞职时已完全明明白白。「六四」之后，我只有两种选择：

一、学戈尔巴乔夫，说一辈子谎话，熬到当总书记说句实话，咱们还是改邪归正，融入世界先进民主潮流。虽然戈氏由于有理想主义，太不恋权（这在共产党内又是异数），让叶利钦这些小人窃取了民主改革的果实，使俄国人民经历了十年辛苦生活，大量国有资产被少数人窃取，老百姓把一腔怨气发在戈氏身上。戈氏是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换来了俄国的美好未来，世界人民称他为英雄，他自己的人民却不感谢他，也不喜欢他，这也非常悲惨。戈氏这条路我走不来，我肯定要愁死的。第二条路就是离开，出自污泥而不染，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我哪儿不能去？何必留在这儿受气。融入世界民主潮流，更知今是而昨非；遗憾的是，有点愧对「江东父老」。但其他选择均无天时、地利、人和，勉强去做，必然事与愿违，这点，在我对中国的分析和展望中再慢慢道来。

我离开装备部两年后，有一次在新加坡航展上碰到原来装备部贺平的小翻译和一帮人，互相打了招呼。这帮人回去后报告了贺平，贺平当时已当了装备

部部长，大发雷霆，说谁让罗宇出国的？！组织了一个项目组，调查「罗宇出国真相」。项目组工作了半年，从公安部、民办大学调查一番，一切合法。贺平硬是写了一个文件，「开除罗宇军籍、党籍」。别的人告诉他，罗宇写的辞职报告，军委批的，开除什么军籍？罗宇走之后，工资停发，党费不交，按党章规定，六个月自动脱党：现在已经两年多，开除什么党籍？但贺平智商不够，他根本不明白别人说什么，硬逼着迟浩田发文件上报军委主席江泽民。

当时邓小平还活得好好的，江泽民、迟浩田拍马屁还来不及，哪敢挡贺平，于是 1992 年军委就发了一个主席令：「双开除」。但这个文件看的人没几个，因为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专为哄贺平发的，没人认真对待。但是，我却非常感谢贺平，我辞职是我和邓、杨划清界线。贺平「双开除」是邓、杨和我划清界线；将来清算邓、杨「六四」屠杀平民罪行，罗家和他们是经纬分明。

中国共产党的将军我不要当，也当不了。为什么当不了，有两点理由：一是这第一代的将军冲啊，冲啊的劲我没有，不要说杀人了，杀个鸡我都杀不了，这个刀就下不去，所以肯定不是将才。第二，这些理想主义出身的将军们如此不吭不哈的就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我也做不来，你邓小平、杨尚昆调军队上天安门屠杀学生，我就只有辞职了，至于那些没打过仗、靠耍嘴皮子当上的将军，那根本是误人子弟，当然不能当。

我 1984 年从高等军事学院大学生班毕业，提副处长，是副师职。1985 年提处长，是师职。1986 年赴美，美国人问你来的人是什么军衔？当时中国还没授衔，外交部问中央，因为美国的正师职是准将，所以外交部建议答复美“我和空军试飞员（科研部部长，也是正师职）为准将”，中央批准后，外交部正式回复美国，所以美国给我发的 ID（身份证）为准将，我就这样在美国当了一年多将军，1988 年回国，授的是大校衔。

此事在国内还闹的沸沸扬扬，因为美国人都称我「罗将军」。而前面提的两国照会的事，知道的人又不多，于是有人就告我，说：罗处长在美国自称将军，这个话从空军又传回美国，我就问空军的那个试飞员，我说：「老葛（葛文镛），人家怎么只告我，不告你，你也是将军。」老葛笑笑，说：「你是树大招风，这都是些小人，不用理他们。」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种谣言在国内流传。比如说：「罗处长自己开车

出去。」怎么回事呢？我一到美国就开始上夜校，学英语，其他四个人都不愿意去，大概是因为要花点钱，大家自己的钱都紧，我当然不能强迫别人去，所以只能自己去，于是就有了上面那句话：罗处长晚上...，去干什么也不说，我从美国回国后，空军管装备的副司令林虎对我说：「你在美国一年多，国内的话怎么那么多？」我说：「好话还是坏话？」他就笑了，说：「不是说你好，也不是说你坏，但所有的话都是怪怪的。」这下，我笑了，我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他要说你坏，你让他拿出证据，他拿不出，就把他捉住了，为了不让你捉住他，所以他就说些怪怪的话，让别人去想象，可能是去干坏事了！」

我又对林虎副司令说：「我是不畏人言，但我明白为什么中国话说『人言可畏』。」

林虎说：「你不怕！你又认识邓小平，又认识杨尚昆，你是通天的人物。」

我说：「我再通天，还有我父亲文革前通天！还不是照样挨整，照样人言可畏！」

此言一出，四座无声。此时离「六四」不到一年，我在中共的官僚机构里待了十五年。我离开装备部十三年后，装备部把我的户口落在我母亲府上。我给曹刚川写信，我说：「我们总是不断地创造各种纪录，一个复转手续办了十三年，可能也是一个奇迹，但还没办完，复员费还没给我呢！也不知有几个钱，但回国时请大家吃顿饭总还够。」

回首平生，六十年风云际遇。上天对我最大的眷顾，是引导我找到了最可爱的终生伴侣梁帼馨。她是我的天使，善良、美丽和智慧的化身。我们身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千里万里，聚在一起，实在是个奇迹。

（写于 2003 年）

第二章 帼馨和我

梁帼馨（狄娜 1945-2010）广东新会人。1962 年入影坛，有香港传奇女子之称。早年曾以性感明星走红。70 代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思想左倾，声明支持文革与中共。多次为中共政府奔波，促进中美建交与西方交流。息影后从商，发展和中国的航天与军工业务。2005 年返港主持电视节目《百年中国》。

病逝前留言，鼓励传媒进步。狄娜 1990 年和罗宇秘密结婚，迄今未曾公开。

1、第一次见面：买雷达制导导弹

中美建立之后，有一段蜜月期，开始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用美国的雷达火控系统，装到中国的歼八二歼击机上，美国人称为「和平珍珠」计划，我们叫「歼八二工程」。当时我在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装备处当处长，国内「官倒」越演越烈。邓小平的子女、王震的三个儿子、叶剑英的子女带头，儿子女婿一人开一个公司，用国家资本为自己捞钱。

邓小平的三女婿贺平和王震的大儿子王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装备部搞了一个「保利」公司，倒卖军火。杨尚昆的女婿和赵紫阳的女婿也参加进来，整个装备部让「保利」搞的乌烟瘴气。我不沾边，还到处吹冷风，这帮人就看我更不顺眼。他们派装备部一个退休的部长，当时在保利挂一个董事长虚名的李光来拉拢我，想拉我入伙，也被我顶回去。大家在一个楼层，抬头不见低头见，就更别扭！正好歼八二工程上马，要向美国派一个联络组，我即自告奋勇去了美国。

后来帼馨告诉我，这段时间她也经常在北京，长期包了北京饭店一个套房，她在工作中也认识了王震的儿子王军，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彭真的女儿傅彦等一大帮干部子女。但我们两个却不认识，她说：「真怪。」我说：「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 1986 年 11 月去了美国，1987 年 1 月邓小平就把胡耀邦赶下台。年底军委改组，杨尚昆当了常务副主席，把自己的弟弟杨白冰提成军委秘书长。其实 1987 年是中国政治重新回归黑暗的一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之一，废除终身制，到了邓小平这儿就行不通了。

胡耀邦傻呼呼的，真心诚意拥护废除终身制，所以邓小平赶胡下台。

在邓小平看来：你赞成我退休，我先赶你下台，还有没有人赞成我退休了？党内鸦雀无声，人人自保，哪有真理可言？

但邓小平处理这些事比较温和，不像毛泽东，不搞反党集团这些事。但封建实质，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不敢走到前台，利用军委体制，破了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一体的惯例，他自己当军委主席，总书记赵紫阳当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杨尚昆当常务副主席。全党只有陈云吭了一声：「你这是什么体制！」

也只是在周围说说，不敢在会上说。

倒胡耀邦，起了最坏作用的就是薄一波。只有习仲勋大声疾呼胡耀邦是好人，被邓小平、杨尚昆下结论为神经病，把习仲勋赶到广州、深圳去住，不许回京。军委刚改组完，杨得志退休。杨尚昆不知发什么疯，把我从美国骗回来，说情报显示美国人要害我，我哭笑不得，但只能服从，又回去当处长。

八二工程继续，我仍主管，这时就出来一个中程导弹问题。当时我们只有以色列卖给我们的「怪蛇 III」红外制导的近程导弹，雷达制导的中程导弹我们没有，美国人不卖。法国人卖，但美国的雷达制导不了，只剩下意大利生产的「阿斯派达」。在主管装备的何其崇副总长处开会时我说：「没选择，只能买意大利的。」于是何其崇指示「保利」请意大利人来谈，结果左请不来，右请不来，过了一周，何其崇找我去他的办公室。

何说：「保利请了几次，意大利人不来。昨天保利收到封信，人民集团董事长梁帼馨女士受意大利 Alernia 公司委托来谈此事。保利说，他们不跟中间商谈。」然后何问我：「你说怎么办？」

我看了看梁帼馨的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民集团，梁帼馨。

我说：「过去七八年，科工委和航空部一直想引进这个弹，派了一批又一批人去意大利考察，但没钱买，意大利人烦了，也怕了，觉得中国人没诚意，只是偷技术。现在意大利人请不来，意大利人委托了梁帼馨，就先跟梁帼馨谈呗！」

何说：「保利不愿跟中间商谈，而且说梁过去是个演员。」

我说：「你管她过去是什么，现在意大利人委托她来，就只能先跟她谈，保利不愿谈，可请科工委叶正大副主任和空军的人先去谈谈看。」

叶正大是北伐名将叶挺的大儿子，我上中学时他已从苏联留学回来，航空专业。空军指派了装备部一个处长刘太迟，是刘伯承元帅的小儿子，两个人去了一谈，马上谈成了，他们称帼馨为「梁小姐」。回来汇报说：「梁小姐马上叫意大利人来签合同。」这时何其崇问我：「你上次报告说要六千万美元，不能再少点？」

我说：「这个数也是叶正大他们谈了六、七年谈出来的。八二工程已花了两个亿，不能买得起马，配不起鞍。」

何笑笑说：「你的理总和他们不一样，好吧，我就按六千万向军委申请了。」

何所说的「他们」，我知道就是贺鹏飞。其实我的报告贺鹏飞是签了的，否则也送不到何其崇手上，为什么贺鹏飞不挡我呢？因为他没理由挡我，所以只能嘀嘀咕咕。

整个事情进展很快，梁小姐一叫，意大利人马上就来了，没几天，就和保利签了合同。六千万美元，军委也批了。一天，叶正大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我们请客，感谢梁小姐帮忙，你一定来。」

我说：「我也没参加谈，事情都是你们办的，我就不去了。」

棠正大说：「不行，不行，没有你这个后台，我们办了那么多年也没办成。」

我还是没有允，于是叶正大找贺鹏飞，说：「你们装备部的人架子太大，一个处长我都请不动。」

不一会儿，贺鹏飞路过我的办公室，走进来说：「叶正大请客，你就去一下吧。」我说：「你是部长，你说去就去。」就这样，在叶正大的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梁帼馨小姐。

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跟帼馨说：「如果不是叶正大激将，我们还认识不了呢！」我们认识之后，由于帼馨是代表意大利方执行合同，我是中方主管。而且我们买这个弹，是由于我们没有雷达可以制导这个弹，必须用美国的雷达来制导这个弹，这一套又要装在中国的飞机上，所以这就是一个中、美、意三方的合作，技术非常复杂，很多设计数据，意大利人不在乎给美国人，但不愿给中国人，这些事买卖合同上根本没有，所以就要做很多工作。

帼馨不懂具体的技术，也没学过理工，但她能抓到问题的关键，并能很大程度上影响意大利人，所以很多我们说不通的事，她能说通，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空军的人，一说起买意大利「A 弹」，没有不感激梁小姐的。「六四」血案前这一年多时间，我们之间交往也比较多，每次帼馨到北京，都请我吃个饭，交流一下合同执行情况，但我们只谈业务，从来没有谈个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她过去演过电影，主持过大型电视系列节目，她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去世前是很大的官。

关于帼馨，保利公司里传的沸沸扬扬，所以我才知道帼馨在香港，「狄娜」之名，家喻户晓，在国内也很有名气。与外贸部、石油部、中信的荣毅仁、广

东、福建的省长、省委书记，甚至总参谋部伍修权副总长都打过交道。在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方面做过大量工作。关于我的家庭，一直到我辞职离开了装备部很长时间，有一天帼馨突然问我：「听说你父亲过去是很大的官。」

我说：「是啊。」

她问：「有多大？」

我说：「文革前，林彪是国防部长，父亲是总参谋长，文革后，华、叶、邓时，父亲是军委秘书长。」

她问：「军委秘书长是多大的官？」

我说：「文革前，父亲当总长时，实际上也兼军委秘书长。」华、叶、邓时，邓小平挂个总参谋长的名。邓小平说：「我这个总长还得交给罗瑞卿。」但汪东兴不干，邓小平说：「好，你汪东兴不干，就让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总之，军队的事就是罗瑞卿管。」

她说：「早知你父亲是这么的官，就不和你好了。」

我说：「现在晚了，已经好了。」

2、情定巴黎，告别体制

杨尚昆把我从美国骗回来之后，又给我官复原职，「八二工程」继续，每半年中、美双方在中国开一次会，在美国开一次会，在中国开会我主持，在美国开会，我缺席（杨尚昆不许我去美国），所有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得理不饶人，谁也不怕，我就直接给杨尚昆写信，找杨绍京（杨尚昆的大儿子）帮我递给杨尚昆，又在各种会议上指责这种安排，空军、科工委、航空部反映也很大，说过去罗处长长驻美国，现在怎么去美国开会都缺席，出了什么事？我有理，但官小；他们没理，但官大。一般官场规律是官小的怕官大的，我又不遵守这一规律，偶尔在杨尚昆处开会，开完会我跟他说：「杨副主席，我占你五分钟时间。」

他总是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杨尚昆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就是不想谈，也不想答应我的要求，所以「六四」前这一年多，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搞的很紧张。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帼馨像天女下凡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当我们的话题逐渐进入哲学、历史、政治、文学、艺术、诗词等广泛领域时，我才骤然发现帼

馨是那么心地善良、嫉恶如仇、知识渊博，诗词造诣，脱俗超凡。而帼馨对佛学和易经的研究，更使我叹为观止。过往我们都把这个领域称为迷信，帼馨就耐心的给我讲解，为什么这不是迷信，而是天文地理，只是因为很少有人能真正掌握这门学问，所以才有那么多伪科学的东西到处泛滥。

但我实在是凡俗之躯，听不懂这些高深学问，我忧心忡忡的还是中国的现状，眼见着邓小平把中国引向贪污腐化的官僚资本主义，唯一一个不贪的胡耀邦，也被邓小平赶下台。邓小平家族带头贪，党、政、军各路大员紧随其后，整个形势不是清官肃贪官，而是贪官肃清官。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在总政上班，我们一个大院，休息时散步偶尔也碰到，邓先群把我当「自己人」，跟我说：「现在，要么升官，要么发财。」弄的我目瞪口呆，我们还停留在「为人民服务」阶段，人家早已把升官发财当目标了。

1984年，学生打着横幅：「小平，您好！」

1989年，学生哭喊着骂：「小平，你好狠！」仅仅五年，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已丧尽了良心。

这段时间，我的心情也很沉重，父亲走的早，邓小平、杨尚昆这些人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开始对我们也很照顾，可是眼看着「官商」、「官倒」把党和国家弄的乌烟瘴气，刚从毛泽东的专制恶梦中解放出来，眼看着又走入邓小平的专制恶梦。恰恰此时，帼馨出现在我生命中，她像头戴光环的圣女，集善良、智慧、美丽于一身，帼馨确实很漂亮，但她吸引我的，确实不是外表，而是智慧和善良。

智慧嘛，人一开口，马上可以感到是智慧还是愚蠢。像李鹏，在电视上和学生对话，一开口就知道李鹏是个蠢材，连我的参谋都说，中国有这么个总理，真是国人无地自容，善良虽然也是通过感觉传递的，但却不像智慧那么直接，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感到。

适里，我突然想插一句对胡锦涛的评价。胡是我的学长，大我二年，智商好像也不大够，奥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外国记者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胡锦涛翻过来、倒过去说了一大堆废话，最后说他的梦想是「小康社会」。中央台直播，笑掉所有人的大牙，起码发达国家的人和你就不是同一个梦想了。看起来从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没有谁认真对待「同一个梦想」，

坚持一党专政，如何跟别人有同一个梦想！

帼馨在我生命中出现之后，我有一种「恨相见太晚」的感觉。但我看帼馨，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从来没想到我们可能在一起。帼馨是一个「外商」，虽然是中国人，但国内从来视香港为「外」，我是一个在总参谋部核心部门工作的正师职军官，我怎么可能离婚，然后迎娶一个「外商」？不要说党、军队、国家通不过，就是母亲那儿也通不过，所以我也从来没想到。

只是有一次帼馨请我吃饭，在长城饭店，她突然说了一句：「别人会以为你是我的男朋友。」吓了我一跳，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没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这些事。朱德总司令的一个孙子，就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竟然被邓小平给枪毙了。中国人太善忘，也不懂法律，不懂人权，大家在封建主义潜规则中游泳，跟着邓小平混，说着一套，想着另一套，做着更是另一套。共产党当政六十年，自己变坏了，把人民也教坏了。

我是少数没学坏的人之一，只认道理，不计个人利益，我不同意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更不同意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中国还是要搞自由资本主义，高薪养廉是可以的，但不能贪污。都小平带头贪污，所以我跟邓小平就越行越远了。

这时，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清官，已经下台的胡耀邦突然去世，我则在好几个月前被杨尚昆安排去巴黎参观航展，出发日定在六月四日，这段故事前面讲了，没讲的是，由于去巴黎航展，美国人也去，意大利人也去，我就约了帼馨，准备在巴黎谈谈歼八二的事情，但我还没上飞机，天安门广场军队就向学生开了枪，我到了巴黎，欧美就宣布对中国制裁。

我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一切事情发生的巧合，实在不可思议。如果人来安排，没有人能安排。所以我相信，只有神安排了这一切，哪个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躺在天安门广场上非常不舒服，他知道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我还是敬他为神的。于是他指点一下江山，轻叹一声：唉，让罗瑞卿的儿子去自由的飞吧。第二个想到的当然就是父亲，父亲离开我们太匆匆，父亲为了节约，甚至不允许我随他赴德国治病！父亲绝对无法想象邓小平对付几个学生娃，竟然开出了坦克，父亲在天之灵知道我不高兴，洒下一滴泪，对我说：儿子，你想走就走吧！总之，在神灵保护之下，我最终跳出

了邓小平、杨尚昆的手心。

在巴黎乔治五世酒店见到帼馨，她定了最好的总统套房，我一进门，她横眉竖眼地问我：「你赞成开枪吗？」

我说：「我当然不赞成。」

她缓和下来说：「那你怎么办？」

我说：「这身军装可怎么再穿啊。」

她说：如果你真要离开军队，人民集团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的。」

我说：「我官虽然不是太大，但要离开也不容易。」

于是我开始给她解释，在中国没有「辞职」一说。华国锋辞职，是邓小平、胡耀邦逼的，胡耀邦辞职，是邓小平逼的，这次赵紫阳辞职，也是老人帮逼的。如果没人逼，我回去就辞职了，那会很奇怪，他们很可能随便找个理由就把我抓起来，我这番话帼馨听得似懂非懂。在她看来，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怎么还这么复杂！

我心情很沉重，两个多星期，电视上天天是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的画面，满街挂满了血淋淋的北京街头民众死伤的照片。帼馨看我忧心忡忡，大概想安慰我一下，特意点了一桌晚餐，一只大龙虾，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龙虾。但我没什么胃口，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结论是必须软着陆，不能太感情用事，特别还得照顾母亲的处境。我跟帼馨说：「我至少需要三个月，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理由自然离开，如真能离开，我当然愿意来人民集团工作。」

我们在巴黎道别，帼馨回香港，我回北京。回北京的飞机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一路上苦思苦想，能找到什么理由辞职呢？赵紫阳刚辞职，你罗宇就跟着辞职，邓小平、杨尚昆还能饶了你？飞机落地，我也没什么主意，没想到，又有人来帮忙了。谁呢？就是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贺鹏飞和贺平（邓小平的女婿）。

我第二天去部里上班，自然要先去报个到。到贺鹏飞办公室一看，曹刚川（后来当了一阵国防部长，已退休）、贺平和几个处长都在，好像在等我，我刚打完招呼，贺鹏飞和贺平就翻了脸，说：

「你逾期不归，停职检查。」我虽然毫无思想准备，但我反应很快，我知道没什么「逾期不归」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哪天走，哪天回，任务批件上

是写明的，机票也不能改。我正愁找不到理由辞职呢，眼前就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必须抓住，于是我也立即翻了脸，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拍了桌子。

我说：「我逾什么期？日程是你贺平定的，机票是你贺平买的，我有一点改动吗？你们两个是想整人，昏了头，文件都在这儿，你用不着停我的职，我辞职！」

以后的故事，我在前边也写了，总之，我利用大小二贺发难，终于比较顺利的辞职，离开了封建专制的政体。九月我离开了总参谋部，算算时间，从巴黎回来也正是三个多月。10月25日我拿到了护照，1990年2月14日（情人节），帼馨与我在深圳叩拜高堂，共偕连理，六月我就到了香港。

但后来每当谈起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帼馨总说的是1989年，我不得不每次都纠正她，我说：「不是89年，是90年，90年是双春，而且算命先生看你的命，也是90年。」但什么时候再谈起，她仍说是89年，我想，主要是因为「六四」是1989年，印象太深了，没有「六四」，我们实在没有任何可能后半生终于走到一起，全靠神灵安排。后来我常跟帼馨说：「原来我是无神论者，经历了这么多是是非非，我现在是有神论者了，我相信有神灵在保佑我。」

3、意大利念旧，欣然出国

邓小平、杨尚昆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邓小平的女婿和我在一个办公室，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当时是军委秘书长，所谓正师职干部离队要军委批，就是杨白冰批，杨白冰批了之后，总参给我开出了介绍信，自己找工作，我和民办的京西大学校长认识，他聘我挂了个教授的名，从大学申请了护照。当时形势很险恶，邓、杨引而不发，是由于邓、杨觉得你罗猛猛反正跳不出我的手心，慢慢再整你。我如果不能趁他们不注意，很快离开，麻烦就会很大。

当时不是谁想申请护照就能申请，必须有「理由」，我的最好的理由当然就是小孩在美国，申请赴美探亲，但护照拿到了，美国人却不给我签证，罪名是「移民倾向」，由于「八二工程」，我跟美国武官很熟，大使也见过，但我一辞官，美国人的脸马上就冷了。

我领教了美国人的冷淡，转而申请意大利签证，意大利人却念旧，意大利武官后来跟我说：「我一看是你申请签证，马上办了。」但是当时实行「出境卡」制度，我申请护照是「赴美」，有了意大利签证还是走不了。

帼馨和我都很着急，几经周折，找到了海南省一个赴欧考察团，随这个团到了意大利。迄今已二十年，我现在是半个中国人，半个欧洲人。这时我记起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长征的路上，「依天抽宝剑」，把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赠美，一截遗欧，一截还中国。这是毛泽东世界大同思想的表达。但他的思想还停留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代，毛不可能看到世界大同。今天，我的儿子在美国已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也有了孙子，帼馨和我在欧洲也生活了近二十年，妈妈和一众兄弟姐妹在中国——让我觉得世界大同真是不远了。

我辞职两年多之后，贺平要挟江泽民签发了一个「主席令」，开除罗宇军籍、党籍，消息传来，我诚心诚意感谢贺平，因为我辞职，知道的人总是有限，主席令一发，全党、全军都知道了，而且入了党史，搞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冤假错案。

贺平搞这个文件时，好心人劝他：人家罗宇走了两年多了，军委批件是杨白冰签的，总参、总政、公安部、北京市看到批件的人不下百人，你现在开除人家军籍，无法自圆其说，就是日子也对不上。但贺平智商不够，他听不懂。江泽民不认识我，贺平逼着他签主席令，他还是问了一下当时的公安部陶驷驹，陶驷驹是文革后父亲当军委秘书长时公安部李广祥副部长推荐来的一个秘书，我们当然很熟。

江泽民问陶驷驹：「罗瑞卿的儿子出国是怎么一回事？」

陶驷驹答：「罗宇出国手续是全的，军委批件批准复员。我也看到了，至于后来装备部为什么不按程序给罗宇办复员手续，我就知道了。」

江泽民肯定是听懂了陶驷驹的话，江泽民知道，邓小平的三女婿贺平是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冤枉罗瑞卿的二儿子罗宇，再造一个冤假错案，拉江泽民下水，但是罗瑞卿已去世十多年，邓小平则掌握着江泽民的生杀大权，正是邓小平所谓南巡，到处放话「谁不改革谁下台。」矛头直指江泽民的时候，江泽民当然要拍邓家的人马屁，所以毫不犹豫的签了违宪的牛头不对马嘴的「主席令」，于是我就第二次荣登中国共产党冤假错案排行榜。

杨尚昆知道我已经出国后，就对陶驷驹讲：「罗宇如果回来，就不要再走了。」他们这些人从来不考虑法律、人权这些事，想怎么干怎么干，合不合法

无所谓，这些故事，都是陶驷驹退休后，邓、杨也驾鹤西去了，陶驷驹才敢悄悄的说给妈妈听。到 2003 年，妈妈给江泽民写封信，问江泽民：我这个儿子怎么啦！江泽民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具体怎么批的我也不知道。

总之，总参谋部、总装备部派人来家里看妈妈，说江泽民主席批了，把罗宇的户口安在你这儿，档案放在派出所，并发给我一张公民证。他们以为我可能会谢恩了，我则给当时的国防部长曹刚川（我离开装备部时曹是装备部副部长，所以我们很熟。）写了一封信转江泽民，信中我说：你开除我军籍、党籍，是冤假错案，必须平反。总参谋部扣压我的档案十几年，必须赔偿。从此，再无下文！到江泽民下了台，又托人找新任胡锦涛，胡办传过话来：「这是前任办的事了，我们不好插手。」此胡（锦涛）非彼胡（耀邦）。

4、发射澳洲卫星

从胡耀邦上台到「六四」，是中国和民主世界的蜜月期，在台湾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中、美已经开始军事技术合作，法国则极力想出售幻影 2000 战机给中国，这两个项目我都参与了，而且是促进派。军事技术合作，就是互相不再认为对方是潜在的敌人，民主世界寄希望于中国融入现代民主体制，像后来的苏联东欧一样，但一切希望被「六四」粉碎，所以美、欧对中国的制裁一直持续至今。不管双方说了多少好话，编了多少谎话，但制裁不变。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根本不记得「六四」，但民主世界仍然牢记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政府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相较于民主世界的正义和原则，中国的「愤青」们是一群多么可怕的浆糊，我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中国的「愤青」们随时会给中国造成灾难。民主世界之所以坚持制裁中国至今已超过二十年，也是因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捉摸不定。

话说回来，当年中国的航天事业也向国际开放，招揽发射业务，正好澳洲要发射两颗卫星，国际招标，于是中国的长城工业公司就去投标，由于是第一次参与国际竞标，「长城」根本不知道如何办。

「长城」的总经理有一个同学在帼馨的北京办公室工作，于是就通过这个同学找帼馨帮忙，帼馨为此专门成立了「澳大利亚人民集团」，在不可想象的短时间内，准备齐了所有文件送入政府，并一举夺标。

但中国中标之后，不愿执行合同中附加的补偿贸易条款，实际上就是具体

负责的两个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这两个人想把补偿贸易合同给自己的亲戚在澳洲的公司。这样，原来跟长城签了补偿贸易合同从而帮长城中了标的澳洲公司就要告长城。一告，整个发射合同肯定就吹了，中标前这两个人对澳洲人民集团言听计从，中标后就翻脸不认人了。

于是帼馨找我帮忙，当时我还在总参谋部，航空和航天是一个处，国务院航空航天部林崇棠是部长，于是我就介绍帼馨去跟林崇棠谈，但也不得要领。我到了香港之后，澳洲人民集团澳方董事也要告长城，因为长城没有按合同付佣金。帼馨说：最好别告，长城虽然没理，但中国首次发射外国卫星总是好事，一告，发射合同就吹了。人民集团做了澳洲的工作，你能不能给国内反映反映情况。当时江泽民还没有发他那个「主席令」，我自认为一切还算正常，所以我就给邓小平、杨尚昆以下所有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讲清道理，为了中国的利益，要诚实履行合同。

这封信，各有关部门都看到了，但没任何声音，贺平后来以这封信为据，给我加了一条罪名：「站在外国公司立场上损害国家利益。」所以大家都说贺平是白痴，这件事的结局是：澳洲人民集团由于帼馨说不起诉，就没起诉，长城为了保发射合同，赔偿了一百万美元给澳洲补偿合同的公司。但是老天还是惩罚了中国，第一颗星就掉了下来。过了八年，我们又与「长城」合作，帮助「长城」争取到一颗欧洲星的发射合同。这时，「长城」的领导都是新人了，再说起澳洲这颗星，所有人都抱拳作揖，对小姐说：「得理且饶人！」

虽然这颗欧洲星由于用了美国的一个部件，美国坚决不放许可证，「长城」最终未能发射。但航天总公司内部，「长城」、「五院」、「八院」，大家都知道小姐是诚心诚意帮助中国航天事业。我们和航天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很多业务来往，航天的很多人都探访过我们，帼馨对这件事的处理手法，我也很佩服。官僚资本主义不能帮，但科学技术最终是人民的，科技发展和交往，必然促进民主事业。

5、民航大标，看透朱镕基

建国之后，空中交通管制（空管）一直和空防是一个概念，空军有雷达兵，主要是空防，也兼管了空中交通。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国际民用航空交通大增，原来由空军掌管的空管系统就非常不适应了。空军抱怨任务太重，民航抱

怨空军根本没有国际水平，要求组建国家空管局。文革中，空军管民航，欺负民航，得罪了所有人，文革后空军撤出民航，两家就成了死对头，事事对着干。1978 年到 1988 年，民航在飞速膨胀，空军在缩编，近万名飞行员离开空军，民航一个不要！自己办航校，自己从头开始培养飞行员，好像用的不是人民的钱。空军给军委打了几次报告，邓小平、杨尚昆就是装聋作哑，这近万飞行员就散了。这种浪费，到处都是。

当年为了加强空军的「空管」能力，我们引进了一套法国汤姆逊的雷达系统，从上海到济南到北京，勉强连成了线，在北京空军大院内，还盖了一幢「空管」大楼，但是到 1988 年，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国家空管势在必行，民航则早已开始着手加强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建设。正好有一笔日元贷款，民航就用招标形式选雷达，我在认识帙馨之前，意大利 Alevis 公司就已经委托帙馨投标。

「A」弹成功签约，意大利人信心更足了，这段故事，帙馨在回忆录中写得活灵活现。

过去民航只盯着美国和英国的雷达，对意大利的雷达不熟悉，其实世界上很多机场都是用意大利的雷达，包括香港，只是意大利人不大会宣传自己。由于「A」弹和雷达是一个公司，两个分部，所以帙馨问我，能不能找民航总局的领导谈一谈，我和空军、民航的关系都很好，于是介绍总局管技术的副局长管德和管外事的副局长何德铭去跟帙馨谈，他们谈得很好，「六四」后我离开，他们仍然谈得很好。终于民航内部统一了认识，知道意大利的产品质量和价格都是最好，于是意大利中了标。

但朱镕基和吴仪访英之后，就出来干扰了，朱镕基让民航写报告，不要意大利的，要英国的，理由是英国首相告诉他，中国买英国雷达，英国就不抛出香港政改方案，这种鬼话朱镕基还真信。从伦敦用外交特急密件给民航，叫民航打报告，终止意大利合同，改为跟英国签合同。民航收到朱镕基的指示后，打报告说：你是领导，你决定买英国设备，我们服从，但民航不能说这是民航的主意，你下文，我们执行。第二，选择意大利的雷达，是民航评标评出来的，现在要改，一切损失由领导承担。第三，航管雷达，人命关天，我们选我们负责，领导选领导负责！

好家伙，朱镕基大概还从来没碰到如此硬的下级，但民航说得处处在理，

朱镕基也不敢下文，民航就坚持你不下文，我就不变，这下顶上了，一拖三年多，一直到九四年才尘埃落地。民航还是买了意大利的雷达，装备了十六个机场，形势大好之时，意大利人却昏了头，不大听人民集团的意见，英国的马可尼公司又合并了意大利 Alevia 的雷达分部，美国人就乘虚而入，意大利的优势转瞬即逝。

民航开始搞全固态雷达，其实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全固态雷达也是意大利产品，中国却不知道，以为什么都是美国的最好，国际空间站，欧洲造一个舱，美国任务是造三个舱，波音造了一个，不造了，另两个下定单给了意大利，意大利造出来了，还要描上波音的标记，我跟意大利人开玩笑：你们最起码也要写上「意大利造」，意大利人说，合同上规定不许写！这种故事还多的很，很多美国人啃不动的高精尖技术，都要请欧洲人帮助。

民航大标这件事，也使我稍稍认识了一点朱镕基，朱镕基「六四」后上来的人，我们无缘相识，原来我对他还寄予一点希望，当过右派，但五年总理任上，建树有限，而且实在是缺乏政治智慧，出了两大丑，一是对台讲话，还是共产党那一套，结果帮陈水扁上了台。二是访法时对法国军火商说：你们不要卖军火给台湾，卖给我，我有大笔的钱，真是不知所云。

这是一种人，挨过共产党的整，但上了台，还是共产党那一套。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等几乎所有共产党的高干，都是如此。真想改变一点共产党的本质，我认识的高干里，只有两个，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习仲勋。赵紫阳我不认识，但我佩服赵紫阳宁愿政治局委员不当，也不做检讨，当了共和国十六年的囚徒，至死坚持理想，但全党和全国人民却没有几个和他一起坚持，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

民航大标，帼馨赢了朱镕基，天助我也。

6、香港遇险，欧洲安家

我 1990 年到香港，感到香港乱哄哄的。走私、打劫，日日响枪。AK-47 冲锋枪也上了街，警察疲于奔命，我们住在港岛一条路，都是富人，是警方重点保护区，相对好一些。没想到，贼还是持枪入了屋。那天也巧，平常底下有一个工人，上面有一个追随帼馨多年的英国人，那天工人放假，英国人出了差，只我们两人在家。

贼撬开了厂房的窗户，上、下三层转了一遍，才在我们睡房前烧起了电线。我们闻到了焦味，以为是电线出了问题，因为味很大，我们一下跳下床，我对帼馨说：「我下楼去查电闸，你去化妆房看一下。」睡房连着卫生间，卫生间连着化妆房，帼馨奔卫生间，我则去大厅准备下楼，我一开门，赫然看到一蒙面人持枪立于门口，此时帼馨已进了洗手间，而且已关了门，后来帼馨告诉我，我开门的一瞬间，她已经看到了火光和人影，知道是贼入了屋，于是她锁好卫生间的门，迅速报警，其实她当时是非常安全的，贼只挟持了我，并没有看到她，而且也挨不着她，化妆房有阳台，从阳台一下就到隔壁房子，但帼馨为了救我，一边穿了一件睡衣，一边隔着门与贼周旋。

贼用枪逼着我，对着门里说：「狄娜，快出来。」

帼馨隔着门说：「你别乱来，我穿好衣服就出来。」

帼馨打开门之后，首先对贼说：「嗨！你先把火扑灭好不好。」一杯水浇灭了火，贼就让帼馨捆我，也没什么绳子，拿了两条窗帘的带子，然后贼又要捆帼馨，帼馨说：「你捆上我，谁帮你拿东西？」贼问：「保险箱在哪儿？」

帼馨说：「没什么保险箱，只有几件首饰，我帮你拣几件真的，你拿了快走，否则工人一上班，报了警，你就走不了了。」

贼正在拿东西，就听到了警车响，掀开窗帘一看，到处是警察，贼见此景，一巴掌就打向帼馨，帼馨轻轻一闪，贼打空了。后来帼馨告诉我：「这是我师傅教的，躲早了，他会调整打你的线路，躲晚了，打着了，必须感到风至，再闪，他就打不着你了。」

帼馨对贼说：「你看，我让你拿了东西赶紧走，你不走，工人一回来，当然就报了警，你别慌，我送你走。」

贼枪指着我，说：「让他开车。」

帼馨说：「他哪会开车？你看，哪有车钥匙？」

帼馨鞋也没穿，双手还被捆着，贼用枪顶着帼馨的脖子，开了大门，径直下去，警察一看，贼拿着枪，哗一下就散开了。

从大门口到公路，有一条十几米长的私家路，一路下坡，帼馨一下滑倒，警察利用高度差这一瞬间开了枪，贼被击中，但仍勉强押着帼馨走到了公路，截停一辆车，贼欲开门之际，帼馨乘机拔腿就往回跑，这时警察第二次开了枪，

贼被击毙，后来警员告诉我们，他们一共开了五枪，但只找到四个弹头，警员说：「你们可要好好感谢神灵，这第五个弹头是神灵收起来了，以免伤到小姐。」

到我挣开捆绑追出来时，帼馨已坐在警车上，气定神闲，我开始还有点惊慌，看她如此镇定，我也安静下来，我用双手握着她的双手，上下打量，我说：

「没事吧？」她说：「脚擦破点皮。」我赶紧回屋给她拿来便鞋，用药棉和红药水擦洗了一下脚。这时一个警察过来，兴奋的说：「打死了！」帼馨一听贼被打死了，非常吃惊，说：「阴功！你们怎么就把他打死了？」警察听罢，也很吃惊，说：「他差点把你打死了啊！」但是第二天，帼馨还是让司机在贼被击毙的地方，给贼上了一柱香。

我们当即被警方请往警署录口供，从住地往警署不过三、五分钟车程，到了警署，帼馨问一个女警要镜子，首先去洗手间梳理一下，她后来跟我说，那是她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没梳妆就见人。

简单的录了口供，一个警长对帼馨说：「小姐和十年前一样漂亮，一点没变。」

帼馨说：「我们以前见过？」

警长说：「小姐不会记得了，十年前在一个颁奖典礼上，我见过小姐。」

后来我们听警长讲述，今早警方收到小姐报警，正在交接班，晚班还没走，早班刚集合，于是两班人马齐出动，四十名警察一下包围了我们的住地，四十名警察四十条枪，再加上贼一条枪，中心就是一个弱小的女子。警察对小姐佩服得不得了，说很多人经历这么一场惊心动魄的枪战，多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小姐却如此从容不迫，先梳妆，然后又跟我们谈香港时局，政制改革，真不得了，真不得了。

此事香港各大报头版头条报了好几天，记者把住地围的水泄不通，没办法，我们只好在朋友家暂住了几周，那些年，天天响枪，总是贼占便宜，这一次警方大胜，又是庆功，又是领奖，发给我们请柬，我们也都没去，国内认识小姐的人也很多，也闹的沸沸扬扬，世界各地飞来很多慰问信、电话，很多是很长时间没联系的朋友。

我的父亲建国开始，做了十年毛泽东的大警卫，毛泽东身边从来没出现过险情，不仅毛泽东，所有高干身边也没出现过险情，我刚到香港，就经历道么

一场惊心动魄的警匪枪战，不是英雄救美，而是美救英雄，使我终生惭愧。至今，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事事处处我都依着帼馨，任何事不争。你想，一个人不顾个人安危，用生命救了你，你还有什么可争的？

香港遇险之后，帼馨说：「香港太乱，我们不如去欧洲吧，我们主要的业务也在欧洲。」我们在意大利、瑞士、法国看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这时有个朋友告诉我们，在欧洲最南端，有一片非常美丽的土地，可谓欧洲的天涯海角，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阳光，新鲜空气和水，欧洲人称其为「欧洲最后的天堂！」这是哪儿呢？就是 Portugal（葡萄牙）最南边的一个省，Alperve（阿尔戈夫），省府是 Faro（法鲁），我有一个英国友人经营了二十年的昆塔湖区，在海边，高尔夫球场连着高尔夫球场，围着高尔夫球场一座座别墅，我看到的第一眼，就想起了北戴河，一个模式，只不过更现代化一点。北戴河是三十年代英国人建的，这里则是八十年代的风格，我们在昆塔湖住了几天，大家都喜欢，于是决定在此安家。

我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的翻译是如此糟糕，Portugal 应翻译为菠琪嘎洛，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Spain（西班牙）则应翻译为斯潘，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如此美妙的音，怎么中文给翻成这个「牙」，那个「牙」。闲来无事，查找出处，发现原来是广东音读 Portugal、Spain 翻译成了现在这个音，于是我跟帼馨开玩笑。

我说：「原来这两个可怕的翻译是广东音弄出来的。」

她问：「你认为哪个地名翻译的最好？」

我答：「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翻译的最妙。」

她又问：「那我们广东音有什么最好的？」

我答：「广东音唱诗词，妙不可言，你经常唱木兰词、秋声赋、长恨歌，吊古战场，音域真是妙不可言。」

她高兴了，说：「那当然了，你们北方只有四音，我们广东音则有九声。」

由于互相爱慕，互相信任，帼馨和我之间无话不谈，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只有一个题目我不发表意见，就是易经，实在是我根本不懂。帼馨的诗赋造诣，已使我叹为观止，因为我从小对文学无兴趣，几乎是诗词、古文的白丁，易经对我则是天书了。当然这是真正有学问的天书，不是当今一些所谓艺

术家，自己什么不懂，只是为了去唬人家而造的天书。易经、佛经、可兰经、圣经，传承了几千年，学问深不可测。由于我过去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把这些学问忽视了。

我在毛泽东身边生活了 16 年，从五岁到 21 岁，文革坐牢五年，当了三年工人，又当了十几年军官，我们主要话题之一，当然就是谈论毛泽东、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我曾跟帼馨说：「毛泽东在十大时拎出个王洪文当副主席，说王当过农民，当过兵，当过工人，所以可以当副主席，我当时想，这算什么理由，我的经历都比王洪文强，那时我刚从监狱出来，正在当工人。」

帼馨跟我抬杠，说：「那你可以当副主席了。」

我则非常认真的说：「何止副主席，我当什么都比江、李、朱、胡、温强。」

她说：「何解？」

我答：「中共的封建主义特征之一，就是指定接班人，过去皇帝是老子传儿子，现在的『指定』，和老子传儿子并无本质区别，所以和封建皇朝一样，也是一窝不如一窝，到民怨沸腾，就是又一次革命。希望是苏东戈尔巴乔夫式的革命，不流血，中国革命实在是死了太多的人。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打了半个多世纪，只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却仍然是封建主义。邓小平开放了经济，政治上仍然是一党专政，封建主义。毛、蒋之争，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国民党是输在腐败上，『六四』之后，邓小平的共产党腐败已超过了当年的国民党，只是因为没有另一个政治中心和中共竞争，中共靠刺刀还在维持，现在国民党又回来了，国共开始第三次交手，国民党在蒋经国的引领下已改造成了一个先进民主政党，中共现在最怕的就是民主选举，一选，中共肯定下台。」

帼馨跟我抬杠说：「也不一定嘛！」

我说：「江、胡像你这样想，反倒进步了。你真为人民服务，你怕什么自由选举？」

关于毛泽东、蒋介石之争，我跟帼馨说：「我从儿时起，一直以为毛、蒋之争，是信仰之争，直到文革，我才觉悟，根本不是信仰之争。毛、蒋都信仰封建主义，只不过毛泽东高蒋介石一筹，毛泽东高举「均田地」大旗，得到农民拥护。反帝，得到大部份知识分子拥护，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军事指挥，毛泽东更比蒋介石强，这就是兵不厌诈！如果蒋介石在大陆就实行他到台湾后

实行的温和的土地革命；如果蒋介石跟毛泽东搞议会斗争，蒋介石就不会输的那么快。」

帼馨认识宋美龄、蒋纬国等蒋家的人，她时不时也讲一点蒋家的故事。

帼馨不大喜欢我批评毛泽东，她总说：「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说？」

我答：「文革如我尊毛泽东为神，实在也没看出毛泽东这么多不是。坐牢五年，我想清楚了，毛泽东根本就是封建主义，我父辈追随毛泽东打天下，是又一次农民革命，打仗，毛泽东是天下第一，治国，却没治好。刘少奇不过是说了两句实话，就等于被杀了头，我如果把我想清楚的事情说出来，岂不早被杀了头？！封建主义的第一条法律，就是不能批评皇帝。」

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则绝对重视敌人，毛泽东知道刘少奇并非他的对手，我听说，毛泽东曾对人说过：他「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刘少奇打倒，但真要扳时，毛泽东还是非常细致麻痹谋划的，1964、1965年，毛泽东说自己退居二线，要去考察黄河，沿河逆流而上，因为没有路，所以要骑马，而且让汪东兴调来几匹马，所以这两年我也学会了骑马，现在看，这是毛泽东放的烟雾弹，目的在麻痹刘少奇。毛泽东整刘少奇，是精心策划，目地就是把刘少奇整死。毛起家，靠群众运动，农民、知识分子，自愿参加和支持毛的农民革命，毛泽东败家，则是运动群众的结果。

毛泽东把个人利益置于全国利益之上，把中国封建文化中最卑鄙无耻的东西通通翻上桌面，在华丽的革命词汇掩饰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赛说谎，折腾十年，得罪所有的人，把开国皇帝的功名，也折腾的暗淡无光。毛泽东整彭德怀，则是突发事件，谁也没想到这么一封好心的私人信件，弄出这么一个大乱子，这是毛向全党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无论是谁，功劳再大，逆了龙鳞，也得死。毛整我父亲，则是整给林彪看的，并不是真整，只是因为父亲没听懂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话，才酿成惨剧。

毛泽东生前，把死后的事都想清楚了，所以精心布了一个局，我称之为「三足鼎立。」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足，叶剑英、李先念这帮老家伙一足；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实权派一足。「三足」就能「鼎立」，一足没了，「鼎」就倒了。而这个局最妙之处就在于：除了华国锋，无人能破此局！帼馨对我的分析

极为赞扬，在香港主持「百年中国」电视系列节目中全盘引用了我的理论，但有几个人能听懂，我就知道了。

节目大陆不让播，香港懂中国政治的人又太少，我自己感觉，华国锋到死也没明白是他自己破了毛泽东留下的局，才被叶剑英、邓小平赶下台。华国锋可能怪叶剑英骗了他，可能恨邓小平不守信用，但华国锋对毛泽东留下的局动不得，则似乎没有任何认识。这就是中国的宫廷政治，毛泽东想清楚的事，毛泽东以为华国锋、汪东兴想清楚，江青可能也以为华、汪想清楚了，但实际情况是，华国锋、汪东兴就是没想清楚。

共产党打天下时，是革命党，也讲道理。打下天下后，毛泽东就把党往坏处教，大跃进、庐山会议到上海会议，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一个封建主义的党，大家都不敢讲实话了。往日千军万马，出生入死的英雄，现在都变成了唯唯诺诺、察颜观色、唯利是图的小人，这都是毛泽东教的。你看杨成武，打仗的时候也是一员武将，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之一。上海会议跟着林彪起哄，文革开始后，想上林彪的贼船，林彪还看不上他，踢落船来；林彪摔死后，杨成武平反，又投靠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也看不上他，又救他一命；邓出来之后，他又去拍邓的马屁，邓说：「此人不可用」。他就去拍叶剑英、聂荣臻，这两个元帅也确实为杨成武说了话，但邓坚决不允，最后当了两天政协副主席退休。然后就拼命写回忆录，拼命出书，在各种杂志上拼命的发照片，自吹自擂十几年，驾鹤西去，然后又有儿子拼命给他修坟。

这些帝王将相的故事，是我们日常谈话的主题之一，我经常想，毛泽东在我这个岁数在干什么，父亲在我这个岁数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这些英雄们都已经回归神煞。当年，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翻天覆地，赶走列强。又是什么因素使这一辉煌的革命胜利，变的越来越黯淡无光。跟毛泽东无法谈这个题目，因为仗打胜之后，毛从来没觉得自己还会有错；跟邓小平也无法谈这个题目，邓可以在毛面前认错，也可以跟华国锋认错，但不会对人民认错。邓可能也感觉到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毁了他一生的英名。

但邓小平至死不认错，邓小平想用经济开放，掩盖政治专制，结果就造成了眼前这么一个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怪胎。这是个全新的事物，一个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在民主世界军事制裁下（武器禁运），用了不到二十年，积累了两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成为世界「首富」（外汇储备第一），掌握八千亿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第一债权国。人均 GDP 是世界最穷国家之一，国家 GDP 总值则已经「超英」，正在「赴美」，中国已是「五强」之一，正在进入「三强」，人们已在议论「美中主宰世界」。

我认为不会出现美、中主宰世界的局面，因为美国的民主政体和中国的专政是根本对立的，美国坚定不移的和平演变一切专制政体。民主和专制的对抗，是美中关系、民主世界与当今中国关系的基石。不管表面上如何握手言欢，骨子里大家都明白，独裁专政就是民主的敌人。中共现在最怕的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中国传播，一旦人民觉悟，一党专政必然崩溃。美国稍稍有点害怕的，专制的中国握着八千亿美国国债，这八千亿，对美国是相当大的威胁，对中国是相当高的风险。此次金融风暴（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元对欧元已贬值了一半。

我认识帙馨之前，帙馨和美国打交道十几年，我们认识之后，和美国的交道就少多了，帙馨对美国很有意见，经常说：美国人太自私。

我说：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就是「人之初性本私」，所以资产阶级搞私有制，用「私」来调动一切个体的积极性，同时又用各种法律限制「私」的恶性膨胀。相较于前苏联和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起码资产阶级理论说的是实话，而无产阶级理论则说的是谎话。

帙馨说：资产阶级民主也不完美。

我说：离完美还差的远，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它更好的社会制度。

帙馨问过我：「在这些高级干部中，你觉得最好的是谁？最差的是谁？」

我说：最好的还是胡耀邦，如无邓小平这个太上皇，胡有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民主，起码绝不会贪污腐败到现在这个样子。但话又说回来，没有邓小平，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机会也不大。所以，成也是邓小平，败也是邓小平。最差的当数薄一波。胡耀邦为了解放以薄一波为首的叛徒集团，废寝忘食，邓小平整胡耀邦时，薄一波是带头的，为什么整胡耀邦？就是因为胡真心改革，真心想让邓小平当中国的华盛顿，结束封建皇权终身制。薄一波对胡耀邦恩将仇报，然后又去巴结江泽民，为什么巴结江，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官，进政治局，这种官场，还能有什么好官。

帼馨和我在欧洲生活了十五年，渡过了我们银婚纪念，这是我一生中最甜蜜的时期，我在电话上跟妈妈说：「这里夏天就是北戴河，冬天就是广州。」碧海蓝天，鸟语花香。帼馨喜欢猴，我们养了两个家庭的 Mamsse，中国名是白耳猕猴，属珍稀动物，有时候猴妈妈生了小猴，没有奶，或奶不够，帼馨就只好人工喂养，专门从英国找来 B B 奶，第一周要一个小时的喂一次，24 小时不断。有一次，太累了，晚上起来的晚了一点，小猴饿，就到处钻，找东西吃，但小猴不会退，结果钻进一个保暖用的小布袋，窒息而死，帼馨一摸，小猴已没了，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半夜三更，吓死我了，赶紧跑去看，等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赶紧把小猴接过来，抱好，然后慢慢安慰她半天才休息。

帼馨用手带大七、八只小猴，我们有个兽医朋友，他说：「这真是个奇迹！」人带大的猴，和人一直非常亲密，长大之后，把它们放回给它们的父母，它们和别的猴仍然不一样，什么时候见到我们，都想出来和我们亲昵一番。我们喜欢看「动物世界」，有时看到狮子、老虎撕啊，杀啊，帼馨就不敢看，但有时说起某人「禽兽不如」，帼馨就说：「禽兽比人好啊，你看，禽兽从来不同类自残，只有人类自相残杀！」

我想，是啊。狮子不杀狮子，老虎不杀老虎，只有人杀人。直到今天，人类还是把最优秀的聪明才智用在发展制造武器。

帼馨经常轻轻的唱着「我们的田园多美丽」，从小猴唱到小狗，从孔雀唱到山鸡、锦鲤鱼。2009 年 3 月，帼馨回香港检查身体，发现需要动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又连续动了三次，香港杂志有报导。医生建议她不要长途旅行，于是我们决定搬回香港。

7、「A」弹交货

「六四」之前中、意所签的「A」弹合同，由于美、欧对华武器禁运，没有交货。双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出主意，我说：「反正合同是禁运令之前签的，双方政府也都批准了，如果是在商店里买东西，交易已完成，现在请意方把日期通融一下，『六四』则已完成父易就行了。」于是双方皆大欢喜，货就交了，之后，国内有人问我：你是帮中国，还是帮美、欧？

我回答：「我帮中国民主化，我帮美、欧促进中国民主化，这种事，卡在那儿，两败俱伤，中国付了订金钱拿不到货，欧洲生产出了货拿不到钱（全部

款)，也不会促进中国民主化，法国也是按此模式解决了几个『六四』前签的小合同，工作主要是帙馨做的，如果中国政府交给外交部去做工作，外交部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我赞成美、欧对中国的军事禁运，民主世界是牺牲商机，坚持理想，国内纪念「六四」的声音已经被打压的很微弱，三十岁以下的人不知道「六四」，四十岁以下的人不知道「文革」，中共就想混过去，这怎么可能混过去？台湾「二二八」，五十年，不是照样平反！江、李、朱、胡、温实在没什么政治智慧。

「A」弹交了货，空军当一件大事上报江泽民，江泽民知道，主要是人民集团做的工作。江泽民也知道，人民集团里有一个被他冤枉了的罗宇，空军的人说，贺平不是东西，还是罗处长，受了那么多委屈还想着我们，当时负责这件事的是刘伯承元帅的小儿子刘太迟。

中国还没走出封建主义的怪圈，人类还没走出自相残杀的怪圈，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再有一百年，什么也没了！

8、ATR

我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十几年，一直管理航空装备，深知航空工业的历史和现状，深知使用部门和研制部门之间的矛盾。1992年，法、意合营的ATR公司想打入中国市场，请人民集团帮忙，帙馨问我的意见，我说：「ATR是一个成功的飞机，中国现在生产的运七（及后来的新舟60，新舟600）都是同一档次的飞机，就是质量不如人家，如能引进ATR生产线替代运七，是中国航空工业达到国际水平的绝好机会。但是航空工业总是瞧高手低，民航只瞄准『波音』、『空客』，不把这两家弄到一起，这件事很难办成。」于是帙馨把航空部朱育理部长，民航总局阎志祥，柯德铭副局长请到一起，签了一个原则协议，又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开了一个研讨会，金牛坝是原来毛泽东到成都时住的地方，文革开放做了宾馆，会开得热闹，但民航和航空部还是貌合神离，法、意又目光短浅，要价太高，始终也没谈成。2007年油价冲上一百美元一桶，所有飞机赔钱，只有ATR赚钱。

帙馨对我说：「你应该把你讲给我的故事写出来。」于是我就写了《三十年，中国航空工业的是与非》。帙馨逐句看过，还做了点文字润饰。

9、伽利略计划

航天技术，一切都是军、民通用的。比如搜索救援系统，找到你，把你救上来，这和找到你，把你打下去，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航天技术各国都列为高度机密。美国的 GPS 系统，到二十世纪末已老化，欧洲适时提出了伽利略计划，用伽利略系统替代 GPS。由于标榜的是民用全球定位系统，所以邀请中国参加，整个系统二十四颗卫星，耗资三十六亿欧元(3.66)，中国出资两亿 (200million) 参与。但朱镕基错误地把这个项目交给了科技部，因为航天部已变成了总公司，已不是政府部门，而这个项目又是政府之间的合作，但科技部从来没管过航天，所以从一开始国内各部门就打成一团。

人民集团和航天部一直有长期合作关系，虽然航天部目光短浅，有很多对不起人民集团的事，但帼馨非常大度，既往不咎。伽利略项目开始后，航天部自然请人民集团帮忙，我们在欧洲空间局内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争取到搜救分系统开发生产制造权，我们称为搜救盒。这是中国生产的分系统第一次登上国际卫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家都明白，这些事如果交给外交部或科技部来办，他们是什么也办不来的。

欧洲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很快将深入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首先是所有飞行器、舰船都有 ID (卫星定位身份证明)，然后所有车辆都有 ID，任何没有 ID 的，警察马上就会检查，然后越来越多的个人，将加入全球搜救系统，在不离身的对象中如手表、手机，甚至项链上装一个小片片，如有意外，如地震、海啸、空难等，随时可全球呼救，三分钟内，离你最近的救援中心会向你发出信息，告知救援队伍何时可到达。

欧洲和当今中国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只有根本理念的冲突，欧洲是民主理念的发源地，坚决反对中共的一党专政的封建主义，所以欧、美拒不承认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为完全市场经济。

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第一，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以欧、美、日为主体的民主世界，期盼和平演变一切专制政体。这一基本矛盾，主导了中国专制政体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当然也主导了欧、中关系，欧洲对中国，合作归合作，批评归批评，制裁归制裁，一切清清楚楚。只不过由于其他矛盾的存在 (如恐怖主义)，中国的暴富和中共媒体的有意歪曲，有时这一基本矛盾被模糊了。伽

利略计划就属于合作范畴，只不过所有技术都极为敏感。由于金融危机，欧洲没钱了，整个计划就搁置了。

科学技术的进步，会促使一个民族进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因为独裁是靠说谎维持的，但科学技术进步不能靠说谎维持的，民主只能在智慧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壮大。

【附录】中国航空工业的是与非

1、底子是俄国牌

战争年代，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国民党是飞机加大炮，打过仗的那一辈人，对飞机是无限向往。抗日战争，太行山五月反扫荡，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就是日本飞机炸死的。抗美援朝，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是美国飞机炸死的。其实那时飞机扔炸弹，炸死谁，飞机也不知道，人也不知道，不过是碰上而已，不像现在精确制导，指哪儿打哪儿。

解放军的第一批飞行员，是日本战俘在东北教出来的，其中有个林虎，我管空军装备时，他是空军副司令，我们很熟，1949年飞过天安门广场那几架飞机，其中就有林虎开的一架。开国伊始，大家当然都非常想要飞机，于是斯大林帮我们在沈阳建了一个歼击机工厂，在西安建了一个轰炸机工厂，这就中国航空工业的底子。

2、周恩来与『斯贝』发动机

中苏交恶之后，中国航空工业实际上停滞不前，文革中，空军提出搞一个像美国人F-4那样的歼击轰炸机，当时F-4非常成功，生产了上千架，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盟国都装用了F-4。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周恩来也知道，要搞飞机，首先要有发动机，当时中美没有任何关系，搞美国的发动机根本不可能，但英国人用「斯贝」发动机装备英国的F-4，所以周恩来就跟英国人谈，引进英国「斯贝」发动机。签合同时，我还在坐监狱，该合同用了十七亿人民币的外汇，当时相当一亿美元，而当时全国的外汇存底还不足五亿美元，实际上是倾全国之力，办了这件事，当时叫「专利引进」，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次从西方引进专利，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引进了「专利」自己就可以生产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到总参开始管航空装备时，周恩来早不在了，

工厂也建成了，当时管国防工业的是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王震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工厂向中央发个喜报，说生产出了两台合格发动机。

王震问：「今后年产可以多少。」

答：「英国人卖我们多少套『坯』，我们就可以生产多少。」

王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一听就不对劲，于是王震让国防科工委的叶正大副主任（叶挺的儿子）带着我们几个人去西安看看，我们到了西安，他们还没开始汇报，我已经全明白了，整个这个「引进专利」根本就是一场骗局！我们引进的就是一套加工设备。所有要加工的「坯」件，都需要从英国买，英国卖十套，我们就加工十套，英国人不卖，我们的厂子就没得加工，回来之后向王震汇报。

我说：整个这个引进就是「无米之炊！」完全受英国人控制。王震将信将疑，问：为什么不把生产「坯件」的技术也引进来？我说：这根本不可能，第一没这么多钱。第二，有钱英国人也不会卖，发动机技术是英国人的看家老本，二战后，美国人逼英国人还债，点名要发动机技术，英国人什么都给了，但就是把热部件的涂料技术扣了下来。直到今天，世界发动机市场，还是英、美并驾齐驱。英国人军机、民机买美国人的，发动机都用自己的。法国人、俄国人发动机技术都落后一大截。第三，现在的技术，是大专利套着中专利，中专利套着小专利，根本买不完！

王震听得似懂非懂，那时我只是一个参谋，因为和王震熟，什么都敢说，在王震那儿开会，都是这个部长，那个部长，我看这些部长主要心思都是揣摩「领导意图！」并没什么主见，叶正大是专家，叶正大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但也不吭气，于是王震对叶正大说：「你去英国调查研究一下，回来写个报告。」于是叶正大去了英国，一去三个月，音讯全无。我对也在我们装备部的王军说：「你老子交给他的任务，他完不成。」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叶正大的报告也不说成，也不说不成，但是如果要继续引进肯定是个无底洞，谁也无胆批个无底洞的项百上马。

西安这个发动机厂没有英国坯件，没有任务，也就没饭吃了，于是就用这套加工飞机发动机零件的精密数控设备去生产摩托车、汽车发动机，这种混蛋、王八蛋的败家子行为，只有中国的「国企」才会干，资本家会这么干吗！就是

从那时起，我才深刻的认识到，所谓「国有」，就是官僚所有，官僚胡干，就是蹭老百姓的钱。

从军队的角度，我们还是不能允许航空部这么胡干，所以我们还是发了一个文件，要求航空部研制「一种类似的歼击轰炸机」。这就是今天的「飞豹」（歼轰七），歼轰七「六四」前首飞，又过了十五年，才装备部队，这时，美、英的 F-4 都退役了。其实，英国人一开始就算好的，嫌你中国人一笔钱，三十年中国人飞不起来，谁骗了周恩来？当然不能说是英国人骗了周恩来，因为这么具体的事，不是周恩来应该操心的，是当时的航空部的主要负责人骗了周恩来。王震从这件事上并没有学到什么，后来王震拍板引进的六、七条日本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也都是没有第一道工序「光刻」，也都是无米之炊。

3、军机发展，核心在发动机

国际大环境如此，毛泽东跟美国人绝交二十二年之后重新跟美国人握手，并不是欣赏美国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只是「以夷制夷」，牵制俄国之举，邓小平改革开放，也不是要放弃一党专政，最好的胡、赵时期，也只是实用主义的吸取一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整个民主世界视中国为专制国家，中国也确实是专制国家，美国是军机老大，欧洲是老二，法国独树一帜，无人跟随，俄国只能靠自己，中国也只能靠自己，没有人会帮中国发展军机。

不要说中国还是一个专制国家，民主世界不会帮中国强大，就是像印度，民主化了的俄国，从经济角度出发，美、欧也不会帮助印、俄发展军机，日本、南韩就是 Copy（复制），从汽车到飞机，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本事复制。中国还没这个本事，俄国也没有，飞机的心脏是发动机，日本、南韩也 Copy 不了发动机，只能买美国的发动机。

王震之后是张爱萍管军工，张爱萍跟美国人谈好了，请美国改装我们歼八二的火控系统，中国的飞机，美国的火控系统（计算机），意大利的导弹。张爱萍是儒将，比王震懂的多，张爱萍世不跟谁商量，自己就定了。给军委写个报告，邓、杨就批了。我们叫「歼八二工程」，美国人叫「和平珍珠计划」，两亿美元，那时穷，整个国家外汇存底不到十亿美元，所以两亿美元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我是赞成扩大跟美国的合作，首先因为美国是军机的老大，其次因为我对

美国有特殊的感觉，或说疑问：美国建国两百年，从一个殖民地，发展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靠的是什么？中、美交过两次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打仗时，咬个你死我活，现在回头一看，大家都是愚不可及。

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一样，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准的代表。火箭上太空，是一次使用，但一架飞机生产出来，要使用至少二十年、三十年，几十年的飞机，美国、英国、俄国也都在用。所以航空产品最大的特点和难点就是维修，无故障率。你看俄国和中国，火箭技术和能力比美国和欧洲并不差很多，但飞机就是不行，无论军机、民机，都差很远，飞机的心脏是发动机，比起英、美的发动机，俄国货就是耗油高、寿命短，重量也重，所谓「傻、大、黑、粗」。中国的发动机比俄国的又差一大截。

发动机、特别是民用发动机，哪都买得到，拿来拆开来看，实在也没什么秘密，就是工艺、材料的差别，你就是搞不出来，俄国人赶了八十年，也赶不上，中国人赶了五十年，也赶不上，而且差距并没有缩小的趋势。

我们的歼八二运到美国，还着实把很多美国人吓了一跳，因为他们想不到中国生产这么大的歼击机，但也是「傻、大、黑、粗」，主要就是发动机不行，所以整个飞机性能就差好多。

「歼八二工程」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美国人坚决不谈卖军用航空发动机给中国，而且当时也实在没钱，美国人真卖，我们也买不起。作为开始，我们就选了一个火控系统改装，美国人算的很精，美国人知道中国的飞机不行，空空导弹也不行，所以火控系统提高了水平，无非是瞄得准，但威胁并不大，因为没有好的空空导弹。美国的导弹美国人明确表示不卖。当时中程雷达制导的空空导弹，除美国外，只有法国和意大利两种，法国货根本和美国系统无法兼容，即美国系统根本无法制导法国导弹，用的计算器语言都不一样，只有意大利的可以，因为意大利是跟随美国标准（北约标准），歼八二工程上马时，中国意大利之间为这个弹已谈了七、八年，意大利人想卖产品，但中国没有雷达可以制导这个弹，现在有了美国雷达了，于是我给军委写报告，申请六千万美元买 A 弹，意大利的 Aspide。

在英国人民集团梁帼馨董事长的帮助下，很快谈成合同，于是歼八二工程变成了中国的飞机。美国的火控系统，意大利的空空导弹三结合，我具体负责

这个项目，感到风险很大，当时考虑的风险是技术风险，从来没想到「六四」这种政治大倒退的事情，我从美国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现在还在军委档案里，因为它是得到空军附议后，呈军委审批，属永久保存档案。我的报告简单明了：鉴于将来如果系统精度达不到标准，三方可能互相推卸责任，我建议用美国人的钱，按美国对外军事销售法，我们可申请 80% 的贷款，将来如真有问题，美国人推卸不了责任，否则我们可以不还它钱。这个报告杨尚昆没批，杨尚昆访美时，我还专程跑到洛杉矶给他汇报了一次，结果「六四」枪响，美、欧对华军事禁运，我们已花了一个亿，飞机还被美国人扣了三年，到老布什临下台时，才还回来，一堆废铜烂铁。这种由于决策错误把人民的血汗钱随便扔掉的事，再也无人提起，也没什么掌权的人变的更聪明一点。

时值今日，欧、美仍坚持对华武器禁运，胡、温想冲破禁运，于是外交部负责编谎话的「发言人」想出了一个词：「冷战思维的继续」。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欧美什么时候跟中国「冷战」过，外交部发言人视全世界人民为傻瓜，所以他就是一个最大的傻瓜！「八二工程」之前，空军提出要搞「新歼」，邓小平说：「新歼」，五个亿，可以嘛！我跟当时的军委秘书长耿飊和当时的总参谋长杨得志说：五个亿怎么可能？五十个亿也不够啊！耿飊、杨得志对这些事不大懂，邓小平怎么会说出「五个亿」，他们也不敢问。在研究「新歼」的会议上，我仍坚持给军委的报告要写明：现在搞一个新歼击机，是五十亿或一百个亿的事情。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但是国防工业中有一大帮人，仗着老家伙们不大懂，专门唬弄老家伙们，他们说：「罗处长，你说五十个亿，老头们就吓回去了，现在邓说了五个亿，咱们先拿五个亿，上了马，立了项，花完五个亿再申请五个亿。」

那时万里（人大委员长）刚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民主决策」，我说：「现在讲科学民主决策，国际上搞装备的先进大国，都提出『全寿命』概念。从研制、装备到维修使用，一揽子规划，老人家说五个亿，是老人家不懂，我们知情不报，则有『欺君』之嫌。」这番话可得罪了一大批人，因为当时叶剑英的女婿邹家华（后来当了副总理）、聂荣臻的女婿丁衡高（后来当了国防科工委主任）等一大帮高干子弟都在。争来争去，还是唬弄老头这帮人势力大，因为唬弄老头就可以上马，即立项，说了实话很可能就上不了马（立不了项）。

其实我也是赞成上马的，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认为必须说实话，科学论证上马，他们则认为先上了马再说，「新歼」就这么稀里糊涂上了马，到 1989 年「六四」，已经花了好几个「五个亿」，又搞十年，到世纪末，总共绝不止五十个亿，「新歼」命名歼十，上了天，但还是没有发动机！

「新歼」八十年代初一上马，首先就是要确定用什么发动机。当时，我们自己没有，对苏关系仍在冰冻中，对美关系虽然比对苏关系好的多，但美国明确表示不谈军用发动机的出口问题，怎么办？国防科工委从罗马尼亚偷偷买来两、三台米格-23 的发动机，就决定用这个发动机发展「新歼」，又不安排仿制或研制这个发动机的经费，我就不同意。因为这么搞，十年、十五年后，即使「新歼」上了天，空军还是什么也没有，空军支持我的意见。

科工委的人问我：「你说怎么办？」

我说：「人人皆知，发展飞机，首先要有发动机，发展『新歼』，首先要安排研制发动机的经费。」

科工委内部关系复杂，大部份人急功近利，对长远项目不感兴趣，发动机研制比设计飞机更难，科工委的兴趣是搞几架样机上天，至于军队有无装备，他们并不认为很重要。所以就绕开难点，择易而行，把困难留给后人，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遇到困难就「绕开」，但实际上是绕不开的，无非是留给后人。

我第一不同意科工委违反科学规律，不搞发动机就搞飞机，第二不同意他们选俄国的发动机，我主张跟美国人谈 404 发动机，虽然美国人明确表示不谈，而且前面我也提了，美国人真卖，我们当时也没钱买（但并不等于十年内没钱买，可以先买几台，用 10-20 年时间逐渐引进技术）。表面看是发动机之争，实际上是对中美、中苏关系发展方向的预见之争。

这场争论到「六四」见了分晓，科工委歪打正着，全赢，因为「六四」之后，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全部中止，苏东欧解体，中俄拥抱，中国越来越多的钱买俄国的飞机（苏-27）、军舰、潜艇，当中国人告诉俄国人，中国用俄国米格-23 的发动机发展了一种新歼击机时，俄国人着实大吃一惊，像中国人这样，在发动机毫无着落的情况下，就发展了一种飞机，实在不可思议，中国「新歼」上天已是上世纪末了，俄国的米格-23 已准备退役，米格-23 的发动机当然可以卖

给中国，再赚一笔钱，中国要引进生产线，自然花更多的钱，总之，一切还是受俄国控制。

批准「新歼」上马的老人都不在了，再也无人提「五个亿」，这时国内传来话：「幸亏没听罗宇的，否则怎么上得了天。」我则传回话：「搞科学的人，还是尊重科学规律好，如果听了罗宇的，坦克不会开上天安门广场，中国今天也不会还是一党专政的落后政体。」

驳嘴归驳嘴，谁也不会说服谁，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中国的事情之所以办不好，就是由于一党专政，不尊重科学规律，不尊重自然，不尊重人。

「新歼」从外型上看，和以色列的「幼狮」一模一样，以色列七十年代自己设计了「幼狮」，用美国 404 发动机，大概搞了十年，被美国人叫停。以色列花的都是美国的钱，美国人说：你买我们的 F-15、F-16 就行了，还搞什么「幼狮」！美国人叫停，以色列不得不停，但以色列人花了十年完成的一套「幼狮」设计软件，就栽在自己手里了，以色列就想把这套软件卖给中国，那时中国和以色列还没有外交关系，但中、以之前的军事技术合作已有相当规模，科工委做主，引进了以色列 120mm 口径坦克滑膛炮，引进了「怪蛇瓜」空空导弹，同时又开展了「新歼」设计的合作，买了「幼狮」的设计软件。

军机只能靠自己，敌人不会帮你，朋友也不会帮你，以色列人跟中国做军火生意，美国人知道得清清楚楚，美国人点头，以色列就可以做，美国人不点头，以色列就做不了。以色列人这套软件，有价无市，除了中国之外，不会有人买，所以可以把价钱压的很低，但以色列买通了科工委几个关键的人，中国用天价买了这套软件，美国人则算的很清楚，让以色列人赚笔钱，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人三十年飞不起来！「六四」之后，邓小平的女婿贺平，看跟以色列做生意这么肥，于是也参加进来，决定买以色列人的预警机，合同签了，钱也付了，到要交货了，美国人喊停，以色列人只好撕毁合同，赔礼道歉退款，而中俄已经拥抱，于是中国人调头去买俄国人的预警机了。

国内好事之徒看到这几段文字，大概会说：「你泄密！」其实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会反问这些好事之徒：「泄什么密？泄给谁？」泄给美国人？泄给俄国人？还是泄给以色列人？他们比我还清楚，无非是泄给了中国人民，官僚们拿人民的钱去胡干，人民还没有知情权，所以要保密。

定为敌人，如果把自己的情况泄给了对方，招致己方损失，为泄密。所以，如果指责我泄密，即为以中国人民为敌，读者以为此定义如何？

「泄密」之罪，在中共党内被乱用，总书记辞职，总书记的秘书告知天下，也为「泄密」，这种指责是否有常识！

言归正传，军机靠自己。世界上能搞歼击机的，也就三家，美国老大，欧洲紧随其后，法国和瑞典已经到头了。由于投资太大，市场太小，到此为止了。日本和南韩是美国的小伙伴。俄国另树一帜，比美、欧差一大截，中国「六四」后一头栽回俄国的怀抱，一切武器装备重归俄国标准，跟着俄国人，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容易，要么不搞歼击机，要搞，还得下大力量放在研制发动机上，否则永远落后。

结束这一段，讲个笑话（真实的故事），刚开始跟美国人有了军事交流，空军接待一个美国代表团，拟好的谈话题目中，有一个关于美国的「空勤灶」，被我止住。我告诉我们的空军，美国没有空勤灶，什么是空勤灶？就是为了保证空勤人员特别是飞行员的身体健康，给予一个特殊的伙食补贴。我们小时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经常从口袋里拿出两块巧克力，就是空勤灶的，那时有两块巧克力，小孩就高兴的不得了，现在大家都节食、减肥，巧克力无人问津了，什么事都在变。

4、热衷飞机，扼杀民族工业

建国后二、三十年，民航只有一点点，也没什么民机，周恩来 1960 年访问非洲，还是租了瑞士两架飞机，那时最好的飞机（客机）在空军，几架俄国的伊尔-18，两架英国的「子爵」，文革开始买了十几架英国的「三叉戟」。中美关系恢复后，民航开始买美国的波音 707，那时没几架飞机。买什么，也是周恩来亲自拍板。运输机，就是仿造苏联的伊尔、安东诺夫，搞了一个运七、一个运八。四人帮为了争权，硬是在上海搞了一个「运十」，完全按波音 707 的尺寸，也是用波音 707 的发动机，巨额投资，生产出一架，也飞了起来。四人帮倒台了，没人要，民航不要，军队也不要，就憋死了。

周恩来之后，中国实际上没有总理（文革中周恩来也不是总理了），华国锋哪是总理之材？赵紫阳也是只懂三自一包，不懂城市，至于以后的李鹏、朱、温都是庸庸碌碌之辈。

我管航空装备之后，科工委的人带着我去上海看运十，问军队能不能买几架，救治这个企业，我说：「这么大的客机，军队要它干什么？民航都不要，因为它没有适航证，而要飞出适航证，得要多少钱！」我又说：「周恩来引进斯贝发动机，让国防工业搞了个类似 F-4 的歼轰机，周恩来走了，也没人搞了，四人帮搞个运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怎么能救得活！」科工委的人哑口无言，但我想他们心里是恨恨的。这个罗处长，哪壶不开提哪壶。

「运十」死了之后，上海开始组装 MD-80，我是赞成的。我一直宣传，民机只能靠国际合作，组装整机就是很好的开始，我们买这么多飞机，必须逼着美国人转让技术，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把民航的合理要求和航空工业的合理要求结合在一起。做为中国对美谈判，中国内部民航和航空工业部首先打成一团，互相排斥，本来买飞机买方是皇帝，可以争取很多来料加工、技术转让，壮大自己的航空工业，但民航一概拒绝帮助自己的航空工业，由于江、李、朱、胡、温这些人天天坐民航的飞机，民航更加有恃无恐，谁也不敢得罪了。买飞机成了平衡贸易的一种手段，世界上只有中国如此愚蠢，这就是「国有」，没有国家利益，只有各部门的利益。

民航文革中被「军管」，受够了空军的气，文革后民航开始发展，空军整编下来的好几千飞行员，一个不要！我就骂民航，我说「空军文革中欺负你们不对，你们现在这样做也不对，这是多大的浪费！」但没人听，报到邓小平那儿也没回音，几千空军的飞行员就这么散了！

也是八十年代初，空军打报告要买两架波音 747 做专机，我说，这个飞机大了点，但还是报了上去，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做专机这个飞机太大了，给民航吧。从这时开始，民航就开始膨胀了，原来空军是老大，好飞机也都在空军，改革开放后，只有民航飞得出去，民航就和空军平起平坐了。

民航最怕民族航空工业进步，最怕民族航空工业生产出什么合乎国际标准的东西，民航只想买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又好用，又好贪污。

中国的航空工业则不明大局，世界民航机市场，就是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垄断。俄国都掺不进去，中国比俄国还差一大截，俄国飞机虽然差一点，但俄国人还是自己用自己的飞机，中国民航则根本不用中国的飞机，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发展民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中国大量买飞机，要么与波音联手与

空客争，要么与空客联手与波音争，中国人暂时搞不出发动机（主要是材料和工艺问题），但敲出飞机壳子，并不比美国、欧洲差！同样质量、同样消费，它敲出一个，我可以敲出两个半，这就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优势，所以周恩来之后，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把民航和航空工业部统一起来的总理，外国人就欺负中国人，民航就是外国人的帮凶，航空工业就是不明不白的受气包。

我在国内到处批评，我批评民航是买办，扼杀民族工业，民航的人狡辩说：你让我们用国产飞机，摔死人谁负责？我说：你「偷换命题」，我不是说让你摔死人，我是说你应该帮助中国工业生产出高质量的飞机，利用「买方是皇帝」的优势，有步骤的逼外方转让技术，提高民族工业的能力。我也批评航空工业，我说你们总是不明大局，闭门造车，总想独树一帜，这根本不可能。航空部长副部长都是我很熟的朋友，吕东、莫文祥、林崇觉、何文治、王昂……都听不进去。开始他们搞运七，摔了一架，就被扼杀。然后搞新舟 60、新舟 600，民航都不要，然后开始吵吵 100 座。

我已在海外，我请科技部的一个部长给他们传话，我说：「还搞什么 100 座干吗？要么联手波音搞 737，要么联手空客搞 319，自己搞个 100 座，还得胎死腹中，没人要！」他们不听，从国家贷了一百个亿，开始跟「空客」谈，不是谈组装 319，是让「空客」提供一个比 319 还好的方案，我听了之后就笑，这是什么思维方式？！「空客」怎么可能帮助中国打倒「空客」？！谈了三年，不欢而散，中国下决心自己搞，现在 100 座也下架了，我告诉他们，第一，中国确实还差很远，何年何月能飞出适航证？第二，就算真的差不多了，人家也不会给你国际适航证，这里面名堂多了，比中国的贪污路线还复杂。

大家看，这就是「国有」。过去打仗，一、三军团也有矛盾，但打起仗来，是同心协力，真诚合作。打下天下了，一个民航，一个航空工业部，就弄不到一起，互相恨不得卡死对方。我东骂、西骂，民航和航空工业部的头不敢驳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谁谁谁的儿子，主要是因为我说的是谁也不敢说的实话，但是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的女婿都和我在一个办公室，所以三大女婿也把我的话传给了邓、杨、赵，于是阴风四起，坏人不敢到我这儿说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是来讨骂，只有几个好人偷偷的跑到我这儿说：人家都说罗宇不过是个小处长，怎么谁都敢骂？这其中就有

2007 年刚退休的国防部长曹刚川（当时是装备部副部长），我说：不是「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我说的是实话，我怕什么，曹刚川听罢，唏嘘不已，掩面而去。

最早听闻回扣贪污，也是关于民航总局沈图局长的传言。中美关系恢复之后，民航开始大买波音 707，没几年，传出沈图贪污，把儿子送到美国，波音给了多少多少回扣。那是八十年代初，北京城小圈子里传言沸沸扬扬，说要法办，紧接着又传出，沈图的儿子在美国给邓小平写信，说你把我老爸关监狱，我就把你邓小平儿女贪污的事都揭出来。这种事我没证据，但是我相信不会有人造这种谣。总之，最后的结局就是，沈图革了职，但并没有坐监，不了了之。这是邓小平时代最早的贪污丑闻。

航空工业的布局，像中国一切工业布局一样，完全是在领导集团乱七八糟的指导思想下布的乱七八糟。开始是苏联援助，在哈尔滨（直升机）、沈阳（歼击机）、西安（轰炸机）建了三个基地，中苏交恶，沈阳「下了一个蛋」，在成都又建一个歼击机厂。文革，毛泽东、林彪搞「山、散、洞」，成都又「下一个蛋」。在贵州又搞一个歼击机厂，西安下一个蛋，在汉中又搞一个运输机厂。同时，四人帮为争权，在上海又搞一个大飞机基地。直到今天，仍在瞎胡闹，所有上述工厂都吃不饱，又在天津搞一个欧洲空客总装厂，这就是官僚经济，官僚们只是争投资，至于这个资投下去有多少效益，官僚们并不关心，所以就有无穷无尽的浪费。

第三章 开国皇帝毛泽东

进北京之后，毛泽东把父亲调到身边当公安部长，父亲只管警卫，但警卫实际上衣、食、住、行都要管，所以我父亲又当了十年毛泽东的大管家。这期间，叶子龙、汪东兴只是小管家。

1、每星期都见毛泽东

从我记事开始（1949 年进北京前的事，是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地记得，进了北京后，我算记事了），就是每个周末随父亲去中南海春藕斋跳舞。中南海和现在的「北海公园」一样，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园林。共产党进北京后，把北

海辟为公园，把中南海做为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毛泽东住南海的菊香书屋，春藕斋紧靠着菊香书屋，楼台亭阁，长廊相连，菊香书屋入口面对着浩瀚的南海。

毛泽东喜欢水，南海中间还有一个小岛，即「瀛台」，满清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的地方。当时「瀛台」已经非常破旧，但是菊香书屋和春藕斋这些地方，还是维修得非常好，油漆得漂漂亮亮。后来我听父亲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喜欢跳舞，延安的礼堂是泥地，都可以跳，春藕斋是皇家的地板地了。大人跳舞，我们小孩就是吃冰淇淋，这是最开心的时候。舞会的中心是毛，毛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毛的两个女儿都是我姐姐的同学。我和姐姐都在育英小学，所以我和李纳、李敏也算同学。在学校里，我们都知道谁是毛主席的女儿，但每天在一起上学（住宿），也不觉得毛主席的女儿有什么特殊。最固定的见毛，就是每年夏天和毛一起在海边游泳，开始是在青岛，后来是每年去北戴河。北戴河是秦皇岛市渤海边一片幽静的海滩，蜿蜒十几公里，岸上则是长满松树的丘陵。英国人在这建造了一幢幢别墅，离北京只有两个小时车程。

解放后，这些别墅都作为「敌产」没收；1954年后，就作为中央开会休息的地方，只是把旧的房子维修了一下，直到1959年才建了一个大礼堂。过去所有的房子都没有围墙，也是1959年，才为毛泽东建了一幢新房，也是唯一一幢有围墙的房子。我们就住在毛泽东的隔壁，去海边游泳，就是一路往下走，也就是十几分钟。海边，每隔一、两公里就有一幢建筑，我们称之为「浴场」，也是英国人修的，格调也差不多，都是中间一个大厅，两边一排排小房子，用来换衣服和冲洗，五浴场是最漂亮的一幢。

直到文化革命前的1965年夏暑假，我们还是和毛泽东一起到北戴河五浴场。毛、刘少奇、朱德、陈云，然后是爸爸和杨尚昆，这六家是天天都在。其他五家都是大人小孩一大家；刘少奇、陈云和我们家都是一大帮孩子；朱德、康妈妈则带着一帮孙子。只有毛泽东是独来独往，一个夏天也看不到江青一次半次，毛的两个女儿也从来见不到。其他的人，如陈毅，偶尔来一下；周恩来从来不游泳，林彪也从来不到海边。

林的女儿、儿子也来五浴场，但都是选在午后别人不在的时候，有意避开

和大家见面；邓和彭真在三浴场。虽然我们都知道毛是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但在北戴河，毛的时间却有规律，我们小孩 11：00 到浴场，大人们都是 12：00 以后来，因为上午他们开会，开完会就来浴场，游一个小时回去吃午饭，毛和大家的时间一样。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到爸爸来了，就知道毛马上也要来，准备好过去打招呼，然后就继续玩我们的。

李志绥医生书上讲的，刮大风时毛下海的事，我当时也在场：大概是 1956 年，我还不到十二岁，天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做完功课去游泳，但是那天风大、浪大，说是有台风，所以父母说今天不游泳了，突然汪东兴打来电话，说毛泽东去了五浴场，要下海。父亲一听，赶紧坐车去五浴场（平时我们都是走路）。我一听毛泽东也要下海游泳，赶紧拿上游泳裤就钻进车里随父亲到了五浴场。平时在五浴场很少见到汪东兴，这次我看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主，我们的车还没停稳，已看到汪东兴迎了出来。

在大厅里，汪东兴悄悄跟父亲咬耳朵，父亲很快走出大厅，来到大厅外的阳台上，又是风又是雨，这时看到海里离岸一两百公尺，两只小木船，二、三十个人影在浪里时隐时现，我才知道毛泽东已经在海里。本来爸爸不让我们小孩下海，看到毛下海，我们也要下，爸爸没办法，只好答应。后来爸爸问我：「浪这么大，危险不危险？」我说：「一点不危险，浪来了，扎个猛子到水底下，浪过去了再出来，一点没事。」爸爸说：「猛子扎猛子，你就是个猛子。」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听爸爸对妈妈说，那天毛泽东是发了脾气（发谁的脾气，不知道）。汪东兴说谁也劝不住，汪没办法，赶紧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当然也同时报告了父亲。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都只有一句话，让汪东兴「确保安全」，只有父亲一听到汪的报告赶紧赶到五浴场。

每年最确定的时间就是夏天去北戴河度假，和毛泽东在一个浴场游泳。晚上，毛在五浴场跳舞，我们在四浴场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过来吃冰淇淋。大概只有两次庐山会议的暑假，毛没来北戴河，爸爸也没来，但我们还是去北戴河。平时，在北京不是周末，偶尔也见到毛。比如，有一次我们在玉泉山，爸爸看看表，叫我们马上上车，一下开到西郊机场，车开到飞机跑道上，跑道尽头停着一架飞机，我们小孩下来玩。过一会，两辆吉斯车风驰电掣般开过来，一停车，前边下来毛泽东，爸爸迎上去，我们才知道是来送机。

我们有时也去中南海游泳池游泳，这个游泳池原来是没有的，是中央进驻中南海之后新修的，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喜欢游泳。一个院子，一边是一座室内游泳池，从来不开放，爸爸也带我们进去过几次；一边是一座室外游泳池，夏天中午对中南海工作人员也开放两小时。我们小孩也经常自己去，爸爸有时也带我们去。一看工作人员在岸边布置躺椅，就知道毛要来了。我们就赶紧上岸换衣服，出来看到毛正在池中，然后打招呼，我们就离开。

关于室内游泳池，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大约是1962年左右，（由于饥荒，党内外意见比较多），一天，秘书突然报告父亲，说：「汪东兴来电话，说主席问，为什么大家不来室内游泳池游泳，让罗瑞卿带着老婆、孩子来嘛！」这样的电话还给谁打了，我们不知道。爸爸听完就跟妈妈商量怎么办，说来说去，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定了让我们小孩去，父母却不去。我们听说能去游泳，当然高兴的不得了，去了几次，都是星期六去中南海看电影，早去一个小时，先游泳，大概也就去了个三、五次，也从来没见过毛泽东。一天秘书又来报告，说汪东兴又来了电话，说只是小孩，就别去了。这件事当时我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想想，可能是由于当时党内意见比较多，曾有人说，为什么毛泽东一个人修一个游泳池，毛泽东当时处于劣势，所以也要做做样子，国内话是照顾照顾影响不搞特殊化。

然后每年十一、五一晚上在天安门上看烟火；十周年国庆前还每年国庆一起吃饭（国宴），后来由于困难时期，吃饭就取消了。总之，从儿时起，没有把见到毛泽东当作稀奇事。但我听到的「军国大事」大部份都是文革后父亲讲的，有时是故地重游，见景生情，讲给我们听，而且大部分是文革受难后，在福州养病时爸爸才讲得多一点。

2、毛把个人安全交给「罗长子」

毛泽东为什么建国伊始，就把罗瑞卿调到身边，委以重任，负责警卫工作，出任公安部长，组织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我自己的答案，要从我们在看《万水千山》话剧时，爸爸给我讲的故事时说起。长征之前，中央红军的发展，开始是红四军（朱毛红军）；然后一军团、三军团；然后是一方面军。朱毛组建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就接红四军军长、政委；朱毛组建一方面军，林、聂就接一军团，爸爸和曾士俄就接红四军政委、军长。

那时天天打仗，干部就这么一层层形成了，可以叫做嫡系！爸爸在第三次围剿中头部受了重伤。当时杨得志（即杨、罗、耿兵团的杨，后授上将，文革后当过总参谋长）是父亲的警卫连连长。父亲去世后，杨得志亲自给我讲述了父亲负伤的经过：那场战斗是打敌人的一个土围子，林彪也在场，敌人一颗炮弹打过来，军长曾士俄当场就牺牲了；一块弹片擦破了父亲太阳穴的动脉，血像喷泉一样喷出来，大家都以为不行了，粗粗包扎一下就抬下战场。

我小时父亲跟我讲过：他负伤后迷迷糊糊躺在那，曾听身边的人讲话：「棺材做得长点，这人个儿高。」父亲才知道人家在给自己做棺材。此次父亲大难不死，也得了个外号「罗长子」。

朱德总司令知道父亲负了重伤，命身边的医生叶青山去护理父亲，朱交待：「罗不康复，你莫回来。」就靠点磺胺，硬是把人救了过来。伤愈出院，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父亲回到一军团，林、聂说：「你当保卫局长吧，四军已经有了人。」那时周恩来、王明已经夺了毛泽东的兵权，但毛在军中威信仍很高。当时保卫局和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是并列的军团领导机关，所以父亲也成了一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父亲跟我说，反第五次围剿的仗，指挥是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中文名字李德，不会说中国话。李德叽里呱啦说一通，没有人知道他要干嘛，还要伍修权（后来也授上将，当过副总参谋长）翻译。李德是狗屁不通，横行霸道，战场上连机关枪放在哪儿，他也要管。

我问父亲：「那干嘛要找这么一个人来指挥？」

父亲说：「你懂什么，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总之，没有主席，我们也都没了，哪还会有你？」

其实，那时候是不好提斯大林，也不好提周恩来，所以只能骂王明。

长征开始，林、聂找爸爸说：「毛泽东现在没人管，部队开始行动，还是你去管管吧。」当时毛只挂个虚名：「中华苏维埃主席」，林、聂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照顾，爸爸当时虽然认识毛，但由于隔一层，并没有太多个人接触。于是父亲组织了一支百十人的小队伍，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卫连，人员装备选最好的，配马，战斗力强，行动快，目标又小，直属一军团，随毛行动，实际上执行保卫任务。

当时红军几十万人马摆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个小队伍就夹在一军

团大队伍中间。从江西出发到遵义，过雪山草地，到陕北。只是遵义会议后，这支小队伍加了一部电台，加了一些作战参谋人员，警卫仍是这支百十人小队伍的职责，直到陕北。汪东兴、叶子龙什么时候加入，父亲没有提及。父亲的责任就是经常到这个小分队来看看，确保安全和供应。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父亲都是同样地尽心尽力，恐怕这一点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患难识知己啊。

当戏演到过藏区时，爸爸说：「藏人的枪打得很准。由于仇视汉人，不跟我们贸易，红军只好去抢羊，然后放下两块大银元。为了主席和部队的供应抢羊，有时还牺牲我们的战士。」看到过草地时，父亲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吃西瓜撒辣椒面，就在过草地时。」前几年国内拍的《长征》，我是硬着头皮看完。送给编导一句话，走过长征的好人都不在了，所以你们才敢这么胡编乱造。但这也实在怪不得谁，是共产党的传统，毛泽东也胡编乱造，什么刘邓陶、彭罗陆杨，所以邓小平、杨尚昆也胡编乱造《长征》。

到了延安之后，毛说：「罗瑞卿热情高，去办学校合适。」于是任命父亲为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校长名义上是林彪，但林彪一天也没管过抗大。林彪平型关战役后，骑着日本马，披着日本斗篷行军，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以为是日本兵，打了一枪，受了重伤，好一点后就去苏联养伤，苏德战争爆发后回延安，代表毛跟蒋谈判，仍是休养。抗战八年，林彪大部分时间在休养。

父亲办抗大，经常请毛去讲课，《论持久战》就是毛在抗大的讲演。1940年抗大深入敌后办学，临行前毛亲笔题「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徒」送父亲。我觉得直到父亲离开我们时，也没太明白这两句话。1941年5月反扫荡，父亲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转了两个月。我们在这个山头，敌人在那个山头，直线距离不远，互相看得见，敌人打枪也够得着，但下山追上另一个山，至少要半天，就这么白天黑夜转。一次情况危急，为了不让敌人拿到文件，所有文件都烧了，最后这张毛题字的纸也烧了。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父亲虽参加过西安事变的调解工作，也参加过美国调解国共之争的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但基本上是领兵打仗，所以爸爸从来没想到去当公安部长。西北坡会议，大局已定，毛已开始筹备政权，父亲对毛说：「林彪即将入关，我是不是随林总南下？」彭德怀说：「不行。我兵

少，你得跟我西进。」毛说：「南下也好，西进也好，打完太原再说。」太原前线，杨、耿兵团是主力，当时胡耀邦是兵团政治部主任，打完太原，收到主席一封电报：「请瑞卿将部队交别人，来北平一议。毛泽东」。

当时北平已和平解放，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这个故事就是我和爸爸在香山散步，走到十八盘上的双清别墅，父亲讲的。到了北平先去见周恩来，周说：「我已在筹组政府，主席点你做公安部长。」父亲听后为之一惊，他从来没想到当公安部长，于是对周恩来说：「公安部长？李克农当比我合适吧？」周说：已经定了，不要再说别的了。现在去见主席，到了主席那儿，也不要说别的了。」

到了主席处，就是香山双清别墅，谈话就在院子里，池水旁，父亲还是说了一句：「公安部长我怕当不好，我一直是领兵打仗的。」毛说：「仗打完了，现在是建立政权，你就大胆地去做，有事就直接找我，你保卫局长就当得不错嘛！」父亲给我讲故事时触景生情，说他从来没想到主席突然间提起长征时候的事，我后来则暗暗地想，说不定长征时毛泽东已经选好了将来的公安部长。

毛泽东点父亲做公安部长，后来才知道是毛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把自己的安全工作交到父亲手里。毛泽东很重视自己的安全，谁负责这个事，由毛自己指定，别人绝不插嘴。在延安时，比较简单；进了城，当了皇帝，环境大不一样了，警卫工作显得非常突出而重要。父亲一直是领兵打仗，从来没想到做警卫工作。毛用父亲，一个是「水太清则无鱼」，不搞小圈子；一个是举轻若重，警卫工作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事情要做到万无一失。

虽然大家都热爱伟大领袖毛泽东，但伟大领袖对每个人的信任则是不一样的。毛把自己的警卫工作交给父亲，就是把生命安全交给了父亲。父亲在福建养病时跟我说过：他并不知道毛为什么这么信任他。现在看，父亲当年提李克农当公安部长，实在是很「幼稚」。（十七年后上海会议，林彪诬告父亲，父亲说我跟他〔林彪〕对质，周恩来说：「没想到你这么幼稚」。）父亲自己不搞小圈子，但党内确实存在很多实际的小圈子。

毛泽东认为李克农是周恩来的人。毛对周恩来的「用」和「信」是有差距的。毛泽东用周恩来的才，但至死没提过把「班」交给周恩来，就是这个差距的明证。毛泽东至死都没忘记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和王明一起，挟共产国际之威，

夺了他的军权。长征开始，周恩来、王明又决定不带毛泽东，欲借国民党之手杀掉毛泽东。如果不是林彪、彭德怀力争，毛很可能就没了。这一仇，毛至死不忘；虽然后来整风，毛只提王明路线，给周恩来留了面子，但毛心里从来没原谅周恩来。（按：此案可见伍修权、康克清回忆录。亦有学者指出是毛本人要求留下，经周劝说而同意北上。结论待考。）

所以文革后，江青天天念叨批林批孔批周公，当然是毛教的。周恩来如果不死在毛前，毛肯定要打倒周再死，这虽然是个判断，但从文革后期毛、江、周的表现，可以看出这个判断，是非常有根据的。毛泽东对林彪，则更是「用」而无「信」，所以林彪虽然掌握了相当大的军权，但林彪连毛的行踪都掌握不住，而且林彪和叶群也从来不把八三四一部队看成是自己的警卫。但是林豆豆有什么事背着林彪和叶群告诉周恩来和毛泽东，她却知道找八三四一没错。大家看，老的、小的谁是谁的人都非常清楚。

我从小没听过父亲谈谁是谁的人这些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自己感觉出来；但父亲直到离开我们，也从没谈过谁是谁的人。父亲第一次被打倒，我去医院看他，他从来没讲过我们有什么事可以找谁谁。后来大家妻离子散，多少年又重新团聚。他去德国治病即，也从来没讲过如果有什么意外，哪个叔叔、伯伯可以多照顾我们一些。父亲对党内小圈圈的事深恶痛绝。在外人看来，罗瑞卿是毛泽东的人；刘少奇、周恩来都是这么看，林彪开始也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如此信任罗瑞卿。在林彪看来，罗瑞卿应该是林彪的人，因为从井冈山开始，罗瑞卿的直接上级是林彪，林彪的直接上级是毛泽东。

所以 1959 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投毛泽东所好，提议父亲任总参谋长，但实际目的是想拉父亲上林彪的贼船，夺毛泽东的权。但父亲从不搞阴谋诡计，所以不管林彪如何威迫利诱，父亲始终没有答应。林彪无奈，只好跟毛泽东摊牌：你毛泽东是要我林彪，还是要罗瑞卿？毛泽东在上海会议安排的局，是既要林彪，但并不打倒罗瑞卿。毛泽东清清楚楚地知道，林彪是陷害诬蔑罗瑞卿；而且毛也清楚，林彪要打倒罗瑞卿，矛头是指向自己的。

但毛泽东要用林彪搞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和党内大部分中央委员。毛在 1965 年不可能为保护罗瑞卿，而跟林彪决裂，所以毛让父亲辞去总参谋长，仍保留书记处书记和副总理，将父亲放在一边，作为对林彪的一个威胁。但毛

泽东的底牌不可能言传，只可能由父亲自己体会。

可是父亲刚直不阿，孔子曰：「刚毅木纳近仁。」父亲的刚毅木纳根本担当不了毛泽东派给他的新角色。父亲以死言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跳楼，林彪大喜，正愁整不倒你罗瑞卿，现在自己整倒自己了，毛泽东则大怒。毛泽东觉得，我给你罗瑞卿留足了面子，你却一点面子不给我！所以虽然林彪叛逃之后，毛泽东马上说：「罗瑞卿的事情，我们搞错了。」

汪东兴说：「罗瑞卿是假党员。」

毛泽东说：「假的也成真的了。」

但毛泽东至死没再见父亲。如果不是邓小平回北京后追着毛泽东给父亲平反，不知父亲、母亲在监狱里还要关多久，也不可能当上军委顾问。周恩来听完毛泽东说话却不闻不问。汪东兴当然更是硬顶着；汪东兴最怕罗瑞卿复出。这是后话了。

父亲当了公安部长，主要是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所以情报和反情报是重要的一面，而且处处胜国民党一筹，再有就是全国治安。现在大家都怀念五、六十年代的治安和警民一家。哪有黄、赌、毒？现在则是警匪一家，黄、赌、毒的老板都是警察，比国民党还坏！父亲这个公安部长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就是管毛泽东的事。这是毛交待给谁管，谁就管，并不是某一官职的固定职责。谢富治接了公安部长后，就没这个职责了。

3、伴君如伴虎：上海会议真相

在外人看来，管皇帝身边的事，甚至家事，是无比夸耀的事。皇帝只会把自己贴身的事交给最信任的人去办，尤其警卫，统领「禁卫军」（御林军），更是头等大事，父亲曾不只一次跟我说：在二十二年的战争中，父亲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并不多。

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公安部长，则几乎可以说是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因为毛身边的事成了父亲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话：伴君如伴虎。问题是我开始没把毛泽东当成君。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国皇帝杀功臣，我才把毛泽东当成君。现在我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很多人不一样，追根溯源，实际上就因为定位不同。

你如果把毛泽东定位成人民领袖，当然处处不是，因为中国到今天，还没

有一个人民领袖。毛也不是，蒋介石不是，孙中山是不是？壮志未酬身先亡，也不知道。如果你把毛泽东定位为又一个开国皇帝，你就明白我的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朱元璋是一样的。哪个开国皇帝不杀人？哪个开国皇帝不杀功臣？你如果说，所有开国皇帝都是混蛋、杀人魔王……，那也没办法，我们的对话，便没有意义！

毛泽东身边的人都知道父亲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地位是毛给的，但又反过来制约毛。因为做警卫工作，当然什么事都知道，谁来谁往，一会儿江青又发什么赖，一会儿哪个护士、哪个文工团员又怎么啦，无非是李医生书上那些许多女朋友的事，有时比军国大事还烦父亲。父亲在福建养病时，我曾把我的感觉告诉父亲，父亲说：「你懂什么？我从来没跟你讲过主席身边的事。」

我说：「你是没讲过，但有时你跟妈妈讲两句，我听到了，而且我有感觉嘛，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呀！」

毛泽东身边的事，有时交给父亲办，也出乎父亲意料之外。我记得 1958 年还是 1959 年，一天秘书来报告，说李银桥来电话，说主席有点事，让他来见罗部长。父亲听后觉得很奇怪。李银桥是主席的内勤，就是彻茶端水的。李银桥会有什么事？于是告诉秘书，问问他什么事。秘书回来报告说，关于毛岸青的事。父亲听后跟母亲说：「我没时间，让他来跟你说吧。」于是让秘书通知李银桥。

李银桥来的那天，妈妈带上我，在爸爸办公室见李银桥，妈妈说：「罗部长忙，让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再转告他。」李银桥说：「主席让我来找罗部长，说岸青这孩子身体不好，现在已有了媳妇，江青也不管。主席说：把岸青两口子交给罗瑞卿管吧。」妈妈听后说：「罗部长回来后我跟他说，主席交待的事，我们会尽心办好。」接着又问了问岸青和邵华的情况。父亲回来后，母亲把李银桥的话说了，父亲说：「那这事就你来管吧。」妈妈说：「怎么管？」爸爸说：「这还不容易，先找个地方住，离我们近点好，你经常去看看，有吃有穿，治病就是了。」于是母亲在我们住的总库后巷甲一号旁边找了一个小四合院，本来是公安部工作人员住的，房子不错，整修一下，还带我一起去看。没过几天，毛岸青和邵华来家里，妈妈带着我和大妹妹见他们，说岸青会

弹钢琴，和我妹妹弹了一通琴，然后妈妈跟邵华说：你好好照顾岸青，有什么事只管找我。你罗叔叔忙，我会经常去看你们。」

后来妈妈经常去看一下，有时也带我去，直到1965年上海会议，毛岸青当时神经病时好时坏，文化大革命中则根本变成一个傻瓜了。我后来才知道邵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女人，利用她姐姐和毛岸英的夫妻关系，死缠着岸青，抛弃一切人的天性，一心只想当毛泽东的儿媳妇。直到今天，岸青已经是个植物人，她仍打着岸青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还造出来一个「毛泽东的孙子」，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邵华有一个妹妹，死缠着毛远新，但毛远新不是傻瓜，所以不要她，也救了她自己一命。

注：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文革中当了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的联络员。文革后判刑十六年。邵华（1938-2008）曾任军科院副部长、少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毛岸青（1923-2007）毛泽东次子。1960年与邵华结婚。

毛岸青的哥哥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炸死之后，邵华的姐姐一直守寡。毛发了几次话，也没嫁；于是毛又找父亲，让父亲管一下。

父亲把此事又交给母亲，妈妈也不知该怎么找。一次告诉了吴法宪，吴胖子马上说：「我来办。」很快找了一个飞机驾驶员，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好，于是介绍给邵华的姐姐，很快结了婚。

1963年，毛泽东七十大寿，全国饥荒也已度过，现在看，毛那时正在筹划文化大革命，毛自己规定不祝寿，所以也没人提祝寿。一般如果在外地，当地主管就说大家聚聚，吃个饭，不提「寿」，毛也不一定去。这年，毛在北京，请「身边」的人聚聚，除了医生、秘书、警卫，参加的就是父亲、母亲，还有王海容和她父亲，照片还在相册上。这大概就是毛的感谢了，一起吃个饭，并没有江青。

1964年毛泽东的生日，父亲回来后跟母亲说：「主席今天好大的脾气，本来是寿筵，但主席一上来就说『有人想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大家也不知道主席是在骂谁，鸦雀无声，一顿饭就主席一个人说话。」母亲和我听后都大吃一惊，父亲看我在旁边，就打住了，跟我说：「可不能在外边乱说啊！」

多少年之后，我在陶铸的夫人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了这一段，陶铸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文革前是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第一书记，文革开

始，一下子成为四号人物，排在毛、林、周之后，几乎不到一年就被打倒，曾志是井冈山的老人，和毛泽东关系不一般，传说在井冈山有过一段情。请看曾志妈妈对 1964 年毛泽东寿筵的描写：

会议刚开完，恰逢主席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共三桌。我和陶铸、富春及耀邦同志是最早到的一批。不一会儿主席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去搞四清了，她没有资格来。」

突然主席扭头对坐在身旁的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我们相信，这决不是批评富春同志。幸好这时江青过来招呼大家入席，她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和邢燕子安排在主席左右；罗瑞卿、陶铸和我也分在这一桌；而少奇同志、耀邦、富春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江青自己，则分坐另外两桌。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而一年多后，1966 年，终于爆发了旨在打倒少奇同志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回头看，1963 年毛泽东寿筵，没有江青参加，1964 年寿筵，江青就是主人了，这是毛泽东召江青出山的最明确信号。看起来 1964 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腹稿已经打好了，所以才请客，当着大家的面，戏怒笑骂一番。很多人听后是一头雾水，但也不得不想：毛泽东是在骂谁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多少可能比其他的人明白些。另一个重要的信号是：毛泽东开门见山就说，是父亲和陶铸「让我请客」，然后江青肯定是按毛的设计，把父亲和陶铸两口子安排在和毛泽东一桌，其它都是科学家、劳动模范。这就是毛泽东告诉全党，他对罗瑞卿和陶铸是另眼相看，党内就是这样传达信息的。后来由于林彪告父亲的刁状，父亲 1965 年 11 月就出局了，而 1966 年文革一开始，陶铸一下子

变成了四号人物，福兮？祸兮？所以才有老话，祸兮福所倚！

（陶铸后来很快被打倒，但曾志一直受到很好的待遇，林彪摔死后，曾志很快回到北京，被安置在中南海旁边的一个小四合院里，老头被打倒，老太太仍受礼遇的，曾志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曾志和毛泽东关系不一般的传闻更甚嚣尘上。）

毛泽东喜欢全国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杭州、苏州、上海、南京一线，广州、长沙、武汉、四川也常去。父亲十年公安部长，很多时间陪毛泽东各处转。毛开始时喜欢乘飞机，一次从杭州回北京，三架伊尔-14：第一架，毛泽东，父亲陪着；第二、三架，杨尚昆及秘书、警卫。那时空军刚刚建立不久，预报、通讯都不大完善。到了北京，正好有雷阵雨，转场油又不够了，驾驶员就是后来飞林彪去蒙古摔死在温都尔汗的那个麻脸潘景寅。

窗外电闪雷鸣，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毛坐在那儿，照样看他的文件。父亲站在他旁边驾驶舱门口，依着门跟驾驶员说话，父亲说：「行吗？」潘回答：「行，有一条缝，可以钻过去。」父亲说：「那好，按你的办。」结果硬是钻过云层。飞机停稳，毛和父亲下来，父亲后来跟我说：「刘亚楼的脸还是白的。」毛笑哈哈地说：「怎么，今天差点去见马克思啊？」有雷穿云是很危险的事情，为此，父亲和刘亚楼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禁止毛坐飞机，从此毛外出改乘火车。

毛 1957 年反右，得罪党内外一大批知识分子。1958 年大跃进，全党全国比赛说大话。1959 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全党「噤若寒蝉」。1960 年大饥荒，党内不满之声开始汇集。到 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毛被迫做了检讨，此时毛心情极坏。

当时父亲已到军队工作，有一次陪毛视察部队，在汽车上毛问父亲：「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看了？」父亲答：「看了。」毛问：「你能不能讲出这么一篇话？」父亲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答道：「林总水平这么高，我怎么讲得出这么一篇话。」毛对父亲的回答很不以为然，说：「水平不够，提高水平嘛！」于是讲了一通要学马列，军队高级干部要读三十本书，让父亲去找陈伯达，选三十本马列著作，印成大字本，并叮嘱：「选好了把书单送给我，最后敲定。」这就是三十本书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说罗瑞卿弄出三十本书，干扰林彪提倡的学《毛选》，毛一声不吭。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林交恶，毛对林说「不是罗瑞卿干扰你，是我毛泽东干扰你。三十本书是我让罗瑞卿搞的。」这时，罗瑞卿腿已残废，关在监狱中天天受共产党的折磨。母亲也在监狱，患乳癌，动了一个大手术，当天就自己下床自己照顾自己。我也在监狱，饿得皮包骨。周恩来听到毛这个话，完全可以像他对邓小平做的，撤销罗瑞卿专案组，或者起码可以改善一下「监狱」条件，但周恩来什么也没做，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周至死没有再见父亲的原因之一。

关于三十本书，毛泽东和父亲这段谈话，不知读者有没有看出，这里实际上还有更大的玄机，因为七千人大会上，几乎一片批评声，会场上流行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毛泽东加了一句：「都是放屁。」这句话在毛身边的人圈子里传，我也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这就是毛对七千人大会的真实态度。但正式在会上表态，毛还是做了检讨，说：「这几年的错误，凡是中央有份的，都有我一份。」从遵义会议之后，大概这是毛的唯一的一次检讨，恰恰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仍高调吹捧毛泽东，林说：「历史证明，凡是听从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就胜利；凡是违反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就失败。」意思是大饥荒的出现，是由于「我们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不是毛泽东的错。

毛泽东问父亲：「你能不能讲出这么一番话？」实际上就是在试探，在未来的党内斗争中，可以给父亲派什么角色。当然父亲的回答令毛非常失望。父亲是个非常「木讷」的人，毛对此又爱又恨。

上海会议之前，江青曾问父亲要一套军装。江青问总长要军装，毛怎么可能不知道？但父亲说：「军装可以给，领章帽徽不能给，因为你不是军人。」江青没答话，扭头就走了。第二天去问林彪要，林彪立即派叶群把什么都送去，这就是差别。

文化大革命后，毛也走了，父亲也走了，毛身边的一个警卫干部来看母亲，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在毛身边多年，看到三次毛彻夜不眠，来回踱步，一枝烟接着一枝烟。第一次是在中南海，决定出兵朝鲜之前；第二次在庐山，和彭德怀决裂之前；第三次就是在杭州，林彪派叶群来告父亲的刁状，毛决定开上海会议之前。他说：「我跟主席十几年，我们并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但

一看到主席这种举动，就知道有大事发生。」毛正在思考，权衡，很难决定，却必须决断。

上海会议在 1965 年 11 月召开，称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父亲陪毛泽东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周恩来也在，见完外宾，毛对父亲说：「林彪在苏州，你代我去看看。」从进了北京，林彪就是谁也不见，十年公安部长时，毛也经常让父亲「代」他去看看林彪。父亲到军队后，更是如此，周也说：「代问林总好。」

于是父亲从上海飞苏州，叶群打电话给妈妈，说：「你也来，他们两个男人硬碰硬，咱们两个在，可以缓和缓和。」这时，父亲已明显地感觉到林彪在找茬，无事生事；比如，你去看他吧，他说不用事先通报，否则等得心急；你真的不通报就去，他又说你突然袭击。总之，不知该怎么好。但父亲的错误是没有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或周恩来，而是忍辱负重，总想团结是大局，而且不想把麻烦交给毛、周。

真实的情况是林彪知道，毛泽东不放心他，所以毛请林担任国防部长，林点父亲为总参谋长。因为林认为，只有点罗瑞卿，毛才放心。林彪还认为，罗是一军团的，一直也是跟着林彪的，所以想拉父亲入伙，像后来的黄、吴、李、邱那样。五、六年的时间，林彪称病不出，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军队的事情就是父亲请示中央，具体事就是父亲负责。林试探了好几次，父亲根本没反应，最后一次是 1965 年 5 月，刘亚楼肝癌后期，时日无多，刘是林彪的四野参谋长，也是父亲的好朋友。父亲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当时林彪也在上海，叶群是天天去医院，到了医院就和刘亚楼单独密谈，把刘亚楼的老婆霍云英也赶走。

父亲去看刘亚楼，正好是五一假期，我也跟着去了上海。后来父亲告诉我，刘亚楼说：「林总很焦心。大罗（指罗荣桓元帅，四野的政委）跑了，现在小罗（指父亲）也要跑。」父亲对刘亚楼说：「亚楼啊！我们都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们往哪儿跑啊？」这个话刘亚楼当然是传回去了，所以林彪就下了决心必须除掉父亲。

林彪事先跟广东的陶铸（当时的广东第一书记，原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打了招呼，再有就是跟杨成武（第一副总长）、萧华（总政主任）、刘志坚（总政副主任）、谢富治（公安部长）打了招呼，所以才有杨、萧、刘、谢在上海

会议上四篇声讨罗瑞卿的发言。

这是后话，再说父亲从上海去苏州看林彪，气氛却出奇的好。林彪仍然是没什么话，只是说：「我身体不好，军队的事你去办就是了，我放心。」父亲说：「主席、总理叫我问候你，从你这儿我就去云南中越边境看地形。」出来时，叶群送出来，在院子里剪大把花拿给母亲，说的话要多甜有多甜。「总长辛苦啊！你要好好照顾啊！」父亲母亲后来都说，他们感觉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化了，没想到这是林彪决定吃人了。

父亲前脚走，去昆明，毛那时从上海到了杭州；林彪后脚就派叶群去杭州拿着林彪的条子，找毛泽东谈了七、八个小时。叶群一个人说，毛一声不吭地听，旁边一个机要秘书徐业夫做记录。

记录，据说按毛的指示，密封了。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所有当事人都不在了，妈妈问胡耀邦要这个记录，妈妈对胡耀邦说：「现在人也都不在了，我要看看当时叶群跟毛泽东说了些什么。」

胡耀邦就打哈哈，说：「那个东西我也没看过，看它干什么，还不是胡说八道。」妈妈说：「胡说八道主席就会信啊？！」胡说：「要说主席就信了，也不一定。」

妈妈还是要看，胡就只好打哈哈，说：「我让他们找找，谁知道这些东西现在在哪儿放着？」直到胡下台，也没找着，当然我们也知道，胡并没有去找。真要找，还是找得着的。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档案，都放在西山的一个山洞里，等开封的那一天吧，还有很多东西可看呢；但真到了那天，不知道还有多少后人对这些事有兴趣？

叶群告完了刁状，毛泽东就决定开上海会议，也非常有戏剧性。爸爸妈妈在福州养病时，讲了这个故事：爸爸去云南中越边境看地形，邓小平一行人也在云南看三线建设，于是约好在昆明会合，但爸爸看完地形到昆明时，接待的人说，邓一行昨天刚去上海，说中央有会在上海开。爸爸听后觉得奇怪，「中央什么会，怎么我没有接到通知？」于是打电话给北京留守的彭真（当时中央的人在各地走动时，北京总有一人留守），问：「中央在上海开什么会呀？」彭真说：「我也不知道。但总理有一封信明天到，到了就知道了。」爸爸又问：「有人说是关于作战方面的会议。」彭真说：「不是，不是，作战方面的会议

还会不通知你这个总长，昨天电话上，总理说是庐山性质的会。」

「庐山性质的会！」是指又有人反党了，爸爸当时想，这次又是谁？（没想到就是自己！！）第二天再打电话过去，彭真就吭吭哧哧了，说：「总理讲，会议分两期，你我都是第二期，过几天就通知了。」

爸爸虽然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刚从上海、苏州过来没几天，刚见过毛、周，也没听说中央要开会，而且还是「庐山性质的会」，但是父亲是一个从来不打听的人。父亲当公安部长十年，几乎是毛走到哪儿，父亲都跟着，但毛身边的事，父亲从来不打听，毛不交待，父亲从来不管警卫之外的事。汪东兴、叶子龙讲些毛身边医生、护士、警卫、秘书之间的事及江青身边的事，父亲只是听，也不传，长年习惯如此。

听彭真讲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父亲就又去看地形；但没两天，中办就通知去上海开会。空军一架专机来接，到了上海，陈丕显来接机。很奇怪，因为一般中央开会，地方的第一书记不需要接机，吴法宪也来接机，但态度也很怪。陈丕显和父母都很熟，人也很好，文革也挨了一通整。文革后到湖北当第一书记，那时父亲已经不在了，陈恳请妈妈在武汉住一个冬天，说：「上海会议，我对不住罗总。」妈妈说：「上海会议你一句话没说，你有什么对不住？！」

陈说：「我去机场接的罗总。」妈妈说：「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主席让你去接，你能不去嘛？」

这是后话，当时在车上，陈说：「这次不住锦江，住另一个地方。」车开进一座小院，还没停稳，里边走出周恩来、邓小平，这就更怪了，没有这个礼仪。下了车，爸爸妈妈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相互问了好，周恩来说：「咱们在楼下说话，郝治平去楼上休息。」

坐下之后，周说：「此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林总向主席告了状：说罗长子手伸得太长，要逼他让贤，自己当国防部长。」

爸爸说：有什么证据？」

周说：「叶群说，罗瑞卿去看林总，出来在走廊上看到一只猫，一脚踢开，口中大叫，让开，让开，不工作，挡什么路！」

爸爸说：「你相信有这种事，我罗瑞卿再蠢，也不会蠢到这种程度。我可以和叶群对质。」

周又说：「叶群说，你告诉刘亚楼传话，让林总休息：军队的事由你管。」

爸爸说：「我从来没对刘亚楼说过这样的话。」

爸爸又提出和叶群对质，周说：「不用了，这次只是背对背，你和他们不见面，他们说什么，你就在这儿看简报。」爸爸说：「我要说什么呢？怎么说？」周说：「你就写材料，发不发会议，主席定。」

邓小平在一旁坐着，一言不发，文化大革命后听邓讲，上海会议就是叶群一个人说，林也一言不发：然后就是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刘志坚四篇发言，都是中央 1966 年 5.16 通知的附件。开完会，刘少奇说：「不可思议。」邓小平说：「死无对证。」（指刘亚楼揭发父亲让林彪让贤，当时刘亚楼已死。）刘伯承说：「我虽然身体不好，他（罗瑞卿）还是经常来看我的。」（针对叶群说父亲不去看林彪。）陈毅说：「我虽然不管军队的事，罗瑞卿军队的文件都送我。」（针对叶群说父亲封锁林彪，不送文件。）

最后，毛泽东发言，当着林彪的面，对大会说：「罗瑞卿反你（林彪），没反我。只反对我游泳，还是对我好。有些事一下扯不清，先挂起来。」

周恩来一字一句向父亲传达了这几句话，然后说：你写个辞呈吧。」父亲问：「都辞？」（指党、政、军一切职务。）周说：「就辞总参谋长。」于是父亲写了一个辞呈，这大概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过去高岗、彭黄张周，都不是辞职，而是撤职，所以父亲上海会议后仍是书记处书记、副总理。

文革之后，父亲在福州养病，我曾问父亲：「上海会议，毛泽东说得那么清楚，说你反林彪，没反毛泽东，这明明是给你吃定心丸嘛，这几句话要是说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他们还不是一百个放心。你怎么就那么想不开，老婆孩子都不要了，一撤手就走了！林彪那一伙正恨整不倒你，你却自己整倒自己。」父亲却一声不吭；再问，父亲就使劲地瞪我一眼，说：「你懂什么！」所以父亲实在是心里埋了很多东西，没有对任何人讲。

我曾跟妈妈说：「胡耀邦说上海会议上林彪的那一套，要说主席就信了，也不一定是对的。要我看，毛泽东根本就非常清楚，林彪告罗瑞卿矛头是对着毛泽东。」

妈妈说：「那为什么还要开上海会议？」

我说：「现在回头看，1965 年，毛泽东的首要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即毛

泽东一个人向全党宣战！毛泽东靠林彪吹捧，造神，毛泽东何尝不知道，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是瞎扯淡！但毛泽东当时需要这个造神运动，林彪的阴谋诡计骗不了毛泽东，毛林互动，是互相利用，并无互相信任。上海会议，在毛泽东看来，并没有什么对不起罗瑞卿，元帅告大将，国防部长告总参谋长，毛泽东怎么办？只有开会，大家来说嘛！跟着林彪起哄的，就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谢富治这四个人。相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刘少奇都不同程度，旁敲侧击的说了不同意林彪的话，毛泽东最后总结发言，当着林彪的面，说：罗瑞卿反你，没反我！一锤定音，而且也只是让父亲辞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仍保留副总理（政）和书记处书记（党），在毛泽东看来，已经很好的保护了罗瑞卿，而且派发的定心丸是够够的，只是父亲没听懂毛泽东的话！」

妈妈说：「你比爸爸还高明？」

我说：「我跟爸爸说过我的想法，爸爸没有赞成，也没有不赞成，其实，如果我真比爸爸高明，是好事，一代应比一代强嘛！共产党靠理想主义起家打天下，打下天下后，理想主义却没有了，往日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下子变成了胡说八道的陌生人，林彪害爸爸，是为了篡毛泽东的权，毛泽东并非忠奸不辨，而是要用奸臣吹捧自己，想暂时委屈一下忠臣，但爸爸又受不了这个委屈，其实，这么多人，谁当总长还不是一样。」

妈妈说：「你不知道京西宾馆三月会议他们都说什么？」我说：「我知道，无非就是胡说八道，其实爸爸实在不需要这么认真对待三月会议，上海会议后成立的处理此事的中央领导小组：邓小平、彭真、叶剑英、邓、彭根本不闻不问，开会也没露面，只有叶剑英脚踩两只船，拍林彪的马屁，主持三月会议，我要是爸爸，我就去京西宾馆宣读一番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然后就对那些胡说八道的将军们说声『再见』！即扬长而去。如果父亲真能如此潇洒一番，毛泽东就高兴了，林彪就没折了，咱们家也可躲过一难，但这并不一定就是『福』，因为父亲如果听懂了毛泽东的话，肯定就要卷入毛、林这场极端自私、完全脱离人民的斗争，对父亲而言，恐怕还是凶多吉少，难逃劫难。」

妈妈说：「你说来说去，好像都是爸爸的错，毛泽东并没有错。」

我说：「毛泽东林彪之争，是牺牲人民根本利益的个人之争」，爸爸的地位，躲不过这一难！爸爸仍然是理想主义者，但毛泽东、林彪早已不是理想主

义者了，甚至党内高层所剩理想主义者也没几个了，所以爸爸根本不明白林彪告罗瑞卿什么，什么「踢猫」这种故事也在政治局会议上去说，爸爸还要跟林彪、叶群对质！爸爸还要跟林彪讲道理，但党内已无道理可讲了，爸爸夹在毛、林之间，根本无法适应毛、林这种阴谋对诡计的斗争，可能这就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上海会议是文革的序幕，上海会议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就下发「五一六通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文革，其后的十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丑恶表演，把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推入封建主义的深渊。

父亲直到离开我们，没有讲过毛泽东一句坏话。记得刚「解除监护」，即刚从大牢里（医院）放出来，没人管了，我接父亲出来，父亲让车先去天安门转一圈，给毛泽东的像敬个礼。母亲和我们一群孩子，都觉得毛泽东对不起父亲，听信林彪不实之词，将父亲害得妻离子散，但父亲直到离开我们，却从来没见过说一句责怪毛泽东的话。

4、打天下胜了，坐天下败了

进北京后的毛泽东时代，虽然事情办得越来越不好，但却没有统治危机；老百姓很穷，甚至吃不饱肚子，全党、全军、全国都很穷，但怨言并不多，当然很多是不敢说。几十万右派和冤假错案，当事人都是拼命检讨和向党靠拢，打出推翻共产党旗号的，还真是不多，尽管已经把理想寄托错了，但大家似乎都承认有个理想在那儿，这实际上是很奇怪的。

共产党战争年代在人民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大家一直相信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当政的前十七年，尽管共产党已犯了很多错，但人民对党采取了原谅的态度，全党对毛泽东也采取了原谅的态度，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农民。「饿死」太难听，于是发明一个「非正常死亡」来安慰自己。历朝历代，饥寒生盗匪；这三年，却没有任何盗匪。蒋介石派小股武装部队登陆福建沿海号召起义，也没人响应，这说明老百姓还是信共产党。

为什么信？就是因为共产党廉洁，没有其它原因；事情没办好，老百姓甚至饿了几肚子，但看共产党不贪污，与民共甘苦，老百姓就不反共产党。历代历次封建农民革命，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于是盗匪遍地，

烽烟四起，各路农民军，整合出支队伍，推翻一个王朝，建立另一个王朝，共产党的革命也是这样源于社会的不公平。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相当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团结同志，能听不同意见。毛泽东的威信是在战争中树立起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毛泽东的战争艺术，指挥才能，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有谁能比？

毛泽东自己在战争年代相当能容人，比如东北战场，第一次保卫「四平」，毛泽东给林彪的命令是把四平变成马德里（Madrid，西班牙内战死守首都马德里），林彪开始也是执行毛的命令，调集全部主力摆开死守的架式，但打起来之后，林彪看看不行，即果断往后撤退，作为战场指挥官林彪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告诉毛：我撤了。根本不是请示，也不等批准，因为再不撤就要全军覆灭了！对此，虽然明显的林彪对毛泽东有点不敬，但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毛泽东知道林彪是对的，所以根本也不再提什么「马德里」，也没有一句指责林彪的话。相反，把指责林彪没执行中央指示的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撤了，调回延安，任命林彪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把东北的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了林彪。毛泽东能这样用人，东北局势很快就扭转过来，只一年就把国民党几十万主力消灭在东北境内。

所以说战争年代，毛泽东是头脑清醒，用人得当，英明伟大，一点不过分，否则一百万小米加步枪怎么打败三百万美式装备？毛泽东农民革命战争这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是中华文化之一，是战争艺术的瑰宝，是古今中外几千年历史的佼佼者。实际上对这场革命战争的赞美，不是过分了，而是还不够。尤其由于当权者的偏狭，知识分子的逢迎拍马，有权有钱让儿女写自己家人的无耻，如邓小平；有时间写回忆录的人的自吹自擂，如杨成武。

这幅画卷现在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支离破碎，乌七八糟，但也不是完全不好，不平等条件下自由竞争吧。老的死了，小的继续争，中国什么事都无序，这种事要有序就更难，就是让我来讲序，我也讲不出来，就是讲出来了，同意的能有几个？可悲的是，打仗的时候不争，那辈人都快死光了，却争了起来。战死的，气死的，整死的，没参加这个「争」。投机的，长命的，争个不亦乐乎，悲哉！

当政之后，前十七年虽然已经不英明了，但心还是好的。十五年超英赶美

并不是不好，问题在于不知道如何赶，如何超；更可悲的，由于战争年代的英明，到了这个时候，没人敢教毛泽东如何炼钢，一亩地能种出多少粮食，这就是中国哲学讲的物极必反，走到光辉的顶峰了，就掉头向下了。其实最英明的做法就是不懂就不要管，让懂一些经济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去搞饭吃，自己做做诗赋，交交女朋友，都好嘛，比瞎折腾好，结果折腾到没饭吃，还不闭门思过，又想出一个「文化大革命」怪招，不知是不是从希特勒的冲锋队那儿得来的灵感，弄出个红卫兵打砸抢，夺权。

文革十年，毁了毛泽东一生的英名。二十二年战争艺术的光彩，也被这二十七年瞎折腾磨暗淡了。但毛泽东有一个特点，干什么事，他自己相信自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十年文革，老百姓天天喊千秋万代，毛泽东真以为他死后老百姓会捧着他的书千秋万代。江青在监狱中也是等了十五年才自杀，她可能始终也没明白，为什么没人来救她。毛泽东不是教导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来造反。为什么没人造反呢？她不明白。

毛泽东的威信在文革中丧失殆尽，这就是领袖的悲哀。打天下时，千军万马，将星簇拥，人民爱戴；打下天下后，老百姓想的是吃饭穿衣，毛泽东想的是世界革命，想把中国变成世界的井冈山，从中国出发去埋葬全世界资本主义，谁敢说他不行呢？毛不是从井冈山出发，埋葬了蒋家王朝，为什么不可以从中国出发，去埋葬世界资本主义？这种事，如果论证，是论不出胜负的，唯一可以定胜负的是实践。毛泽东第一个实践二十二年打天下战争胜了；第二个实践二十七年坐天下建设就败了。

第一个实践开始时，毛泽东只是一个书生，带着九千大刀长矛农军落草为寇。国民党突然背信弃义，大杀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但是共产党却杀不完，而且有大批在国民党中有高官厚禄的人，如周恩来、朱德、贺龙，都汇集到共产党旗下。为什么？就是一个理想主义。今天的中国，还能找到几个理想主义者？胡耀邦有一点，邓小平不容，打了下去。赵紫阳比胡耀邦已差了很多，仍不为邓小平所容，又打了下去。再提上来的，就都是一些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了。

邓小平是聪明人，他知道他这一套混不长，所谓邓小平的理论，最大特点是无法自圆其说。邓小平想用资本主义救一党专政，资本主义的灵魂是自由竞

争，一党专政恰恰就是要扼杀自由竞争，所以邓小平搞出来的就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的怪胎，即官僚及其子弟，在国库拿钱去搞资本主义，利润用来养肥官僚，维持国家机器，保证他们继续「合法地」盗窃国库，同时也施舍一些残羹剩饭给所谓「精英」。中共官僚资本剥削十亿中国人民，而且与国际资本相结合。国际资本虽然恨一党专政，但喜欢剥削无人监管。

中国共产党出卖中国的资源、中国的劳力、中国的环境，甚至中国的女孩子，什么都可以卖！不仅邓小平及其一家人知道他这一套混不长，全党都明白邓小平这一套混不长，否则贪污怎么禁也禁不住？所有能贪污的都明白，这条船已经千疮百孔，早晚要沉，所有的官，高、中、低，都是抱着捞一把赶紧走的算盘。你看，从邓小平开始，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各路诸侯，都把子女安排在各种公司里捞钱，官越大，捞得越多，越名正言顺。我给你儿子批八千万，你给我女婿批几个亿。

总有一天，中国人民会给邓小平开始的贪官们列出一个账本来。邓小平和毛泽东最大的不同也在这里，毛泽东不管是对是错，起码他自己相信自己。毛泽东时代也没人把钱往国外运，就是林彪驾飞机外逃，也是只带了文件，也没见他带多少美金。邓小平则是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自己的这一套可以混得长久。到了「六四」之后，全党都看清了，邓小平这一套早晚要垮，要不，为什么要贪污呢？就是谁也不把这个国家当成自己的，所有的官都是捞一把就跑，先把子女、老婆送出国，薄一波的儿子，姬鹏飞的儿子……算不清。从邓小平开始，中国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5、我看毛泽东的兴亡

从家庭和个人而言，毛泽东确实对不起我们一家，特别是对不起父亲。但我总觉得，评价毛泽东，不能从个人的恩恩怨怨出发，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我认为毛是又一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即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开国皇帝。毛泽东的革命，是又一场了不起的农民革命。中国没有融入先进民主社会，是由于中国仍然没能冲出封建愚蠢的束缚。毛泽东是理想主义的封建主义；邓小平是实用主义的封建主义。从封建专制这一点上，毛、邓并没分别，分别在于毛泽东是开国之君，邓小平是篡位之君。用现代的观点看，邓篡了位，如能把中国引向民主主义，邓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这也是我支持邓的初衷。

六四枪响，一切善良的人幻想都破灭了；邓小平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邓自己亦心知肚明，所以邓小平不会躺在毛的身边等后人来鞭尸。把骨灰撒掉了。

我现在分析批判毛泽东，大前提是毛泽东的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中国人的近百年反帝斗争的失败，孕育出了这场人民革命，尽管这个革命成功之后，由于毛泽东不懂现代民主制度，也根本没想把中国引入现代民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还是明君治国，搬出卡尔·马克思这么一个洋和尚，因为大家都不懂，才能唬住人；但这个明君是赶走了帝国主义，实行了土地革命，所以农民拥护，革命就胜利了。

毛身边这些元帅、大将，哪一个不是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就是服毛泽东，这个威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毛泽东拉大旗，上井冈，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都不当（文革时说这个是国民党，那个是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自己就当过国民党，但当时你如果说出这个事实，就得杀头），上山打游击。共产党一面和国民党斗，一面自己窝里斗，牺牲了无数仁人志士，也制造了成千上万冤假错案。

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围追阻截下，仅仅三、五年就迅猛发展壮大到三十万人马。如果没有周恩来、王明挟共产国际淫威的干扰，中央苏区完全可能分出「半壁河山」。到遵义会议，剩下不到十万，但终于斗出来一个自己的领袖，到陕北只剩三万人，但这三万是（将星）种子。八年抗日战争结束，共产党已发展到一百万小米加步枪对着国民党的三百万飞机加大炮，谁敢说共产党能打赢？共产国际斯大林这些洋人，也都说打不得，其实毛泽东也不会主动打，但蒋介石打过来了，毛泽东只能从容地接住，仅用三年时间，就把掌握着全国政权、有三百万美式装备军队的国民党赶到了台湾，这难道不是举世罕见的奇迹吗？！现在几个小土豆把毛泽东说得一钱不值，还有一些既不懂历史也不懂现状的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胡说八道「毛泽东的革命是一场骗局。」简直开玩笑，你去骗骗看！不错，国共之争是兄弟之争，但大哥不讲理，小弟也不能等死；相反小弟教训了大哥，把大哥赶去台湾岛。国民党痛定思痛，反倒慢慢进步了，传到第二代就开始实行现代民主制度，虽然是民主初级阶段，但比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先进，后者居上。

世人评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按：此言传系毛 1945 年重庆会谈后之评语）。其实蒋介石如果有点气量，让毛泽东跟他进行议会斗争，对蒋是福，对毛是福，对中国人民是大福。蒋不打过来，毛肯定不会打过去，加上国际大环境，国共如能和平的议会斗争，逐渐解决封建割据，军队政党化的困局，不要说三年，三十年也不会谁把谁赶到什么岛上。相反，中国人民却可以从议会斗争中学到进入世界先进民主制度的道路。蒋、毛均可安享百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也不会腐化到当年的国民党和现在的共产党（邓小平的共产党）这样不堪入目。为什么不说不可救药呢？因为国民党腐败导致了丧失大陆政权，但逃到台湾后，蒋经国却把它救了过来。现在国民党已经是中国最先进的政党，它的先进，表现在开放党禁、报禁，与反对党平起平坐，自由竞争，军警宪特国家化，不再参政。

台湾新千年和平的政党轮替，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不管李登辉耍了什么阴谋，连战、宋楚瑜如何失策，朱镕基代表共产党帮了多少忙，这都是小事，大事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这个小岛上结束了。中国有一个小岛已经进入了现代民主制度。现在民进党的陈水扁想开倒车，我不看好他，一个社会一旦进步，个别人想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会有好下场。

还有一些人骂毛泽东到没有理性的程度，这是由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杀了很多，当然也杀错了一些人。共产党杀了多少国民党？国民党杀了多少共产党？被杀的人的亲属说些过头的话，也就不计较了。

真正地、严肃地、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检讨毛泽东农民革命的人，是为了把中华民族引入世界现代民主制度。两千年的封建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沉重包袱，其糟粕多于精华（并非没有精华）。毛泽东的反帝是真的，全中国人民拥护这个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参加这个革命，就是因为这个革命反帝。问题在于，当帝国主义改变了之后，如英国、法国、日本均在二战后由帝国主义对外政策逐渐改弦更张为现代民主制度，毛泽东的反帝革命却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世界。

朝鲜战争，从中、美来讲，完全是一场误会。越南战争，毛根本上是沉浸在幻想之中，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坦赞铁路，更

是愚不可及的政策，乱撒人民的血汗钱给一些不要脸的家伙。毛泽东的反封建，则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帝王思想。毛熟读万卷书，精通千古史（仅中国史，他不通世界史），手不离卷的就是《资治通鉴》、《明史》、《红楼梦》。毛泽东是封建权术、阴谋诡计、尔虞我诈的大师，张国焘、高岗、林彪都不是他的对手。

但毛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就是封建主义的明证，全党、全军、全民就跟着起哄）却败在叶剑英、邓小平的联手阴谋之中，毛传的二世三年就垮了台，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了。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封建主义登峰造极的十年，一切伪装都撕下来，所有封建主义能想象出来的花样都用上了。

看看文化大革命，就是集中华民族两千年封建主义之大成，谁做的呢？我们总不能说都是毛泽东做的吧，最多只能说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做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民，有什么忏悔吗？如果说大部份愚民没什么忏悔不忏悔的，那么「我们」中的有知识者，有没有什么忏悔呢？基本没有。在胡耀邦时期，曾有一点点？但马上被邓小平封杀了。因为邓小平坚持这、坚持那，四个坚持，实质仍然是坚持封建主义，坚持自己当皇帝。

毛泽东革命的反官僚资本主义是真的，但反过了头，把民族资产阶级即自由资本主义也消灭了。毛泽东之所以不喜欢自由资本主义，是由于毛的封建独裁专政从本质上是和自由资本主义对立的。如果允许在中国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削弱封建独裁专政。

毛泽东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也根本不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毛只是把一切不喜欢的东西叫做资产阶级，一切喜欢的东西都叫做无产阶级，所以要整谁，谁就是资产阶级，至于有没有资产，并不重要。彭德怀算哪门子资产阶级？刘少奇是资产阶级的女婿，沾点资产阶级的边。毛泽东自己是无产阶级吗？全中国的产都归他，这样的共产谁都愿意。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确实太残酷，也不公道。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份，在反帝这一点上，是拥护毛泽东的农民革命。革命成功，知识分子是功臣。当然知识分子存在自由主义的倾向，这是知识份子最宝贵的地方，却是毛泽东最忌恨的地方。

毛本人是小知识分子，他没有取先进民主的自由主义，却取了封建专制的帝王思想，这是毛泽东革命的悲哀，却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孕育的成果。毛泽东文革焚书坑儒，其打手是青年学生（多可悲！）毛泽东利用了封建传统，所以检讨毛泽东革命的最主要结论，就是中国革命首要任务应该是反封建。反封建谁来反？中国的知识阶层应该当仁不让，但是经过毛泽东三十年的摧残，邓小平十年的腐蚀加流放，已经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堕落、出卖灵魂、埋没良心的趋势，今天的中国官僚贪污腐化，知识界逢迎献媚，整个社会道德伦丧，故今天中国知识阶层的状况，确令很多人感到悲观，有良心的太少，能抛弃一切利益为理想奋斗的太少。

毛泽东当年抛弃一切，拉大旗，上井冈，立志当皇帝，这是何等的有志气。纵观天下，我还看不出来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可与当年毛泽东相比的知识分子。看吧，看中国何时出现一个华盛顿式的戈尔巴乔夫。

今天的中国，农民仍是老百姓的主体。两千年来，农民并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并不关心谁当皇帝，他们只关心有饭吃，邓小平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有经济开放，吃喝嫖赌随便，政治上收紧，任何人不许谈论军队国家化、多党制、普选等先进民主议题。毛泽东是理想主义（空想主义），只想万岁；但毛传的二世华国锋风光了也就半年。邓小平是实用主义，从共产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一国两制，一切「中国特色」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但是邓小平 73 岁第三次复出，开始他的最后革命，一直混到 93 岁，寿终正寝。邓小平传的二世、三世，二十年了还在混，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和特点。一方面是共产党的贪污腐化，一发不可收拾；另一方面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贪官卷款外逃，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是外资大量涌入；一方面是环境恶性破坏，资源恶性浪费，各种人为、生产恶性事故天天不断；另一面是大兴土木，醉生梦死的歌舞升平……今日之中国，一派邓小平设计的光怪陆离的末日风情。

完全、彻底、干净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邓小平。毛泽东写了五大本理论，在中国发行一亿册，想和马克思、列宁齐名。实际情况是德国的马克思、俄国的列宁都没人要，哪有人要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就一个黑猫白猫论，中国人都很受用。

从任何角度评论，毛泽东的下场都很悲惨。十年文革，全党、全军、全民比赛扯谎。没有人问：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谁把刘少奇定为国家主席？但并不是没有人想。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转眼就背着你毛泽东而去，摔死在蒙古。大家还在喊：「伟大、光荣、正确」。在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无法思议的荒谬绝伦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却成了正统，这就是中国的封建性。这个「封建性」可怕得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机体和灵魂之中。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努力什么？就是消灭封建性，但这无异于一小撮人向全民族开战。毛泽东的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理论思想就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所谓爱国就是忠君开始。邓小平一样要当皇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毛泽东清楚，他的十年文革，在封建史上也立不住。

但环顾周围，四下无人，一起打天下的将帅，被他自己整得死的死，残的残；跟着毛泽东起哄的一班烂仔，毛也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毛也知道，江青不是武则天。果然，毛一撒手，江青就关进了监狱，华国锋被叶剑英、邓小平连蒙带骗的赶下台；吵了十年「誓死捍卫」的封建士民，鸦雀无声，这就是领袖背叛了人民，人民也就背叛了领袖。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几近贫困潦倒。邓小平拿毛的一个「傻仔」当正统，由一个恶媳妇带着，全国招摇撞骗，丢人现眼，还「造」出一个孙子，滑天下之大稽。

只有「凤凰卫视」，根本不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情况，才会去访问这样的恶人。你们为什么不问问这个邵华，她见过毛几面，说过几句话？这个邵华根本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怪胎。她一生的理想就是抱着这根木头，换来「毛泽东的儿媳妇」这个名位，多么可怕的用心！是什么毒浸泡着这个心灵！过去有太监娶媳妇，人家毛岸青还不是太监。邓小平的大儿子和王树声（大将）的一个儿子，则和太监生理上一样，也娶媳妇！真是后来居上。

毛泽东的文革，红卫兵的暴行，邵华的理想，邓小平开坦克去镇压学生……所有这些两千年来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大大小小的坏事，用我们中华民族封建文化传统就可以贯通起来。

但封建文化也不全是糟粕，也有凤毛麟角的精华。中医是精华，全世界都

承认。在哲学和人文思想方面，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民族的坏事大概基本上可以消灭，各种危机基本化解掉。

除了用我们凤毛麟角的精华去消灭我们铺天盖地的糟粕之外，我们民族反封建的任务相当程度依靠国际大环境，说起来惭愧，还要靠洋人。过去洋人欺负我们，割地赔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打了一百多年，才把洋人赶跑。但是洋人也变了，帝国主义的英、法、德、意、日，二战之后，均放弃了帝国主义政策，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没什么帝国主义了。洋人也在进步，而且进步得比我们快，人家已经进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我们还在坚持野蛮的一党专政。

毛泽东的闭关自守，被说成是帝国主义「围堵」我们，其实：第一，帝国主义在二战后已经自动消亡。第二，所谓帝国主义，其特征是侵略，并不是「围堵」。毛泽东掌权后，是自己划地为牢，闭关锁国，拒绝与民主世界交往。实际情况是只有独裁政体怕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并不怕独裁政体，要辩论就辩论，要选举就选举，民主政体有什么好怕？独裁政体则不敢让人们自由发表意见（人家写个「零八宪章」，胡、温就把人家捉到监狱里去），也不敢自由选举，闭关自守，实际上就是害怕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民主理念吹入中国，颠覆独裁。

非常特殊的是，毛泽东的闭关自守，本质是为了独裁，阻挡科学和民主，但是这个错误的政策，却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因为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欺辱中国人，中国割地赔款，恨透了洋鬼子。因此，把鬼子赶出中国，就大快人心。但恰恰在二战结束后十几年间，鬼子也变了，我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个巨大的变化。

所以闭关自守只能使中国停留在封建落后的状态，世界发生了什么，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进程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我们都不知道。毛泽东追求的是绝对的权力；资产阶级现代民主政治的第一条，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独裁者不承认这条真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我曾追随中共追求绝对权力，相信「好人管理坏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后来才发现，好人并不好，而且真的好人也能变坏。

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基础是「人之初，性本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私的个体，「自私」是本性，它向好处发展就是好，向坏处发展就是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舍己为人的事情有，但不是社会合理立论的基础。自私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如何运作，如何发展，如何和睦相处，有赖于人人遵守法律，所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至高无上的，是法律，而不是某个人，这就是民主和独裁的根本差别。为了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和机会均等，资产阶级政治学特别重视分权、监督，不允许任何绝对权力存在，所以，媒体都盯着总统，严格限制权力的使用。

资产阶级这一套，比毛泽东的那一套，实在是真实的多，人性的多，也有效的多。邓小平的一套则是政治上坚持封建专制，经济上却想搞资本主义，邓并没有什么设计，也没什么主义，东撞西撞，撞出这么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共产党独裁在苏东欧已经垮台，官僚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也已失败，但中国却撞出来一个暴富的独裁政体！对民主世界而言，和平演变暴富的独裁中国政体，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看到了独裁德、意、日的兴亡，我们看到了独裁苏东欧的兴亡，现在上演的是独裁中国的兴亡，所谓「亡」，不是中国亡，是独裁亡！

6、评毛的专家们

近来又出了好多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毛原来身边的人李银桥，从延安开始跟毛，一直到1960年。毛死后一些好事之徒找到他，写了一些东西，由于过去谁也不知道毛的私生活，所以国内掀起一阵热潮，主要目的是钱。后来写的人和说的人为了版权还上了法庭。这些东西没什么假，只是拣好的说。还有一个李志绥医生，从进城开始跟，一直跟到毛死。我们小时候，任何时候见到毛泽东，李医生都在旁边，也给我们看过病。李医生之所以能在毛身边二十几年，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在政治上不敏感。中国的土话讲，是「不多事」，只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毛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进城以后到毛身边服务的人，最大特点是政治不敏感。李医生可能是个例外，但八大（1956年）他也不可能「感到」毛和刘、邓有了分歧。首先，毛即使1956年有对刘、邓不满，毛也不可能让身边的人「感

到」，毛只会在有十分把握的时候，才把与刘、邓的分歧暴露出来。这就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毛一手抓住林彪军队，一手放纵红卫兵打砸抢，似乎有十分把握，胜券在握，但却毁了一生功名。

洋人研究中国问题，总想找出一条「规律」，而我认为，中国问题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无规律」。或者说是「兵不厌诈」，「兵」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不打仗了，「诈」则一样。

毛对国民党、蒋介石是以诈取胜；对共产党，对刘周朱陈林邓，对红卫兵，同样以诈取胜；因此，要说「规律」，无规律就是最大的规律，洋人不懂中国问题的这个最高规律。洋人有洋人的一套研究问题的方法，比如，从出身、文化背景研究人物的思维。他们讲毛泽东是土生土长；不错，毛一辈子只出过两次国，一次是去莫斯科跟斯大林签友好条约，另一次也是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赫鲁晓夫吵翻。

除了这两次去莫斯科，他再没出过国门，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他根本不知道，完全生活在幻想之中，天天想的就是美国人打来怎么办，俄国人打来怎么办，蒋介石打回来怎么办。其实世界大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二战之后世界的变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现代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占了上风，老朽的资本主义已经消亡，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毛却看不到。美国人从来没想打中国共产党，如果要打，1949 年为什么不打，划江而治，南北中国，美国的军力可以挡住我们过江。但美国的民主政治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美国的最大利益。

毛泽东不懂美国，不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林彪却看到这点，所以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和毛发生了分歧。朝鲜战争，不是美国人打过来，是金日成打过去；只是因为毛泽东和杜鲁门之间没有一个通话的管道，没有起码的互相信任，打了一场「误会」的战争，中、美俱伤，结了怨。然后是越南战争，援越 100 亿美元，援助阿尔巴尼亚又一个 100 亿美元。到文化大革命，又搞了坦赞铁路。

现在回头看，毛的 27 年外交政策，根本是罔顾中国人民的死活，天天想着「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这如果用洋人的「文化背景，土生土长」来解释，恐怕是很难解释得通，起码是不完全。再如，洋人确实预见到了毛和刘、周、邓的分裂。我印象中最早看到的就是费正清的论文，当时我是初中学生，费正

清的文章被列为高度机密的「反动文章」。

当时我就不明白，这「反动文章」我们干嘛要列为「机密」。后来才恍然大悟，这是对中国老百姓保密，父亲母亲也是不准我看的。但我从小就破了父母这一党规，偷偷地拿来看。文革开始，我已是大三学生，非常佩服费教授的预见；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我的结论是：洋人的「规律」有一定的道理，但解释不了中国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洋人经常硬把一些「事实」往自己的规律里面「塞」，以证明自己的规律正确。

要说称得上是研究了解毛泽东的「专家」，实在没几个人，洋人根本没有，有哪个洋人可以读懂中文的「三国」、「红楼梦」、「资治通鉴」？读不懂这几部书，根本不可能了解毛泽东思维的方式。我在前边提到过中国人根本不懂卡尔·马克思，和外国人根本不懂毛泽东是一个道理。

中国人里边可以称得上研究了解毛泽东的「专家」的，大概只有周恩来、陈云、叶剑英。邓小平、林彪只能算半个「专家」。跟毛没有个人接触的，无从了解毛泽东；跟毛有个人接触的，要想了解毛泽东的思维也很难。彭德怀跟着毛打了几十年仗，还是不了解毛泽东。华国锋、汪东兴，毛把班交给他们，他们更不了解毛泽东，丢了政权。江青也不明白毛泽东，所以做了华、汪、叶、邓的刀下鬼。我认为我的父亲罗瑞卿也不了解毛泽东。

当然，我这里讲的「专家」，是一个非常特殊定义的专家，首先是了解毛泽东的思维方式、行事原则，基础是个人接触。毛死后三十年，这种意义上的专家就不可能有了。

周恩来研究透了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诚心诚意追随毛泽东四十余年；但毛泽东并不忘江西中央苏区，周恩来、王明是要杀毛泽东的，所以毛泽东一天到晚选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甚至一度想选王洪文；但毛泽东从来不提把班交给周恩来。越是全党全民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周恩来接班，毛泽东就越担心，周恩来也越担心。

毛、周都明白，毛在毛是用周恩来的才，江青一帮人咋咋呼呼，并无治国之能，属无德无才之辈。毛不在了，江青一帮人可不是周恩来的对手。

所以文革后期，困扰着毛泽东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处理周恩来。打倒吧，找个宰相不容易；不打倒吧，毛一走，周恩来肯定翻盘。所以 1975 年，一会儿

传出毛的话：江青别想组阁；一会儿又传出江青布置批林、批孔、批周公，打倒周恩来呼之欲出。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哪个是真的？其实都是真的。毛泽东在思考，在权衡，打倒周恩来的意向肯定是有的。毛泽东不给江青交待，江青肯定不敢自己提出「批周公」，毛泽东只是还没下决心，还在犹豫。

周恩来何尝不知毛泽东在想什么。周恩来比毛泽东小五岁，不沉溺于女性，古言，色是刮骨的刀。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周恩来肯定活过毛泽东，而这一点却成了毛泽东最大的担心。我在关于周恩来夫妇的一章中，曾根据周恩来医疗组李冰院长的只言片语，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周恩来拼命让医生给自己动手术，目的就是走在毛前面，让毛放心！不要打倒周恩来！提出这一假设，我实在也是胆战心惊，字字千斤。

几千年前古人没有绕地球一周，即有天方地圆之说，无非是观察星空，浮想联翩。我随父亲在文革开始前半年多即远离了权力中心。我观察到的星空无非是人人可见的，只有浮想联翩属于自己。再深想一层，周恩来错矣！即便毛泽东真要打倒周恩来，也并非世界末日，刘少奇沉冤十几年不就平反了！邓小平不世复出了，何况周恩来再转而一想，毛泽东亦错矣！如果真把班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绝不会把江青抓到监狱里去，也会善待毛泽东的两个女儿。

真正研究透毛泽东并颠覆了毛泽东政权的，是最不起眼的末位帅叶剑英。叶剑英无一兵一卒之权，只靠二寸不烂之舌就颠覆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坏华国锋大事的是汪东兴。汪东兴跟毛跟了四十年，却不懂毛留下的这个局是动不得的，一动就满盘皆输，我在关于叶剑英一家的描述里有详述，这里不赘了。

叶剑英完全用和平的方式救出了邓小平。邓小平却在叶剑英归天之后，把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叶剑英在天之灵当可训斥邓小平：你邓小平真是无能！我救你都没用一兵一卒，你对付千把示威的学生，竟然用了九个军番号的士兵，竟然把坦克开上大街，真真是无能加蛮横！

读者说，我这浮想联翩对不对？

林彪和邓小平只能算研究透一半毛泽东，所以一个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一个被毛封在空瓶里，如无叶剑英来救，也就没戏了。如果邓小平没戏了，我的父亲恐怕也没多少戏了，我恐怕更没什么戏了；当然，如果父亲不复出，

也不会去德国治腿，也会多给我讲些故事。

做学生时不懂什么「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忽视了人文科学，以为共产党当政已解决了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的问题。文革开始重新认识，坐了五年牢，不甘心灰意冷，勉强打起精神，支持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到1986年赴美工作，已采取了逃避的方针，看不惯的事太多。到「六四」，则九州岛岛之大已无容身之地。我是「只要主义真」，但环顾茫茫大地，能找到几个「只要主义真」的人呢？

研究毛泽东，很难；研究透，则更难，犹如千年前的「难于上青天」。我在前面提到了，按我的标准，今天研究毛已经几乎不可能。我的父亲随毛泽东打天下二十二年，又在毛的近身辅佐毛坐天下十六年，我认为我父亲不了解毛泽东，我写毛泽东基于父亲的只言片语，还有自己的浮想联翩。我写的这一点，离真实的毛泽东、全面的毛泽东、透彻的毛泽东，要多远有多远。我在前边提到的有可能是研究透了毛的专家，都已作古，且没有留下有关他们研究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一个永远的「谜」。我们这个民族这样的「谜」很多，毛不过是刚过去的一个。我写这一篇，只是感到沉重，似乎每一句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如封建文化压得我们这个民族喘不过气来一样。

当然毛泽东也有不是「谜」的一面，非常清晰的一面，从湖南山沟里一介书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延安山沟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从来是把自己当作又一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我是在监狱里才把毛泽东这个皇帝「谜」的一面读懂。

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本就是瞎扯淡！中国基本没有资产阶级，哪来无产阶级？毛也没当过一天无产阶级。毛泽东的革命根本就是农民革命。什么「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都是自封的瞎扯淡，而且我对无产阶级的观察，我也看不出工厂工人有任何优秀于其他人的质量，什么「大公无私」，哪有？相反，工厂工人也是非常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看看英国的工会和美国的工会，看看他们的领导人，实在没有什么优秀份子。真正的优秀份子是有良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民主、平等是资产阶级在和封建阶级

斗争时提出的理念。在资产阶级当权之后，资产阶级优秀的知识分子又用这个理念来约束大资产阶级，从而产生了现代民主政治。随着社会的富裕，中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体，暴富和赤贫均为少数。由于机会均等，自由竞争，三权分立这些基本原则的实行，社会才可能和谐。

毛泽东身边，大管家是周恩来，从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是毛泽东政策的最得力执行者。毛、江结合，由于江青的丑史，党内反对声音甚高，周也一声不吭。在延安，毛的家事也是周恩来照顾，从警卫到衣、食、住、行。进北京之后，毛泽东把我父亲调到身边当公安部长，我的父亲只管警卫，但警卫实际上衣、食、住、行都要管，所以我的父亲又当了十年毛泽东的大管家。这期间，叶子龙、汪东兴只是小管家。

李医生对这段时间的描写是活灵活现的。我父亲 1959 年调任总参谋长后，汪东兴成为大管家直到毛泽东死。林彪虽然当了副统帅，但林彪从来接触不到毛的警卫、医疗、衣、食、住、行。毛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林彪，只是利用林彪。林彪也同样从来没有信任过毛泽东，只是利用毛泽东。

我把陈云也列为研究透了毛泽东的人之一，是因为陈云虽然不同意毛的左倾冒进的经济政策，但陈云从不跟毛正面冲突，陈云只是不跟着起哄而已，所谓「国有道，其言可兴邦；国无道，其言商自保」。毛泽东也知道陈云不同意自己这一套，特别是 1960 年饥荒开始，陈云提出「农业要退够，工业也要退够」，而且暗中鼓励三自一包。

我还莫名其妙地当过一次毛泽东、陈云之间的传话人，因为我和陈云的儿子陈元都在四中。陈元告诉我，他爸爸认为只有三自一包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我把原话告诉了父亲，父亲就告诉了毛泽东。过了一些天，父亲告诉我：主席说，不能三自一包。我又告诉了陈元，相信陈元肯定告诉了陈云。我当时十五、六岁，真正相信共产党是团结一致的，根本想不到，常委们之间有些话也不好说，只有找这种方式来传话。这种方式的妙处在于互不得罪，没有记录，话也说清了。

另外一些人，现在也被称为专家，像李锐先生、王若水先生，他们都是好人，起码是党内民主派，但要称为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则很难，因为实在是接触很少，或根本没什么接触。现在到处说李锐先生是毛的秘书，其实也只是毛随

便说的一句话。当时李锐是水电总局的局长，关于长江三峡是否建电站，有一篇文章，毛看了，很有兴趣，说了一句：我研究水利问题，你来给我当秘书吧。并无任命，党内都知道。

毛泽东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副部级；还有些小秘书，像徐业夫、林克，分管很专业、很细致一点事，与毛的接触也很有限。像前面提到，1965 年秋叶群到杭州去告我父亲的刁状，叶群拿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张字条：「叶群代我向主席报告一件事」。毛分两次接见叶群，叶群说，毛听，徐业夫做记录，一共七个小时。据说，毛一言不发，就在中央档案馆。

比起这些小秘书，李锐这个秘书就更差一截，因为李锐从来就没上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名单，现在到处说李是毛泽东的秘书，实在有点言过其实。我写这几个字丝毫不贬低李锐老先生的意思，我虽从不认识李老先生，但从他的经历，我却从心里同情他。我写这几个字，只是想让读者知道，要了解一件事的真相有多难。

至于外国人，中国问题专家也好，毛泽东研究专家也好，实在看他们的东西，既了解不了中国，也瞭解不了毛泽东。只能让我们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中国人的，是如何认识毛泽东的。我有一小文「外国很难懂中国人一例」附后，可供参阅。

7、文革：毛向全党宣战

文化大革命，毛个人向他亲手创建、而且确实拥护他的全党宣战，这个决定实在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上。毛幻想有一个拥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集团。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集团。1964-1965 年的形势，在正常人看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势。经过 1957 年反右、1958 年大跃进，1959 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1960 年饥荒饿死人，全党虽有怨气，也有要求平反的呼声，但整体讲，全党对毛泽东还是采取了一个原谅的态度。

经过全党的努力，刘、周、邓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农业已走上轨道，彭德怀去三线（四川）当了副总指挥，潘汉年这些人也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刘、周、邓在具体工作中是在改正毛的错误，但全党非常给毛泽东面子，毕竟是毛

带着大家打下的天下。最重的一句话就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可能是真正地惹恼了毛，也断送了刘少奇的性命。因为毛根本看不起刘，毛把刘放在第二位，一是由于刘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二是由于刘毫无战功，在军中根本没有威信，也没有自己的系统（人脉），对毛根本构不成威胁。

毛真正提防的是军队的领导人，像刘伯承、陈毅、彭德怀、林彪。毛泽东打天下，军事上依靠的是刘伯承、彭德怀、林彪。三分天下，党内共识，指刘、彭、林，一人打下三分之一的天下。坐天下之后，刘伯承立即隐退，至死再未出山，毛泽东则玩彭德怀、林彪于股掌之间。实际情况是，不但刘、周、邓根本没有谋反的想法，就是这些军队领导人，也根本没有谋反的意图。

唯一有点谋反气味的，就是林彪；但真到了林认为无法和毛相处下去的时候，林彪也没有打出反毛的旗帜，而且除了他的老婆和儿子，也没有一个人跟着他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做了很多坏事，但你说他们跟着林彪去谋反毛泽东，则根本无任何证据。林彪集团干的一切和江青集团干的一切一样，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引下干的。

邓小平无胆说出这句话，是因为邓小平仍想利用中国共产党这块牌子来当皇帝。但是 1965 年的形势确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虽是实话，但并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党是团结的、廉洁的，并且自己的实际努力工作，迅速扭转了饥荒的态势。全党、全民并没有把过错归咎于毛泽东；相反，周恩来亲自导演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把全国对毛泽东的崇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林彪则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投毛所好，毛个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在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实在没有哪一个政治人物会蠢到挑战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毛身边那些真正对他好、也有点思想、也能说上话的人，如田家英等人，力劝：毛放手让刘、周、邓去搞饭吃（搞经济工作，当时就简称为搞饭吃），毛泽东则享福当皇帝。毛如真能按此行事，活到百岁应无问题，这可能是正常人的想法。

但毛泽东不是正常人，是特殊的人，是开国皇帝。：

毛泽东幻想在党内有一个反对他、想取他而代之的集团。苏联赫鲁晓夫对

斯大林的清算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中国封建道德文化特别恨背叛，特别是主子死后背叛主子。中国皇帝除了关心在生时不要有人推翻他，皇帝还有相当大的心思是考虑他死了之后是否有人背叛他。1960年的饥荒迫使毛泽东暂时退却，毛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表面的理由是毛讨厌繁琐的国事活动，迎来送往，浪费时间。此事不假，毛是讨厌这些繁文缛节，但深层的理由，毛让出国家主席，是为了麻痹刘少奇。毛在心里，此时已把刘少奇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确信，他一死，刘、邓肯定要背叛他，因此，毛泽东决心必须在有生之年，铲除刘少奇，但时机尚未成熟。毛又把中央工作分为分一线、二线，让刘、周、邓在一线，他自己退居二线，说是研究重大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他在绝对少数的情况下（当时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如果毛靠开会铲除刘少奇，是绝对办不到的），如何打败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而铲除毛想象中的一切反毛的老战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开国皇帝杀功臣，中国的封建王朝，两千年来不断上演这个戏。毛泽东的红卫兵就是希特勒的冲锋队，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三十年代德国青年和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毫无关连，却惊人的相似，都是那么疯狂，没有人性，为了盲目崇拜，摧毁社会，最后也毁了自己。但是德国人已经检讨了六十年，还在检讨；但中国人却不检讨，而且元凶中国共产党禁止中华民族检讨。

德国人从来不把一切罪恶归于希特勒一个人，德国知识界心平气和地检讨了六十年。大家都承认，德国作为一个优秀民族，受了希特勒的欺骗，同时也帮助希特勒犯下了这一切罪行，这种检讨根绝了再出现冲锋队的危险。中国呢？邓小平篡位之后，搞了一点「伤痕文学」，到「六四」，全面封杀一切政治改革的议题。因为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毛泽东的封建主义，在专制、反民主、当皇帝的议题上，并无任何分歧，于是中国迅速地从毛泽东的封建主义泥沼滑向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泥沼。

这个过渡惊人的顺利，它的基础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愚昧无知，中国广大知识阶层的良心埋没和中共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艺术。毛泽东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就是安排他的后事。毛泽东这个皇帝并不担心他活着时的一切事；他知道，他只要活着，没有人可以向他挑战。林彪，党章上写上接班人；但林彪自己都不相信毛会交班给他。林彪虽然比毛泽东小十几岁，但负过胸部

重伤，自己认为也活不过毛，于是阴谋抢班夺权，结果驾机叛逃，折戟沉沙，老婆、儿子一起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周恩来万念俱灭，唯一担心的是毛泽东批林批孔，会不会批周公，临死前最后一次去看毛，多少军国大事，一件不带，就抱着一本国民党旧报纸「伍豪（周恩来当时化名）脱党声明」，请毛泽东再确认一次：此乃国民党伪造的周恩来脱党声明。毛圆了周这个愿，周就平静地先走了一步。此前，毛泽东已经看出，自己死后，四人帮斗不过邓小平，于是再次把邓小平拉下马，软禁在宽街二号（我母亲现在还住在宽街二号）。

周一走，临急临忙拉出一个华国锋来，毛说：想当的，都不能当，不想当的，却可以当。全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毛所说的「想当的」，就是指江青、王洪文、邓小平。十年了，只有农民还在种地，否则，大家都饿死，全国学生不上学，工人不上班，科研不作为。全党、全军、全民比赛说大话，然后就是生孩子。一个民族可以这么折腾十年，查查世界史，能找到第二例吗？

今天，这疯狂的十年已经过去三、四十多年，我们这个民族都没有检讨（个别的良心犯，只能在海外检讨），大家都摆出一幅无辜的样子，杀人的、放火的、打砸抢的都摆出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谁是坏人呢？邓小平经手的中国共产党说是四人帮。可是邓小平自己相信四人帮有一件事是不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的吗？（至于江青智商不够，理解不了，办错了，那是另一回事。）

那么谁是坏人呢？有人说：毛泽东。其实也不对；毛泽东本是湖南一个书生，是我们这个民族把他拥上了开国皇帝的宝座。一个民族怎么可以拥护出一个「坏人」做自己的领袖？所以，今天我们全民族检讨自己的题目应该是：为什么两千年来，我们不断地拥戴出这么些开国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毛泽东？直到今天，从无耻的张艺谋到无耻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在不断地歌颂这些皇帝。中华民族必须觉悟，当封建糟粕文化仍然主宰着亿万人的头脑时，我们是永远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生前担心的事，生后全发生了，这说明他的担心是对的。毛临死前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走了国民党，这件事同意的人多些；一件是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同意的人少些。当然「少些」，中央七个常委，倒了五个；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副总理，就剩一个李先念。毛泽东生前就预感到「文

化大革命」立不住，果不其然，他死后不到十天。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皇后江青统领的四人帮，就被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汪东兴投入监狱。

不到三年，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就篡了位，把华、汪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万卷书，统统扫入垃圾堆；中国大地，除了毛的一具干尸、一幅图腾，再也找不到任何毛的神迹；喊了十年「誓死捍卫」，「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各色人等，一转眼就投入了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大潮，十亿人民九亿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欺骗人民；人民的「誓死捍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欺骗领袖：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报应」。

8、传统深厚的「成王败寇」

毛临终说他一生干了雨件事，其实何止两件？起码还有 1950-1953 年抗美援朝，牺牲一百万中国士兵（农民），1957 年反右，将六十万中国知识分子投入劳改营；大跃进、十五年超英，结果导致三年饥荒，又饿死几千万农民；1957 年跟赫鲁晓夫决裂，中苏论战，写了九评；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一百亿美元；援越抗美，又一百亿美元；文革中，援建坦赞铁路，又几十亿美元；勒紧裤腰带，发展原子弹。

世界已经变化了，毛泽东的思想则仍停留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天天想的就是外国人会打过来.....但是我分析、检讨毛泽东的行为、思维，却从来不致于简单的否定，也从不赞成别人对毛泽东的简单否定，而是力图找到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捧毛泽东为神明，说毛是伟人，邓是小人，这是真正出自抛弃了个人的恩恩怨怨。但我承认我是凡人，毛是伟人；凡人分析伟人，就难免有局限性，如李志绥医生一样。

参加毛泽东农民革命的大部分知识青年，都是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愿当亡国奴，把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寄托在毛泽东身上，寄托也是强加，特别是在你不真实了解你要寄托的领袖时，你就寄托了，很多就成了一厢情愿的悲剧，如无数像潘汉年夫妇一样的青年。

注：潘汉年（1906-1977）中共著名作家、曾在香港做间谍，1949 年任上海市副市长。抗日时期奉命代表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合作。1955 年毛命令逮捕判刑，与妻子董慧关押农场，1982 年获平反，称为优秀共产党员。

当然也不是个人完全一厢情愿。共产党那时比之今日确实廉洁，也真实的

反帝。毛泽东的革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是只有独立，却没有自由、民主、平等。我们希望毛泽东是中国的华盛顿，但毛根本瞧不起华盛顿。他心中的英雄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朱元璋。毛自己说得明白，写得明白，诗歌的明白，只是我们这些凡人没听明白（听明白又如何？听明白了也不能当亡国奴，也得去打日本鬼子，要打日本鬼子，不投共产党就投国民党）。

如果天真的问：这是谁的错？问题可以这么问，答案则无法说明：是领袖的错，还是人民的错？中庸的答案是：中国二十纪前半叶发生的一切，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由中国和世界的大势决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势决定了中国在这个时候根本推不出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资产阶级领袖，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资产阶级。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只可能又推出一个开国皇帝——这就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至于毛泽东个人的魅力、凝聚力、无师自通、打仗的指挥艺术以及对内、对外的政治谋略（愿意称阴谋也可以，自古兵不厌诈），一切的一切谁人能比，游击战打败了正规战，小米加步枪打败三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就是毛泽东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这倒应了林彪一句话，「几百年才有一个」。

当然我们也不止一次指出，这个天马行空的大师，却不懂人口论，不懂怎么炼钢，也不知道麻雀主要吃的是有害于人类的昆虫，而只吃很少的粮食……。这时没人敢教伟大领袖了，因为封建传统说皇帝比任何人都高明，毛泽东也超级自信，朕即真理。打败蒋介石可以，超英赶美，岂有不行之理？刘少奇、周恩来、用不同方式劝阻。毛泽东根本不听。

这时像当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这样的奸臣就出来作怪了。曾告诉毛泽东可以土法炼钢，于是毛一声令下，全国胡干蛮干，砍光所有的森林，砸光所有的铁锅，这一次钢没炼出来，英美更没赶上，只折腾出了一个饥荒，饿死几千万农民。毛从心里也是非常恨曾希圣的，恨曾希圣让毛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丢了这么大的脸。但毛并没有把曾打成反党集团，相反，给曾留足了面子，光荣退休。毛泽东忠奸不辨，不知自己已堕入昏君之境。

进城前，毛泽东在西柏坡语重心长告诫全党，全国胜利后，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不能胜利冲昏头脑。可是建国执政后，还有谁比他更骄横、傲慢？

内战的胜利使毛的威信达到顶峰，我们看到他一步步从顶峰滑落，走向反面。中国哲学总讲「物极必反」。胜利转化为灾难。国民党也是「物极必反」，失败退到台湾，到蒋二世经国先生，开放党禁、报禁，放弃一党专政，融入世界民主潮流。

五十年，共产党由先进转化为落后，国民党由落后转化为先进。时至今日，两岸不可能再用战争解决任何问题。今天，两岸谁言战，谁是民族罪人，已成为全民族共识。此点，在 1963 年蒋介石结束派遣小股武装分子骚扰大陆后，毛泽东、蒋介石之间便有共识，即两岸井水不犯河水。此共识可能是由周恩来和蒋经国在南海太平岛见面时达成，我曾略有所闻，此事现在的罗青长（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知道，在罗青长纪念已故的南海舰队司令吴瑞林的文章中有所透露。

毛蒋之间的共识，在毛来讲，亦是为文革做准备。1966 年天下大乱，我还曾想过，毛就那么放心蒋介石一动不动？果然，十年文革，蒋介石隔岸观火。毛泽东 1971 年见尼克松时说：台湾问题，一百年后再解决。美国人亦知毛蒋共识，此共识周恩来肯定传给了邓小平，蒋经国肯定也传给了李登辉。邓小平、叶剑英拿台湾问题来吵吵，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一党专政不满的视线。陈水扁瞎吵吵，也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台湾现状不满的视线。

清高的人（笔者亦是）会说，这真是肮脏的政治。不错，是肮脏，不仅国共是肮脏，美国人也一样肮脏。布什打伊拉克时说，伊拉克有这、有那；打进去了，一看什么也没有，仍厚着脸皮说，没有也打得对。朝鲜金正日这个小流氓说，我有原子弹。布什说：你有我也不打你。为什么？因为朝鲜没石油。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全世界天天去吵，天天去论；美国人照样选这个说谎的布什连任总统，这够不够肮脏呢？！也就一个鲍威尔，觉得这个谎撒得太大，辞职不干了。

国际社会，法、德还坚持一点正义，坚决不出兵，那么多新融入民主社会的东欧国家，也放弃民主理念，跟着起哄。中国则是脚踩两只船，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邓小平的传统，差别在于，民主社会批评自由，你批评布什不会有人捉你进监狱，拍电影、游行示威，都可以。最后还是看人民往那儿投票，看多少人信你。专制社会则不允许批评，你批评邓小平，或者批评老江、小胡

之类，就有人捉你关监狱。中国共产党现在最怕的就是选举，一人一票，中国共产党及其走狗，如香港的董建华、澳门的何厚铨，肯定选不上。怕选举就是怕人民。

9、没有朋友，也没有家庭

李志绥医生在毛泽东身边二十多年，李医生说：毛泽东没有朋友。此话点到毛的要害之处。一个民主领袖或者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朋友呢？皇帝则没有朋友，尤其是开国皇帝，打天下时有很多朋友；打下天下，就没朋友了。毛泽东不仅没有朋友，而且几乎也没有家庭。毛泽东对妻妾子女都没什么感情，或者说感情不露。杨开慧在长沙还没被杀，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是夫妻生活了。十年夫妻，据讲贺子珍几乎每年怀胎，但成活不多；长征开始时，有一个儿子寄养在老乡家，进北京后，贺子珍的妹妹和江西省委的人专门去找，没有着落；长征路上寄养的一个女儿，也没找着，剩下一个女儿李敏和杨开慧生的两个送去苏联的儿子岸英、岸青。

贺子珍跟毛泽东在延安大闹一场之后，去了苏联治病，江青则马上填上这个空。党内知道江青底细的人，如潘汉年、饶漱石都发电报给延安表示反对；但康生保荐了江青。这些事父母从来不评论，但现在回头看，凡卷入毛泽东、江青是否合适结合的争议中的人，很多在进城后都莫名其妙被打成反革命；特别是潘汉年，整个身家生命都投入共产党反国民党的革命，而且屡建奇勋，实在没有一条理由说潘汉年是反革命。我认为就是江青忌恨他，但我没证据，也没花时间去追究。

江青的前夫之一，黄敬，1959年在天津市长的位上神经错乱，跳楼自杀。黄敬的哥哥俞大维曾做过蒋介石的国防部长，黄敬生前和爸爸经常来往。黄敬的大儿子俞强声和我哥同学，小儿子俞正声和我同学，都熟。文革后，俞强声在安全部当个处长，80年代初突然叛逃去了美国，出卖了中国在CIA卧底的间谍金无怠，没几年在美国车祸离奇死去；俞正声则投靠了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靠小邓一路往上推，现在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18大成为政治局常委。

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前父母很少在我面前议论毛泽东和江青。虽然每年在北戴河和毛泽东在一起游泳，也偶尔见到江青；但江青给我的印象就是闪电般

的出现，又闪电般的消失。我从没见过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游泳，甚至舞会，江青偶尔来一下，也从不和毛泽东同时出现。从我孩时印象起，就觉得毛是伟人，伟人总是独来独往。伟人的老婆孩子也很寂寞，他们甚至很难和毛一起吃饭。而我们这些一般的人，最愉快的事之一，就是全家大小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吃饭。文革前，大家对江青都是敬而远之，大人小孩没有一个人喜欢见到她。她一出现，大家都非常紧张，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

文革后，父亲跟我说：当公安部长十年，经常在主席身边，自然也经常见到江青。刚开始，江青对父亲很热情，而且经常找机会跟父亲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如：她多么寂寞之类。看到父亲不理她，她对父亲才逐渐冷漠了。但李志绥医生的书里有一点是错误的，李医生说毛泽东随便找女朋友，江青则是安分守己的。实际情况是江青也到处勾引卫士，而且至少跟一个卫士发生了两性关系，此事毛知道，但没有追究，由汪东兴报告父亲后，将此卫士发配新疆。文革前，母亲偶尔也被安排陪江青，如 1965 年大比武在十三陵向主席汇报，江青也要去。主席同意了，汪东兴就给妈妈打电话，说：「主席同意江青也去看比武，你能不能陪陪她？」妈妈事后跟我说：「这种事还有什么能不能？再别扭也得能。」汪东兴这些人可能想，别人想陪还没得陪呢！但妈妈从心里不愿沾江青的边，但不想陪也得装得高高兴兴地去陪她。妈妈说，当天，父亲陪主席去十三陵，妈妈就去中南海接江青。江青坐在一个大黑房子里，打过招呼后就上车出发。当时江青也无一官半职，就是主席夫人，也是主席秘书，一路就是江青谈她的样板戏。

我长大才明白，江青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进城之后，江青不再有夫妻生活。东方哲学称之为阴阳不调，这种阴阳不调的人，多数变态心理，自己不高兴，也不愿别人高兴，这种养尊处优，无所事事，阴阳不调，心理变态的生活积压了十七年，就冒出了一个文革旗手，一个鬼哭狼嚎、志大才疏、小里小气的旗手，中国人民就开始了一个十年没文化更没有快乐的灾难。

但邓小平对江青的审判并不公平，华国锋、汪东兴对「四人帮」的逮捕行为，是违宪，并违反党章，党内斗争不能使用专政手段。毛泽东尚顾虑这条，所以毛不会用 8341 部队去对付刘、邓、陶，还要来个「群众专政」遮羞布。中国共产党所以是一个封建主义的政党，中国社会所以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反映

在党内斗争上，就是不民主的手段机制，游戏没有规则，有枪就是草头王。

作为一个女人，江青其实很可怜，但她是自愿选择，所以也不值得同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江青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只不过她没有毛泽东的智商，不懂毛思维的真谛，所以毛也知道不能把班交给她。毛泽东对刘、邓、陶是流氓手段；华国锋对四人帮是流氓手段；邓小平对华国锋也是流氓手段。毛泽东是用「群众运动」掩盖一下流氓的实质，邓小平则根本不在乎；只有陈云在整赵紫阳的时候，提及了一下合法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老人帮整赵紫阳，根本不合法。

毛泽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他从来要做人民的代表，这是理想主义的特征之一，所以毛泽东绝对不会用军队去对付学生。「四五」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也只是用工人大棒子赶走了悼念周恩来的学生。邓小平则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邓小平对形象并不感兴趣，他在毛面前说：「永不翻案！」在华面前说：「永远拥护华主席！」中国人民从毛泽东、邓小平身上学到什么？就是全民族道德沦丧，中国的政治就是没有实话。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邓小平实践了林彪这句话。刘少奇说一句实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被毛泽东整死，说是不杀，其实比杀还卑鄙残酷。

10、战略和理论错误

我的感觉是：无论是毛泽东自己，还是党内其他的人，没有谁认为可以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把他赶下台。毛泽东，像一切开国皇帝一样，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被赶下台，但党内唯一动过脑筋把毛泽东赶下台的，就是毛亲自提拔的接班人林彪。高岗是怎么回事，我不大清楚，因为那时太小，但实际情况是，高岗何德何能？高岗根本没有可能和毛泽东争大位。

遵义会议之后，很快党就成熟了。长征胜利结束，在陕北立住脚跟，全党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心服口服，谁都看得出来，没有毛泽东，大家一起完蛋。王明虽然不服，但王明已是孤家寡人，谁都明白，跟着王明，死路一条。周恩来改弦更张，心悦诚服地辅佐毛泽东，周恩来视毛为君，视自己为相，这一定位为中国革命成功起了关键作用。

为什么周恩来不视蒋介石为君呢？这就是周恩来的理想主义，他们这一代革命者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宗旨，所以我才更不能容忍邓小平、王震、杨尚昆

这帮人，革命到最后了，都变成了贪污犯，这成什么样子，道不合，不相为谋——在邓小平的共产党内，没我的位子。虽然毛泽东至死没有原谅周恩来，也没放松对周恩来的警惕（表现在毛感觉自己时日无多时，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先走，周恩来自动接班）。但周恩来却是至死再没跟毛泽东争过。

林彪可能想过争一下，但也自知不行，否则为什么不飞广州另立政府，来个南北战争，就是林彪知道争不过毛泽东。翻翻中国历史，也没有哪个开国皇帝被赶下台。李自成算不上什么开国皇帝，是前朝的大将引外族把李自成赶下台的，所以毛泽东也担心蒋介石引美国人打回来。毛泽东的思想还停留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时候。

毛泽东在湖南山沟里只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没研究世界史，即使读了一点现代民主先贤的著作，也没读懂，所以毛泽东根本不知道美国从来不是帝国主义，美国从来没有为了殖民利益进行战争。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很多专制政权也打得火热，但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理念，从本质上是要颠覆专制政体的。所谓反共，大前提也是反专制。蒋介石也专制，毛泽东也专制，从美国来讲，都是要反的，也都是可以打交道的。所谓反，并不一定要打仗，更有效的方式是和平扩散（输出）民主理念，和平演变专制政体。

美国的这个国策是非常清楚的，它不仅针对共产党政权，而是针对一切独裁政体。希特勒是独裁，斯大林也是独裁，民主的美国援助独裁的苏联打败了独裁的德国。德、意、日是扩张性的法西斯专制政权，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联合起来消灭了德、意、日法西斯政权，但反法西斯阵线内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并不可调合，所以二战一结束，美、苏矛盾就成了主要的矛盾，即世界民主阵营与专制阵营（以共产党为代表）之间的矛盾。

而法西斯阵营内的西班牙佛朗哥并不能因为他信仰法西斯主义，民主阵营就可以去进攻它，这就是民主理念制定的国际法。美国反共，因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共产党则要消灭私有制，但美国并不会向苏联扔原子弹，如果原子弹首先在希特勒或东条英机手上，他就一定会乱扔，甚至在斯大林手上，他也会扔，这就是有没有民主理念问题。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的独裁，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还满嘴的华盛顿、林肯、杰佛逊，表现得比蒋介石要自由、民主、平等得多，而蒋介石专制政权内部的贪污腐化，已引起了美

国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极大厌恶，并且赞扬延安的廉洁。

美国后来支持蒋介石，主要是因为怕共产党，但并不是死心踏地的支持。国、共打了一年之后，美国人已经看出来蒋介石不行，所以就停止了支持。解放军过长江，如果美国人真要挡，是挡得住的。美国的海、空力量完全有能力把解放军的攻势停止在长江，造成南、北中国对峙之局，为什么美国不这样办呢？就是美国认为完全可以跟毛泽东打交道。解放军过了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就等着和周恩来握手，他们都是老朋友，但毛泽东就不让周恩来去南京，这是毛泽东一个战略错误决策。

战争时期，毛泽东没犯过战略错误，东北战场指挥林彪「坚守四平」、「把四平变成马德里」之类的事，也算不上什么战略错误，而且林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没按毛的指示办，也没造成多大的损失。1949 年没跟美国大使握手，可就是重大战略错误，影响了二十多年，带给中国巨大的损害。中国话讲：「物极必反」，刚胜利就开始犯大错，如果 1949 年不拒绝跟美国人握手，1950 年肯定不会卷入朝鲜战争，美国人 1949 年在长江不阻挡共产党过江，1950 年怎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从朝鲜打回来？这种担心，是因为毛泽东根本不懂美国的建国民主理念。

美国人对斯大林不扔原子弹，怎么会对毛泽东扔原子弹？民主的美国对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的政策，完全不是剥夺战败国，而是通过输出民主理念，跟着大批优惠经援，从根本上摧毁法西斯独裁政权发动战争的理念，并迅速恢复了德国日本的经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民主理念的奇迹。这两个战争的根源已被彻底消灭，而且根本不可能再死灰复燃。法西斯的基础是愚昧和贫穷。资产阶级现代民主理念发源于欧洲，首先在美国结果，随着二战的胜利，现代民主理念在欧洲和日本又取得了硕果，成为人类的灯塔。

但美国在中东一直违反民主理念，偏袒以色列，所以孕育出了恐怖主义。现代民主理念在印度和东南亚取得了部分成功；黑非洲除了南非，均一筹莫展。其实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民主阵营与专制阵营之间的矛盾。凡走上现代民主之路的国家，就是找到调节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机制，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就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共同富裕；凡是坚持独裁，或一党专政，或

日人民民主专政，不管叫什么，凡是坚持独裁，一定垮台，下一个垮台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独裁。

毛泽东抗日胜利后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的，但没有实行；打败蒋介石后《论人民民主专政》则是错的，却实实在在地实行了，所以进了北京，登上天安门的毛泽东，开宗明义就违背人民的利益，犯了两大错：一个是对内坚持专政，用毛泽东的专政代替蒋介石的专政，就是封建皇朝的轮替；一个是对外拒绝与现代民主理念的龙头老大美国握手。这两条对内对外的主轴，主宰了毛泽东二十七年的北京生涯，人民吃尽了苦头，说尽了大话，毛泽东则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

没有民主机制，没人能帮助他改正错误，也没人能推翻他，所以大家都盼着自然规律早点送他走。一个人到了老百姓都盼他早点死，多没意思；想想湖南山沟里一介书生，带着几千大刀长矛的农民落草为寇，二十二年千军万马打进北京，何等风光，坐上金銮殿，有福不会享，天天折腾，最后折腾的成了孤家寡人，开国皇帝的悲哀。

我研究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让周恩来去南京跟司徒雷登握手，不管毛的独裁心结有多浓，但这位封建主义的大师总不至于连「以夷制夷」都不懂。我知道毛泽东自始至终不喜欢斯大林，毛跟斯大林拥抱，不是因为毛喜欢斯大林，而是因为毛泽东喜欢专制独裁。毛革命时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号，但真心惧怕自由、民主、平等。毛从马克思那儿拾来只言片语，只是为了唬住土八路；毛根本不懂马克思，马克思也根本没想到他的理论会应用于中国。

今天，马克思理论已经破产，资产阶级已经找到调合劳资矛盾的办法，并且行之有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已经大有改变。1949年，毛的新政权对外游走于苏、美之间，并不影响对内独裁专制；和美国握手，对斯大林也是个牵制，也利于台湾问题解决。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美国可能已抛弃蒋介石；而如果毛泽东和美国有条热线，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跟美国人打了一仗后，毛觉得还需要一条通话的管道，于是在华沙搞了一个中美大使级谈判。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美国人也主动跟周恩来握手，周遵毛泽东指示不接招，一直到勃列日涅夫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美国人秘报中共后，毛

泽东才想起来要和美国修好，「以夷制夷」，整整和美国人绝交二十二年。现在回过头来看，1949 年就跟美国人握手，显然比 1971 年才握主动得多。毛泽东怎么会在对美关系上犯如此大的战略错误？

从理论上找不到根据，或许只能从毛泽东的性格上找些理由，属猜测。毛泽东有时候非常感情用事，父亲在福建养病时曾跟我讲过，五十年代湖南省一个公安厅长，有点错，也坐了监狱，有一天毛泽东突然跟父亲说，此人该杀。父亲听后非常惊讶，因为根据父亲掌握的材料，离「该杀」还远着呢！于是静等毛泽东说说为什么「该杀」，却没下文了，也不好问，皇帝说该杀，你还要问为什么？父亲说，估计是毛泽东听了家乡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但谁也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此人是杀了，在毛死后也平了反，但还是没人知道为什么毛泽东要杀这个人。

专制就是没有民主讨论的空间，什么事都一样，外交关系几乎就是毛的私事，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拒绝跟美国人握手？为什么一头栽入斯大林的怀抱？这样的外交政策对中国有什么利？对毛有什么利？毛泽东表面说的一些理由，根本不成理由。

我小的时候，说起美国，就像说起魔鬼，后来开放了，我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多，才明白，美国虽然什么坏的东西都有，但毛泽东所惧怕的，是美国价值的主流：民主理念、自由、民主、平等，怕人民醒觉，埋葬专制独裁。毛泽东当年拒绝跟美国人握手，恐怕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惧怕超出人们的想象。中国的农民革命，从来打着平等的旗号，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到毛泽东，多少热血青年投奔延安，都是怀着自由、平等的理想，结果打出了一个独裁政权，用毛泽东的独裁代替了蒋介石的独裁。法西斯战败国德、意、日，则被美国改造成民主世界的成员。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代，所以在我们孩时，天天就听毛泽东说，美国人打回来怎么办？完全是毛泽东的梦幻。

腐败的满清皇朝，让英、日、俄等帝国主义从海上和陆上打了进来，割地赔款，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毛泽东这一代英雄豪杰也都是刻骨铭心，这就是毛反帝农民革命的背景。毛进了北京，仍采取闭关自守的落后愚昧的外交政策，虽然阻了中国的发展，但却守住了，不被侵占，这不是毛泽东有什么高明，是

世界形势根本变化了，攻城略地式的帝国主义已经消亡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美、欧、日形成了现代民主阵营；美国并充当了世界警察的角色，这个角色虽然离尽善尽美还远，但美国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民主、自由、平等。

只要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美国首先掌握原子弹，而是任何其它的独裁国家，世界会是什么样？！可以相信，美国确实不以掠夺为立国之本。欧洲移民曾经屠杀印地安人，和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同属种族灭绝的罪行。但美国人检讨了自己的罪行，并经过一场内战奠定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立国理念，由此找到了化解劳资矛盾的方法，并没有使用马克思描述的阶级斗争。 1

毛泽东从马克思处捡来只言片语，拼命喊阶级斗争，制造各种矛盾和仇恨，甚至在党内也制造出各种莫明其妙的反党集团，搞得国无宁日，其实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毛泽东搞的这一套，和马克思毫无关系，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列宁喊马克思是偷梁换柱：毛泽东喊马克思也是偷梁换柱。我在上大学时，已发现这个问题，只不过还没有答案。在监狱里，我就想清楚答案了。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的一个特例；虽然是一个奇迹，但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泽东则不这么认为，进了北京之后，就要「农村包围城市」，进行世界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其实毛年轻时虽然鼓励其他青年留学，并为留学生筹款。但毛自己却不离开中国，所以毛泽东不像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毅、李富春等人，对资本主义无任何感性认识。

毛说：他自己对中国的事情还没研究透。果然，有一样就没一样，毛泽东对中国的事情研究得比谁都透，不仅读万卷书，能赋诗填词，而且无师自通，文武韬略，出类拔萃。可惜现代文明，一知半解，也不知道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一定就变成帝国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比你毛泽东的一党专政进步，战后不断发展，大显优越性，独裁怎么可能埋葬自由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思想出不了国门，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试了一下，都以惨败告终；就是在中国国内，也已不存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条件了。毛不是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吗？毛死后，江青给抓进监狱，华国锋被赶下台，也不见有人造反。中国人已不再相信毛泽东，早已把农村包围城市忘掉了。

以世界革命埋葬资本主义是毛泽东的梦想，毛不惜耗费国力投入他这个梦

想。弄得老百姓没东西吃，特别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饿死人，历朝历代都是坏皇帝的标志。我们家的生活算最好的了，在困难时期也吃不大饱。饿死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把国民生产剩余价值，不是拿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世界革命，中国老百姓口里的粮食都被用来援越、援阿、援亚、非、拉，这些到毛泽东这儿来讨吃讨喝的，实在没有个正经东西。

饿死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一大二公的热情，毫无理性！如果说毛不懂现代民主理念，不懂炼钢公式，还有点道理可寻，那么毛不懂农民是自私的，就有点不可思议。毛自己是农民出身，农民只有私有劳动的积极性，要改造农民两千年的积习，如果不用三、五百年，起码也要三、五十年，总不是三、五年的事吧！可是农民刚刚分到田地，互助组没搞三年，毛就急不可待的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结果社越来越大，粮食越来越少。

毛泽东当政的二十七年，农业政策上就斗了二十七年，一头是毛的空想社会主义，一头是邓子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比较务实的「三自一包」派，这帮人知道，只有三自一包才有饭吃；但跟毛泽东又说不通，所以只好在实际工作中偷偷摸摸地搞一点「右倾」的、实用主义的东西，毛称其为修正主义：直到毛死，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农村政策，无非是回到邓子恢当年的三自一包，即依靠农民的私有制积极性生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中国就有东西吃了。回想这一经历，饿死整死几千万、几百万，根源不正是来自于毛泽东一系列理论和战略的错误吗？

11、代毛行使生杀大权

父亲当了十年公安部长，这是毛泽东建立新政权、消灭蒋介石旧政权的十年。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手上有两把刀，一把是解放军，一把是公安。现在仗打完了，解放军这把刀收起来了，经常用的是公安这把刀。

建国的头十年，毛泽东相当大的精力是亲自领导公安工作，每年全国公安会议，毛都出席接见与会人员，以示重视。这十年公安工作的成绩，是彻底摧垮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的根基，主要是靠人民群众的拥护，打天下、坐天下，战略上都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战术上才是「兵不厌诈」。国民党里并不是没有能干的人，军统、中统内都有很多精明强干的人，但斗不过共产党，就是因为国民党失人心，共产党得人心，这是二十世纪中叶，国共斗争成败的

个基本背景。无论谁骂毛泽东、评毛泽东、无意或有意，不尊重一点，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论。

父亲做十年公安部长，毛泽东对公安工作有非常多、非常具体的批示（都在档案馆，有的已经陆续公开，引起关注）。我坐牢时，林彪的爪牙把我关在死牢里，跟死刑犯隔壁，恐吓我，我则一点不害怕，我说：「不要说我不是反革命，就算我是反革命，你也不敢杀我，毛泽东还活着啊！」林彪这帮爪牙气得七窍生烟，还是拿我没办法。因为我知道毛有指示：内部肃反一个不杀。江青要杀王光美、周恩来都签了字，送到毛泽东那儿，毛还是批了个：「刀下留人」，这说明毛对「内部肃反一个不杀」还是相当认真的。不错，刘少奇、贺龙、潘汉年、傅连璋这些人文革时都整死了，和杀也差不多。但毛泽东这个指示，还是镇着公检法部门各种各样的小鬼，也没有敢随便大开杀戒！

在和苏联人关系最火热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批示：我们的公安工作不要苏联人参与，我们也不学 KGB（克格勃）；所以公安工作几乎是唯一苏联人没有插手的部门。KGB 有一套神乎其神的情报，保卫手段，毛明确指示：情报工作不搞「美人计」，有专门训练美女间谍的学校，苏联人称为「燕子」。我还看过一个叛逃后的「燕子」写的一本书，讲述她们如何受训。父亲、母亲都访问过苏联，苏联人也向我们介绍「燕子」学校的情况，但我们不搞（现在搞不搞我就知道了），毛泽东管公安工作，就是管的这么具体。

公安工作，一个职责就像包公一样，代皇帝行使生杀大权，毛泽东提倡看包公的戏（文革中江青说这都是封、资、修，毛泽东却不吭气），毛经常说：公安工作不能放过坏人，也不能冤枉好人。现在回过头来看，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坏人、好人的标准毫无道理的在变，特别是革命成功之后，实在有点背信弃义的味道，抗战时的开明士绅，土改时怎么就成了坏人？那么多帮助过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右派坏人，打入另册，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剥夺人身自由二十年！毛泽东不大讲法律，宪法对毛无所谓，最基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论，什么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毛泽东那儿一钱不值。

毛泽东和中共只讲「政策」，什么是政策？政策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毛自己讲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前的十七年，虽然很多事已经是

违法，如反右、庐山会议反彭德怀，但公安工作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刑讯，不许逼、供，信，什么事只有口供不算数，要有人证、物证，这些基本的条条框框，很多也是毛泽东亲自参与规定的。

关于杀人的问题，由于我的父亲是代毛泽东行使生杀大权，所以我如果回避这个问题，读者就不可能相信我，而我可以告诉读者，我从来也没想过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我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理直气壮，你同意不同意我都尊重你，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讲道理，好好想一想，分层次想一想，你多少会同意我一点，或者去投票民调一下，我相信同意的多（如果我错了，我会检讨）。

中华文化最恶劣的一条就是：「你得罪了我，我就永远不同意你；你有恩于我，我就永远同意你。」读者可以看到：罗猛猛是异类，跳出了中华文化封建的束缚（圈圈），愿意给读者一个民主的未来。

毛泽东有恩于我、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毛泽东的贴身大将，又被毛泽东整的妻离子散，几乎没了命，平反之后，也是至死不见，我却没有以个人恩怨评毛泽东。

邓小平则只有恩于我、我的家庭，几乎无怨。邓小平把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是打学生，和罗家无关，我为什么要站在学生一边？学生的很多东西我并不同意，我只是尊重学生的发言权，我认为学生和邓小平是平等的，邓小平无权用坦克把学生赶出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是国际公约明文规定的战争罪行。十三亿中国人民，有多少知道这一公约？赞同、尊重这一公约？三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多少战士知道、赞同、尊重这一公约？中国的现状就是：有良心的人就是痛苦的人；没良心的人就是醉生梦死，我自认为自己是良心的人。

父亲代毛泽东行使生杀大权十年，镇反、肃反杀了很多反革命（按：毛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称，1950至1952三年杀了70万，其后三年杀了约8万。毛亲自撰批的指示142件。有案可查）。后人讨论这个问题，要有根有据，不偏不倚，头脑清晰，不容易。

我认为首先要谈中华文化，两千年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哪一朝不杀前朝的人？这个文化不是共产党新中国的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中华民族只有走出封建主义，才能改变新朝杀旧朝的文化。

其次说国共兄弟之争，是国民党先杀过来，才有共产党后杀过去，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国民党破坏的，这一基本事实，蒋介石都不否认（现在却有不少混淆视听的说法）。如果杀过来杀过去是中华民族的悲哀，那么祸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再其次才说到具体个案，那就要把档案拿出来，一条条说。杀错的肯定有，但究竟有多少？需要调查落实。也不能只看到镇反、肃反后，整个社会是安定的，没有发生像东欧那样的社会动荡。

【附录】外国人难懂中国人一例

民主政治训练出的知识分子，很难懂封建主义的中国。我看过不少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著作，虽然可以看出他们是很认真，花了很多功夫，但总的感觉是东拼西凑，东拉西扯，错谬百出；他们很难把材料融会贯通，他们可能掌握了一些材料与事实，但却掌握不住大局，也搞不清发生的原因。我想举例说明我的观点（我读的都是中译本）。

美国很有名的一位记者 Harrison E.Salisbury，中译沙兹伯里（1908-1993），写过一本书「The New Emperors」（按：台译全名《新皇朝：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权力游戏》。沙兹伯里是美国苏联问题权威之一，1959年起致力于中国研究，1989年天安门事件在北京目睹始末）。

首先说封面，封面是一张照片的剪影，六个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还有一个人在邓小平的后面，恐怕没人认识，这个人是邓小平的卫士。一般在这种场合下，卫士不应该跟得这么近，但照片是1960年军委扩大会，邓小平刚刚摔断腿复原，读者可以看到邓小平拿着一根手杖，按着Salisbury的主题，他肯定不应该把邓小平的卫士放在封面上，就是因为Salisbury根本不知道这是谁。

其实我还是很佩服这个美国记者的，在国内我就听说有一个美国记者沿长征路线走了一遍。他访问过的人，有李锐。我在前面说过了，李锐对毛泽东的了解很有限。伍修权上将，他是周恩来、王明路线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对长征前后那段时间，毛泽东多么痛恨共产国际有深刻了解，所以有的人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靠共产国际，也就是俄国给的银元，实在是胡

说八道。

但这种胡说八道在台湾、香港、海外，很多地方就是有市场。胡乔木是真正的毛泽东的大秘书。胡乔木和陈伯达是负责出毛选的秀才。师哲和阎明复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他们两个人知道毛泽东是多么痛恨俄国人。毛泽东对斯大林从来没有好感，斯大林也从来看不起毛泽东；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但是由于毛的独裁本质和斯大林的独裁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毛不可能加入民主阵营，只有加入独裁阵营。赫鲁晓夫的民主改革虽然激怒了毛，所以就有中、苏分裂。今天邓小平的一套和赫鲁晓夫的完全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却非常受用。

其他 Salisbury 访问过的人，但是这些人跟他说了多少，特别是他理解多少，就很有限了。Salisbury 很是用功，如朝鲜战争，几月几日开了什么会，他都查到了。我也写过朝鲜战争，这些细节我却没做功夫，但他抓不到重点。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不在打不打，而在估计美国人会不会过鸭绿江。毛泽东估计美国人不会停下来，美国飞机已经炸了东北，与其你打过来，不如我打过去。林彪则估计美国人不一定会过江。双方都有道理，但都是估计。现在美国文件解密了，证明毛泽东的估计是美军战场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的想法。林彪的估计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命令，这证明还是林彪对了，毛泽东也没错，所以我的结论是朝鲜战争根本是一场「误会」。读者看一下我在前边对朝战的描述分析，对比一下 Salisbury 的描述就明白为什么我总说：「外国人很难懂中国的事」。至于 Salisbury 写的那些「道」啊，「佛」啊之类的事，哪朝哪代都有闲人编这些故事，外国人听起来新鲜，我们则不认为任何严肃的政治分析著作需提及这些。

我看完 Salisbury 的书，总的印象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错谬百出，再随手拣几个例子。

第七章，对刘伯承、邓小平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完全错误。无耻文人都吹邓小平，贬刘伯承，是因为邓在当权。如果是刘当权，可能就变成了吹刘贬邓了，Salisbury 也完全入了此圈套。其实，打仗靠刘伯承，邓小平只是跟着「起哄」，邓小平的作用就是团结，不干涉刘伯承、党内、军内，人尽皆知，无耻文人以谬传讹，外国人只有上当，什么邓小平还研究国军营、连级军官的资料，如果真有其事，邓小平也就没用了，不知 Salisbury 这一段是吹，还是贬。总之，

懂一点军事的人都会笑掉大牙。

说贺龙是土匪出身，蒋介石是什么出身？贺龙在南昌起义时，已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毛泽东拉大旗，上井冈，也是「土匪」，蒋介石喊共产党是「共匪」，共产党喊蒋介石是「蒋匪」，人尽皆知，我就不明白你说贺龙土匪出身，是什么意思？！外国人看你这本书，更不懂中国了。

十九章。题目不错，但 Salisbury 对文革的起因和毛泽东与田家英的关系的描述，根本不着边际，时间也不对，颠三倒四。1958 年，毛泽东让田家英去四川农村调查，根本不是因为灾荒，而是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头脑正发热的时候。十五年超英赶美，1958 年、1959 年都是丰收。1959 年丰产不丰收，才导致 1960 年的饥荒。文革更是毛泽东处心积虑，策划已久，精心部署的一场阴谋。Salisbury 根本没掌握住整个画面，中国人看了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外国人更不明白中国发生的事。

再随手翻开这本中译本，随处可见几个小错和大问题。比如，书中说：邓小平最后一次被打倒后，叶剑英把邓小平送上军机，送到广州许世友处保护起来。说这是小错，因为根本没有这回事。邓小平从再次被打倒，到毛泽东去世，到复出，一直住在宽街二号。说这是大问题，因为这种「小错」把当时中国的大形势扭曲了。中国皇帝驾崩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北京城一片诡秘妖气；邓小平是皇帝的「钦犯」，叶剑英哪有胆把邓小平送去广州。叶剑英根本没有发言权，当时就是汪东兴管，许世友也是只听毛泽东的，怎么可能「保护」邓小平。所以一个「小错」把整个大形势颠倒了，大人物的作用和之间的关系，也搞乱了。什么人告诉 Salisbury 这个「小错」呢？肯定是些吹牛拍马、狗屁不通的无耻文人。但 Salisbury 却无能力把这些人灌输给他的错谬剔除掉，又用他的书去传讹，做了别人的工具，因为他不了解中国政治架构内部的事。

我非常敬佩作者以这么大的热情，企图去了解中国。我只是想把事实告诉大家，这恰恰是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鸿沟，要跨越极为困难，正如让我去描述「水门事件」或美国的伊拉克政策，虽然我的观点是明确的，同意不同意，但我肯定写不好，因为我很难掌握全面和深入的状况。

至于书中提及的李锐说毛泽东并无通读廿四史，我不知道李锐的话是根据

什么？李锐知不知道毛泽东读了哪些书？他去过毛的书斋吗？我真心同情李锐老先生的遭遇，真心拥护他的民主思想，但说他是和毛有很多接触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我则不认同。（他在胡耀邦时期当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也没当好，所以才有现在这帮江、李、朱、胡、温烂仔当大任，他参与提拔的人，现在反过来打压他，拒绝政治改革。）

前面说到政治架构，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外国人很难学懂。中国是封建人治社会，政治架构最大特点就是随皇帝的意，并没有固定模式，某个官位，有没有，无所谓，某个人在某个官位上，有没有权，也不一定。刚建国时，毛泽东除了党的主席、军队的主席，也当了国家的主席，外国就认为是国家元首。后来毛把这个国家主席让给了刘少奇，这就种下了祸根。中国自古一山不能有二虎，当毛泽东对内、对外到处挂在口边「现在有两个主席」时，刘少奇还没听出来他的末日已到。毛泽东把刘少奇搞成叛徒、内奸、工贼后，国家主席这个位子也臭了。中国可以多少年没有国家主席，民主政治如何解读中国这一特色？

国防部长这个官位，彭德怀当的时候，军队常务大权在握，林彪当了之后，六年可以不上班，常务交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只是林彪为了让毛泽东放心（这放心两个字，如果教外国人，就要教半天）。林彪整垮罗瑞卿之后，林彪这个国防部长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林彪垮台后，国防部长这个官位也臭了，中国又多少年没国防部长。到了邓小平当皇帝，军队常务又交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手上，这是邓小平和汪东兴斗争的结果，前也讲过了。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杨尚昆兄弟倒台，军队常务在军委秘书长手上。杨尚昆兄弟倒台后，军委秘书长这个位子又臭了，一直到现在，这个秘书长的「官位」都没有了。这种架构的随意性，在民主国家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多少年没元首，没国防部长，在中国，都无所谓，机器照转。

随着这种人治政治架构的随意性，伴生的就是各种中国人说话的随意性。全中国谎话铺天盖地，造谣如同儿戏，从毛泽东、林彪、邓小平、杨尚昆到街上的小摊、小贩，无诚实可言；从中央电台、人民日报到泛滥成灾的各种书报报杂志，谎话流成河，谣言汇成海，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马列党史学院、专家、教授，到街上的瘪三，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说谎大军，在中国政治生

活中兴风作浪。Salisbury 在中国转一圈，甚至住上几年，他收集的材料能有多少真，多少假？他也无能力搞清，像前面也提到的叶剑英送邓小平去广州的谣，造谣者看到 Salisbury 的书肯定沾沾自喜：你看，我连 Salisbury 都骗了！

将来编一本《中国谎言大全》，封面上印上林彪一句实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把近百年来中国的谎话，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李登辉、陈水扁到阿猫、阿狗都编进去。有一天，我们全民族每一个人都感觉说谎言羞了，我们这个民族就进步了。我们这些经历过谎言狂风暴雨式洗礼的人，对谎言稍有鉴别能力，但仍不可掉以轻心。对讨论严肃话题，又不肯真名实姓讲清自己背景的，都要大打折扣；当然更可怕的是外国人遇上官方职业骗子接待，这些人就会扭曲了中国的大形势。

第四章 见证邓小平及其家人

赫鲁晓夫是对共产主义修修补补，邓小平则是在中国埋葬了共产主义，但坚持一党专政，搞官僚资本主义并和国际自由资本相勾结，剥削中国人民，谋共产党一党之私利。搞邓小平这一套，何须从江西打到延安，又从延安打到北京？跟蒋介石干，不比跟邓小平干好得多？

1、「牌桌上的话都不算数」

我童年的记忆中，对邓小平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现在想想，第一个印象还是关于打麻将。刚进城，中央每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开的次数多（1956 年以后，由于毛泽东喜欢游泳，改在北戴河的次数多）。每次中央开会，爸爸就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四川的李井泉到家里来打麻将。由于麻将桌一般要有五个人才可以轮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胡耀邦。胡当时是共青团书记，父亲让我们称他「青年领袖」。胡耀邦解放战争时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飏）兵团（十九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十九兵团入川后，胡在爸爸的家乡南充当地委书记。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这个麻将局，就跟爸爸说：「那么多人去你家打麻将不方便，咱们在北京饭店开个房间打吧。」（那时中央开会，各地来的人都住北京饭店。）于是，爸爸的牌桌就变成了邓小平的牌桌。

其实邓小平是又想打牌，又不想去我们家，这是由于一个礼仪上的习惯，一般上级（官大的）不去下级（官小的）的家。毛从来没去过我们家，刘、周、朱、陈、林、邓，也只有周恩来去过我们北京的家一次。元帅们则不太严格，贺龙、聂荣臻、罗荣桓都到家里来吃过饭。

牌桌开到会场后，妈妈有时也带我们去看一下。房子黑黑的，只有牌桌上一盏灯，大家都在聚精会神打牌，我们小孩也轻手轻脚。邓小平有一句名言：「牌桌上说的话都不算数。」其实，他们很少说话，偶尔说几句，我们小孩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除了爸爸，所有人都抽烟，满房子乌烟瘴气，妈妈最不喜欢，尤其 1956 年后，会议到了北戴河，妈妈总抱怨爸爸：「空气这么好，不游泳，躲在房子里打麻将。」爸爸总是不吭气，我们小孩则被禁止打麻将，所以后来我到了香港，说不会打麻将，我太太大吃一惊，说香港的小学生都会打，你却不会？我是真的不会，又重头学起，根本跟不上香港的速度，而且直到今天，还是算不过来，尤其是可以胡三、四张时，我只看到一、二张。

邓小平主持牌桌后，由于胡耀邦技术不高，而且中央开会，他这个团中央书记也不一定次次到，所以胡就逐渐出局了。尤其 1956 年以后到北戴河打牌，胡就没来过了。

我在打牌的地方只听邓小平讲过一个故事，即关于邓自己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他说：在法国，要入党，别人说：「你要入党，先停止打牌，因为打牌是旧社会的坏习惯。」邓说：「好吧，不打了，等入了党再打。」我们小孩听后，都大吃一惊，我心想：唉哟！我们的总书记就这么入党的，但也不敢说，妈妈则赶紧说：「你这个伯伯讲什么呀，别把孩子教坏了。」我看邓根本不以为然。

1959 年，父亲进入书记处，当了副总理，卸下公安部长，当了总参谋长，我们家和邓家的来往就越来越多了。父亲离开公安部，向中央建议第一副部长徐子荣当部长，邓则向中央建议由原刘邓大军（三野）陈（赓）谢兵团的谢富治来当公安部长，当时谢在云南当第一书记！父亲过去与谢富治并不熟，为此父亲专门和母亲一起去了一趟云南，算是认识认识谢富治。回来后，父亲也附了邓小平的议，于是谢富治就当了公安部长。

此事文革后邓做过自我批评，邓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是我提议的，这

个人我看错了。」父亲很尊重邓，妈妈和卓琳也谈得来，两家的孩子也交往得很密切。1960年冬，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第一年，中央在广州开会，开会完，毛泽东说要做调查研究。邓对陶铸说：「我们去海南转一圈吧。」于是邓、彭真、陶铸几个人安排去海南考察。当时开会，都是一家一家住在广州，小孩们是寒假，我没去过海南，于是我和我二姐就想跟他们去。妈妈把我们两个托给卓琳和曾志（陶铸夫人），卓琳说：「你放心，这么一大帮孩子我全管了。」

这支队伍，浩浩荡荡，一、二百人，从广州六架伊尔-14飞机飞海口，然后乘汽车环岛一周，车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路上邓很少和孩子们说话，只有彭真、陶铸、卓琳、曾志每天吃饭都到小孩的桌上来看看。地方上招待最好的蛇肉、果子狸，很多小孩不敢吃。彭真说：「这是最好吃的，你们不要迷信啊。」我也是那时第一次吃蛇肉。这是我跟邓小平的第一次出巡。1959年夏天，中央开庐山会议，小孩们还没放假，大人们都去了庐山。放假后，卓琳、张洁清（彭真夫人）把北京的一大群孩子带去北戴河，两节车厢，车到滦县，大水冲垮了滦河大桥，进退不得，当时又没有手提电话，大桥一垮，电话也不通了，随车的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后来当了刘少奇的卫士长，文革时被整肃，后反戈一击；刘少奇平反后，由于这反戈一击，又被整肃。文革后，我只见过他一次，之后再没见过。）怕北京担心不知道这帮人的下落，赶紧找一个卫士泅水过河到对岸，跟北京通电话报平安。

那时县里也没什么招待所，只好把县委办公楼临时腾空，架上床。卓琳、张洁清两人两个小房间；其他人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几个人，十几个人分开生活，在滦县困了三天，卓、张两个阿姨还带着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上工地慰问抗洪架桥的工人、农民，那时真是没有什么官架子，人民也很亲，也不需要什么警卫。桥架好，我们就到了北戴河。那段时间，从进城到文革，总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比较随和，比较朴素。

文革之前，邓小平不大说话，毛泽东要干什么就干什么！1949年打完仗，邓小平在四川，和刘伯承、贺龙同在西南军政公署。1953年后才被毛泽东召入京，和高岗（东北）、陈毅（华东）、习仲勋（西北）一起。毛泽东在提议邓小平任总书记时说：「邓比较公平。」按党内土包子和洋包子的界线，邓小平实际属于洋包子。邓小平出身大地主，在法国留过学，在法留学时已与周恩来、

李富春、陈毅这些在中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和我的父亲罗瑞卿却没有怎么共事过。

在中央苏区，周恩来、王明整毛泽东时，搞了个「邓、毛、谢、古」，实际是整毛泽东，还把邓小平放在前边。经此一整，邓小平因祸得福，与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即和土包子结了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厚爱有加，一路提携，打仗靠刘伯承，毛把邓派给刘当政委。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刘邓大军，邓可分得一半功劳。文革后，邓小平当了皇帝，无耻文人拍电影，把主角刘伯承当配角，把配角邓小平当主角，引起刘家后人和稍尊重一点历史的人极大不满。所以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邓临死前出版她那捧邓小平的书时，请不到刘家的人出席捧场，当年这在北京也是大新闻。

从我童年时听邓小平说：「入了党再打牌」，到我刚从监狱出来听中央文件传达邓小平复出时对毛泽东说：「永不翻案」，再到毛死后，邓小平再复出时对华国锋说：「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读者可以看到，邓小平说的话什么时候算数，什么时候不算数，是没人知道的。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只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说不说谎论英雄，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2、上海会议「死无对证」

1960年开始的饥荒，是谁也没料到的，由于大跃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赛说大话，实情无法上达，直到饿死人，才惊动中央，派人下去一看，情况严重得令人难以想象。没东西吃了，再吹、再拍也没力气了。前十年，毛泽东一言九鼎，谁也不敢反对；因为毛的威信是战争中树立起来的。跟着毛泽东、井冈山、遵义、延安、小米加步枪，就打败了三百万美式装备，所以毛泽东说大跃进，谁敢说不跃进？！但这次却是没跃成，反倒饿死了人。历朝历代饿死人都是最坏的事，毛泽东没办法，只好把「吃饭」的事（经济工作）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自己退居「二线」。

但毛泽东从来不服输，要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坚持反帝、反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知道，只有「三自一包」才有饭吃，但跟毛泽东又说不通，所以只好在实际工作中搞些「右倾」的政策，多给农民点自留地，开放点利伯维尔场。总之，就是调动农民私有的积极性。这段时间，林彪吹捧毛泽东一浪高过一浪；周恩来亲自导演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经

济工作经过三年调整，也走上了正轨。毛泽东是干什么事，先谈「主义」；邓小平则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先要有饭吃。

这段时间，党内虽然有意见，但无人挑战毛泽东的地位，刘少奇憋不住，说了一句重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邓小平则非常低调。1964 年开始，毛泽东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现在看，当然知道毛是在准备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发动前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上海会议，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告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我的父亲。

上海会议在 1965 年 11 月，称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前，父亲陪毛泽东会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周恩来也在，见完外宾，毛对父亲说：「林彪在苏州，你代我去看看。」从进了北京，林彪就是谁也不见。十年公安部长时，毛也经常让父亲「代」他去看看林彪。父亲到军队后，更是如此，周也说：「代问林总好。」于是父亲从上海飞苏州，叶群打电话给妈妈，说：「你也来，他们两个男人硬碰硬，咱们两个在，可以缓和缓和。」这时，父亲已明显地感觉到林彪在找茬，无事生非；比如，你去看他吧，他说不用事先通报，否则等得心急；你真的不通报就去，他又说你突然袭击。总之，不知该怎么好。但父亲的错误是没有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是忍辱负重，总想团结是大局，而且不想把麻烦交给毛、周。真实的情况是林彪知道毛泽东不放心他，所以毛请林出任国防部长。林点父亲为总参谋长，因为林认为，只有点罗瑞卿，毛才放心。林彪还认为，罗是一军团的，一直也是跟着林彪的，所以想拉父亲入伙，像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那样。五、六年的时间，林彪称病不出，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军队的事情就是父亲请示中央，具体事就是父亲负责。

拉父亲入伙，林彪试探了好几次，父亲根本没反应，最后一次是 1965 年 5 月，刘亚楼肝癌后期，无多时日，刘是林彪的四野参谋长，也是父亲的好朋友。父亲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当时林彪也在上海，叶群是天天去医院，到了医院就和刘亚楼单独密谈，把刘亚楼的老婆翟云英也赶走。父亲去看刘亚楼，正好是五一假期，我也跟着去了上海。后来父亲告诉我，刘亚楼说：「林总很焦心。大罗：（指罗荣恒元帅，四野的政委）跑了，现在小罗（指父亲）也要跑。」

父亲对刘亚楼说：「亚楼啊！我们都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们往哪儿跑啊？」（按：跑即不跟着我林彪了。）

这个话刘亚楼当然是传回去了，所以林彪就下了决心必须除掉父亲。林彪事先跟广东的陶铸（当时的广东第一书记，原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打了招呼，再有就是跟杨成武（第一副总长）、萧华（总政主任）、刘志坚（总政副主任）、谢富治（公安部长）打了招呼，所以才有杨、萧、刘、谢在上海会议上四篇声讨罗瑞卿的发言。这是后话，再说父亲从上海去苏州看林彪，气氛却出奇的好。林彪仍然是没什么话，只是说：「我身体不好，军队的事你去办就是了，我放心。」父亲说：「主席、总理叫我问候你，从你这儿我就去云南中越边境看地形。」

出来时，叶群送出来，在院子里剪了一大把花拿给母亲，说的话要多甜有多甜。「总长辛苦啊！你要好好照顾啊！」父母亲后来都说，他们感觉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化了，没想到这是林彪决定要吃人了。父亲前脚走，去昆明，毛那时从上海到了杭州；林彪后脚就派叶群去杭州拿着林彪的条子，找毛泽东谈了七、八个小时。叶群一个人说，毛一声不吭地听，旁边一个机要秘书徐业夫做记录。这个记录，据说按毛的指示，密封了。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所有当事人都不在了，妈妈问胡耀邦要这个记录，妈妈对胡耀邦说：「现在人也都不在了，我要看看当时叶群跟毛泽东说了些什么。」胡耀邦就打哈哈，说：「那个东西我也没看过，看它干什么，还不是胡说八道。」妈妈说：「胡说八道主席就会信啊？！」胡说：「要说主席就信了，也不一定。」妈妈还是要看，胡就只好敷衍，说：「我让他们找找，谁知道这些东西现在在哪儿放着？」直到胡下台，也没找着，当然我们也知道，胡并没有去找。真要找，还是找得着的。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档案，据说都放在西山的一个山洞里，等开封的那一天吧，还有很多东西可看呢；但真到了那天，不知道还有多少后人对这些事有兴趣了。

叶群告完了刁状，毛泽东就决定开上海会议，也非常有戏剧性。爸爸妈妈在福州养病时，讲了这个故事：爸爸去云南中越边境看地形，邓小平一行人也在云南看三线建设，于是约好在昆明会合，但爸爸看完地形到昆明时，接待的人说，邓一行前天刚去上海，说中央有会在上海开。爸爸听后觉得奇怪，「中

央什么会，怎么我没有接到通知？」于是打电话给北京留守的彭真（当时中央的人在各地走动时，北京总有一人留守），问：「中央在上海开什么会呀？」彭真说：「我也不知道。但总理有一封信明天到，到了就知道了。」

爸爸又问：「有人说是关于作战方面的会议。」彭真说：「不是，不是，作战方面的会议还会不通知你这个总长，昨天电话上，总理说是庐山性质的会。」

「庐山性质的会！」是指又有人反党了，爸爸当时想，这次又是谁？（没想到就是自己！！）第二天再打电话过去，彭真就支支吾吾了，说：「总理讲，会议分两期，你我都是第二期，过几天就通知了。」爸爸虽然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刚从上海、苏州过来，没几天，刚见过毛、周，也没听说中央要开会，而且还是「庐山性质的会」，但是父亲是一个从来不打听的人。父亲当公安部长十年，几乎是毛走到哪儿，父亲都跟着，但毛身边的事，父亲从来不打听，毛不交待，父亲从来不管警卫之外的事。汪东兴、叶子龙讲些毛身边医生、护士、警卫、秘书之间的事及江青身边的事，父亲只是听，也不传，长年习惯如此。

听彭真讲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父亲就又去看地形；但没两天，中办就通知去上海开会。空军一架专机来接，到了上海，陈丕显来接机。很奇怪，因为一般中央开会，地方的第一书记不需要接机，吴法宪也来接机，但态度也很怪。陈丕显和父母都很熟，人也很好，文革也挨了一通整；文革后到湖北当第一书记，那时父亲已经不在了。陈非请妈妈在武汉住一个冬天不可，说：「上海会议，我对不住罗总。」妈妈说：「上海会议你一句话没说，你有什么对不住？！」陈说：「我去机场接的罗总。」妈妈说：「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主席让你去接，你能不去吗？」

这是后话，当时在车上，陈说：「这次不住锦江（饭店）一个地方。」车开进一座小院，还没停稳，里边走出周恩来、邓小平，这就更怪了，没有这个礼仪。下了车，爸爸妈妈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相互问了好，周恩来说：「咱们在楼下谈，郝治平去楼上休息。」

坐下之后，周说：「此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林总向主席告了状：说罗长子手伸得太长，要逼他让贤，自己当国防部长。」

爸爸说：「有什么证据？」

周说：「叶群说，罗瑞卿去看林总，出来在走廊上看到一小猫，一脚踢开，口中大叫，让开，让开，不工作，挡什么路！」

爸爸说：「你相信有这种事，我罗瑞卿再蠢，也不会蠢到这种程度。我可以和叶群对质。」

周又说：「叶群说，你告诉刘亚楼传话，让林总休息，军队的事由你管。」

爸爸说：「我从来没对刘亚楼说过这样的话。」

爸爸又提出和叶群对质，周说：「不用了，这次只是背对背，你和他们不见面，他们说什么，你就在这儿看看简报。」爸爸：「我要说什么呢？怎么说？」周说：「你就写材料，发不发会议，主席定。」邓小平在一旁坐着，一言不发。文化大革命后听邓讲，上海会议就是叶群一个人说，林也一言不发：然后就是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刘志坚四篇发言，都是中央 1966 年「五一六通知」的附件。

开完会，刘少奇说：「不可思议。」邓小平说：「死无对证。」（指刘亚楼揭发父亲让林彪让贤，当时刘亚楼已死。）刘伯承说：「我虽然身体不好，他（罗瑞卿）还是经常来看我的。」（针对叶群说父亲不去看林彪。）陈毅说：「我虽然不管军队的事，罗瑞卿军队的文件都送我。」（针对叶群说父亲封锁林彪，不送文件。）

最后，毛泽东发言，当着林彪的面，对大会说：「罗瑞卿反你（林彪），没反我。只反对我游泳，还是对我好。有些事一下扯不清，先挂起来。」

周恩来一字一句向父亲传达了这几句话，然后说：「你写个辞呈吧。」父亲问：「都辞（指党、政、军一切职务）？」周说：「就辞总参谋长。」于是父亲写了一个辞呈，这大概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过去高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都不是辞职，而是撤职，所以父亲上海会议后仍是书记处书记、副总理。

上海会议：邓的态度很清楚，说：「死无对证」，明确不相信叶群讲刘亚楼揭发父亲要夺林彪的国防部长位子，当时刘已死，其他叶群讲了 6-7 个小时，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谢富治四个书面发言，洋洋数万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 516 通知附件），邓连理都没理。会后成立中央三人小组，负责调查林彪对罗瑞卿的指控，邓为组长，他没开过一次会，上海会议一结束，一言不发就去

了西南继续他的三线考察！

文革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说：上海会议期间，卓琳和郝治平抱头痛哭，也有其事。上海会议毛泽东、林彪定了背对背，即林、罗不见面（指控的和被控的不见面），会上谁发言说什么，由周恩来、邓小平传达。期间为了缓和气氛，也组织一对对（单个不行）不关紧要的人来看看，如李富春、陈毅、李先念、陶铸、李井泉等都来看过。有一次邓小平也带了卓琳来，周、邓和父亲在楼下谈，卓琳上楼看母亲，两人确实相对流了泪，这种事也能传得出来，说明父母亲的一举一动都在「组织」监控之中了。

3、只有邓小平想着罗瑞卿

文革从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接着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人都抓起来了，我也进了监狱；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没人管了，当时邓家有个「奶奶」，即邓小平父亲的姨太太，不是邓小平的生母。邓 1949 年入川，即把「奶奶」接到身边供养。「奶奶」有一个女儿，邓家的孩子都喊「小姑」，和我哥哥年龄差不多，我们也跟着喊「小姑」。这段时间，「奶奶」对我弟妹非常照顾；我的弟妹和邓毛、邓飞（邓飞飞，邓小平幼子邓质方）也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两个妹妹还和邓毛一起去陕北插队。

当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开国皇帝杀功臣」的时候，所有的功臣都无招架之功，更别提还手之力了，一个个任毛泽东宰割，但周恩来是想着邓的，毛泽东也念着当年中央苏区「邓、毛、谢、古」反党集团的旧情，从开始就没打算把邓往死里整，而邓则是「举重若轻，棉里藏针」，非常沉得住气，不像父亲一点冤枉都受不了。随着毛、林彪之间关系开始紧张，邓的环境急速改善，孩子们也陆续回到身边。在被打倒的高级干部中，邓是受到毛、周最优惠待遇的一个。林彪一垮台，毛泽东第一句就说：

过去有些事情我们也搞错了，比如罗瑞卿。」但周恩来不应，汪东兴更是怕得要死。

我曾问父亲：「毛都说了话了，为什么周不接着话茬就把你解放了，还让我们多坐了三年牢？」父亲却也不答我，以为浅薄之见，我想周可能心里有点愧（虽然我也认为大部份政治家不懂什么心中有愧，中外都一样），更主要的

原因，周是很实用主义，周大概认为父亲身已残，花很大力量把父亲解放出来，并帮不了周什么忙。总之，周恩来对解放罗瑞卿并不积极，但对解放邓小平则非常积极，抓住毛的每一句话，解散了邓的专案组。邓有吃有住，老婆孩子在一起，一点没受虐待，但是邓小平 1972 年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工作后，却时时挂念着罗瑞卿。

1973 年年底，父亲解除了监护，即成为自由人，不坐监了。以前小孩要去看，次次给中央打报告，中央专案组批了才能去；现在天天在一起了。1974 年初，把妈妈也从监狱里放出来，虽然什么也没有，每个月要借钱（借自己的工资）花，但总算一家团聚了。接着邓通过张爱萍传来话：「让罗给主席写报告，就说去福建治腿，其他什么也不要提，我来递。」父亲按邓小平的嘱咐写了报告，没几天毛泽东就批下来，于是父亲去了福建，当时福建第一书记是廖志高，军区司令是皮定钧，他们待父亲为上宾，情况当然比在北京好多了。

由于邓小平力争，到 1975 年八一建军节前，毛签发了任命父亲为军委顾问的命令，这下父亲算是平反了，又穿上了军装，回到了核心。一天杨成武派人来找我到他家，这是从 1965 年上海会议后第一次见到他，一见到我就抱着不放，说这么多年多么惦着我们，说他们全家受了多大的苦，他有一个女儿也死了。我心想，你那么惦着我，我在地安门白广路这几年，你当副总长，怎么没见你来看看我们？

总之，说了一大堆亲切的话，然后言归正传，说毛主席批了，请爸爸出来当军委顾问，他现在派一架飞机去福建接爸爸，本来他应该去，但是忙，走不开，要我去代他问爸爸好，他派人随我去，我有什么事就吩咐他们办。总之，一切要安排得最好最好。我实际上心里已经很烦这种人的表演。我心想，上海会议你是什么嘴脸？三月京西宾馆会议又是什么嘴脸？现在又亲成这样，这能是一个人吗？

我去福州接爸爸，爸爸身体、精神明显好多了。妈妈也很高兴，说爸爸天天锻炼身体，用中药治腿。当时廖志高夫妇、皮定钧夫妇，还有一些副书记、副司令一大群人来送别，大家一起吃饭，爸爸还稍稍喝了点酒。虽然大家都很高兴，爸爸终于恢复了名誉，但是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又使大家很担心。毛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周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四人帮猖狂得不得了，邓孤掌难鸣，

廖和皮千叮咛万嘱咐，说开完「八一」招待会就回来，别住在北京。郑英阿姨（廖志高夫人）也拉着我不断说：「开完招待会就送爸爸送回来啊！」第二天到机场，车一停下来，看到飞机上前舱已坐满了莫名其妙的人。我大发脾气，问杨成武派来随我的人，谁让他们上飞机的？他说：「不知道，是空军安排的。」我说：「你叫空军的人来：统统下来，否则我找皮司令赶你们。」空军的人一听吓坏了，不知道该听我的，还是听福空的。这时爸爸对我说：「算了，算了。他们在前边，我们在后边，又不影响我。」我当然远得听父亲的。在飞机上，爸爸说我：「你怎么那么凶啊。」我说：「你看看，这像什么样子，乱七八糟。」妈妈说：「你这个儿子啊，文化大革命前就鬼得不得了，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凶，跟工作人员斗，让人家关了五年，一点没改，还是这么凶。」我说：「幸亏一点没改，要不专案组还不把我踩扁了。」

爸爸慢慢地说：「现在，光靠凶也不行啊。」又问：「见到邓了？」我说：「见不到，只是从张爱萍叔叔那儿听到邓的情况。邓现在也难啊，但是邓是想着你的，这次也是邓提的，邓跟主席说，你让我当总长，让罗当个顾问吧，这有事我也有个人好商量，主席没办法，就批了。」爸爸很不高兴地看我一眼，说：「什么主席没办法，别乱说。」然后又慢慢地说：「主席还是想着我的。」

我心里很委屈，咕咕地说：「又不是我说的……」妈赶紧用眼色阻止我，我不吭气了，心里却想，林彪垮台多少年了，主席问过你一句吗？要不是邓啊，主席也不会让你当这个顾问。后来，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的儿子告诉我，福州都在传，说罗瑞卿的儿子比罗瑞卿还厉害。

回到北京，住京西宾馆，我赶紧上街买条象样的裤子，因为爸爸坐轮椅，晚上我要推着爸爸进大会堂参加招待会。晚上，主席不会去，周也不会去，就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四人帮里就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也不会去。叶、邓也都是1965年上海会议后就没见过了。至于王洪文，没人认识他。爸爸行动不便，所以所有人都过来打招呼。虽然乱哄哄，但两个阵营却泾渭分明，参加了招待会，就算是平反了，见报了，又挂上帽徽、领章了。

回到京西宾馆，爸爸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要去看他。」第二天，我拿上信坐车到中南海东门。我走进警卫室，说：「我是罗瑞卿的儿子，罗瑞卿要见主席。」值班的军官一听罗瑞卿：要去拿电话的手都发抖，说话也不连贯，

说：「等等，等等，我...我...我得请示。」我没想到他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可能他以为爸爸正坐在车里。我赶紧说：「不是现在，我是来送信的。这是罗瑞卿给主席的信，要见主席。」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但这封信，直到毛泽东去世，根本无回音，是看到了？还是汪东兴扣下来？都不知道了。

回到京西宾馆，妈妈说：「邓打来电话，要爸爸去看他，卓琳让我也去。」第二天就去看邓，妈妈和卓琳也是 1965 年上海会议后没再见过。打过招呼后，邓说：「你们都到你们的地方去，就我们两个在这儿。」卓琳拉着妈妈说：「走，走，咱们走。」毛毛跟我说：「你来，你来我这儿。」我在毛毛那儿，跟她说：「我坐了五年监狱，现在在工厂，我能不能参军啊？」毛毛说：「为什么不能？你写报告，我拿给爸爸批。」于是当即写好报告，然后又扯东扯西，我说：「邓伯伯也难啊！」她说：「是啊，没人啊，就一个胡耀邦，一个万里，可也管不了军队的事。」我知道陈锡联是华东的，在刘（伯承）、邓手下打淮海战役，当时是北京军区司令，政治局委员。所以我问她：「陈锡联行吗？」她说：「不大行，跟那边勾的好紧。」

谈了大概两个小时，里边叫，我们赶紧跑进去，看到邓、爸爸、卓琳、妈妈都在握手再见，邓对我说：「猛子，好好照顾爸爸。」毛毛插上来，说：「你让他参军吧，参军了才好照顾罗叔叔。」邓耳朵不好，根本没搞清毛毛在说什么，于是毛毛冲着我说：「爸爸耳朵不好，我以后跟他说。」在车上，爸爸问我：「你跟毛毛说什么？」我说：「参军呗。」爸爸说：「你不该麻烦邓伯伯，他多少事哇！」我说：「没人想着我们了，也就一个邓伯伯。」妈妈这次却帮着我，说：「你这么一大群孩子，东一个，西一个，不麻烦，怎么办？」爸爸也就不吭气了

邓小平为什么对解放罗瑞卿这么积极，除了很多很多原因之外，主要原因之一是邓明白，要在中南海跟四人帮斗，尤其毛百年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中央警卫团（名为团，实为师的编制），即中南海的御林军，当时是汪东兴的独立王国，但中央警卫团的开山鼻祖是罗瑞卿。父亲在中央警卫系统、情报系统、公安和军队系统威信极高，人脉极广，因为父亲这个人办事比较公道，不拉帮结伙，毛泽东的评语是「水太清则无鱼」。父亲嫉恶如仇，锋芒毕露（不像邓小平「棉里藏针」），举轻若重，（和邓小平「举重若轻」正好相反。）

毛、周的健康急剧恶化，四人帮又极为猖狂，邓在中央左、右无人，当时胡耀邦、万里、赵紫阳都是刚刚解放，也远离核心，且天天被四人帮整得自顾不暇，根本帮不上邓的忙。在中央的叶剑英、李先念则是墙头草，两头摇。邓对毛批评江青的几句话估计得过于乐观，又知道江青早已不在毛的身边，张玉凤早已取代了江青的位子。

邓想从教育、科技、经济入手，借着全国人民对文革的不满，借着「批林整风」部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结果招来杀身之祸。毛泽东最终还是听了江青的，而不听邓小平的，第二次把邓小平打倒。邓被第二次打倒后，就住在我们现在住的宽街一号，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切断，我们只能通过邓毛的丈夫贺平（贺彪的儿子，1989年六四后把我开除出党），偶尔从贺彪家问候问候邓的身体情况。紧接着，周、朱、毛相继去世，那时的北京真是乌云压城，风雨欲来。

4、毛泽东留下的局：三足鼎立

周恩来比毛泽东小五、六岁，不近女色，任何人都觉得周恩来会活得比毛泽东长，但毛从不提把班交给周恩来。周也小心翼翼地绝不去碰二把交椅，两个人心知肚明，都没有忘记江西中央苏区的旧恩怨。（详见「开国皇帝毛泽东」）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拎出个王洪文。王洪文谁认识？哪能接班？！周恩来一走，毛临急临忙又拎出来一个华国锋。华国锋算老几？哪能担大任？十年文革，毛泽东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跟着毛打天下的老将、老师，被他整得死的死，残的残；一大帮老家伙怨气冲天，毛一走，华国锋哪镇得住？要保住华国锋，毛泽东布了一个绝妙的局：实际上，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班子，左、右两班人都不是忠心拥护他华国锋。一边是四人帮张牙舞爪，江青要做武则天，路人皆知。一边是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做了武则天，这班人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坚决反对江青掌权。本来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回来，是借邓震震江青，但斗了二、三年，毛泽东慧眼识天机，毛看出来，如果他死前不把邓拿掉，四人帮要完蛋，华国锋也站不住，所以毛临死前，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留下汪东兴、陈锡联两个忠心拥护华国锋的人。一个掌握警卫、机要，一个主持军队常务；四人帮和叶、李这两帮人斗来斗去，谁也消灭不了谁，自然都有求于华国锋，这样华才坐得隐，此乃中国封建政治的ABC。

天网恢恢，百密一疏，毛万万想不到，华、汪对此一窍不通，「主席尸骨

未寒」（江青语），即将四人帮一网打尽。四人帮一灭，叶剑英即如鱼得水，叶先哄住华国锋，让邓小平写了一个检讨：「决不翻案」、「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作为中央文件散发全党。华以为这下叶、邓可以为他抬轿子了，此乃政治史上少见的天真烂漫。邓小平一出山，华、汪末日指日可待。

毛泽东布的这个三足鼎立之局，最妙的地方在于除了华国锋自己，无人能破。四人帮，不是华国锋点头，谁能捉？邓小平，不是华国锋点头，谁能放？四人帮无一兵一卒，根本颠覆不了华国锋。

叶剑英、李先念也无一兵一卒，也根本颠覆不了华国锋。

叶剑英是十个元帅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人，也是毛泽东传给华国锋唯一一个帅（聂、徐二帅健在，但早已不问事），华相当倚重叶剑英。四人帮一灭，叶剑英即鼓足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华国锋相信了「老家伙不会跟你争」。实际情况是，邓小平一出山，三拳二脚就把华国锋赶下台。

中国共产党天天喊党指挥枪，实际是枪指党；毛泽东如此，邓小平更是如此。历次党内斗争，都是「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只有叶剑英说动华国锋放出邓小平这一次，是没有一点「武力和武力相威胁」。但中央恰恰就是不敢宣传这次党内斗争，邓小平就根本抹煞了华国锋，称自己为「第一代」，而江泽民搞的「百年中国」，则把胡耀邦、赵紫阳也通通抹煞了……大家看，中国人编造历史比日本人一点不差！

今日中国，十亿人民九亿商，大概已没什么人想这些三足鼎立的故事了。大家都忙着赚钱，在漫漫长夜中，大概只有华国锋在想怎么丢了毛泽东留给他的江山？华国锋可能叹息轻信了叶剑英；其实，华国锋只能怪自己破了毛泽东留下的局。（按：华国锋 2008 年逝世，终年 87 岁。）

我当年是坚决支持邓小平赶走华国锋的。

5、邓一句话：军队的事还得罗瑞卿来管

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不惜与汪东兴（抓四人帮的功臣）正面冲突，首先请出父亲任军委秘书长，夺了陈锡联主持军委常务的权。父亲走马上任第一天，邓小平召来三总部的头头（总参、总政、总后），就一句话：「以后军队的事情就由罗瑞卿来管。」至此，军队的一切调动，没有父亲点头，动不了。父亲一上任，第一件事是把中央警卫团（师）归了总参谋部的建制，改称总参警卫

局。至此，御林军重归父亲掌管，一切人事任命、驻防、调动，武器装备配备，后勤补给到发工资，一切归于军队建制，汪东兴的独立王国连根拔掉。这时，汪东兴就是想吭气也没用了。汪东兴稀里糊涂当了几天党中央副主席，就被赶下台；汪一倒，华国锋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父亲拖着病残之躯，全心助邓牢牢掌握了军权和中央警卫团之后，邓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不用担心华、汪像捉四人帮一样再捉邓了。邓这时根本不把华国锋再放在眼里，步步紧逼，因为华周围的人没有哪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点民愤的（就像现在没有哪个官不是贪官的），实际上是想整谁就整谁，首先把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这一批文革大将拿掉；同时把还没有解放的文革受害的老干部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等等统统解放出来，全面翻毛泽东文革案，最后给刘少奇平反，把华国锋也踢下台。

毛泽东在世时，毛的警卫工作由谁负责，绝对是毛泽东说了算，别人绝对插不上嘴，也没人去插嘴。进城伊始，毛亲点父亲负责警卫工作，组建中央警卫团（师），即八三四一部队（现在人有说这四个数是什么老道告诉毛泽东的，我根本不相信这些鬼话），父亲伴君如伴虎负责十年，然后是汪东兴负责直至毛死。林彪最鼎盛时，也根本管不上警卫团的一点事：林对毛身边的事一无所知，毛对林身边的事则一清二楚。宫廷政变，只要掌握御林军即可，华国锋、汪东兴捉四人帮是宫廷政变，邓赶走华国锋也是宫廷政变。

我当时也是全心全意支持邓的，不仅由于邓全力工作，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地位，主要是由于我认为当时支持邓就是支持中国进步，支持民主，支持中国共产党改革、中兴，别再瞎折腾了，真正干点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但是也就十年，像对毛泽东的革命失望一样，我对邓小平的改革也完全失望了，后边再详述我对邓的不满之处。

邓小平和卓琳的婚姻，卓琳亲口告诉妈妈：「我们不是自由恋爱，是组织安排。」妈妈说：「这不是安排得挺好嘛！」卓琳是北大的学生，她父亲是一个富商。邓小平的家庭是一个大地主，在中共的领导集团内，没有哪一个是贫苦人家出身，大概只有彭德怀讨过饭，后来当兵卖命，在军阀的部队中作战勇敢，班、排、连一级级提到团，1927年把部队拉出来上了井冈山，这是凤毛麟角。中共领导集团，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中共当权后，

对知识分子那么糟糕。

父亲 1978 年离开我们之后，直至 1982、1983 年邓小平、卓琳对我们家非常关心，比如每次去北戴河，卓琳都会打电话来，说：「一起走啊，反正一列火车。」跟他们走，当然非常舒服，在北戴河也是一个浴场。1982 年邓八十大寿，妈妈带着我、我的儿子去拜寿，还有照片，我还在浴场给邓拍了八十岁的照片。1983 年之后，主要是因为我对军队做生意非常不满，对邓小平的女婿贺平的贪污行为非常不满，邓、罗两家才逐渐疏远。卓琳也不再来家里坐了，电话也越来越少。到 1987、1988 年，只有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偶尔来一下。到 1989 年「六四」之后，邓、罗雨家就绝交了。一直到 1996 年，爸爸九十诞辰，出书纪念，妈妈犹豫再三，给邓办王瑞林打个电话，说：「瑞卿九十诞辰有本书，请老爷子题个书名吧。」第二天王瑞林回话：「报了。老爷子说不题。」简单，明确，充分表明对我们罗家非常不满。

6、邓小平签署六四作战令

「六四」毁了邓一生的「英明」，如果有什么英明的话。就像毛泽东的文革一样，邓对「六四」也是至死不认错，但邓知「六四」肯定要翻案。对人民开枪，在哪国都是战争罪和反人类，所以邓遗嘱把骨灰撒到海里（中国的陈腐文化有鞭尸一说）。「六四」写了那么多书，我却没看到有谁提「作战命令」是怎么写的，因为军队要行动，必须有作战命令。

我 6 月 21 日从巴黎回到北京，马上找总参作战部的人问：命令是怎么下的？作战部的人告我：命令起草好后，先送给杨尚昆，因为一般是副主席签后送主席。杨尚昆当时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赵紫阳是第一副主席。杨尚昆说：「先送邓，邓不签，我不签。」

于是命令送邓小平，邓小平签后，杨尚昆加签。三十八军军长拒绝执行命令，理由就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没签，军令不全（不合法），不能执行。我又问：命令是怎么写的，写了可以开枪吗？作战部的人答：写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当部队行进受到群众阻拦时，底下请示怎么办，上头说：你们手上的家伙是烧火杆啊？底下问：能开枪吗？上头答：命令上写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于是就开了枪，人群挤满的长安街，枪一响，还不是尸横遍街？图像照片发遍全世界。

当时的总参谋长迟浩田几年后访问美国，硬是敢对着全世界媒体撒谎，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今天，迟浩田也有话说：你美国总统布什也撒谎嘛！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不知道选布什当总统的美国人看到此处有何感想。我是既不同意迟浩田撒谎，也不同意布什撒谎。

政治、经济，邓小平都没什么理论，改革开放比闭关锁国好，但政治上不触动一党专制，还不如蒋经国；经济上无非是步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后尘。特区、经济开发区、红灯区，二十五年已经葬送了一代人，不知还要葬送多少？

邓小平虽然彻底、干净、全部地扫清了毛泽东思想，但他却跳不出毛的手心。毛说邓两条：一条搞资本主义，一条害怕群众。邓至死，也是这两条。其实搞资本主义，并不是不好，不好的是邓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挂羊头卖狗肉，起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在资本主义中，选了一个最坏的官僚资本主义来搞，必然死路一条。目前中国最大的危机，都是邓小平当年不知该怎么办，于是「绕过去」造成的。其实这些事是绕不过去的，无非是拖，而且越拖越难解决。

邓小平由于没有理论，所以才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没有预见，遇事就「绕过去」，「不争论」。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产权不明，挂着全民所有的羊头，卖着官僚资本主义的狗肉。

7、发展硬道理，贪污变成中国特色

今日之中国大陆，危机重重：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教育危机，就业危机，金融危机……各种危机的总根源就是政治上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坚持自己当皇帝，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经济上，农村还是三自一包，搞私有制。城市的工商业，邓小平其实也没什么理论，没什么设计，东闯西撞，搞出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只是为了一党专政的私利。

二十五年来，国企和民企的发展都是一笔烂账。国企是全民的资本，由官僚来经营。官僚不计成本效益，官僚维持某种平衡，只是为了自己有升迁的机会或「合法」地捞到更多的利益。维持平衡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投资扩大资本，因为资本反正是无价占有，所以官僚不怕借钱，多少钱都敢贷，反正不用担心还。所以中国经济年年投资过热，朱镕基就是典型，由于各种原因维持不了平

衡了。官僚基本两种做法：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是不行了，国家看着办吧。大型骨干还得「全民」接这个烂摊子，无非换一个官僚来经营，又开始一个新的周期。再一种就是不行了，捞一把就跑，所以才有这么多贪污。产权不明，是贪污的基本原因，每年几千亿坏帐，钱都哪去了？就都贴在国企里了，这是个无底洞。

民企更是开玩笑，毛泽东社会主义过来的人，没一个有钱。原始资本从何而来？追本溯源，所有的民企都是靠和官勾结，搞到第一笔钱，于是大家都有原罪。好的民企，发展了之后，把钱还给银行，与官划清界限，但这是极少数，而且即使民营企业要想这么做也难，因为中国什么都是官说了算。你和官划清界线的那一天，就是民企破产开始之日，所以官商勾结就成了继贪污之后的第二大中国特色。二十五年来，中国私人资本的积累，在资本主义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是由于基本的私人资本都是通过官商勾结管道，直接从国库中贪污的。所以现在民营企业出巨资雇用一批无良文人，鼓吹原罪无罪论，简单讲就一句话，大家都不干不净起家，算了吧，别再追究了。但我不同意，对你们的纵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只可以区别对待。

二十五年，金融系统的坏帐，已经超过了最高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居民存款亦超过最高一年的GDP，这两项加起来，犹如洪水猛兽，随时可能决堤，仅仅是由于专政的压迫和欺骗及中国人储蓄的美德，才使得这一危机暂时被掩盖。但朱镕基已感到压力，朱想把老百姓的钱骗到股市上去，老百姓丢了几千亿之后，已不再上当受骗。到了温家宝，除了「国资」，即官僚资本还在股市上招摇撞骗之外，已没什么正经人再投资股市，唯一地产市场还可能骗骗老百姓，但最多也只是几千亿的盘子，而我们现在谈的「洪水猛兽」是几万亿，所以楼市救不了金融市场，而且楼市钢筋、水泥高耗能，又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邓小平留给中国的最大危机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国企和原罪的民企。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必须把国企还给全民，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没人做过的社会工程。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文化背景迥异，版图、人口、贫富差异，照搬恐怕行不通。民企的原罪，则既要惩罚，又不要弄死，多数应允许以钱赎罪，回馈社会。从苏联东欧十五年改革的经验看，小而富的国家还国企于全民容易点，中国恰恰大而穷。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从理论上讲，这就是错误的。一个社会，首先要有公正和公平，中国社会恰恰就是没有公正和公平，全民感觉不到全民所有，民企只靠和官勾结来发展。官僚所有，官商勾结，这种发展就是在沙地上建楼，楼建得越高，将来垮下来就越难收拾。垮是肯定要垮的，因为这种发展只是追求一党之私利。今天在中国，再合理的事，没有官的利益办不了；再不合理的事有官的利益就能办。这种官僚控制经济命脉，靠官商勾结来发展的模式，从本质上是反人民的，所以只能靠刺刀和谎言来维持。

到我执笔此段的 2007 年，中国股市回光返照，又出现一个疯狂的投机热潮。这种情况时而会出现，因素很多，但由于股市的基本因素不健康，裁判是官僚，大玩家也是官僚（所谓国企），所以老百姓肯定玩不过官僚，崩盘（股灾）只是时日问题，大家拭目以待。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成为官僚破坏环境，掠夺资源，逃避工作事故甚至贪污腐败的借口。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没有公平、公正，所以发展也不是，不发展也不是。中国加入 WTO（世贸），外资银行在自由资本主义原则下参与国有（官僚有）银行竞争，早晚矛盾要暴露出来，此一日即是官僚资本银行体系崩溃之时。就是为什么有人写了一本《中国必将崩溃》（按：金融专家章家敦 1991 年著作），因为以自由资本主义观点看中国金融体系，早就崩溃了，只是由于前边提及的专制和储蓄美德，才延缓了崩溃，但仍然是必将崩溃。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癌症是官僚所有，即官僚拿人民的钱来「发展」，所以天天就是「比例失调」、「重复建设」、「构不合理」、「宏观调控」、「软着陆」，为什么天天调，月月调，年年调，调了几十年，还调不合理呢？没人问，也没人管，就是因为官僚所有不合理，用不合理的官僚所有去调经济，永远调不合理！

「六四」之前，我的一个社科院的同学跟我说：邓小平的经济特色即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是权力转化为金钱进入流动领域。我说：好啊，以此为题目写本书吧。他说：不能写，写了要坐牢。我说：还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奖。但他最终没写，我则给他加了一个注：权力转化为金钱，这个转化比率是不定的。多大权力转化为多少金钱？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在哪里？

一、没有规律。外国人不是什么都想找规律吗？中国最大的规律就是没规律。

二、没有理论。天天喊社会主义，天天干官僚资本主义，天天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说不圆了，就加个「中国特色」，比如宪法上要写上保护私有财产了，党章上要写上吸收资本家入党了，有任何理论解释吗？至于为什么已经消灭了的丑恶现象：贪污、腐化、吸毒、卖淫，又统统返回来了？还是没人问，也没人理。

三、任何一件事，没有官的利益，办不通。打着全民所有的旗号，是为了官僚盗窃瓜分国库。邓小平借了几千亿外债，朱镕基借了几万亿内债，这都是要子孙后代还的。金融系统的千疮百孔，总有一天盖不住，那就是崩溃之时。

今天，只有欧洲和美国还坚持一点原则，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为中国是官僚市场经济，全民税养着一个官僚系统。官僚们在无偿盗用纳税人的钱去「发展」，贪污就成为这个发展过程的最大特色。

8、军火生意两派分赃窝里斗

邓小平家族的贪污，人尽皆知，也出了很多书，基本是真实的。如「邓小平家族」、「王震和荣毅仁的权钱交易」，邓小平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婿，都是打着全民所有的旗号，干着官僚所有的勾当。「六四」之前还有点遮遮掩掩，「六四」之后根本就变成了发疯般的掠夺。特别典型的是邓的小儿子邓质方飞飞，「六四」前还保持平民气质，跟全家划清界限；「六四」后，飞飞助江泽民、李鹏扳倒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发疯一样去搞钱，和周北方搞到一起，和香港李嘉诚合伙搞北京东方广场，闹得丑闻铺天盖地。江泽民没办法，只好把周北方捉起来，判了个死缓，放了飞飞一马。据说卓琳为保儿子，服了安眠药，威胁江泽民。

邓小平如此，上行下效，王震的三个儿子，陈云的大女儿，赵紫阳的女婿、儿子，叶剑英的儿女，彭真的女儿和两个小儿子，杨尚昆的女婿，张爱萍的小儿子，姬鹏飞的儿子，万里的二儿子，贺龙的儿子，刘华清的儿子、女儿，都是知名的贪污。至于江泽民、李鹏、乔石、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黄菊，这些人的家族成员贪污，更是人尽皆知。最有趣的是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他拿了国家的钱去香港开公司，成为「首富」。他自己都搞不清他是国企还是民

企；会有一天，中国人民帮他搞清。

七十年代末，赵紫阳批给荣毅仁一亿美元办中信，批给王光英五千万美元办光大。接着，总参的保利（有王震的儿子、贺龙的儿子加邓小平的女婿、杨尚昆的女婿、赵紫阳的女婿），总政的凯利（有叶剑英的儿子），科工委的凯丰（有杨尚昆的儿子），邓小平大儿子的「康华」都办了起来。一时间，京城被这些亦官亦商的子弟们闹得乌烟瘴气。当时两伊（伊拉克、伊朗）在打仗，中国一只手卖军火给伊朗，一只手卖军火给伊拉克。由于中国的军火价廉物美，所以两伊基本上是用中国的常规武器在打仗。

特别好卖的是大口径炮弹，中国兵工厂开足马力，二十四小时生产，仍供不应求！兵器部要卖，「保利」也要卖，但「保利」必须先从兵器部买来才有东西卖，于是兵器部不接军队定货，贺鹏飞、贺平、王军这帮人告状告到军委，说兵器部不保障军队定货，只搞外贸。兵器部说，你说是军队定货，实际上也是外贸，你卖不如我卖。军委内，张爱萍代表工贸，杨尚昆代表这帮子弟，吵来吵去，还得杨尚昆出来摆平。十年，「保利」卖军火至少 20 个亿（美元），提成就用来经营、挥霍，给一般干部一点小恩小惠，回扣就贪污了。这种事也不可能一个人做，而且这帮人也不懂外语；要用人，自然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自然就有人来告诉我。

机关里闹得沸沸扬扬，总后来查账，这帮人就给杨尚昆打个报告，说「保利」是军委的帐，不用查了。杨尚昆一批，什么事也没了。「保利」实际上成了邓、杨的私家公司，这就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当今的国防部长曹刚川当时是我们的副部长，他知道的事可能比我还多，当然也不满意，但他不吭气，我则公开表明我的态度。我在部的会议上说：我们是装备部，我们的职责是部队装备建设，不是做买卖，更不能把部队装备拿去卖，空军好几个地空导弹营装备卖给了伊朗，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根本不成个部队的样子。

我这样说，那帮人自然不高兴，但也驳不了嘴。我也直接跟杨尚昆谈过，我说：军队做生意，利弊得失值得考虑。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在重庆，空军要做生意，蒋介石都都没批准。这些话，杨听不进去，而且觉得我什么都有意见。1984 年之后，邓、杨对我们就明显的疏远冷淡了。比如，过去去北戴河，都在五浴场游泳，天天和邓、杨见面，一般我们一到，就打个电话给中央警卫

局，问能不能去五浴场啊？总是说：「欢迎，欢迎！」1984年，电话打过去，对方调子就变了，说：「要请示。」然后就没下文了，当然就是不欢迎了，我们也就没再去了。

军队做生意，极大地败坏了纪律和作风。「六四」之后，更发展到走私、运毒，无恶不作的地步。贺平往美国走私AK47冲锋枪，让美国海关截住，官司打回中国，证据确凿，江泽民没办法，只好把贺平装备部长免了。邓一死，江、朱把军队的生意也停了。

邓小平只管谁当总书记，谁当总理，然后就打麻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比毛泽东的闭关锁国好，但实在谈不上有什么设计，无非是抄抄台湾、新加坡而已，民主、廉政还被删了。邓晚年，民间有一首民谣：

西方白，太阳落，
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为儿女谋幸福，
他叫我们各顾各。

任何时代最贴切的描述就是民谣，那些御用文人吹捧，这个理论，那个思想，都一钱不值。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他身后的事，并不担心在世时谁会挑战他的地位。邓小平则只关心他在世时的事，并不大关心他死后如何如何，有没有人读他的理论，所以他把钱装满儿女的腰包，就驾鹤西去，不留一点痕迹。

9、邓搞修正主义，只做不说

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打下天下后，多数人逐渐就变成了实用主义者，只求在共产党里做官，这是非常可怕的。从邓小平做了皇帝之后的作为看，他是不同意毛泽东的治国理念的。进了城之后，毛错误一个接着一个！从反右，大跃进，打倒彭德怀；大饥荒，和苏共决裂，反修，援越抗美，邓小平其实都不同意，但不吭气而已。现在大家把当年的「九评」拿出来看看，毛泽东批赫鲁晓夫的事，邓小平不仅都做了，而且做得比赫鲁晓夫要彻底得多。

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不懂列宁；邓小平同样不懂马克思，不懂列宁。毛批的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比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进步的主义。邓小平实行的内外政策，是比南斯拉夫的铁托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更彻底的修正主义，但邓小平

自己却无胆量把自己的主义说清楚。以「中国特色」混过去。赵紫阳说：「邓小平并不在乎所有制。」其实经济制度，最根本的就是所有制。

邓小平明白，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行不通，所以农村一实行三自一包，就有东西吃了！但邓坚持毛泽东的一党专政，自己当皇帝。一党专政怎么搞自由经济？所以就搞出了今天的官僚资本主义。各级共产党官僚直接从国库拿纳税人的钱，开工厂、办公司，剥削十三亿中国人民，利润就用来养活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权。这样的官僚资本主义，冠以「全民所有」，只是为了欺骗人民，肯定是死路一条。

当年毛泽东反修，只是为了争「共运」的老大；根本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

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民主改革的开始，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拼命吹，拼命拍，和林彪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也差不多。斯大林死后，不知赫鲁晓夫是良心发现，还是争大位的需要，把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给赶下了台，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的神经。

毛泽东从来不喜欢斯大林，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毛泽东连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都不当，上井冈山，落草为寇，短短几年发展到三十万之众。此时周恩来、王明挟第三国际的淫威，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导致五次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逃跑（长征）。到了遵义，才把毛泽东请回来。「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到了延安剩下不足三万人。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几乎使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全军覆灭。毛从此对斯大林是敬而远之，从来不听斯大林的话，而斯大林也瞧不起毛山沟里的马列主义。1949年毛泽东一头栽进斯大林的怀抱，只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独裁和共产国际的渊源。二战之后，世界就是两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独裁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对毛泽东而言，斯大林再不好，但斯大林的独裁专制对毛的口味；美国再好，但美国的这一套自由、民主、平等引入中国，哪来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虽然苏美都在1949年向毛泽东招手，毛泽东还是「一边倒」向了斯大林。但毛和斯大林从来是貌合神离，这时的邓小平和毛也是貌合神离了。

我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最想不通的一点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接很多民主人士提出的建议，游走于苏美之间，中国哲学从来是以夷制夷。直到1971年，毛泽

东才回归游走于苏美之间的路线。检讨毛的外交路线，是相当个人情绪化的。

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毛泽东并不高兴，因为毛更不喜欢奴才背叛主子，这是封建文化最不容的一条，所以毛泽东才跟赫鲁晓夫翻脸。至于「九评」那些垃圾，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勃列日涅夫三架马车打倒赫鲁晓夫，完全是反动，是苏共党内保守派阻挡赫鲁晓夫的有限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确实非常有限，而且注重政治改革，忽视经济改革，这又和中共在邓小平上台后的改革正正相反。中共是经济改革大步向前，一两步迈到官僚资本主义，政治改革却纹丝不动，特别是「六四」之后，邓小平已成「惊弓之鸟」，「稳定压倒一切」。稳定什么？就是稳定邓小平当皇帝，另外也可看出苏共的政治改革比较大地触动了党内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招来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动。中共经济改革给了党内特权集团更大的特权和利益，所以呈现出一片贪污腐化，歌舞升平，黄、赌、毒泛滥的末日景象。

我比较苏共和中共，越比较越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同，大概唯一一个比较相同的地方，是苏共和中共都是在非常落后的国家进行的革命（俄国是农业社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都把自己这个和马克思沾不上一点边的革命，称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果祖师爷马克思上天有灵，我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去见马克思时（现在都在一起），马克思会教训列、斯、毛：你们的革命真是和我毫无关系，我马克思开宗明义是资本论。你俄国、中国、列、斯、毛革命时有什么资本主义？所以我的思路是，把中国现在称为「勃列日涅夫停滞期」极为欠妥，而且无益，难道让大家来数年头吗？

勃列日涅夫打倒了赫鲁晓夫，毛泽东并不喜欢勃氏。毛把自己比作马、恩、列、斯传人，赫鲁晓夫已是小土豆，勃列日涅夫岂不是小小土豆，被指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邓小平和刘少奇是赞成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按：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是：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毛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是要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印度等反动派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并提出「三自一包」。所以毛泽东说刘邓是赫鲁晓夫主义，并没说错。

我是赞成「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我不赞成的是邓小平无胆量把

自己的主义说清楚。

10、为什么要「一国两制」？

香港是邓小平留给继任者的一个烫手的山芋，接又接不住，扔又不能扔，因为实在江、朱、胡、温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一国两制」，何况董、曾，任何一个小学生都会说：「他那一制好，我为什么不学他？我这一制好，他为什么不学我？」你可以问任何一个香港人或大陆人，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从官到民，没有人可以回答「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吗？」我告诉你邓小平是如何想的，邓小平知道，如果像收回上海那样收回香港，香港就完了，无非又肥几个贪官。但如果大陆去学香港，中国共产党就完了。一肃贪，中国共产党不就被肃了？为了香港也不死，中共也不完蛋，只有一国两制。

邓小平为香港筑起了一堵墙，挡住大陆的贪腐；为大陆筑起了一堵墙，撑住香港的民主。江、朱、胡、温、董，曾手忙脚乱，笑煞天堂的邓小平，但结果肯定不是邓小平所期待的，因为世界总要进步。邓小平的特色是：说的社会主义，干的官僚资本主义。老百姓可受一时骗，不可能永远受骗。现在不论美国人、欧洲人、中国人，恐怕没有人再怀疑邓小平的共产党是官僚资本主义◇

大家现在喜欢谈「模式」，中国总会融于世界民主潮流，问题是快点、慢点，什么「模式」。当然，最理想的是戈尔巴乔夫模式，也是台湾模式，即独裁党领袖里出了一个好人，有良心的不谋一己之私利，自愿放弃独裁特权，建立民主政治。这种演变，外部压力始终是次要的，主要是内部动力。

大家现在都看淡中共内部变革的动力。由于邓小平活得太长，所以把三八式这一代（抗战参加中共的胡赵一代）中共精英的变革动力扼杀了。我曾和胡耀邦探讨过民主，我感到胡耀邦是党内真心搞民主的人。胡不谋私利，不搞阴谋诡计，真心希望辅佐邓小平开创中共中兴之路，可惜胡并未真正坐上大位。邓小平从提改革开放开始，就是半心半意的。邓小平就是「黑猫白猫」，实用主义走到哪儿算哪儿，实在没什么理论，抄抄南韩、台湾、新加坡罢了。

但邓小平还真有一条发明创造，或曰设计，即独裁专制的中共官僚资本与民主世界国际自由资本相勾结，剥削十几亿中国人民积累起来的财富（2007年外汇储备已达8000亿，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向自由民主世界开战。我看好三点：

(1) 独裁的中共官僚资本主义与世界民主阵营玩 WTO，民主阵营非常明确，就是用自由经济冲垮独裁专制，美国总统布什公开对胡锦涛讲：你要像喜欢自由贸易一样喜欢自由政治。用中共老祖宗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相适应。资本的灵魂是自由主义，官僚资本扼杀了资本的灵魂，却想用资本主义的钱来救一党专政的命，这条路肯定行不通；最终，资本的自由主义属性冲垮独裁专制。

(2) 独裁的中共官僚资本主义和已民主化的国民党玩经贸论坛，结果必然是民主战胜专制，进步战胜落后，台海两岸只会进步融于世界民主大家庭，不会退步到独裁政体。

(3) 独裁的中共官僚资本主义与港英「余孽」领导的香港政府玩一国两制，香港从来就是民主颠覆独裁的基地。中共不是口口声声寄希望于人民吗！人民会问：香港人有的权力，大陆人为什么没有？台湾人有的权力，大陆人为什么没有？到香港、台湾、大陆两岸三地人民的权力都一样了，中共独裁必然结束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也别太悲观。

邓小平的这个发明创造是世界面对的新课题，我称其为「邓小平特色」。大家看现在香港的资本家，台湾的资本家，整个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共产党称为「吸血鬼」的，都和小平的共产党握手拥抱，亲密无间。资本家为什么不怕共产党了？就是因为资本家知道，邓小平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党，虽然名字没变，五脏六腑全变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已经埋葬了共产主义，从而又一次证明，共产主义根本走不通。邓小平的共产党现在还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只是为了独裁专制谋一党之私利。邓也清楚知道，他这一套「用资本主义的钱，救社会主义的命」混不长。「六四」开枪，邓小平、王震、杨尚昆这帮老朽想的就是「打一下，稳定十年」。他们为什么不想稳定百年呢（不是毛泽东的千秋万代）？因为邓小平只想做皇帝做到死，儿女袋里装满钱，「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现在「六四」开枪已快二十年了，邓二世也转给了邓三世，仍「非常稳定」，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几乎被摧垮了。

经过毛泽东 27 年的摧残，邓小平二十多年摧残和收买，特别是邓氏官僚资本主义近十几年来剥削中国人民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人均收入虽然很低，

仍属最贫穷国家之列，但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独裁政权炫耀财富，向全世界证明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并不坏，财大气粗，贪污腐化，朱门酒肉臭，残羹剩饭，散些给「知识精英」。这种收买政策，相当有效，使得中国今天的知识阶层，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堕落。一个民族的觉醒和兴旺，我认为主要依靠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农，知识分子可称为民族的良心。

今天中国读书识字的人，没有几个可称为知识分子，我们这个民族的良心几乎没了。环视九州岛岛大地，官场的腐败，读书识字者的麻木，逢迎，吹牛拍马，已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由此也呈现出一种全社会性的道德沦丧！邓小平在中国埋葬了共产主义，彻底，干净，全部扫除了毛泽东思想，然后建马列学院、毛泽东思想学院，还开博士课！我的上帝！如果不是骗子，谁去授课？如果不是想当骗子，谁去上学？像广东的张德江，金日成大学的毕业生，不是骗子，还能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政坛明日之星！电影界张艺谋的堕落则是另一典型，所以中国的民主化仍是任重道远！

简单的说，赫鲁晓夫是对共产主义修修补补的改革，邓小平则是在中国埋葬了共产主义，但坚持一党专政，搞官僚资本主义并和国际自由资本相勾结，剥削中国人民。剥夺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谋共产党一党之私利，谁都看得出来。搞邓小平这一套，何须从江西打到延安，又从延安打到北京。跟蒋介石干，不比跟邓小平干好得多？所以邓小平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输了理。

至于邓二世、邓三世，他们的权力是私相授受而来，更无法理基础，「刺刀尖上的政权」，小胡来了个「新三民主义」。胡耀邦时的中宣部长给小胡加了一条：「权为民所授」，小胡就不敢接，因为小胡心虚，他知道自己的权力不是民所授。香港人向北京争取普选，是与虎谋皮。共产党现在最怕的就是选举，为什么？因为一选，共产党肯定完蛋。

实际情况是，邓小平也大彻大悟到共产主义这一套不行，和戈氏是一样的，但邓小平谋私利，所以虽然历史给了邓小平很好的机会，邓小平可以把中国引入现代民主政治，但邓小平为一己之私利 拒绝这样做，而把中国带进官僚资本主义的绝路。中国今天的发展是沙地上盖楼，楼盖得越高，危机越凶，邓小平清清楚楚知道这点，所以我才命名邓小平为「我死了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式的皇帝。

所有共产党的官都知道，所以贪污才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大家都相信邓小平这一套，何必要贪污呢？贪污的原因就是两条：一是谁也不把这个国家当成是自己的（你看私营经济有贪污吗？自己的东西还需要贪污吗？）。二是知道早晚要垮，赶紧捞一把赶紧跑。所以邓小平就是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这一套。

今天中共的纪委，不是肃贪，是权争的工具，因为无官不贪，你跟着我就可以贪；你不跟着我，我就把你拿出来当贪官办，太出格的小猫小狗，也要办几个，以欺骗民意。

中共的邓小平特色，是苏共或任何共产党都没有的，如果仍然把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列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倒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11、比较苏共，愈显邓改革半心半意

毛泽东在北京二十七年，虎踞龙盘，却也是腾云驾雾，完全脱离实际；独裁，闭关自守，幻想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邓小平坚持独裁（所谓「四个坚持」），所以无法带领中国真正走向进步。中国民主化进程任重道远，归纳一下主要的障碍：第一当然是中共的坚持独裁；第二就是邓小平特色；第三就是我们民族沉重的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其中邓小平特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延缓专政灭亡的主要因素。

曾有文章，呼吁国际自由资本制裁中共，这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幻想。忘记了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邓小平正在勾结自由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削弱了资本追求自由的本性。尽管有无数资本家在中国碰得头破血流，血本无归，而且无处申诉，但是资本仍然蜂拥而入中国市场，就是因为资本都明白，在中国只要跟「官」勾结好，在法制社会办不了的事，在中国这个独裁社会都可以办，从而获得超级利润。广东省每年工伤事故，切掉四万个劳工的手指，这要在民主法制社会，多少个资本家早就赔光了。可是中国的广东，鸦雀无声。一个残存的中国的良心，写了一篇文章：《四万个手指》，马上受到打压。中国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但不能揭发。

八九民运是中国人民民主进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却失败了。原因很多：学生的盲目；赵紫阳掉以轻心；邓小平老朽昏庸；杨尚昆老奸巨滑……但是有没有人想过，什么才叫胜利？所有希望八九民运胜利的人，请给我描述一下，你认为胜利了，会是什么样子？天安门「英雄」上台？那连我都要吓跑。看看「英

雄」们现在在干什么，就知道这些人第一上不了台，第二真上了台，对中国也不是福。赵紫阳不下台就算胜利？赵紫阳本来也没下台，是让八九民运整下台的。

我当时通过我的同学给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传话，我说：你们这么搞不行，赶紧鸣金收兵，返校与赵紫阳对话；你们给了赵紫阳面子，赵紫阳才坐得稳；赵坐稳了，中国才有机会进步；你们把赵整下台，中国就只有退步。这个话传到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就是传到了，英雄们也不会听的，而且会把房子吵塌。大家想想，一个连自己要干嘛都不知道的运动，什么叫胜利都不清楚，它怎么可能胜利？所以八九民运注定要失败，我这个批评，英雄们可能不会服气，不要紧，慢慢想吧。

这么伟大的一个群众民主运动，这么轻易就失败了。几乎二十年了，昏昏沉沉的国民已经忘了！这也说明中国民主进程还有漫长的路。

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和邓小平的改革截然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大彻大悟，坦诚要走现代民主政治之路，但忽视了经济改革。由于戈氏大彻大悟，不谋私利又坐上大位，所以才有苏东欧解体的变革，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中共党内是否能出戈尔巴乔夫就很难说了。我曾跟胡耀邦提过戈氏的「新思维」，那时胡也已下台，谈得非常谨慎，仅说他也注意到了这本书。赵紫阳，我不认识，除了「六四」我赞扬，在其他方面，我对赵多有批评。

胡、赵比邓小平进步的地方，在于胡、赵真心想党内多一些民主，防止个人专断的毛泽东式悲剧重演。但邓小平要的是独裁专断。邓小平对江泽民交班时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邓小平独裁专制理念最清晰明确的表达。「六四」后，江、李、朱、胡、温是对胡、赵政治改革的反动。但是由于胡、赵的改革和江、李、朱、胡、温的反动都是得到邓小平「恩准」的，所以这一改革和反动又都打上邓小平的烙印；也由此，我才认为邓小平从一开始对改革就是半心半意的。

大彻大悟的人，党内外都很多，但不谋私利的人，则少多了；又能坐上大位，则微乎其微了。所以从内部发动的革命才如此困难。善良的人们希望内部动力的改革引导中国融入世界民主潮流，主要着眼于少流血。外部来的革命又是你杀过来，我杀过去，而且暴力革命实在较难产生一个民主政权，特别是在

像中国这样极为落后的封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我在「一怒辞天阙」前，对这个问题有大彻大悟的思考。

12、两岸的民主和独裁

我研究政党和世界政体，首先分析其独裁民主本质。和苏共最相似的是纳粹，党的主体是流氓无产者，领导集团是非常平民的知识分子。纳粹夺取政权比苏共还文明一点，还是德国人选的，只不过选上去了，没有选下来的机会。

和中共最相似的是中国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国家」，这就是独裁时的国民党与现在的共产党的信条。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在蒋二世经国主导下，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开放党禁、报禁，已转化为民主政党，内部动力主导由独裁和平演变为民主，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相同。我们探讨中共民主化进程，最可模拟和期望的，还是台湾模式，因为国、共同种同族；苏共和中共则文化背景差异太大。

国民党和共产党断绝往来五十多年后，现在又开始大张旗鼓地交往了，国民党回来了，当年老百姓痛恨国民党腐败，支持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五十年过去，国民党已成了一个民主的政党，共产党则变成贪污腐化不可收拾，老百姓就会比较了。台湾人民可以选举，我们为什么不能选？台湾人民可以告总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告李鹏？台湾司法可以侦调陈水扁的弊案，我们的司法为什么不能侦调人尽皆知的邓小平家族、王震家族的贪污案？这么一比，就会「得人心者得天下」了。

国共第一次合作，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杀北伐功臣共产党，开始十年内战。日本人打进来，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不顾重庆停战协议，仅仅三年就被共产党赶到了台湾。现在，第三次国共合作有望开始，一边是民主的国民党，一边是独裁贪污的共产党，读者说谁会赢？

这两天我的学长胡锦涛访美，突然引用一句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听到这儿还真是一惊，小胡竟有此胆量引用此言。再听下来，原来小胡的世界潮流是经济全球化。小胡差矣，谁都知道当今世界潮流，政治民主化是老大，经济全球化是老二。你不提老大，别人则不会不想老大。所以为小胡准备讲稿的小子，肯定是把小胡给卖了，小胡的智商大概也不够。

由此可见，已经到来的国共第三回合，肯定会加速中国的民主进程。民主不怕独裁，只有独裁怕民主。抗战结束后，毛蒋会谈，协商多党政治，选举，军队国家化。双方缺乏信任。现在大陆提出的「你不独，我就不打。」台湾接招，「你不打，我就不独。」这实际上已经说清了，两岸还在吵，都是转移内部视线。稍稍有逻辑思维的人，都明白这个话题已经谈好。共识就是：大陆不打台湾不独。大陆不敢打，因为打最大的受害者是大陆；台不敢独，因为独最大的受害者是台湾。

马英九 1991 年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2008 年上台，提出三不「不统、不独、不武」。这是高招，共产党不敢接招，只好装聋作哑。但两边谈判，装聋作哑不解决问题，将来谈统一，主动权还是在民主一边。台湾可以把当年毛泽东提的三条搬出来：咱们就实行你们老祖宗提出的三条：多党政治协商、选举、军队国家化，你看中共有什么词。做，就要大彻大悟，放弃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不做，中共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所以，实际怕统一的，不是台湾，是大陆。

从法理上讲，谁都可以独立。加拿大魁北克要独立，也没听谁喊打喊杀，无非投票而已。欧盟，宪法写明，自由退出，可没一个成员退，而且大把东欧的国家想加入。欧盟说：慢着，一个个来。中共应该想明白，为什么香港也不愿和你合，台湾也不愿意，西藏、新疆、内蒙都不愿和你合，是因为你中共落后、独裁。真的民主化了，大中华完全可以效法欧盟，首先要规定，想走就走，就没人走了。像现在这样，天天喊打喊杀，愚蠢之极。这么简单的道理，专制的脑袋就想不通。当年毛泽东不怕蒋介石，就是因为毛代表进步；今天台湾不怕北京，也是因为台湾代表进步。

邓小平祸国殃民的「中国特色」官僚资本主义，必然留下一个烂摊子，到中国人民不得不清理这个烂摊子的时候，将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原则是把名不正，言不顺的「全民所有」（国企）私有化，公正、公平地做好它，则是非常，非常的艰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联就做得很艰难。中国的情况比苏联还艰巨，13 亿人的包袱，可不是容易的事。

第五章 我接触的将帅们

我对战争年代冲杀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崇敬，他们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是为民族而战，而不是为自己而战；但是进了城之后，坐了天下，这帮将星则几乎个个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

178

【林彪一家】

十个元帅，十个大将，我总还数得过来；上将就已经数不过来了；中将与少将，认识的就只有个别的了。说起将帅，当然第一个就要写林彪及其一家。我们两家实在是太多的恩恩怨怨。

我对林彪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童年时和他的女儿豆豆、儿子老虎在他家后院玩，骤然碰到林彪坐在长廊一角，他对我们小孩那阴沉沉地一笑，我从来没见过大人那么笑，现在半世纪过去了，什么时候我想到林彪，那一笑总是挥之不去。

我听父亲说：林彪自进北京后，即闭门谢客，谁也不见，住在西山。当时西山就是遥远的地方，毛泽东时不时就跟爸爸说：「你代我去看看林彪，让他好好养病。」所以爸爸时不时就奉命去看看林彪。爸爸去看林彪，总要带着妈妈和我，因为我和豆豆、老虎年龄相仿，又是同学。去林彪家，过颐和园，到玉泉山，就差不多到了。我只记得林彪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花园，后面山上有一个炮台，据说是八国联军修的炮台，俯视颐和园、圆明园。

到了他们家，一般是爸爸进去看看林彪，我则很少见到林彪，前面讲的在后院碰见林彪，那是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林彪在后院。

还有一次，我们小孩搭积木，积木垮下来，豆豆、老虎吓得不知所措，我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叶群听到响声走进来，安慰豆豆、老虎：「没事，没事。」我挺奇怪，后来听他们的工作人员讲，如果我不在场，两个孩子又要受一顿训斥，我才明白。我和豆豆、老虎都在育英小学，我和豆豆一班，老虎矮一班，高岗的小孩也在。

高岗出事时，有一天突然有人来学校，把高岗的小孩带走了。后来阿姨就说，她转学了，又没过多久，又有人来接豆豆和老虎，我回家之后才知道，林彪搬去上海住了，把小孩也接去上海上学。实际是林彪对毛泽东处理高岗事件

不满意，离京出去。之后林彪一直在上海住了好多年，才回北京。1956 年中共八大，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林彪对这个名次很不以为然。林老虎（立果）傻呼呼地曾跟我说过：「爸爸原来排第二。」

林老虎跟我说这话，是因为他还不懂事，而这话肯定是林彪跟他说的。我曾把这话告诉过爸爸，爸爸说：「党内过去是朱老总排第二，现在是刘少奇排第二。」1956 年之后，由于毛泽东喜欢北戴河，中央每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林彪也去，北戴河的房子都是过去英国人修的别墅，一幢幢小楼座落在山坡上，没有围墙，我们和林彪一前一后，一步之遥，叶群就经常带着豆豆和老虎来我们这儿玩。1959 年，在我们住的旁边，原来董必武住的地方，给毛泽东新盖了一幢房子，围上了围墙，是全北戴河唯一的一座有围墙的房子。

1、和林立果的友谊

林彪说怕见水，一见水就拉肚子，所以搬去毛泽东新房子的后边，看不到水的地方去住，即后来 1971 年出逃时那两幢楼。我们则搬去林彪原住的房子，汪东兴就住到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离开会、演电影的大礼堂很近，一有「内部电影」，我就打电话给老虎，然后我们两个就跑去看，但往往被阻在外边，于是我就带着他东转西转，有时就给我们闯进去，有时就被捉住赶出来，所以从儿时我们就结下很深的友谊；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文革一开始，林彪就要把我关监狱，林彪大概也知道，林老虎跟我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

南昌起义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当时林彪仅二十一岁，是个连长，随朱德残部上了井冈山，即为朱、毛会师。我曾听父亲说，林彪提过，南昌起义失败了，建军节应改为秋收起义的日子，但毛没有点头。文革时又吵吵一阵，我还以为真要改了，但也没动，只是把朱、毛会师改成了林、毛会师，闹出一个贻笑四方的大造假。

井冈山时期，十一师、红四军、一军团、一方面军，逐步扩大，朱（德）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王良（三次围剿牺牲）、罗瑞卿一步步往上跟。父亲是在三次围剿时头部负了重伤，一颗子弹擦伤了太阳穴的动脉，血像喷泉一样喷出来。当时杨得志是警卫连长，杨得志亲口给我讲述父亲受伤的经过，当时林彪也在场，抬下来之后，大家都认为不行了。朱德知道后，派他身边的医生叶青山专职护理父亲。朱德交待叶青山：「你就跟着罗瑞卿，人

一定要救活。」文革之后，叶青山去看爸爸，爸爸指着叶青山说：「要没有他，我也早没了。」就这样，靠点磺胺药粉，硬是把人救了过来。

等父亲伤愈归队，已开始五次围剿了。林、聂跟爸爸说，四军有人了，你来军团总部当保卫局长吧。然后就是长征，林、聂交待父亲照顾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林彪确实对彭德怀说过：「毛泽东不行，你来指挥，我们拥护你。」这是林彪亲口告诉聂和父亲的，而且毛泽东知道后，说：「林彪是个娃娃，他不懂事。」上层也是人尽皆知，并不是林彪垮台以后才说的，只不过文革前大家只是悄悄地说。我是在爸爸跟妈妈讲时听到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当时环境恶劣，几乎被国民党消灭掉，又年轻（林彪和父亲同庚，比毛小十四岁），什么想法都会有，什么话也可以说。（注：关于林彪的年龄，开始说比爸爸大一岁，后来又说同岁，文革前又说小一岁。）

到了延安，开办「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还是让林彪挂个校长的名，爸爸是副校长兼教育长，但林彪一天也没有管抗大的事。林彪第一次负伤是平型关战役之后，林彪骑着缴获的日本大马，披着日本斗篷，阎锡山的兵，一枪打过来，穿肺而过，几乎丧命。林彪负伤后，即去苏联养伤，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回到延安，代表毛泽东跟蒋介石来往。

八年抗战，林彪七年都是在养伤（所以苏联保有完整的林彪医疗档案。九一三之后，当苏联知道是林彪一家摔死在温都尔汗，还专门派人去挖开坟墓，将林彪头颅割下，带回莫斯科鉴定）。日本投降后，毛泽东派林彪赴东北，从华北、山东调大批部队北上。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将日本关东军全部武器交给林彪，所以东北发展很快，仅1946和1947两年，发展到八十万大军，号称百万。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林彪电邀毛泽东来东北，被毛婉拒。毛泽东自己觉得留在西北华北更放心。

2、林彪和毛一样信奉独裁

在外人看来，比如蒋介石看，毛泽东打天下靠的是三个帅才：刘伯承、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德高望重，什么也不争，和朱老总一个类型。朱德也是什么也不争（不争名次），不同的是，朱德仍围着毛泽东转，如每年都在一个浴场游泳。刘伯承则很少见人，很少见毛泽东。彭德怀其实也不和毛泽东争，彭德怀庐山那封信，任何人看了也不会以为彭有任何阴谋诡计。唯一耍阴谋诡计，

谋毛泽东皇帝位的，就是林彪，而且几乎给他谋成。

但是刚打下天下时，林彪并不着急，能打胜仗的人，第一要深谋远虑，第二要稳。林彪不是一个鲁莽的人，更不是他那个没过门的儿媳妇在《尘劫》中描绘的一个跟着老婆孩子转的病老头。林彪是一个运筹帷幄、洞察秋毫、不露声色、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帅才。他只信「兵不厌诈」，「胜者为王」，还有一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个小妇道人家，怎么能看透林彪？毛泽东是开国皇帝，跟林彪共事一辈子，从绿林好汉到登上金銮宝殿；又过二十年，把林彪捧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尚未完全看透此人，何况你我区区一介平民。

刚打下天下，野战军这一级指挥权立即撤销，各路元帅、大将各居高位，但实际领兵权都下放给兵团一级，即上将这一级。兵权分散了，也无造反的可能了，上将几十个，不可能有一个一呼百应。东南沿海尚未扫清蒋介石残余部队，朝鲜战争打响了，毛泽东请林彪领兵入朝；林彪托病不出，实际上是不同意入朝作战。父亲曾对我说过，毛泽东对林彪托病不出，不大满意。

现在回过头看，我认为从军事和经济上考虑，也许毛泽东的「与其你打过来，不如我打过去」有道理。如果毛泽东不太意气用事，他应该派周恩来去南京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握手言和，因为美国明摆着没有用武力阻止解放军过江。论述毛泽东胜利后第一个战略性外交失误时，我说过，如果美国真要帮蒋介石划江而治，南、北中国，美国是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美国不做就是因为美国愿跟毛泽东打交道，而毛泽东却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误，拒绝跟美国人打交道，这一外交失策，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什么如此博大渊深的毛泽东，会一头栽进斯大林的怀抱？并不是因为毛喜欢斯大林，只是因为毛喜欢独裁；其实毛泽东对斯大林一直是怀有不满，因为第三国际一直是支持周恩来、王明压制毛泽东的。沙皇侵占了那么大片中国领土，列宁、蒋介石、毛泽东都不承认沙皇和清廷签订的两个不平等条约。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手上，却和普京划了界，中国人民还都蒙在鼓里。为什么钓鱼岛，天天跟日本在吵吵闹闹，还自称「民族主义」？对台湾也天天喊打喊杀，什么主权、领土完整，天天瞎吵闹，划掉几百万平方公里，悄悄就做了。那些「民族主义者」，屁也不放一个，天天演大辫子戏，「还想再活五百年」（按：大陆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

毛泽东外交政策重大失误，我在前边提到过，直接原因是他不了解美国，不知道，也不懂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或者毛本能地感觉到，这个理念和他的封建帝王的实际追求是相冲突的，而沙皇再坏，斯大林再不好，独裁这一条是和毛一样的。毛领导的农民革命胜利之后，一头栽进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即独裁阵营，毛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是一个因素，但根本因素，是毛统治理念是独裁而不是民主。在这一点上，林彪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差别，林彪上台，照样独裁。

3、林彪推父亲当总参谋长

毛泽东拒绝跟美国人打交道，对中国第一个灾难就是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美国人仁川登陆后，中、美互不知底牌，毛泽东估计美国人会打过鸭绿江，林彪则认为不一定。林彪认为，如果美国要介入，为什么解放军过长江的时候不介入？那时起码蒋介石还有半壁江山，还有一个国际承认的政府，谁对谁错？当时谁也不知道，估计不同，都有道理。这场冤枉仗，中国死了一百万，美国人死了五万，两败俱伤，中美之间结了一个大怨，救活了小王八蛋金日成，现在小小王八蛋金正日、金正恩还在捣乱；当年不出兵，让美国把金日成灭了多好。

林彪在朝鲜战争时托病不出，跟毛泽东结了一个小怨；紧接着就是高岗事件，林毛又结了一个大怨。本来一进北京，林彪就几乎很少露面，高岗自杀身亡后，林彪离开北京去上海居住。林彪和毛泽东唯一的联系，就是时不时毛泽东让父亲去看看林彪。父亲跟我说，每次去看林彪，林彪就说他在专心研究医书，有一年突发奇想，说要「减压」治病，要去西藏住，因为西藏气压低，林彪还给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告诉父亲：「你去看看林彪，告诉他不要去西藏。」周恩来也说：「你去看看林总，就说大家都不同意他去西藏。」他们这些人不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这一级干部去哪儿都得中央批，不批就去不了，当然也得劝，这又是爸爸的苦差事。

又比如林彪说睡不着觉，必须在火车上睡，于是就挂个车皮在火车上东转西转，让他睡觉。总之，林彪哪儿的事都是怪怪的，现在去翻那个时期的照片，也很难看到林彪和大家在一起的。一直到五九年庐山会议，林彪根本没打算参加会议，是因为彭德怀的事发生了，毛泽东临急临忙派江青去请林彪上山。林

彪上山后，把彭德怀大骂一通；过去打仗，一、三军团是通力合作的，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谁也不会出卖谁；这一次，林彪可是落井下石。

彭德怀被撤职后，毛泽东请林彪出山，林彪欣然应允，然后对毛泽东说：「我身体不好，管不了太多的事，让罗瑞卿当总参谋长吧。」林彪这个建议当然第一是投毛所好，因为林彪知道，毛泽东对他并不是太放心；如果不是突然出个彭德怀事件，毛也不会请他出山。林彪研究了十年「医书」，他可能悟出了一点抢班夺权的道道，他抓住机会助毛铲除彭德怀，欣然应允接任国防部长；但林彪欲擒故纵，他推荐一个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当总参谋长，掌管军队实权，他自己则仍然游山玩水，称病不出，以让毛放心。

林彪建议父亲当总参谋长，另一用心是想拉父亲上他的贼船，像后来的黄、吴、李、邱，在林彪看来，罗瑞卿应该是「林彪的人」，红十一师、红四军、一军团、一方面军，林跟毛，罗跟林（在外人看来，林彪、彭德怀都是「毛泽东的人」），林彪并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对父亲如此信任，一进北京，毛就亲点父亲当公安部部长、公安军（相当今天的武警）的司令兼政委，组建中央警卫团（师），即后来的 8341 部队（禁卫军）。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把禁卫军的指挥权交给谁，就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谁，忠心能干的人很多，但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则不多。

4、七千人大会毛林合谋倒刘

林彪初掌国防部长，跟父亲有一段蜜月期，林彪明确指示，大小事直报军委主席，抄我备案即可。在两家的关系上，林彪还经常让叶群带着孩子来我们家玩。1961 年在广州，叶群知道我们要去海南岛，就说：「把我们老虎带上吧。」于是老虎就跟着我们去湛江、海口、榆林转了一圈。老虎小时候其实是个很腼腆的男孩，在大人面前说话脸都红，相处长了好一点，我们单独在一起，他的话才多一点。有一次，他跟我说：「我妈那张嘴，死人都能给说话。」吓了一跳，我想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妈？他还从他的小盒子里拿出一些香港杂志上剪下来的美女穿很少衣服的照片，那在当时就属于「黄色照片」了，父母是绝对禁止我们看的，他则告诉我，这是他姐姐的收藏，被他偷偷拿来。他还告诉我，他姐姐写日记，叶群就让他去偷偷拿来他姐姐的日记给叶群，然后再让他偷偷放回去，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家里的事也是怪怪的，怎么还偷来偷去？

我们两个也算好朋友。回到广州后，要开学了，一大帮孩子在广州要回北京，空军司令刘亚楼就来说：派架训练飞机把这一帮孩子送回北京吧。大家当然皆大欢喜，于是通知各家，第二天装满一架飞机回北京。我上了飞机，看见老虎坐在最后一排，非常奇怪，就走过去问他，为什么不靠前坐？那时都认为前面座位舒适，他就不动，于是我坐在他旁边，他悄悄跟我说，后边好，万一有事，后边的存活率高，又吓我一跳，因为那时我们都很少想到这种事，空军也从来没出过事。十年之后，他就摔死在蒙古。

林彪长年不在北京，只偶尔参加一、两次军委或中央的会议。林彪大部份时间在苏（州）杭（州）一带，夏天在大连，冬天在广州，但除了一、二次开会，他从不和毛泽东在同一时间呆在同一城市，你来我就走。毛、林也从来没有互相探访过，即使林彪重拳出击，在毛泽东面前告爸爸的刁状，也是林彪写个纸条让叶群拿着去杭州看毛泽东，他自己在苏州不动。

林彪 1959 年 10 月当上国防部长，1960 年就开始「饥荒」，党内批评声起，大家对大跃进、对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开始反省。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对着毛泽东的三年自然灾害来的。陈云的「工农业都要退够」、「三自一包」也是毛泽东听不顺耳的。在这一片批评声中，毛泽东也不得不做了点自我批评。

但七千人大会，只有林彪继续吹捧毛泽东，林彪说：「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胜利，凡是脱离了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们就失败。」这几句话在战争时期是对的，但这十年建设没搞好，却是因为毛泽东指引的方向不对，或者说方向对（十五年超英赶美）而方法不对（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林彪这一番话，毛泽东非常受用。我在前面提过，毛泽东还特别问过父亲：「你能不能讲出这番话？」

5、突出政治与大比武的分歧

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后，什么也不管，只管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版毛主席语录。到 1963 年，经济形势在刘、周、陈、邓调整三年后刚刚好转，毛泽东即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于是将在全军进行了三年左右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了全国；与此同时，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调子一浪高过一浪。「一句顶一万句」、「顶峰」，无所不用其极。一般情况下，父亲对林彪提出的意见，

从无异议。但当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时，父亲觉得这种提法有点欠妥。这是林彪在一篇解放军报的社论里加的一句。

当时还要考虑「国际影响」，自己说自己是顶峰，是否合适？甚至毛泽东是否同意？更重要的是，「顶峰」不合辩证法，还发展不发展？理论问题，只好去请教康生。康生是个滑头，他知道「顶峰」这个提法肯定是不合适的；但康生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康生哼来哈去，不说是，也不说否，直接去请示主席吧，也不妥，实在左右为难，最后还是写了「顶峰」。但父亲的疑问「顶峰，还发展不发展」，还是通过报社的人传到林彪的耳朵里，文革中就成了父亲反毛泽东的一条罪状。林彪垮台后，又批「顶峰论」，我都觉得可笑，同样一件事，一会儿全是坏，一会儿全是好。

林彪高喊「突出政治」，父亲就接过林彪的口号，说：「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就是说不能光背语录，还要把本职工作做好，枪要打得准，车要开得稳，于是掀起全军练兵高潮，成绩显着，俗称「大比武」。1964年向中央主席汇报表演，党、政、军几乎全体领导干部到场，毛泽东兴致勃勃，但林彪却不露面。

当时上面想的就是练兵为了打仗，防苏修北面来，美帝南面来，蒋介石东面来，林彪提出「北顶南放」，意思是顶住北边的入侵，南面则放敌人进来再打。毛泽东在观看比武休息时，与在场的中央领导、各大区书记说话时，提出：「战略方针是北顶南放还是南顶北放，还可以研究。」中央就此发了文件，林彪对此当然也很不高兴。总之，林彪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到1963年就有了磨擦。1964年初总结工作，林彪说：「军事训练冲击了突出政治。」父亲说：「一年来军事训练成绩显着，得到中央和主席肯定，问题是个别的，气可鼓不可泄。」

这就已经明显地有不同声音了。文革中这又是父亲的一大罪状；文革后平反，又说大比武是叶剑英的功劳。我就问那些写文章的文痞，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事，就这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可惜中国这样的文痞太多；《长征》电视剧胡编乱造；《三大战役》电影竟把邓小平捧为主角，党史有意歪曲「文革」，无人问津；抓「四人帮」，不提华、汪，却捧叶、李——都是胡说八道；讲改革开放，竟然十年没有总书记，没有总理，也敢演。我看这些人篡改历史的胆子和日本人也没什么不同。读者以为如何？

言归正传，1963年后，父亲明显地感到林彪那儿的事越来越无所适从，比如去看他，他说坐在那儿等，心焦，出汗，所以以后去，不要事先通报了。你事先不通报去看他，又落个「突然袭击」的罪名；再比如，总参作战会议，开完后请林彪去总结发言，林彪不去，于是父亲总结发言，刚发完言，林彪说：「作战会议只有军委主席才可以总结发言。」事先你又为何不说？这不是明显找茬吗？

每当闹僵，叶群就出面扮和事佬，说：「没事了，我已经做好林总的工作了，总长辛苦。」父亲非常反感叶群，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但父亲为了团结，为了大局，却没把这些事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这其实铸成了一大错。上海会议时，周恩来对父亲说：「你和元帅们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我们都不知道。」父亲说：「和林总之间有些磕磕绊绊的事，事后叶群都说『没事了』，和其他的元帅，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紧张。」

6、毛说罗瑞卿搞错了，却不平反

林彪要谋毛泽东的大位，必须拉父亲上他的贼船，林彪处心积虑，软硬兼施，就是不断地试探父亲。文革开始后，林彪有一篇关于军事政变的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像罗瑞卿这种人，又掌握军队，又掌握公安，是最危险的人物，.....」林彪这篇讲话却露出了马脚，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林彪垮台后公布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明显地表明毛泽东对这篇讲话非常不满。为什么不满呢？我猜毛泽东是在想，全党、全军没有谁想军事政变，就你林彪天天在捉摸军事政变。

三番五次威逼利诱，父亲不从，林彪不得其解，于是利用刘亚楼（上将，当时的空军司令，原四野的参谋长）进行最后一次试探。这就是我前面描述的，1965年5月1日，我随父母亲去上海探视已到肝癌晚期的刘亚楼。刘亚楼对父亲说：「大罗跑了，林总很伤心，现在小罗又要跑。」这个话实际上已经很离谱，但父亲却没有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及至上海会议，叶群就造谣，说父亲通过刘亚楼传话给林彪，让林彪「让贤」。元帅、国防部长说：「有。」大将，总参谋长说：「无。」怎么办？毛泽东说：「先挂起来。」又是一个「先挂起来」！（前一个「先挂起来」是七小时说二军团几员大将告父亲「乱杀人」）。上海会议反罗瑞卿，和庐山会议反彭德怀，气氛完全不同，中央其他个常委（毛、刘、朱、陈、邓）没有一个

附和**林彪**的。**毛泽东**最后也明确地说：「**罗瑞卿**反你（你**林彪**），没有反我。」会后也只是让父亲辞去军队的职务，党、政职务不动。在**毛泽东**看来：已经给父亲留够了面子，毛实际就是把**罗瑞卿**冷藏起来，而且对**林彪**是个威胁。在**林彪**看来，打倒**罗瑞卿**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只是父亲太耿直，对**毛泽东**、**林彪**之间阴谋诡计来、阴谋诡计去的做法非常不适应，对自己新的位置非常不适应，以死抗争，铸成大错。在毛、林这盘对奕中，原来**毛泽东**是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给父亲，父亲的刚烈，当然毛很不满意，所以虽然随着毛、林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毛泽东**在训斥**林彪**时多次提到**罗瑞卿**；在**林彪** 913 逃跑后也明确指出**罗瑞卿**的事情「搞错了」，但**毛泽东**却没有认真地过问一下父亲的情况。如果不是**邓小平**力争，恐怕**毛泽东**也想不到为父亲平反，而且即使平反，也至死未再见一面。

但也正是因为父亲的刚烈，才使父亲根本没有参与毛、林这场完全脱离人民利益的权力之争，留给民间一个清白的名声，这是我们全家十分欣慰的；而父亲在帮助**邓小平**从**汪东兴**手里夺回了中央警卫团（师）的领导权，从而奠定了**邓小平**夺权的基础后——我们认为的夺权，是夺回一个**中共**中兴，重新回到与人民利益一致的机会——又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从而使我们根本没沾**邓小平**权钱交易、官僚资本主义的污水，也使我们全家在百般痛苦之余，也稍稍有些欣慰，我只能说，可能这是天意。

7、林豆豆编织**林彪**被绑架神话

至于为什么**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已写入党章，但仍等不及，而要抢班夺权？这实在不合常理，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唯一可能的理由，就是**林彪**认为自己的健康不佳，来日无多，活不过**毛泽东**。**林彪**虽然小**毛泽东**十二岁，但负过重伤，毛则没负过伤，即使从外表看，林的身体也不如毛。

林豆豆自**林彪**摔死后就为**林彪**翻案，说**叶群**不好，老虎不好，**林彪**好。**林彪**是被**叶群**、老虎绑架上飞机的。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我的一个小妹妹突发奇想，和**林豆豆**握手言欢，回到家里跟妈妈说：「**林豆豆**想来看你。」妈妈说：「我不见她！」又跟我说：「**林豆豆**问你好。」我说：「我坐监时，她为什么不问好？」总之，一家人也是泾渭分明。

毛泽东、**林彪**这场「党内斗争」，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永远的谜，大的脉

络可以看清，双方都认为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为什么，谁也说不清。毛泽东说的是假话，什么当不当国家主席，林彪根本不会在这种事上与毛冲突。林彪没说话就死了，周恩来不想说话，所以就没人知道具体原因了。林豆豆也说不清，只是自己编了一个林彪被叶群、林立果绑架的神话。

所有共产党当权的国家，都解决不了接班人的问题，和封建主义的皇权一样，在阴谋诡计中斗来斗去；而资产阶级进步之一，就是抛弃了这种落后野蛮的杀戮，而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的选举制。由于进步，共产党也不能世袭，也要玩弄选举制度，但实际上还是世袭，指定接班人，而不是民主选举，所以和封建制度一样，一窝不如一窝。因为谁也不会指定一个比自己能干的人来接班，只会指定一些吹牛拍马屁的。如毛泽东，打仗是第一，但经济建设不行，毛泽东就不会指定经济建设比较在行的刘少奇、周恩来接班，而是指定吹牛拍马的林彪。邓小平也一样，容不下胡耀邦、赵紫阳，所以就指定没什么创意的江泽民、胡锦涛，不仅人民没发言权，党内也没几个人有发言权。其实，人人都看得出来，这种「选」接班人的方法，根本就是封建主义的世袭制！

林彪是比毛泽东更封建、更专制、更法西斯的人物，稍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林彪如果「刺秦」成功，中国政治只会更黑暗。有人批判文革，批判毛泽东，却赞美林彪，如果不是幼稚到可怜，就是不可思议的邪恶思维。

文革是毛泽东、林彪两家封建法西斯军事专政，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在漫长的十年里，学生不上学，工人不做工，翻翻世界史，还能找出第二个？毛泽东何以敢一个人向全党宣战？何以能一个人打垮一个党？就是靠林彪的吹捧，造出一个神，人民子弟兵变成毛泽东的私家卫队，然后鼓动红卫兵去打砸抢，没有法律，任意杀人。毛、林两家私相授受，顺我者昌，什么乌龟王八都鸡犬升天；逆我者亡，党内党外，有起码良知的人，都打入十八磨地狱，十年时间，在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出荒谬绝伦的丑剧。吹捧者和被吹捧者丑恶荒唐得登峰造极，蛮横、愚蠢得登峰造极，都可称得上前无古人（但愿后无来者）。

这场文革丑剧刚刚结束三十年，我们这个民族离彻底检讨，诚心忏悔还差十万八千里，国内是由于共产党的压制，但这个时候国外突然冒出一支赞美林彪的怪声，实在可怕。如果这些人不是和林彪集团有任何渊源，就说明民主阵营中的思维有多么混乱，标新立异，不知所谓。毛泽东是开国之君，他在历史

上的定位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林彪是中共党章写上的接班人，然后驾机外逃，摔死在蒙古。毛、林互斗四十余年，就是皇帝和奸臣之争。

8、中国的大敌仍然是封建主义

我认为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研究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必须尊重事实，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进步或者退步。然后再研究为什么会发生。领袖、党、人民在各自的位置上都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必须从文化根源上去寻找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原因，然后才能清醒地指导我们未来的行动，赞美「五七一工程」之所以绝对错误，绝对愚蠢，绝对反民主，就是因为：

毛泽东的文革是违宪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是违宪

华国锋、汪东兴捉四人帮是违宪

邓小平「六四」是违宪

中国今天需要的是民主宪政，中国现在有的是铺天盖地的谎言，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到林彪的「顶峰」，到邓小平的「永不翻案」，到江泽民的「代表」，到小胡的「和谐社会」。中国人民在谎言统治下生活了五、六十年，所以才有今天的假酒、假药、假女人、假文凭.....无论什么人用赞美一个邪恶去反对另一个邪恶，也是假民主。

从中南海到全国各地，党政军、公检法各级官僚天天都在违宪执政。由于官僚违宪，人民没有宪法规定的权力，工、农、兵、学、商，全国老百姓也干出很多违宪的事，这就是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小胡提个新三民主义，却不敢触及根本：权为民所授。因为他们的权力是私相授受而来，根本没有民意基础。今天中国共产党最怕的就是选举。几乎全世界都有了选举，虽然有真有假，但没人敢说不选，只有中共，在全世界面前蛮横不讲理，硬说中国人，没能力「选」，似乎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人。

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是民族革命，但没有引进先进民主制度。中国实际上还在封建主义统治之下，直到今天，虽然有一部宪法，但无人尊重。一切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各阶层尊崇的「潜规则」，追根溯源，仍是封建主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仍然是封建皇权，毛泽东、邓小平都自认为是皇帝。中国今天的民主运动，仍是反对封建主义，任何宣扬封建主义的东

西，都是错误的，不仅不能用宣扬暗杀去促进中国民主，几乎也很难用武装斗争去促进中国的民主（这是另一个话题）。

看起来，今天中国的形势，世界的形势，为人民利益计，不是拉大旗上井冈，而是进行宪政的斗争，向共产党争取基本的宪法写明的公民权利，揭发当权者一切违宪执政行为。世界大势是民主潮流滚滚向前，中共反民主螳臂挡车，如不自主改革，必将被民主大潮淘汰。民主虽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没有民主，中国的问题肯定解决不了；有了民主，中国的问题就可能逐步地得到解决。

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清统治的斗争，是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封建主义的党，国、共之争是兄弟之争，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但国、共的灵魂相同的，就是封建主义。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相同之处是封建专政统治。不同之处嘛，当然很多。

口头上喊着全民所有，手上干的是官僚所有，中共扼杀了资本的灵魂，却想用资本主义的钱，来救一党专政的命，谁都知道邓小平的这一总设计是死路一条，所以共产党的贪污才一发不可收拾。

从邓小平家族开始，中央到省、地、县无官不贪，为什么？就是因为谁也不信邓小平这一套官僚资本主义能混得长，都是想捞一把赶紧跑。老百姓最恨贪腐，当年国民党就是败在贪腐上。现在共产党的贪腐甚于当年的国民党，还能混多长时间？

中国人民的大敌仍然是封建主义，不仅中共是用封建意识在维持统治，而且由于封建意识潜移默化无孔不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仍被封建主义所统治，国民不知道自己的权力，对官员为非作歹的麻木不仁，对社会不公给周围的人群造成的灾难视若无睹，这一切封建糟粕，仍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人们的习以为常，是可怕的力量。幸亏开放了，这一点是唯一可给邓小平记的一功，世界民主之风，借助信息的流通，吹进了中国，可以加快中国人民消灭封建主义的进程。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毛泽东是最后一个开国皇帝（但愿如此）；林彪是谋毛泽东大位的一个奸臣，这个奸臣战功显赫，但谋反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今天反封建主义，就是反中国共产党，谁来反？反封建主义的主要力量来自自

由资本主义。但中国只有官僚资本主义，很少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资产阶级尚未形成气候。

9、为林彪设想上、中、下三策

林彪在现代中国，或者说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中做出了一个非常坏的典型，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这也不能全怪罪林彪，也是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自己也给中国人民做出了一个非常坏的典型，即明知林彪居心不良，却仍利用林彪吹捧自己，置国计民生于不顾。这是一场封建主义导演的主席与元帅之争，而中国人民如果不关心诚实和欺骗，只关心「成」和「败」，中国人民就永远无法进步。

所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就又上演了一场尔虞我诈的戏。资产阶级的进步就在于它看到了这个问题，不争是不可能的，不争就没有进步。资产阶级规定一个公平透明的权力争夺的文明规则，不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去争。小布什说谎，林彪也说谎，但美国人选他，别人有什么办法，好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允许人们觉悟，允许批评，允许下次不再选你。

在中国的封建史上，像林彪这样的奸臣也不多见，而且几乎给他搞成。从我个人和我的家庭角度来看，当然林彪摔死在蒙古是最好的结局，但我确实为林彪着想过。我认为林彪的上策是辞职，中策是坐在北戴河或北京，不再坑气，闭目养神，下下策才是摔死在蒙古。

有些读者可能不理解我，我几乎被林彪整死，林彪集团甚至把我关在死牢里（与死囚同室）恐吓我。四十年过去了，我还有为林彪想上、中、下策，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为了中国进步。当年林彪集团恐吓我，我的表现是「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词）。我的思维是：看你共产党能封建法西斯到什么地步！

他们以为我会被吓傻了（确有些年青人给他们吓傻了，自杀的、神经错乱的都有），看我如此轻松，这帮人气得嘴歪鼻子斜，拿我没办法。我从小就只认「理」，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邓小平也好，有理我就拥护；没理，我就反对。当然，我的理是民主、自由、平等，不是他们那套封建主义的理。他们不跟我讲平等，我跟他们讲平等，所以我比他们进步！

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这股正气：只讲是非，不认权势。封建主义的是非就是权势，谁官大，谁说了算，皇帝老子，一槌定音。民主政治则是法律定是非，

官再大，总统也有法律管着。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良心，读书识字而无良心，称不起知识分子。今天中国大陆读书识字的群体，可称得上知识分子的没有几个。读书识字者的主体已沦落为腐败官僚，欺诈商贾和吹牛拍马的文痞、（娱乐界）戏子。我们中华民族如何兴旺发达？！

10、林彪若成功，中国会怎样？

我在花园给花淋水时，在泳池边散步时，往事常常在心里盘旋。难免不断地比较刘（伯承）帅、彭德怀和林彪；讲战功，三个人不相上下；讲人品，刘帅高风亮节，看破红尘，打下天下后，即闭目养神，不再吭气，因此也寿终正寝。彭德怀人品上比不上刘帅，彭老总是粗人，虽然有一些邪的、歪的事，但还称不上阴谋诡计。正因为彭德怀是粗人，所以有很多基本的封建主义道理他没想清；比如，彭德怀有意无意总视毛泽东为「哥们」。打天下时，你视毛泽东为「哥们」，可以；但坐天下时，你还视皇帝为「哥们」，那皇帝就不高兴了！

有些事，彭德怀是强加于毛泽东；比如军衔，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我就不赞成扛两块牌牌。彭德怀当没听见，非要授不可；毛泽东没办法，也就授了，但总别扭；而且更小的事，毛泽东交几个女朋友，彭德怀也七嘴八舌，当然皇帝更不高兴，到庐山会议，就是总爆发。毛泽东得罪人，就把人得罪到死，我相信毛泽东心里明白得很，他是冤枉了彭德怀的，但毛泽东为了树皇威，他就宁愿冤枉死为他打天下的元帅。林彪，当然人品上是最差的；没机会，林彪也是闭目养神，一等也可以等十年，但一有机会，林彪就专搞阴谋诡计。林彪自以为高明，其实毛泽东早看透了林彪；搞阴谋诡计，林彪搞不过毛泽东。

天上有星煞，地上有英雄，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毛泽东的时代，实在是英雄辈出，这些元帅、大将，哪个不是在千军万马中出生入死之辈！打仗是真本事：胜就是胜了，败就是败了，靠吹牛是没用的。打完了仗，坐了天下，怎么变得越来越靠吹牛拍马过活了。有谁明白，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自己也不明白，吹牛不需要动脑子，胡吹。但全民族就跟着起哄，这却是最可怕的！所以我说中国的宪法只是一纸空文，大家遵守的是封建主义的「潜规则」。

国民从小受的教育，就不是宪政保障的权力，不是民主、自由、平等；国

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也不许想，那也不许碰。我们学生年代，还公然提出什么「驯服工具」论。我在前面提过，我曾在耀邦面前把共产党的教育痛骂一通，耀邦也不回骂我，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他自己已经是总书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自己也没有宪法保证的权力，他也是要遵守封建主义的潜规则。

林彪如果篡权成功，他肯定要把班交给儿子老虎，中国的封建长夜只会更漫长，我个人的命运读者可以很容易想象。我想象的却是中国的命运。

【叶剑英及其子女】

叶剑英对毛泽东最大的贡献是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东、西两路北上抗日，东路毛、周带一方面军主力，徐向前带四方面军一部主力，西路张国焘带四方面主力，朱德象征性带点部队随行，只是为了显示团结。当时，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八万余人，一方面军不足二万人。据说张国焘给徐向前发来密电，指示徐向前消灭毛、周中央，此电报被掌管机要的叶剑英先收到，于是警告毛泽东带部队迅速脱离徐向前所率四方面军一部主力。

据父亲告诉我，一方面军北上，四方面军南下，徐向前指示：红军不打红军，于是双方脱离接触，四方面军南下又过草地，然后又返回北上，有很多部队是三过草地。朱德等人则是在毛泽东到达延安后，脱离四方面军，自己去的延安。有关这个电报，叶剑英说有，党史上也写上了。徐向前说无，文革之前我就听爸爸说过，说徐帅说根本没有电报这回事。爸爸离开我们之后，妈妈带我去看徐帅，在北戴河海滨，我亲耳听徐帅说：「都说有什么电报，拿来看！」把手一伸。徐帅临终，还给中央一个报告，还是说没这个电报，这都在军委档案里。我相信徐帅是真话，如果真有电报，拿出来示众就是了，但谁也拿不出来任何电报。

1、文革前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叶剑英对邓小平的最大贡献就是华、汪一网打尽四人帮后，叶剑英出来哄住华国锋，说：「老家伙们没人跟你争。」让华国锋真的相信了邓小平出来也只是给自己抬轿子。其实华国锋开始也有点犹豫，叶剑英就出主意，说让邓小平发个誓：「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并将此发言发至全党，这下你华国锋该放心了吧。果然把华国锋说动，放邓小平出山。邓小平一出山，和叶剑英联手，三拳二脚，没用三年时间，就将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

这帮文革发迹派踢入历史垃圾堆，这时叶剑英吐了真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叶剑英和我们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在延安，叶剑英的一儿一女，选宁和向真与我大哥大姐年龄相仿，于是选宁、向真认我父母为干爹、干娘，而我大哥大姐认叶剑英为干爹，至于有没有干娘，父母就没提过了，因为说这件事的时候，叶剑英身边已没有夫人了。叶剑英进城后在广州当市长时娶了一个小护士当老婆。1956年在北戴河，由于叶和其他小护士睡觉，这个已成为夫人的原来的小护士大哭大闹，脱光衣服要投海自尽，从房子里跑出来奔向大海。警卫发现后就赶紧追，一个前面跑，一个后面追，在浅水处已追上，警卫膀大腰圆，无论小夫人如何挣扎，硬是把个光溜溜的小夫人拖了回来，闹得北戴河沸沸扬扬。

于是说小夫人是精神病，送去医院，再也未能回府，叶剑英从此也再没结婚，但谁都知道，是小护士陪睡，过一阵换一个，走的照样成家立业，而且有的还经常带着丈夫、孩子回来看看，开生日会等，关系良好。叶剑英去世后，那个曾被送进精神病院一阵的小夫人，还来家里看妈妈，请妈妈帮她向中央要求恢复她的叶剑英夫人的地位，妈妈说：「这我可帮不了你。」

文革之前，叶剑英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没什么具体事。李志绥医生的书里说，周恩来跟汪东兴说：「这么多人，就彭真管点党的事，罗瑞卿管点军队的事，我管点政府的事，其他人都只是说说，不管具体事。」这种情况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是由于本事太大了，继续干，毛不放心了，如刘伯承、林彪；有些人是让毛弄得无所适从，所以索性不干了，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叶剑英是属于毛绝对放心，局官厚禄，养尊处优养起来，有事就拿出来用，没事就让他东逛逛，西逛逛。

比如上海会议开完，父亲「辞」了总参谋长的职，「挂起来」，中央就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审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邓小平根本不闻不问；彭真那时因《海瑞罢官》已自身难保；剩下叶剑英就主持1966年3月京西宾馆会议。上海会议毛泽东说：「罗瑞卿反你（林彪），没反我……」京西宾馆会议，叶就顺势上纲上线：罗瑞卿也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父亲以死抗争之后，叶剑英还做诗骂父亲，什么「将军一跳万古臭」。

2、说动华国锋放邓小平出山

文革中，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大字报，骂叶剑英是「花花元帅」，叶剑英摇摇欲坠，毛泽东还是保他。毛泽东非常喜欢叶剑英：没什么原则，什么都可以是好，什么也都可以是坏，浑身辫子（浑身缺点，可用来打倒），所以也不会造反。（注：共产党内把缺点称辫子，如婚外情，抓住缺点不放，就叫抓辫子。）林彪一垮，叶剑英就被毛拎出来主持军委常务工作，但叶剑英年轻时，周恩来也非常喜欢他，八年抗日战争及国共和谈期间，叶剑英都是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国民党打交道。

毛泽东信任叶剑英，最后表现在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班子，以叶剑英为右派（老家伙当时都称为右派）首领。原来这右派首领毛是考虑让邓小平当的；临终考虑再三，知道四人帮也好，华国锋也好，斗不过邓小平，于是把邓小平拿掉。如果华国锋得了毛的真传，让叶剑英为首的右派和四人帮为首的左派互相咬来斗去，华靠汪东兴、陈锡联是可以坐稳大位的，因为叶剑英为首的右派绝无胆量消灭四人帮。后来一些文章说什么叶剑英、李先念在捉四人帮的决策上起了多大多大作用，纯粹是胡说八道。抓四人帮就是华、汪两个人决定的事，但华知道，叶、李肯定会拥护让他捉四人帮的。华国锋不知道的是，他逆了真龙天子的真传，左派一亡，右派就会吞噬他了。

叶剑英比较得到华国锋的倚重，一方面因为四人帮江青一伙张牙舞爪，吓着了华国锋；另一方面因为叶是毛传给华的唯一的一个元帅。华国锋毕竟在军中威信不高，华对叶的老谋深算估计不足，最终听了叶剑英的话，而没听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一大批文革发迹派政治局委员的话。这是叶剑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创造的一个奇迹。按理讲，华国锋继承的是毛泽东的衣钵，毛认为他死后谁也驾驭不了邓小平，华如何能有信心可以驾驭（邓小平）呢？！本身是文革发迹派的华国锋，都力排本派的众议，听信并没有什么深交渊源的叶剑英的话，放邓小平出山。

华国锋这个决策不大合常理，我们当时也是惊喜，即没想到这么顺利邓小平就出来了。当时形势，华国锋掌握大局，没有华点头，邓绝对出不来！叶剑英完全用君子的手段，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华国锋，当然也是欺骗了华；但叶剑英没有用、也不拥有任何非常手段，因为当时军队和安全完全掌握在曾任

公安部长的华国锋手里。华国锋是自愿受骗上当，这在中共党史上也是特例。毛泽东搞党内斗争是在完全掌握军队、公安、中央警卫团的情势下，威而不露；华国锋对付四人帮，依靠的是中央警卫团；邓小平对付华国锋，完全是毛泽东模式，也是威而不露；只有叶剑英对付华国锋是只凭口舌，没用枪，也没有枪，完全在宪政架构内和平进行，没有一丝一毫武力和武力相威胁。

恰恰是这一点，党史上不敢宣传，因为一宣传就反衬出了其他历次斗争都是违宪之举，都是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包括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都是违宪。实际上是叶剑英颠覆了毛泽东亲点的华国锋政权。因此，从历史上讲，是叶剑英颠覆了毛泽东政权，使中国走上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完全符合事实。毛泽东想到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会在他死后颠覆他的政权，但毛泽东没想到叶剑英会在他死后颠覆他的政权，而且完全是使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叶剑英是毛泽东信任的人，而且是大家都认为不大有什么作为的花花元帅，但恰恰就是这个花花元帅扭转了乾坤，所以中国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毛泽东机关算尽，把邓小平也算得一清二楚：一是怕群众，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就是没算到叶剑英。

邓小平出山之后，形势就很明朗了。华国锋不是对手，华、叶、邓时期，实际上是很短时间，掌握大局的就是邓了。叶对邓是言听计从；邓对叶是毕恭毕敬，只有在人事安排上，如果邓认为叶提出的意见不合适，邓寸步不让；其他事，邓对叶百依百顺。比如，华被整下台后，开始是副主席，胡耀邦说，不搞主席制了，改总书记。华对叶说：「我当个常委吧？」叶说：「我同意。我去跟胡耀邦说。」叶跟胡一说，胡答：「大家都不同意华当常委。」

叶说：「那就让华当政治局委员吧。」

胡说：「只能当个中央委员。」

至此，华国锋划上了句号。再比如，叶剑英提议让杨成武接邓的总长，邓坚决不允。这些事，叶剑英虽有一点不满，但从认真不高兴

叶剑英「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过他一次。在西山军事学院内，他有一住宅。院子里有一个好大的游泳池，当时的北京除了毛泽东有个私家泳池，这是第二个。我们去看他，只是因为他年事已高，来日无多，毕竟两家近半世纪是那么熟。文革前，叶剑英有些家务也找过妈妈；像叶向真出嫁时，

叶剑英打电话给妈妈，说：「治平啊，你干女儿要结婚了，你给嘱咐几句吧。」妈妈说：「好吧，让他们来吧。」没多久，叶向真带着刘诗昆来家里，妈妈带着我和妹妹迎接，弹了一遍钢琴，然后说了一通好好相亲相爱之类的话。

事后我听妈妈跟爸爸抱怨，说：「让我说，我说有什么用？他自己天天乱七八糟，还能教好儿女？」爸爸则不吭气，也就是这个叶向真，文革造反，带着艺术学院的学生去我家里捉母亲，自己亲手拿皮带抽打母亲。文革后，这个叶向真再未露面，处处躲着，直到今天，仍是到处招摇撞骗。叶剑英知道文革中的事，所以在在我们面前从不提叶向真。他原来可能以为我们去看他会提什么要求。这在党内也是传统，老人走了，夫人或小孩就要提些要求照顾的事，一般就是工作、住房，也有人干脆要钱。但我们根本就不会想这些事，他看我们根本无意谈什么「要求」，所以也只是说说华国锋、杨成武，问问小孩们如何，这也就是最后一面。

叶剑英一切准备得停停当当，无悔、无恨、无忧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讲的寿终正寝。叶的大儿子叶选平，当了广东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六四」时和邓、杨也不同流合污，但也没撕破面子，不过是调回北京当个政协副主席。二儿子叶选宁退休后，住在珠海花园洋房，老婆在澳门经营赌场生意，一出手就多少亿，可见身家之丰。小儿子在北京当个莫明其妙的花花将军，也是邓小平赐的。

如果说邓小平开放有功，这个功分一多半给叶剑英绝不为过，因为没有叶剑英就没有邓小平。如果说邓小平改革无能，也不关叶剑英的事，因为叶剑英定了大局，具体事是邓小平的。邓小平屠杀平民的战争罪行。叶剑英更不沾边，总不能让死人负责活人的事吧。看来，叶剑英全身而退，至于明哲保身，人人如此，何为过也？多有几个女朋友，更非历史需探讨之事。至于我个人总提不起对他的尊敬，那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其实和历史也没太大关系。叶剑英年轻时也是理想主义，非常有原则，他原是蒋介石嫡系一师的师长，但他不追随蒋介石，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上了井冈山。

上面这段话中文读者可能比较准确地接受到我的讯息；翻成英文，英文读者能否准确地接受到我的讯息，我就知道了，因为我自己的英文也有限，我只知道中国诗词是无法翻译的，字可以翻过去，但意境则翻不过去，感情可能

就更难。所以我这本书一定要以中文为本，不能以英文为本，我不能用一个我都不大熟悉的语言作为表达我的思维的著作的本，像李医生那样以英文为他的著作的本，就不大合适。当然他的英文比我好。（按：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和一般中文的出版程序不同。他的手稿是中文。）

读者可以再一次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封建主义的政党，封建政治没有诚实可言，一切都在你骗我，我骗你中进行。「成者王，败者寇」，不讲道德，只讲成败。「文革」使我惊醒，就是因为我突然间发现，我崇拜的这些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的英雄们，怎么突然间都变成了尔虞我诈的小人。文革后，胡耀邦时期，有昙花一现的民主改革曙光。到「六四」，我则明白了，在中国无「民主」立锥之地。

从封建主义观点看，人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是大师。毛生前布好了局，为了死后，指定的接班人可以坐得稳。他非常清楚，华国锋资格太嫩，左右两派都不服华，于是毛泽东布了这么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除华国锋外，无人能破！毛泽东千算万算，以为自己布的这个局，不用言传，华国锋也会意会，何况还有跟了毛四十多年的汪东兴，但恰恰是华、汪都没能意会毛这个局是动不得的；也可以说，按毛泽东的标准，华、汪的智商实在也太低。

3、重新认识逮捕「四人帮」事件

「四人帮」被捕三十多年之后，华国锋也辞世了，当时具体执行逮捕任务的中央警卫团的人，出来讲故事了，他们讲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真的，但有百分之一的谎话，研究历史，就必须捉住这百之一的谎话，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捉「四人帮」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你看这些人眨巴眨巴眼睛，始终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也可能这些人也不知道。我没有证据，我也不认识华国锋，但我认为，华国锋尽管不喜欢四人帮，但还没这个胆把四人帮抓到监狱里去。起码我相信毛泽东是同意我这个估计的，否则，毛也不会把班交给华国锋，那么，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我没有证据，但我认为，唯一敢出这个主意的是汪东兴。

汪东兴跟随毛泽东四十多年，受尽了江青的气，从延安到北京，汪东兴忠心耿耿为毛泽东服务，但江青却视汪东兴若无物，颐指气使，汪东兴忍气吞声，特别是进京之后，两人结怨之深，恐怕毛泽东也不全然知晓。文革中，江青如

日中天，连周恩来都喊「向江青同志学习！」但汪东兴和江青仍时有小的冲突。其实，江青是志大才疏，毛泽东也知道江青不是武则天，但毛泽东还是用江青，给江青一个合适的位子，帮华国锋抑制文革翻案派，即被文革打倒的老干部。

毛泽东留下的局，不是问题，我称之为「三足鼎立」，最高权力由三足支撑，在华国锋之外，一只足是四人帮，这是文革发迹派，吵吵嚷嚷，无德无才，也无一兵一卒，威胁不到华国锋，至于什么上海民兵，那离北京还远着啦。另一只足是叶剑英、李先念这帮残存的老干部。一肚子气，但也无一兵一卒，也造不了反，大权在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手，左右两派争来咬去，都有求于华国锋。华国锋才坐的稳。可惜华、汪未得毛泽东的真传，自断一足，四人帮一垮，这只鼎自然就立不住了。所以不过三年，华、汪就垮了。所以，出「抓四人帮」这个主意的人，实际上是坏了华国锋的大事，谁出的主意？华不讲，汪不讲，恐怕别人只好猜了。

第二个问题，抓四人帮合不合法？中共最怕谈法律，我自小受教育，从来没学过宪法，文革后，大家受了那么多苦，都说中国没有法，彭真负责修改宪法，别人问他：「党大还法大？」彭真仍然不敢回答「法大」，一个执政党，自己制定了法律，却不敢承认「法比党大」，这样的执政党，如何依法执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么简单的真理，在中国就讲不通，六十年了，越来越乱，整个就是一锅粥。

可能有人会说，四人帮根本就是违宪，你怎么还说用宪法保护四人帮？这个问题问的是好的，只不过狭隘了一点，因为我现在说的，不是用宪法保护四人帮，而是用宪法保护所有的中国人。

毛泽东整刘少奇是违宪。华国锋整四人帮是违宪。邓小平、杨尚昆把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是违宪，讲故事的人讲的津津有味，他们却不知道这种行为是违宪的。而中国人民，无论是主持还是出品人，如果没有听出这是一个违宪的故事，就说明中国人的宪政知识实在可怜

抓四人帮，是华国锋、汪东兴用武力解决党内问题，这比毛泽东时代还退步了，毛大权在握，用武力解决党内纷争易如反掌。但他从来不这么做，毛泽东对自己有信心，所以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是以武力作后盾，但从没动过武。华国锋、汪东兴则对自己根本没有信心，邓小平「六四」，开

出坦克，也是对自己根本没有信心。

独裁的党，封建主义，总是解决不了接班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党。

抓四人帮，关键人物是华国锋、汪东兴。华、汪商量好了，把叶剑英这些老人拉出来作陪衬，只是为了淡化华、汪自己的作用，因为毕竟用警卫部队捉政治局委员，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皇帝刚死就抓皇后，也是大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讲故事的人，他们都是汪东兴当年的手下，他不把「功劳」往汪东兴身上推，而是羞羞答答的往华国锋、叶剑英身上推。

叶剑英和华国锋之间的关系，一句话讲明，就是华国锋答应的事，华国锋都做了，叶剑英答应的事，叶剑英一件没做，华国锋相信了叶剑英，后来又相了邓小平，叶、邓却欺骗了华。华国锋被赶下台前几天，卓琳还来家里跟妈妈说：「邓还要有大动作」，没两天，华就辞职了。

其实当时我是从心里支持叶、邓的，我当年是坚决拥护抓四人帮的，后来有点疑问，但没时间思考。

从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到邓小平、华国锋，说说这些封建故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唤起国人研究研究如何破得了眼前我们这个民族的封建大局。

【朱德、刘伯承、陈毅、罗荣桓】

这四个元帅能在一起写，是因为我觉得从人品上讲，这四个元帅比较正派，不搞阴谋诡计，也不拉帮结伙，本事有大有小，俱军中、党内公认属德高望重之辈。

1、朱老总对毛：有意见，不吭声

朱德(1886-1976)最大的特点是不跟毛泽东争第一，党内叫「没野心」，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呢。怎么争第一就叫有野心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封建主义的说法，如果有民主制度竞选，大家都可以争第一。

我出生时，我大姐已三岁，胖呼呼的。朱老总在在前院种冬瓜，于是就叫我姐姐「冬瓜」，一直到我姐姐都长成大姑娘了，什么时候见面还是「冬瓜」。从记事起，父母就让我们喊老总为「老爹」。1963年夏天，我一个人随老总去东北、内蒙转了一圈。朱老总出行，虽然也是专列。但感觉上随和得多；不像毛出行，戒备森严。无论车上，还是下榻，都非常随便，也和大家一起用膳。

那时刚刚度过饥荒（时称「三年自然灾害」），地方干部刚刚缓过劲来，我参与朱老总一次视察。看了大庆油田，看了呼伦贝尔草原。有一次在聊天时，谈到过去三年「自然灾害」，老总提到：其实朝鲜战争斯大林给的那点二战剩余物资和后来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并非一定要赶在这几年还钱。我猜老总这几句话是对过去几年饿死人的事耿耿于怀，因为历朝历代饿死人是最糟糕的事。

毛泽东要做什么，朱老总从来不挡，有意见就不吭气。文革中，林彪对他说：「你从来不是我们的总司令。我们的总司令从来是毛主席。」朱老总当没听见。井冈山朱、毛会师，无耻文人改为林、毛会师，把井冈山会师那张画也改了，朱老总当没看见。林彪摔死后，又改回来，朱老总当什么也没发生，以不变应万变。毛泽东的声望是威震四海；朱老总的声望是礼仪天下。

2、刘帅一家对邓小平贪功非常不满

刘伯承（1892-1986），精通兵法，一代儒将。进城之后，什么时间见到刘伯承，妈妈都喊：「刘师长」。抗战八年，妈妈大部份时间都在太行山。太行山八路军主力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彭德怀（司令政委）、左权（参谋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也在太行山，同峪、麻田，所以我姐姐名叫「峪田」。

1941 年 5 月反扫荡，事先没有情报，日、伪军在一个清晨就包围了同峪、麻田。敌情发生后，彭德怀、左权带一个警卫团迅速突出了包围。在突围过程中，左权不幸牺牲，剩下的后勤、医院、学校拖拖拉拉几千人，行动也慢，也没战斗力，就被围了在包围圈内。父亲只好留下，因为父亲如果再走了，这帮毫无战斗力的八路军士兵还不被敌人消灭？父亲跟我说，当时只有一个较有战斗力的朝鲜义勇军连，父亲带着这个连先抵挡一阵，组织这几千人往山里撤。敌人包围圈很大，方圆几十平方公里，撤到山里后，几千人目标太大，必须分散，在大山里跟敌人转，才有生存机会。当时我姐姐刚满月，妈妈的身体很虚弱，父亲指示要分散行动，但是这都是些没什么作战经验的年轻人，大家明知应该分散，但谁也不愿离开罗主任这一队，没办法。当时后勤部长是杨立三，父亲跟杨立三说：「你带上赤茜走（妈妈当时叫赤茜），这样才散得开。」大家看罗主任把刚刚生育的老婆都分散了，也没道理再不散了。妈妈抱着大姐

姐跟杨立三走了，杨立三说：「你骑上马吧。」妈妈说：「这么多人，就一匹马，我怎么能骑？」杨立三说：「那你就拉着马尾巴吧。」

天一会雨，一会雪，妈妈抱着姐姐，就一块油布遮一遮。走了一天，不吃不喝，才在一个小村停一下脚，打开襁褓一看，大姐已没气了，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以为孩子死了，老乡还有点经验，说：「别哭，别哭，可能还有救。」于是老乡就摸啊摸，浑身四肢摸，摸了一阵，大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才算救回一命，于是把大姐托给老乡，再上路，一个多月，就在大山里跟敌人转圈子，你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看也看得见，枪也打得着，但等你下了你的山头，再往我这个山头上爬，我早也不知跑哪去了。天天这么转，跟着妈妈的一个小战士，才十六、七岁，姓王，大家喊他小王八，妈妈拉着马尾巴，妈妈就让他拉着妈妈的衣服，爬大山，敌人一枪，就被打死了。父亲跟我说，一次敌人从山下围上来，我们以为无路可退了，把一切带的文件都拿出来烧掉，其中就有父亲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笔赠言：

「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徒。」

这两句话其实是毛泽东对父亲的评价，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表扬，也有批评，你自己去想吧。无穷无尽，但是路并没有绝，还是转了出来，一个多月，父母也没见过面。一天，突然满山遍野喊：「赤茜！」妈妈听到，吓了一跳，心想怎么敌人知道我的名字了。父亲听到，开始也是一惊，不知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伪军很多，伪军都是降日的国民党军，从服装上和八路军分不清楚，后来又一想，敌人不会知道「赤茜」，会不会是刘邓派人来了，于是派侦察员上去联系，一喊上话，果然是刘邓的部队。一个多月，敌人也精疲力尽：刘邓主力回师又打一下，敌人也就撤了。再见面，这帮被围的，除了一身衣服，一支枪，什么也没了，长满虱子。妈见到刘伯承，说：「漫山遍野喊赤茜，吓我一跳。」刘伯承说：「不敢喊罗瑞卿，怕敌人听到，只好喊赤茜喽。」四十多年后，母亲参加刘帅的葬礼，仍题「刘师长千古」。

刘帅的特点也是不争，即俗称「没野心」，战功显赫，却极为谦虚谨慎，打完仗当了两年军事学院院长，即闭门谢客，在家潜心研究学问。刘帅懂俄文，翻译了不少俄国军事著作。刘帅几乎从不出席公众场合，偶尔参加一下军委会，也只是对作战问题，如中印边界战、越南战争、东南沿海反蒋特登陆，发表一

点意见；父亲当总长的六年，每年都要去看几次。1965 上海会议，刘帅也说了公道话，这也是极为少有的。刘帅从不吹吹拍拍，但也很少反对什么。文革中，四人帮几乎无人不整，但并没整刘帅。文革后期，刘帅已成植物人，父亲从监狱出来后，我曾推着轮椅陪父亲去看过一次，完全没有知觉，就这样，拖了十年才去世。

刘帅有一大帮儿女，大儿子刘太行（太行山生的）比我大几岁，我们曾在军事学院同学一年，人很好，但不大聪明。一个女儿在空军高炮部。一个儿子在空军装备部，我在总参装备部当空军处长时，经常打交道，给我的印象都很好，老老实实，刘帅遗风。但我走后，听说装备部这个儿子卷入了江泽民专机贪污丑闻，被免职逮捕，又保外就医。

刘帅一家，对邓小平后来把刘、邓大军的功劳统统归于自己，非常不满。谁都知道，打仗刘伯承是主角，但电影、电视，无耻文人拍邓小平的马屁，硬把邓小平描写成主角。当邓毛出版那本女儿拍父亲的书时，请刘家参加，刘家一个人不去，找到刘太行，刘太行说：去不了，单位让学「三个代表」，不准请假。那时邓小平还活着，别人都不知道如何拍好马屁，刘家却是这种态度。差不多的时间，父亲九十冥寿，在大会堂发行一本相册以资纪念。刘太行专程从大郊外跑来，（他的单位在去十三陵的路上，）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让我一定来，代表我们全家。罗叔叔是好人，可惜走的太早了……」纪念会结束，我们全家合影留念，他也跑进来，说：我一定要和你们全家一起照张相，还千嘱万咐对我妹妹说：「问罗宇好，我们还是同学呢。」你看，大气候一片乌烟瘴气，但是党内、军内却也还有一股清流暖心意。

3、陈毅对文革深恶痛绝

陈毅（1901-1972）在中央苏区时曾当过军委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就是曾夺过毛泽东的权。红军长征，陈毅被留下来，名曰「坚持斗争」，实际上是王明路线借国民党的手，杀陈毅的头。在看《万水千山》那出话剧时，我曾亲耳听陈毅对爸爸说：「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主力长征后那三年游击战争，几乎就没了。一次敌人搜山，我躲在草丛里，敌人的刺刀尖就在我头顶上。陈毅曾有二句诗：「此去泉台召旧部，十万旌旗斩阎罗。」随时可能牺牲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整编江南游击队为新四军。叶挺从国外回来，出任军长。叶

挺在北伐时就是国民党的皮，共产党的心，但对国民党警惕性总是不高。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围歼九千余人，叶挺被俘，当时陈毅为一支队司令，未与军部在一起，遂被任命为新四军新军长。

整个战争年代，父亲和陈毅并不大熟，只是建国之后，陈毅当了外长，父亲当了总长，一个外交，一个国防，两人交往遂多起来。

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所以不仅公务经常在一起，休闲如跳舞看戏，也经常相约。周末我经常听父亲跟母亲说：今天我约了陈总，去哪儿，去哪儿。陈毅的夫人张茜和母亲同庚，又同被周恩来点将承担中央的夫人外交工作，两人也谈得来。上海会议，陈总是说了公道话。文革中，陈毅没一天安乐日子。陈毅对红卫兵的那一套，四人帮的那一套，林彪的那一套，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

实际上两口子都是给气死的，好在陈总还是看到了林彪折戟沉沙，可惜已回天乏术。陈总一走，张茜跟着就走了。父亲当了军委秘书长后，陈毅两口子都不在了。我们没请任何人吃饭，只是把陈毅的三个儿子找来吃了餐饭，（当时最小的女儿在英国学习），父亲说：「我和你们的爸爸是相见恨晚的老朋友，可惜他没熬过来，他的性情太刚烈了。」大家听了，黯然泪下。「六四」，陈毅的大儿子没给老爸丢脸，宁可丢官也不溜须拍马，小儿子则更是丢光一切，从军队中被赶出来，自谋生路，干部子弟中，凤毛麟角，也出了几个英雄。

4、罗荣桓女儿来家痛哭道歉

罗荣桓（1902-1963）元帅和父亲是从中央苏区就熟识的老朋友，军中称为大罗、小罗，进北京时我在家常听大人们咱们是一家人。有时父母出差，罗帅的夫人林月琴妈妈就把我们几个小孩接到他们家去玩。有一次划船，我几乎掉进水里，还记得林妈妈把我放在澡盆里洗，一边洗一边说，以后可不能划船了，这要把你淹了，你妈回来我可怎么交待？

罗帅在军中是德高望重，林妈妈是菩萨心肠。自打进北京，罗帅知道父亲时不时去看看林彪，但从不问林彪如何啊，也没有代问个好之类的话。林彪也知道父亲和罗帅交往甚密，同样从不问罗帅如何了。我听父亲跟母亲说过多次：一个司令，一个政委，进城后十年不说一句话，不可思议。但我可以感觉到，父母是明显地觉得罗帅两口子好，林彪两口子怪里怪气。叶群一有机会就在妈

妈耳边说罗帅两口子的坏话，妈妈则一声不吭，回家后妈妈就跟爸爸说：「这个叶群，简直是莫名其妙。我看林月琴哪点都比她强。」罗帅两口子则从来没听见说过林彪两口子的坏话。偶尔妈妈跟林妈妈提起叶群，林妈妈也是笑笑，说：「那个叶群，莫名其妙。」如此而已。

叶群说什么坏话，无非就是罗帅如何如何对不起林彪，说罗帅什么工作也不做，林彪还把功劳分给罗帅一半。妈妈回来就跟爸爸说：「这叫什么话，我就没听任何人说过罗帅什么工作也不做，就这个叶群胡说八道。」当时大家都不大提林彪，不管怎样，林彪还是副主席，可是谁心里都明白这些话，如果不是林彪的话，叶群怎么敢说。像前面提过的，林立果跟我说：「刚解放时，林彪排第二。」如果不是林彪告诉老虎，老虎怎么知道谁排第几？现在看当然清楚，林彪不喜欢罗帅和后来陷害父亲的原因一样，就是林彪有狼子野心，大家都不跟他走。

但是罗帅身体不好，只有一个肾，1963年就去世了，所以又给大家留下许多想象空间。都说，如果罗帅活到文革，不知情况会如何？要我说，罗帅在，对林彪肯定是个阻力，因为罗帅在毛泽东面前是可以说上话的，但阻到什么程度，就难讲了。大局是不会变的，大局是毛泽东设计的，毛不死，谁也变不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幸亏罗帅早走了，所以没挨林彪的整；至于林妈妈孤儿寡母的，也整不到哪去了。

我从监狱里出来，住在地安门总参宿舍大院。叶剑英给罗瑞卿子女批了两间房子在筒子楼里，林妈妈住在同一个大院的将军楼里，一步之遥。我去看她，她也不避嫌，照样很热情，问有没有去看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是好人，问题很快会解决。」那时，爸爸妈妈都还关在监狱，这样的人不多。爸爸妈妈出来后，林妈妈当然非常兴奋，跑来看。她有一个小女儿（拉拉），文革开始时跑到我们家来造过反，不敢来看，托林妈妈先来道歉。林妈妈对妈妈说：「拉拉不敢来，说自己有罪，不知郝妈妈见不见她？」妈妈说：「小孩有什么罪，快叫拉拉来。」于是叫来拉拉，拉拉一进屋，砰地一声就跪在妈妈面前，两手按住妈妈不让动，一边哭一边说：「郝妈妈，我有罪，我不懂事，去你们家造反，你说怎么罚吧。」「啪」就给自己一巴掌，赶紧被妈妈拉住，妈妈说：「小孩，有什么罪？」一把把拉拉搂在怀里。

你看，人和人就是不一样，那个叶向真，还是什么干女儿，几十年不敢露面。我离国出走之后，有一次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林妈妈在我这儿，她要跟你说话。」电话里传来林妈妈那明朗真挚的声音，她大声说：「祝你幸福！」我说：「谢谢林妈妈，祝你健康长寿！」林妈妈的祝福是真心的，这种真心在我们民族中不多，所以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就健康不起来。从政治局人民日报到街上的小商小贩，都是假话、假货、假仁假义、尔虞我诈、招摇撞骗。

【彭德怀和父亲】

我们小时候看见彭德怀（1898-1974），就像看见一尊神煞，他从来都是面无表情，独来独往，视小孩若无物，根本不和孩子打招呼，所以任何时候看到彭德怀，我们都躲的远远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消失了。我当时在北京101中学，每星期去学校，在北大门口下车。北大对面就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一个大院，高高的围墙，据说彭德怀就住在那儿写检讨。彭德怀的养女，左权的女儿左太北，是我大姐的同学，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离家出走。老婆浦安修和他离婚，就剩一个老头，孤苦伶仃。

我对彭德怀虽然没有什么印象，当时年龄也才十四、五岁；但我却有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即我刚刚听父亲告诉我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我心里立刻有一个问号：怎么革命了一辈子，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呢？但也不敢问，那时这种问题是出格的，那时的规矩就是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二十年后我才跟胡耀邦说：「你们把我们都教傻了，还得我自己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想清楚共产党。」

1、文革中饱受虐待，遭遇最惨

彭德怀下台后，我陪父亲看过一些彭德怀在位时拍的军事演习纪录片，看到大连演习结束后检阅演习部队，彭德怀走在刘少奇前边，大家都觉得这彭德怀可不得了，眼中无人；才知道彭德怀小时很苦，与母亲一起讨饭。彭德怀自己说是在讨饭时与恶狗打斗时学会打仗的。我心里还非常同情，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与儿子谈起彭德怀这段历史，告诉儿子军事学院出来的并不一定能打过讨饭的孩子。

文革中彭老总受尽凌辱，毛泽东、江青指挥的红卫兵个个混蛋王八蛋，我

觉得现在依然有必要把这些人拿出来清算，否则中华民族无法进步，所谓清算并不是要杀这些人，而是要让这些人的罪恶，起码要懂得忏悔，要去彭老总的墓前跪三天，而不能像叶向真那样，逍遥法外，继续招摇撞骗。

我从监狱里出来后，很快可以每周去陪父亲度周末，在三〇一医院十三病室，我们在这头，彭德怀在那头，两个小战士一头一个，算是看守，中间十几间单人病房，走廊上除了医生、护士，很少见人。他们那头天天摔盆子、摔碗，隐隐约约听到斥骂声。医生过来，有时父亲也问问，医生说：「谁都骂，主席、江青、林彪……」又说：「直肠癌，晚期了。」父亲问：「有人探视吗？」医生说：「没有。」有一次父亲还非常难过地对我说：「他比我还可怜，我还有你们在旁边陪陪，他只一个人。」文革前，父亲从来不讲高级干部之间关系的故事。文革后讲一点，这段时间比较多的讲了些他和彭德怀之间的故事。

父亲和彭德怀之间的关系，大的背景就是一、三军团之间的关系。一军团的底子是从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朱德当过一下军团长，然后一直是林彪。三军团是彭德怀平江起义拉出来的一个团，国民党部队为底子，彭德怀一直是军团长。一、三军团在毛泽东指挥下作战，合作得天衣无缝，屡屡挫败国民党数倍、数十倍敌军的进攻，不断发展壮大，不到五年已有三十万人马，如果不是周恩来、王明中央挟共产国际之威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蒋介石可能早就输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有本事对付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的。

2、百团大战彭罗曾有不快

一、三军团作战是团结的，平时大家事事争第一，自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长征结束时，中央红军只剩三万，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编为八路军，刘伯承一个师、林彪一个师、贺龙一个师开赴抗日前线，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以彭德怀为首在太行山成立了八路军前（线）指（挥部）。这时，毛泽东把父亲留在延安办「抗大」（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但林、刘一天也没到过职。父亲是副校长兼教育长，实际主持抗大的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抗大，亲自到抗大上课，《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多篇毛的得意之作，都是在抗大的演讲。毛泽东让父亲写一篇《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小册子，父亲说：「我写东西不行，你不如找个秀才。」毛泽东说：「就是你写，我来改。你搬到我隔壁的窑洞来住，什么时候写好，

什么时候放人。」没办法，父亲还真是搬到毛泽东的隔壁来住，白天去抗大，晚上就写这篇东西，写了一个多月，毛泽东逐字逐句改过，说「好啦，可以出版了。」这本小册子不仅在延安出版了，在国统区也出版了。文革中，这本小册子被说成是父亲投降国民党的证据，父亲说：「这是主席一字一句改过的，你们说我投降国民党，可要小心呢！」

1940年，抗大已发展到上万人，毛泽东说：「抗大要办到前线去。」于是父亲率抗大师生奔赴太行山，一路上每过一个解放区，就留下一批师生。过敌伪封锁线，父亲第一个站在铁路上，到最后最后一个学生过去，每次如此，直到几十年后，抗大的学生谈起罗副校长，都说：「我们跟着罗副校长，心踏实。」到太行山之后，抗大已在各个解放区办了起来，父亲就被任命为八路军前指政治部主任。这是父亲和彭德怀第一次有这种上下级关系在一起工作。

百团大战之后，主席有一个批评的电报，当时没有直接批评作战规模大了一些，过早暴露了自己，而是转了个弯，批评宣传工作做过了头，实际上是给彭德怀留了些面子。由于宣传是政治部的事，父亲看到这个电报后，随即主动写了一个检讨，接受主席批评，以后注意，还将电报送给彭德怀，会签后发往延安。父亲以为这件事就算做好了，没想到彭德怀又写一电报，说彭德怀自己「疏于检查」，所以才出现这个「宣传错误」。彭德怀这个电报却不给父亲看，也不找父亲会签，而背着父亲发往延安。

几年之后，大家都回延安开七大，毛泽东把这个电报拿给父亲看，说：「你知道这个电报吗？」父亲一看当然非常不满，说百团大战未请示军委批准即展开，本来就算你彭德怀的责任。我罗瑞卿主动代你承担一点责任，你还「疏于检查」；不行，我得去找彭德怀论理。毛泽东说：「算了，你知道就行了，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父亲一惊，问：「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于是毛泽东就讲了杨（勇）、王（平）、苏（振华）联署告父亲长征路上在三军团乱杀人的事。我在后面「杨尚昆」那章将写明，这件事后台是彭德怀。如果不是解放后，那个所谓被杀的人自己找回来讨救济，那就永远是个悬案了。

解放战争，彭德怀在西北，父亲在华北，没什么交往。胜利前，在西柏坡开二中全会，彭德怀问毛泽东要杨、罗、耿兵团，毛泽东说：「打完太原再说。」打太原，成立一个「前指」，徐向前为总司令，但徐托病不出，由于主力是十

九兵团，所以主事的还是杨、罗、耿。彭德怀从西柏坡也来了太原前线，彭德怀说：「我来看看，你们干你们的，不用管我。」因为彭德怀在太原前线没有挂职，但他毕竟是西北野战军的司令，所以作战请示他也不合适，不请示他也不合适，弄得大家无所适从，好在太原也不是什么难打的仗，瓮中捉鳖。

打完太原，毛泽东召父亲回京。彭德怀带十九兵团和西北野战军西进。在西路军失败的张液、酒泉一带，看到西路军一些女战士，当年被俘，被二马匪帮糟蹋后流落民间，由于西北女人少，被一些穷苦农民收留做老婆，惨不忍睹！都是四川女娃，彭老总打个报告给毛泽东，说这些人该救济一下，毛就是不批，一直到胡耀邦当总书记，才发了一个「西路军红军证」。这件事，毛泽东实在没有道理，张国焘归张国焘，和这些四川女娃有什么关系？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也只管自己当官，不吭一声。当然，毛泽东没道理的事还多，这也只是一小件而已。

3、中南海文工团与父亲无关

朝鲜战争，毛泽东请林彪挂帅，林彪不允。彭德怀领兵出征，第一次战役，打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因为金日成的军队已经溃散了，美国人就大摇大摆往前走，没想到遇上志愿军，把美国人两个精锐师打个落花流水。于是美国人提出停战，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包括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毛问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说再打打，结果越打越糟。到第四、第五次战役，美国人围歼了我们一个整师，这是建军以来没有过的。打仗，互有死伤，朝鲜战争美国人火力太猛，步炮、步空协调的好，我们死了一百万人，美国人死了五万人，但被敌人消灭一个整师，这是唯一的一次。毛泽东极为震惊，认为不能再打了，指示周恩来停战，但美国人开始开出的优厚条件都没了，而且第七舰队早已出兵台湾，使我们也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

进城之后，父亲当公安部长、公安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两人基本上互不相扰，但彭德怀对毛泽东生活上的一些事，交女朋友之类有意见。彭不敢骂毛泽东，就骂罗瑞卿，说：「罗瑞卿没安好心，搞什么中南海文工团。」其实，文工团和公安没有任何关系，中南海的事，只有警卫，开始十年是由父亲负责，8341 部队也是毛泽东交代父亲，由父亲亲自组建；公安部有个中央警卫局（九局），负责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九局的局长就是汪东兴兼。中

南海其他的事，有个中南海管理局，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管。彭德怀不骂杨尚昆，却骂罗瑞卿，父亲当没听到，反正也不是面对面骂，也不用驳嘴，但毛泽东则是听到的了，指示杨尚昆把中南海文工团撤了，这段故事，李志绥医生的书里也有。

彭德怀是个粗人，不搞阴谋估计，所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不公平，但彭德怀也不大学习，不研究新问题，他曾有句很有名的话：「你有你的原子弹，我有我的山药蛋。」当年还被吹捧为多么大无畏，其实原子弹的出现，已经根本地改变了世界，幸亏是比较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世界大国美国首先掌握了原子弹；如果是希特勒首先拿到原子弹，那还麻烦了呢。人们应该考虑的是消灭战争，无论民族之间还是民族内部的问题，都不应该再用战争手段去解决。他们这一代人的局限性在于：由于他们是打出的天下，所以天天想的就是别人打来了怎么办？这也难怪。

彭德怀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林彪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林彪专攻心计，投毛所好，目的是取而代之。毛泽东容不下彭德怀这样的忠臣（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实在看不出有任何恶意；发现了问题，以一封个人信件提醒一下，恰恰说明无任何阴谋诡计。但毛泽东则发狠话，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却能利用林彪这样的奸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封建主义，到了邓小平，这个封建主义本质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也无我立锥之地。

【贺龙一家人】

贺龙（1896-1969）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家乡创建二方面军。

长征路上，一、二方面军汇合后，贺龙世从来争过老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八路军三个师，贺龙统领一个，三大主力之一。

解放战争，毛泽东分配各大战区：西北、华北、东北、中原，就没有分配贺龙统领一个战略方向。贺龙的部队被分散了，主要是配合西北战场彭德怀作战，所以未能突显出二方面军旧部的战功。这一点恐怕是二方面军干部心中比较有意见的，憋了一股气，觉得受了一方面军的压，这就是山头主义。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撤出后，任命贺龙为中央后方委员会的主任，把延安的机关、学校、医院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押解《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

的过程中，可能怕被国民党截阻，贺龙自作主张把王实味给杀了。

这件事毛泽东是真不满意，还是假不满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毛泽东问贺龙要人，说：「你得还我一个王实味。」弄得贺龙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做了检讨。

彭德怀挥师西进后，贺龙率部从陕西入川，与逆江而上的刘、邓大军在四川汇合，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几年后才进京。父亲与贺龙在战争年代并没有共事过，1959年出任总参谋长后，由于林彪很少在京，毛泽东交代父亲：有事可多找贺龙商量。所有的元帅都是军委委员，林、贺、聂是副主席，总长也是军委秘书长，所以从1959年后，我们和贺龙一家的来往就越来越频密，一起看电影，一起钓鱼，周末有时一起郊游，夏天北戴河，冬天广州，大人、小孩非常随便，互相走动。

1960年开始，毛泽东重又提倡「调查研究」贺龙、聂荣臻、罗荣桓三个元帅与父亲结伴，考察了东北、内蒙、广西、四川，长大之后，我才明白，这谁和谁结伴，还有大学问。贺龙喜欢热闹，但他首要考虑的是避嫌，所以他不和二方面军的人结伴。他结的伴都是毛信得过的人。林彪从来不结伴，是让毛放心。叶剑英不结伴，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和大家不一样，没人愿和他结伴。刘帅、徐帅则不喜欢热闹，也不大走动。另外，谁是「帅」，谁是「总」，也很严格，不可乱叫，只有聂荣臻，有时叫「聂帅」，有时叫「聂总」。

贺老总、薛明阿姨两口子给人的印象永远是和蔼可亲，但家中的习惯和我们不同，比如打扑克，我们跟父亲打扑克都非常认真，不要说换牌，就是偷看一下也不可以。但有一次妈妈带我们几个小孩随贺老总一家去北戴河（父亲出差不知去哪儿），在车上打扑克，发完牌，贺伯伯就跟旁边的人换牌，换好了再出，当然次次都是他赢。回家之后，我跟父亲说：「贺伯伯打扑克跟别人换牌，那当然次次他赢。」被父亲呵斥：「不许乱说。」这怎么就乱说了？按传统，薛明应称为「阿姨」，因为不是红军，但由于贺龙、罗荣桓两家经常在一起，我们喊林月琴「妈妈」，所以称薛明也就不那么严格了。「妈妈」和「阿姨」混合称呼的，也就薛明一个。

据我所知，贺龙和毛泽东、林彪没有任何积怨。贺龙和毛泽东会师后，对毛一直毕恭毕敬；毛对贺也是礼仪有加。毛泽东交代父亲「有事多找贺龙」，

实际上就是让父亲多接触贺龙，多介绍情况，多征求意见。别人看到罗瑞卿和贺龙亲密无间，一起巡视，一起钓鱼，显示出一、二方面军团结。贺龙和林彪也没共过事，无从说起有任何恩怨；但据传说，薛明和叶群却是学生时代的死对头，争当「校花」之类的事，所以有人说，文革中林彪整死贺龙，毛泽东不闻不问，是叶群恨薛明所致，此事无证据，也没听薛妈妈说过。文革后，父亲也走了，林月琴、薛明和妈妈三个老太太还经常在一起，夏天在北戴河住在一个院子里，冬天在广州也是住在一个院子里。薛明阿姨从来不提林彪，但偶尔说起叶群，话虽不多，但你可以感觉出来，恨的咬牙切齿。

从法律观点讲，贺龙是被「谋杀」的（按：在毛支持下，林彪指贺龙是军内反文革总后台，1967年被关押，专案审查，残酷折磨，1969年致死），因为贺龙有糖尿病，人人知道，医生硬是输葡萄糖把人输死。这个医生是千真万确的杀人犯，却无人追究，清理三种人也没清理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不进步，对真正的杀人犯，宽大无边，对请愿的学生，却动刀动枪。

父亲文革后当秘书长那一年，百废待兴，但父亲对贺龙、罗荣桓两家实实在在地关心。杨勇说：「给郝治平在总参政治部挂个顾问的名吧。」爸爸说：「薛明也挂在总参政治部，林月琴、王荣华（刘帅夫人）挂在总政干部部。」于是四个人一起当了顾问。贺、罗两家当时没专车，父亲下令各配一辆，父亲亦指示要把依附林彪反党集团，贯彻执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杀人医生揪出来绳之以法，但父亲匆匆离开了我们，人走政息，再无人落实这些工作，这些人渣就继续招摇撞骗。

贺龙、聂荣臻、罗荣桓三个两口子曾一起到我们家吃饭，这也是仅有的一次，因为那时不大兴谁去谁家吃个饭。一次说起我们厨师会做「汤包」，三个老师傅说，那得去尝尝，老头们嘴都馋，主要是进城后给管的，医生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这些「妈妈」、「阿姨」们就管得很严。有时老头们和我们小孩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突然就伸筷子到我们这边挟块肉，手还要挨下打，我们就悄悄地笑。后来听薛明阿姨说，贺老总被关押起来后，想吃个猪耳朵都不给，我就心想我们一起吃时，就没人管了。

2、贺鹏飞主持总参装备部乌烟瘴气

贺龙、薛明有一儿两女，儿子贺小龙（1944-2001，文革中以贺鹏飞闻名），

年龄和我一样，我们中学、大学都是同学。此人不笨，其实是很聪明，只是心术不正，聪明不往正道上用，从小就是二分学生，整天就是踢球，一群狐朋狗友，吹吹拍拍。我们一起考大学，我上了清华，他的分数太低，清华的人找到薛明，说：「不是我们不收，收了也跟不上，不如到清华附中再补习一年。」于是我们从中学又都到了清华，但他在附中，也经常见面。文革开始，我父亲早倒台，贺龙则还红了一阵。刚开始搞革委会，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小龙，但也没几个月，随着老子倒了，小子当然也马上倒了；但革委会的那几个月，贺小龙还着实风光一阵，据说女秘书都一大群。

文革嘛，大家都蒙难，但贺小龙只是分配到甘肃一个工厂劳动，还是正常人。林彪一垮台，贺龙几乎是第一个平的反，周恩来参加了贺龙的追悼会。贺小龙的小妹妹又嫁给了廖承志的儿子，在周恩来、廖承志、王震等人的关照下，贺家几乎一夜之间就恢复了原来的气势。父亲还没复出工作之前，贺家毫无动静，鸡犬之声相闻，从不过问我们，王震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去吃顿饭；相比之下，贺家的冷淡是明显的。父亲复出后，贺家的人也出现了。我去装备部时，贺小龙和王震的儿子王军已在装备部。父亲工作的那一年，两个人热情得不得了；父亲一走，两个人的热情也没了。我倒无所谓，因为别人太热情了，我还受不了。

我觉得贺小龙没得贺龙的真传，不大团结人；又由于贺龙被林彪迫害致死，小龙心理上受太大刺激，也不太平衡。杨尚昆当秘书长后，把二方面军的余秋里从地方上调回军队当总政主任，王震、余秋里就拼命提贺小龙，派性十足，几近疯狂。贺小龙当部长，我当处长，但贺小龙对装备一窍不通，也不学习，他的全副精力用在贪污上，在邓小平、杨尚昆、王震、余秋里的庇护下，勾结荣毅仁和他的儿子荣智健，建立起总参装备部（贺小龙部长）、保利公司（邓小平的女婿贺平为总经理）、中信（王军）、香港中信（荣智健）一条龙，国家级贪污盗窃、贩卖军火集团，在卖军火给伊朗、伊拉克和卖「东三」中远程导弹给沙特阿拉伯的交易中，上交军委 10 亿美元，他们至少贪污了两个亿，而且跟张爱萍为首的军工企业打成一团。

我对他们冷眼旁观，他们也知道完全瞒着我也不可能，所以他们几次想拉我入伙，还专门派退休的前部长李光来做我的工作，都被我装傻挡了回去，所

以我就成了这帮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六四」枪响，这帮人喜庆到疯狂，所以才有以「过期不归」为借口向我发难，他们根本忘了我的行程是贺平定的，而且白纸黑字打印的文件。我辞职离开后，装备部更是乌烟瘴气，直到邓小平快死了，贺平走私 AK-47 步枪，让美国海关抓住，被江泽民请下台，这幕中国特色的丑剧才算落幕，一笔糊涂帐，多少百姓血汗钱，就养肥这么一帮贪污犯。

1992 年杨尚昆兄弟倒台，刘华清做梦也没想到当了常委，有人升官是因为能干，有人升官是因为不能干，刘华清就是因为不能干而升官的最好典型。刘华清的特点是，既不主张什么，也不反对什么，只是钻营。为了让胡耀邦认识他，八十年代初，他当总长助理时把胡耀邦的女婿调来当秘书。在海军司令任上，他又攀上了邓小平的弟弟；后已决定刘华清从司令位上退休，他用海军的飞机把邓恳从武汉接到北京，连夜去邓府说项。第二天杨尚昆去汇报干部问题，邓小平说：「让刘华清当个副秘书长吧。」把刘华清介绍给杨尚昆。

1988 年杨尚昆重组军委，老将都下台，杨尚昆要把自己的弟弟杨白冰提为秘书长，自己当军委常务副主席，把刘华清拿来当陪衬，夹在哥俩中间当个副主席。1992 年杨家将倒台，军队要一个人进常委挺江泽民，非刘华清莫属也，就这么东蒙西撞进了常委，大家都笑掉牙。

刘华清当了中央常委后，就要提他留苏时的莫逆之交曹刚川当副总长，但贺小龙当装备部长时，曹刚川是副部长，现在只提曹刚川，不提贺小龙，就有点惹人说闲话。刘华清不像过去王震、余秋里底气那么硬，什么也不顾；刘华清还要避点嫌，但又不能两个都提副总长。于是刘跟海军做交易，说海军来个副司令当副总长，我送贺鹏飞（小龙）去海军当副司令，于是这个一天海军没当过的贺小龙，就当副司令了。当海军副司令的那几年，每年在北戴河都来看妈妈，送好多海产，妈妈说：「反正都是公家的，一切照收。」但从不说起我。贺小龙一门心思只想升官，心理几近崩溃，也不交女朋友，只是喝酒，结果把肝喝坏了，肝坏死，人一下就没掉了。

贺小龙和我，同时生，一起长，大环境几乎完全一样，文革也都受迫害，但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理念。我在共产党中生，在共产党中长，得出结论，共产党是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号反对自由、民主、平等：打着红旗反红旗，

所以必须彻底改造这个系统。

贺小龙也是认识到这个系统的欺骗性，他的结论是：别让这个系统迫害到自己，自己可以利用这个系统去迫害别人，这就是贺小龙悲剧所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实在微不足道，我还从心里感谢他，像毛泽东感谢日本人一样，不是他发难，我还真不知道如何离开这个系统。

对贺小龙的批判，是针对干部子弟中一股邪恶的势力，他们背叛人民革命，以一种末日的疯狂，贪图盗窃国库，这是罪行，总要清算。江泽民清算了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总参情报部长，1999 年因涉远华案、出卖军事情报，牟利 2000 万，被判死缓，后减为无期、保外就医），是对的，但不公平。因为比姬胖子贪污多得有的是，包括江自己的儿子！所以老百姓不会服！

【聂荣臻和徐帅】

提笔写聂帅（聂荣臻 1899-1992），唏嘘，不知从何写起。聂帅和张（瑞华）妈妈的音容笑貌，从儿时起就那么熟悉。妈妈和张妈妈带着我和大姐姐，从延安走到张家口，我根本不记事。在张家口，我和大姐捉迷藏，一个跟斗，脑门正中磕出血。张妈妈那时有美国的磺胺药膏，啪一下贴到脑门上止住血，以后一见面就拉过来，「让我看看脑门上的疤还有没有？」到长过张妈妈一头了，疤也看不到了。聂帅有一个女儿，不是张妈妈所生，比我大七、八岁，结婚时，我们也是座上客。聂帅两口子收养了叶挺一个儿子，文革时造聂伯伯的反，再没回来。

据说，林彪出逃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聂帅，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内战时，一军团就是林、聂；抗战 115 师，也是林、聂。解放战争，聂在华北，父亲是聂的副手兼华北主力 19 兵团政委，与傅作义周旋两年，打个平手，知道林彪四野南下，才将傅作义逼和。进城之后，聂帅主管国防科研，也是尽心尽力，与那些放弃国外高薪厚禄，一心只想回国报效祖国的理想主义科学家们（邓小平上台后，一个也没了），也有共同语言。但文革开始后，则完全心灰意懒了，不闻不问天下事，不吭不哈保自己。文革后，又见面，和我们还是那么亲，父亲去德国治腿，从西山出发，聂帅两口子等在路边送行，我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父亲没回来，妈带我还时不时去看看老师。

从心里，我当然祝愿老师长寿，但也实在失望，他们是我们尊敬的前辈，

年轻时漂洋过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回国后，千军万马，枪林弹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到了现在，是功成名就了？还是意志消沉了？总之，不再过问窗外之事，什么主义，什么路线，统统无所谓，只管女儿、女婿当官的事。张爱萍当国防部长时只管科工委，把聂帅的女婿升为科工委主任，女儿升为副主任。到 1987 年国防部长要换届，张爱萍还想当一届，于是聂帅就出面提议张再当一届，但邓小平、杨尚昆不允，张爱萍就退休了。「六四」时，张爱萍是写信给军委的七上将之一（按：另有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坚决要求军队不能开枪，事件不许流血，而且对邓、杨的态度最强硬。「六四」后，杨尚昆压七上将做检讨，张爱萍说：「我的信一点没错，没检讨。」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读者可以看到，我在多处提到张爱萍，有好评，也有不满。比如他和聂帅这段互动，我就觉得有点庸俗，把风气带坏了；当然风气变坏也不是由他开始，毛的后期已经很坏了。但胡耀邦时期，大家还想（起码我是这么想）把风气搞好；但邓小平、王震、杨尚昆、余秋里这帮人把风气搞得越来越坏，张爱萍也陷了进去。我最大的感慨是，人变得太厉害了，而且几乎都是越变越坏。

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从一个廉洁的党，变成一个贪污腐败的党，从一个人民拥护爱戴的党，变成一个人民痛恨，靠刺刀去维持的党；这些老师、老将们，不声不哈地就变过来了。要邓小平搞这一套，何必要打国民党；邓小平的改革还不如蒋经国。中国的开放还不如台湾，现在这帮小猫小狗也不知发什么癫，还天天喊打喊杀要去统一人家，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虽然我百分之百肯定这帮小猫小狗只是「窝里横」，说说而已，根本不可能打，但是打或不打结果都是一样，民主必然战胜专制。

打，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专制亡的更快一点；不打，专制可能拖的时间长点。现在的形势和 1946 年正好调过来。1946 年蒋介石如果不打过来，拖三十年应该没问题，而且国共进入议会斗争，人民就有好日子过。台湾不会有 228 事件，大陆也不会有反右、文革。而且在人民的压力下，军队国家化，离开政治舞台，也不是完全有可能。历史的讲（公平的讲），蒋介石、国民党犯了两个大错误，导致失败：一是 1927 年背叛孙中山遗嘱，杀共产党，杀了十年，直到日本人打进来；一是 1946 年撕毁和平协议，开始内战。这两大错误，

对百姓是灾难，对国民党也是灾难。

现在国民党检讨历史，如果不敢承认这两大错误，根本没用，很多人热衷于给国民党涂脂抹粉，什么抗日的中流砥柱，却忘了如果兄弟不相残，外人何能入侵？中国人民检讨历史就不要站在狭隘的党派立场上：说好都是好，说坏都是坏，完全不正确，实际情况是都有好坏。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比较好；到蒋介石，就变坏了；到蒋经国，又变好了。共产党则是革命时和刚建立政权时比较好；之后就越变越坏，不知道还有没机会变好。胡耀邦时期，曾有一点机会变好，被邓小平扼杀了。

聂帅是活到最后的一个帅，活了 93 岁。

1、徐帅：西路军悲剧故事的传人

徐帅（徐向前 1901-1990）在西路军失败后，只身牵着一匹骆驼，从甘肃走到新疆，此后五十多年不大吭声。张国焘投了国民党后，毛泽东要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徐帅更礼仪有加，徐帅领毛泽东的情，但不吹不拍。徐帅五十多年只说两件事：一件是并没有电报的事——指党史上写的，张国焘发电报让徐向前消灭毛泽东的中央；再一件是徐帅说，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军甘肃，不是张国焘的责任，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两件事，高级干部都知道，但没人驳嘴，也无人跟徐帅论理；实际上就是没人理徐帅这个茬，但毛泽东不记徐帅这个仇，元帅也有徐一个，文革也没指使红卫兵去徐家耍流氓。贺龙无缘无故就整死了，徐帅则安然无恙，一直活到 1990 年。听妈妈说，徐帅临终还是给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是说上面这两件事，还是没人理。

毛泽东和张国焘之争，两个人的信条是一样的：有枪就是草头王。毛是主席，但兵少；张是副主席，但兵多。张国焘不服毛泽东，毛则担心四方面军独大，无法驾驭。毛的红军主力已在陕北站住了脚跟，四方面军的主力怎么还会西渡黄河，挺进人烟稀少的回族聚居地区？如果真是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张国焘也不会西进甘肃，与凶悍的二马匪帮争毫无群众基础的回族聚居区。张国焘首选应该是回他的川陕老地盘，所以究竟是张国焘要消灭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借国民党二马匪帮之手消灭张国焘，实在是商榷之处。

西进是明显的战略错误，如果毛泽东掌握战略指挥权，毛泽东应挥师东进，后来毛也确是如此指挥的。如果张国焘仍掌握四方面军的权力，张国焘应回师

南下，而绝不会西进，但为什么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甘肃，而且被二马匪帮消灭？这是毫无道理的事情！谁指挥的？毛泽东说是张国焘指挥的，徐向前说是毛泽寒指挥的，张国焘说什么，没人听了。文革前，我隐隐约约听父亲说过这些事，但没兴趣；文革后，看毛说了这么多谎话，我才觉得还是徐向前说得对，徐帅没有理由撒谎嘛！

我在前面提过，长征开始，周恩来、王明中央原是决定留毛泽东在江西的，即借国民党的刀杀毛泽东。毛泽东记着周恩来这一仇至死。按徐帅的说法，毛泽东就是借国民党的刀消灭了四方面军的主力，多么可怕！这几万四方面军将士的亡灵如何安息？

徐帅不搞山头主义，也不大跟别人交往，不打牌，不钓鱼，不跳舞，所以文革前很少见到徐帅，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帅。文革后，只是因为前面提过的，徐帅在父亲去德国治腿的报告上批了一个：不如把外国大夫请到中国来更稳妥。妈妈特别感激徐帅，说：「要是听了徐帅的，就好了。」于是每年带我去看望徐帅，也就听到徐帅讲了这么几句心里话。

2、将军们：战场的明星，坐天下的小人

我对战争年代冲杀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崇敬，他们开始都是理想主义者，帝国主义入侵，蒋介石政权的媚外，使得无论哪个阶层的理想主义者，都要为中华民族去找个出路，而不是为自己！战争年代他们是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是为民族而战，而不是为自己而战，所以我敬重他们；但是进了城之后，坐了天下，这帮将星则几乎都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在我眼里比较突出的就是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吴法宪、黄永胜、陈锡联、韩先楚、苏振华。这些人都有战功，像杨成武、黄永胜，也算得上名将，但道德品质都很坏，为了一己的私利，说谎造谣，打击迫害别人，无所不用其极！

这帮人里也有些成了毛泽东的反革命，也算受了惩罚（报应）；其他上上下下，摆来摆去，还是寿终正寝，临死前有充足的时间吹自己，只写过五关，斩六将，干了哪些坏事则只字不提，最突出的就是杨成武，以至于军史、党史都被这帮人的「回忆录」搅得一塌糊涂。

杨成武如果有胆子把他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 5.16 通知的附件）收入他的回忆录，说声「对不起」，我反倒会佩服他；他如果有胆子把他的「大

树特树.....」、「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市长」，这些大作收入他的文集，我反倒佩服他。可惜他没这个品质，所以他的书根本是废纸。比之杨成武，吴法宪是「寇」（成者王，败者寇），但吴法宪的书我却能看，大概因为是「寇」吧，痛定思痛，反倒有点实事求是，不像杨成武自己干了那么多没良心的事，还好像别人都不知道，张牙舞爪，招摇撞骗到最后。

吴法宪出狱后改名吴澄清，很好，我可以帮他澄清几件事：他说他受了迫害，可是他忘了，所有这些迫害方法都是有份参与发明、创造、设计来迫害别人的。你吴法宪迫害了多少人？你吴法宪是毛泽东、林彪封建法西斯专政集团主要成员。中央二办谋杀了贺龙，整残我的父亲罗瑞卿，把母亲和我送进监狱，没有法庭，没有律师，如果不是林彪摔死，我们就这样永远坐下去了。你当阶下囚时想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你当政治局委员、二办副主任时，怎么不想想法律在哪儿？比比你对我们的迫害，我们对你实在是非常宽大的。至于吴法宪说，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林彪拿掉，也不知道林彪为什么要架机外逃，这就不是实话了。林彪是个山崩地裂心不惊肉不跳的帅才，9月13日是什么使林彪心惊肉跳了？林立果在空军干的一切，吴法宪只一味说他不知道，作为一个司令，不知道就是大罪了，何况谁会相信你吴法宪不知道。你说毛泽东言行不一，那哪是言行不一？那时兵不厌诈！所以吴法宪的书值得一读，不管他说了多少实话，多少谎话，都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一再提及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党。

第六章 我认识的周恩来、邓颖超

周恩来承认毛泽东是皇帝，而且是真把毛当皇帝伺候。周恩来知道毛的大跃进不行，但拧不过来。周恩来不赞成文革，但同样拧不过来。周恩来对不起很多人，但没主动陷害过任何人。我不同意周那套明哲保身处世哲学，但设身处地想一想，还找不出比他的一套更好的方法。

周恩来在我生命中最后一次起作用是在文革后，父亲也走了，周和毛当然更早就走了。我已经在总参谋部上班，有一天几个公安部的人来家里拜访，说是给我平反，送平反结论。当时的公安部长是刘复之，爸爸当公安部长时，刘是

办公厅主任，非常熟的人，也看着我长大的。文革中，公安部除了一个谢富治是好人，其他统统打倒，刘复之自然也在打倒之列。这两个人姓不一样，名字的音都样，就这名字，外国人也搅得胡涂。公安部的人来给我宣布平反结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听后哈哈大笑。

我说：「什么事出有因？是反林彪的事？」

他们说：「我们也难，如果我们说抓错了，但是逮捕你的报告上周恩来签了名。」

我说：「抓我的报告我看过。主席没签名，其他的人林彪之下都签了。如果主席也签了，恐怕你们就更为难了？是不是？」

看他们没有回答，我继续说：「周恩来喊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永远健康。』你们现在关着江青，怎么不放啊？」

几个人面面相觑更没回答了。

我继续说：「回去告诉刘复之，抓我，和他没关系。对你们的结论：第一、我不同意；第二、我没兴趣。我也不想再跟你们说什么了，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爱怎么写怎么写，和我没关系。」

几个人没想到，屈尊就驾，跑来给我平反，还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夹起皮包走人。从此我也再没问过有没有谁给我平反，直到 1989 年「六四」我离家离国出走海外。

1、早期周恩来和毛泽东有生杀之怨

父亲当公安部长的十年，父亲写报告，都是：「中央，主席」。有一次，毛泽东批评父亲，说：「你为什么不报告工作？」父亲说：「报告了。」毛泽东说：「在哪儿？拿报告来看。」周恩来马上接上说：「罗部长的报告在我那儿，是我没送主席，我马上送。」周恩来给父亲解了围，这件事父亲跟我说过，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报告上明明写着「中央，主席」，周恩来却没送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有两个很有趣的名词：「土包子」、「洋包子」，虽不见着文字，却很有意义。土包子的代表就是毛泽东，洋包子的代表就是周恩来。洋包子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留过洋要走所谓十月革命城市起义的路线，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土包子虽然也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可是却不为国际承认，即非正统。土包子和洋包子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跟国

民党斗，一方面跟自己斗。

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都是第三国际的路线。王明路线夺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导致五次围剿失败，开始逃跑主义的长征。至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而今迈步从头越」。好好的中央苏区，三十万红军让王明路线搞得东躲西逃，无处立脚，到了延安只剩三万人。

王明路线的灵魂实际是周恩来。毛泽东团结洋包子，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王明则不接受团结，到了延安之后，就去了莫斯科，至死不回中国（按：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1974。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 中共代总书记。1937 回延安。任统战部长，整风中挨批。1950 任法制委员会主任。1956 年 2 月专机赴苏治病，再未回国。）。周恩来遵义会议之后，诚心诚意拥护毛泽东，毛也爱恭维。当年长征时，王明路线要把毛泽东留下，「留下无异于杀头，只不过是借国民党的手杀共产党的头。」这是在看话剧《长征》时，我亲耳听陈毅对父亲说的。

王明路线要杀毛泽东，实际上就是周恩来要杀毛泽东，只是因为林彪、彭德怀坚决不同意，才把毛泽东带上长征。一、三军团是红军主力，没有一、三军团，还长什么征？大家一起死，所以当时的王明中央，即周恩来，还是要听听枪杆子的，这才有林彪、聂荣臻交代父亲照顾毛泽东上路。这才有父亲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那段特殊的友谊，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前，人在落难时，特别念着别人的友情。

毛泽东虽是帝王之身，却也是人肉之躯，后来的遵义会议，主动力也来自枪杆子。枪杆子的主体是土包子，因为洋包子的中央，仗打得一塌糊涂，眼看不行了，所以土包子才决定还是把毛泽东请回来。周恩来参谋、内政、外交都是一流，但不是帅才。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脱胎换骨，忠心追随毛泽东至死；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并不会忘记遵义会议前的恩恩怨怨。周恩来知道毛泽东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不放心毛先走，周翻文革的案。怎么才能让毛泽东放心呢？只有自己先走，毛就放心了，毛也不需要在前生打倒周恩来了。

这是我的猜测，因为我当然不知道周恩来是怎么想的。我是在听了李冰医生讲的故事后，才突然有了这个猜测的。

2、罗瑞卿事件，周不敢得罪毛林

李冰是李克农的女儿，肿瘤医院的院长，周恩来医疗组主要成员之一。李克农是周恩来的爱将，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授上将衔，文革前去世。文革后，李冰来给妈妈治病，曾谈起给总理治病时的故事。李冰说，周恩来多处癌都是原发性的，不是转移，这种病例极少见。由于总理年事已高，而且前面康生、谢富治手术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医生们的意见是保守疗法，不动手术。

特别是第一次手术之后，没有一个医生赞成再动手术，只有周恩来执意要动手术，而且第二次手术后，还要动第三次。李院长说，总理这么动手术，医生都觉得不是求生，而是求死。此话一出，四座皆惊，我则突然有了前述的猜测，当然这是永远无法证实的。

上海会议，由于是「背对背」，父亲不能参加会议听批评，由周恩来负责转达会上说了些什么。周恩来每天来，带着邓小平。邓小平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就周恩来一个人讲。有一次讲到叶群说：罗长子在走廊上看到一只猫，一脚把猫踢开，大声说：病人，还不让贤。父亲听后，拿起桌上的电话，对周恩来说：我跟叶群对质。

被周恩来止住，周说：「没想到你还这么幼稚。」

父亲跟我讲这个故事时，还说：「当时我一下还没明白总理为什么说我幼稚。」我心想这还不明白，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哪是什么踢没踢猫的事；当然我嘴上不敢说。你想一个当了十年公安部长的人，又是书记处书记，又是副总理，还被总理批评为「幼稚」，哪有我插嘴的份！但是也可以看出，上海会议水平实在不高，「踢猫」这种故事也能造得出来。

上海会议开完，周恩来没表态，大概周想，你们土包子自己整自己，我们洋包子何必掺乎。这是笑话，实际情况应该是，周看到毛、林在罗瑞卿问题上明显不一致，所以谁也不得罪。

父亲当了副总理后，和周恩来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周恩来也是有事没事都拉着父亲一起出席各种场合，有时几乎是天天见报。由于六十年代开始，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人家的总统来访都带着夫人，我们这儿江青、王光美、邓颖超都推脱，不大愿意见外宾，尤其外宾夫人们去外地访问无人陪。

为此周恩来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说建议中央委派陈毅的夫人张茜和罗瑞卿

的夫人郝治平承担陪同国宾夫人的工作。打报告之前，周恩来派邓颖超来家里做妈妈的工作，妈妈就不愿意，说：「人家都是总统夫人，我们去陪不合适。」邓妈妈左说右说，妈妈还是不允，于是有一次在舞会上，周当着爸爸的面，对妈妈说：「治平啊，你不愿分担一点大姐的工作？」

妈妈说：「总理啊，人家都是总统夫人，我们陪不合适。」

周恩来说：「我说合适就合适，这件事就算大姐和我求你了。」

好家伙！此话一出还得了！弄得妈妈下不了台，只好说：「总理可不能这么说，我听总理的就是了。」

此事定了之后，邓颖超还来过家里好几次，说：「总理让我来看看，还缺不缺什么？」因为妈妈十六岁日本人打进来，离家出走赴延安，参加共产党，上抗大，当指导员，太行山打游击，一直在军队、公安系统工作，从来没搞过外交工作，也从来不戴首饰，没有任何戒指、耳环这些东西。邓颖超还专门打了个报告，申请了一点寅金，给妈妈做了几个戒指、耳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抄出来，说是封资修。文革后又还回来，妈妈说：「这不是我的东西，还给公家吧。」

3、周恩来哲学明哲保身积郁成癌

父亲落难，周恩来并没有落井下石，但明显的是不关心。周恩来关心邓小平，关心陈毅，甚至关心已被林彪整死的贺龙，但却不关心罗瑞卿。1970年之后，随着毛泽东、林彪逐渐交恶，毛曾不止一次提到罗瑞卿，但周恩来充耳不闻，也没有任何行动。林彪摔死之后，毛泽东马上说，罗瑞卿的事情搞错了，但周恩来仍不闻不问。

如果周恩来有一点点像关心邓小平那样关心一下罗瑞卿，父母和我完全可能早一、二、三年从监狱放出来。但这件事却不能怪周恩来，更不能恨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并没有加害我们，在人家看来是你们土包子自己整自己，一军团自己整自己。至于周恩乘没有热情积极营救罗瑞卿，那原因多了，显然我并不知道详细底蕴，只能猜猜而已。

周恩来的哲学是「先保住自己，才能做点好事」，这也是后人在评论周恩来时争论最大的地方。我虽然不同意这个哲学，我们也不能以这个哲学去教后人，但我实在想不出，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对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周恩来，

我们还能要求他有什么其他的哲学。我们总不能要求周恩来为了保那个人，或为了反对那件事，把自己也陪进去。如果我们要求周恩来玉碎，那事情岂不是更糟！周恩来为了保自己，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起了坏作用，这是失；但在总理这个位子上保住了自己，才可能做点好事，这是得。不知这个评价能不能得到较多人的赞同？

父母从来没说过周恩来不好的话，我则对周恩来多有抱怨，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他没把我们尽早救出黑牢，但我并不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他。如果有人问我对周恩来的印象，实际上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周恩来的形象，仍然是文革前的形象，那么亲切，那么和蔼。朱老总的亲切是憨厚；周恩来的亲切是华丽，光彩夺目，有时让人应接不暇，手足无措。

1956年八大产生的七个常委，被定为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是唯一一个来家里坐过的，也是临时决定，跳完舞，说去你家看看。

半夜三更，我们小孩都睡了，是第二天听父母说，总理昨晚来家里坐了坐。周恩来的车大，怎么也转不进后院，只好在前院下车，走到后院。我们住的地方胡同很窄，他两辆车，我们一辆车，警卫弄得人仰马翻。

文革前，邓颖超倒是经常来；文革后父亲走了，邓颖超来的次数更多了。邓颖超对妈妈说：「你是我主要关心的对象。」每次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一会儿是院子里树上结的桃子，一会儿是树上结的李子。大概邓老太太总记得是父母告诉她「四人帮」给捉起来了的消息。「六四」罢免赵紫阳，我意就别记老太太的帐了。至于有人说她保了温家宝，我就知道了。温家宝是个无心、无肝、无肺的家伙，和老太太也没关系。

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并没有领养过任何小孩，照顾烈士的子女是有的，无非是关照有关部门安排上学，照顾吃饭、穿衣。有几个在中南海住的，受这样照顾的孩子我都认识，还有两个是同学。

李鹏到处吹什么「养子」，无非是有了权，有了钱，找人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对周恩来的思考，也是我断然决定尽快离开邓小平专制系统的重要因素。在我看来，周恩来是这些领袖人物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即一个活灵活现的人，才气横溢，聪明过人。在毛皇帝治下，也无法发挥，还要喊什么向江青学习，

实在悲哀。十年文革，郁郁而终，生出那么多癌。何为「癌」？中医谓气血瘀积即为癌。

邓小平把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完全是发疯！我要不走，要么玉碎，要么生癌。我虽然不同意周恩来的「明哲保身」的哲学，但我选择的还是「明哲保身」，不先保住自己，那就什么也别说了。捉到监狱里去，漫漫长夜，无处讲理，哪天平反了，也就是树个墓碑罢了。

我对共产党、共产主义，从拥护到怀疑，到彻底抛弃，用了半生时间。文革之后，我想这架机器是出了问题，但还想把它修好。「六四」之后，我知道根本不可能修好，只能把它彻底砸烂，我无力砸它，只能逃跑，否则就会被它吞噬。共产党是架可怕的机器，它无情地吞噬着敌人，也无情的吞噬着自己人。

一帮有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男女建造了这架机器，一旦建成，这架机器就不再受这帮崇高理想主义者的控制，而是受坐在驾驶座上的某一个人控制。周恩来曾短暂地坐在驾驶座上，几乎杀了毛泽东。毛泽东坐稳了驾驶座后，得到人民拥护，取得革命胜利，但是毛驾驶这个机器杀了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贺龙，随时准备杀掉周恩来，几乎杀了邓小平，也几乎杀了罗瑞卿、罗猛猛。

俄国共产党、列宁、斯大林、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都曾得到人民的拥护，都曾创造难以置信的辉煌。无数理想主义的男女，为他们献身，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一个比沙皇独裁、国民党独裁更坏的共产党独裁。

人民的力量的伟大与可怕都是一样，最重要的本质是盲目。人民有美好的愿望、自由、民主、平等，但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人民需要领袖，领袖都经常欺骗人民，不欺骗人民就很难成为领袖。你看，有多难。戈尔巴乔夫，违心地欺骗人民时，成为了领袖；然后美国的小布什，明明天天在说谎，人们照样选他。

我的这一套，无论有多少同胞拥护，我都不乐观。我天天念叨的就是屈原的两句话：「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

怎么办？跳江吧。不想跳江，就只好躲在我的象牙塔里，望着这个世界发愁。

4、周恩来的治国之才未能发挥

我对周恩来的感觉，同情多于抱怨，怜悯多于批评，毕竟他是一个人之下，

不能随心所欲。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痛恨封建主义：大家都得围着一个皇权转。过去围着毛泽东转，还有点道理。听他的，仗就打赢了；不听他的，大家一起死。邓小平有什么理由让大家围着你转？邓如有自知之明，就开放党禁、报禁，将中国引入世界民主潮流，这样共产党才可中兴，你邓小平在历史上也才立得住。但邓小平坚持要垂帘听政当皇帝，搞出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的怪胎。

谎称为中国特色的这个体制肯定要垮。今天中国经济畸形膨胀，不是造福，是造祸。是在沙地上建楼，楼建得越高，危险越大，垮下来越惨。垮是肯定要垮的，这实际上早就是全党的共识。我们还在为「中兴」奋斗的时候，邓小平的孙子早已经成为美国人了。邓小平早知道要垮，「六四」之后贪污之风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因为全党都知道早晚要垮。

毛泽东没把中国弄好，是因为他没有现代民主的知识，没有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知识。他起码自己相信这么弄就能弄好，所以我对他的态度是，分析中国文化如何孕育出了一个毛泽东，研究他的发生、发展、壮大、胜利和他的局限性，目的是找出答案，中国应该怎么办。

周恩来由于没有机会把他认为最好的建设中国的美景展现出来，所以就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幻想的空间。大家都觉得：周恩来比毛泽东更温和些，更理性些，都觉得周恩来来弄，恐怕会好一些，但这永远是一个无法证实的美好善良的假设。邓小平则把一个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中国特色」强加给中国人民，养出个『祸害无穷的官僚资本主义，而且为了保护官宦子弟贪污，竟然挑动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此真小人也！

有人问《叫父亲太沉重》（按：艾蓓着，1994年出版，艾蓓2000年和哈佛华裔教授杜维明结婚），我告诉他们，那种东西翻开三页就知道是胡说八道，作者也是真小人。周恩来阴阳是「调」的；怎么调？我们不知道。但一个人阴阳调不调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你和江青在一起，浑身不舒服，没有一处对头。你和周恩来在一起，则一切正常。俗人阴阳平衡靠男女之欢，圣人则不一定。关于邓颖超给周恩来找小老婆的事，只是说说而已。那是六十年代的事。就是周恩来点将，让张茜和我母亲承担国家夫人外交工作时的事情。我在上初中，邓妈妈经常来家里，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妈妈穿过旗袍，而且第一次看到妈妈上了一点点妆。有一天，听妈妈告诉爸爸：「大姐说要给总理找个小老婆，要给总

理留后。」爸爸则不吭气。此事直到文革再无下文。显然是没有行动。

评价周恩来的一生，都是眨或都是褒都不对。推而广之，对几乎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

周恩来首先是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年轻时），出身富裕，据说在中国留法学生中，周是唯一不用打工就有饭吃的人，年轻英俊，一帮女孩子围着转。不投国民党，却投共产党。今天能找到几个这样理想主义的青年？

打仗，周恩来不是帅才，所以第五次围剿打败了。但周恩来是一个绝美的（Perfect）总参谋长。周可以把毛的战略决策，细致地、天衣无缝地安排到绝妙，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毛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挂帅，中央苏区就丢了；周恩来为相，就逐步赢得了全国政权。所以，讲打仗，天下服毛泽东，周恩来也服毛。

治国，毛泽东就是庸才。周恩来看起来比毛强很多，但无法发挥。读者可以自己判断，历史是不是也跟周恩来开了一个大玩笑：周不能打仗，历史却把他暂短地推到了主帅的地位，结果打了败仗，也跟毛泽东结了生死怨。遵义会议后，毛不计前嫌，把周恩来的组织才能在战争中发挥到淋漓尽致。坐了天下，本是周恩来比较内行的治国之才，毛却处处干扰；周恩来忍辱负重，左右为难，费力不讨好

到了文革，甚至江青都在周面前「老娘长」，「老娘短」，甚至说出：「老娘赤条条来往无牵挂」，这种脏话、黑话。周恩来不但不敢拍案而起，反倒低三下四，唯唯诺诺，还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成何体统！周恩来临终，他看到的肯定不是他想看到的。奋斗一生，究竟为了什么？！但是周恩来如果看到邓小平搞的这套官僚资本主义，恐怕也得气死。周起码不腐化，不贪污。

我评价任何人，常常想自己，这是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乱评一通，轻飘飘地下笔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看看他自己，实际上什么也不是。我写出的东西，常常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在这个革命中生，在这个革命中长，这么多我从小崇敬的人物，搞到最后，我发现这个革命的方向根本就是错的。

周恩来承认毛泽东是皇帝，而且是真的把毛当皇帝伺候。周恩来知道毛治

国的这一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行，但拧不过来。周恩来不赞成文革，但同样拧不过来。周恩来对不起很多人，但没主动陷害过任何人。我不同意周恩来那套处世哲学，那是封建主义的一套，但中国仍是封建社会，除了封建主义的一套，其它的也行不通。

所以，设身处地想一想，还找不出比周恩来的一套更好的方法。

读者可以看到，我不同意周这一套，我做不来，我爸也做不来。但我对周恩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毕竟周很多事是身不由己，而且周不当总理，中国还有谁比他会更好？我尊毛泽东为神，但并不同情毛泽东，因为毛是最高权力的独裁者，他的民主理念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国家就会好一点或者坏一点。对邓小平，我也一点也不同情，因为邓小平的独断独行，本来应该搞自由资本主义，他却搞了官僚资本主义。

第七章 和胡耀邦的几次谈话

李昭阿姨对妈妈说：「你知道为什么邓小平不许习仲勋回京吗？就是因为1987年整耀邦时，习仲勋（时为政治局委员）不同意，说耀邦是好人，一句话得罪了邓小平，就被禁止住在北京，只能住在广州、深圳。」

1、在胡耀邦家发牢骚、骂文革

胡耀邦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飏）兵团政治部主任，入川后又在父亲的家乡南充当父母官——南充地委书记。文革时期在陕西当省委书记；九大时由于凑不够法定的上届（八大）中央委员数（半数），被匆忙从牛棚中解放，送回北京凑数开会（九大）。然后即赋闲在家，成为黑帮子弟的头，而他的家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倒台后即住在此至去世）即成为四人帮嘴里的「黑窝」。我从监狱里一出来，去找他。他拉着我的手不放，激动得不得了，说：「知道你受苦了，关了这么多年监狱。」又问身体如何，我说：「还好，饿了一年，胃没穿孔；关了五年，精神没崩溃，就是瘦了十几斤。」他听后高兴得不得了，说「身体没事就好，瘦了不要紧，多吃点就补过来了。今天中午不走了，就在我这儿吃饭。」你可以感觉出来，他的感情是那么真诚，那时父母亲都在监狱，他则一点不避嫌。

他说：「林彪的事都一年多了，主席都说：『我们有些事搞错了，比如罗瑞卿』，怎么还关着？」

然后他又安慰我们，说「现在主席身体也不好，总理也有病，斗争多复杂。」又问爸爸妈妈的情况，又问我们有没钱吃饭。

我说：「我是有工资了，但弟弟妹妹都得靠每个月在总参借钱吃饭，去探视爸爸妈妈，买点东西也得借钱。爸爸那儿情况好一点，在医院，妈妈那儿是正式的监狱，秦城。」

耀邦听了非常气愤，说：「这都是什么事！用对敌人的方法对自己的同志。」

我说：「我们对敌人也没这么不人道，日本战犯，国民党俘虏，我们饿过他们一天吗？国民党关共产党还可以探监，共产党关共产党可小气，搞到全是生死不知。」

耀邦说：「我们在牛棚，比你强点。」又问我：「你现在在哪儿？」

我说：「我从监狱出来就给送回了清华大学。清华现在是迟群、谢静宜的天下，什么军宣队、工宣队、工农兵大学生，乱哄哄的。一个工宣队的副队长接受了我，对我说：『你明天来上班吧，先到校办工厂去劳动锻炼。』我说：『你急什么？你先算算五年有多少节、假日。你该放我多少天假，补我多少工资；还有，你还得开个平反大会，恢复我的团籍。』」

耀邦听后就笑了，说：「你还挺会合法斗争。」又问：「什么恢复团籍？」

我说：「我不够先进，没入党，还是共青团员。在监狱里，他们说开除我团籍。现在我已经超龄了；但我说，你们先恢复我的团籍，恢复的那一天，我就宣布退团。」

由于耀邦过去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所以我加了一句：「你还是我的总书记。」那时真没想到，几年后他真成了我们的总书记。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看他书架上那么多书，看过的外国小说，那时都是封、资、修的禁书，如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雨果、大仲马等法国名家的著作，甚至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于是我们谈起了读书。（记得后来有报导说，他出访伦敦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却不拜访马克思墓。）

我说：「你这儿这么多书。」

他说：「过去没时间读书，从牛棚回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正好读书。」

我说：「我在监狱里也读了三尺书，第一次读《资本论》，怎么也读不下去，硬着头皮读；读完之后，我的结论是，谁也不懂马克思（那时还不敢说毛泽东不懂马克思），马克思也不懂中国。中国的事，找马克思也没用！」

他听后果，说：「猛子，你这些歪论都是哪来的？」

我说：「还真不是哪儿来的，都是在监狱里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继续说：「剩余价值，学政治经济学时，讲得神乎其神的，其实有什么不得了。哪个资本家都比马克思还懂剩余价值。我曾问我的老师，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今天我们工人的剩余价值哪去了？为祖国做贡献了，是吗？老师张大嘴不知如何回答。」耀邦笑笑，说：「你还这么多怪论。」

我说：「不是怪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文革前，我们的思想被你们教育得都僵化了。这也不许看，那也不许听。小时候，爸爸妈妈连红楼梦都不许我们看。我说：你们常说主席最喜欢红楼梦，怎么我们就不能看。爸爸妈妈也不解释，简单命令，高中才许看。」

到了高中，我拿来翻翻，兴趣也不大。到了监狱里，真想看了，也没得看了。只有四卷《毛选》，三年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现在我能倒背如流。」

他说：「这也是一个收获。」

我说：「啥收获，瞎耽误工夫，唯一的用处是用毛泽东的话骂专案组这帮王八蛋。他们让我揭发罗瑞卿反毛泽东，我说：见你的鬼去吧。罗瑞卿反毛泽东，毛泽东都不信呀！你这是逼供信，你这才是反毛泽东，懂不懂！弄得这帮家伙也不敢再来见我了。现在可能也都当林彪的走狗关起来了。」

「我在监狱里还想清楚了一条，一切都得靠自己。」

他听得挺有兴趣，问：「什么叫一切都得靠自己？」

我说：「你们过去教我们的，都是一切靠党，现在党把你关监狱了，靠谁呢？还不得靠自己。我现在谁的思想也不信了，就信自己的思想。我是完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他听到这儿已经有点紧张，我又加上一句：「你说这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瞎胡闹？」

他赶紧止住我，说：「猛子，好多话可不能乱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我说：「这我明白，我也就在你这儿发发牢骚，无产阶级专政，突然就专到你们头上了，把我们也搭上了。我觉得「专政」值得研究，专政有点蛮不讲理的意思。」

他说：「刚建国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只提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也没有了。」

中午在他家吃了饭，告别出来时，耀邦一再叮嘱我：「你们年轻人多考虑点问题是好的，但千万不能乱说，情况复杂呀，好汉不吃眼前亏。」

想想这次谈话，我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文革、（无产阶级）专政都贬了。他并没有训斥我，只是一再强调「好汉不吃眼前亏」，实际上是保护我，这证明他也是在思考这些问题！

（第一章中我提到）父亲一解除「监护」，我深更半夜跑到他家去报喜，他也很兴奋，说：「你看，我说了吧，情况会慢慢好起来。」又说：「一下还不方便去看他，代问爸爸好，我盼着早点见到他。」

后来爸爸当了军委顾问，再后又当了军委秘书长。耀邦就是常客了。耀邦第一次来，就跟爸爸说：「不关你监狱了，猛子第一个就来告诉我。」他们谈话，也是闭门的，只他们两人。我也不知道他们谈的详情，只有一件事，我知道得清楚，就是关于「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当时耀邦是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的《理论刊物》上发了一篇一个教授的文章，拿去《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不给发，耀邦就去找《光明日报》。当时二报一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在汪东兴手里，《解放军报》则在爸爸手里，耀邦把情况跟爸爸讲了之后，爸爸说：「我让《解放军报》给你发。」当即把军报的总编社长找来，并让他们写个：「编者按」。当时爸爸已决定出国治腿。爸爸清楚这篇文章是对着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的。爸爸从北京上飞机赴欧，在乌鲁木齐休息三天，定好了第二天见报。爸爸上机前跟军报的人说：「你们按我的指示大胆地发。我明天在乌鲁木齐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报，不用怕，有事我罗瑞卿顶着。」

爸爸从德国没回来，耀邦伤心欲绝，和李昭阿姨一起来山上看妈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之后，就坐在那儿发呆，不停地说「不该去啊！不该去啊！」又说「何必去治腿，你坐在这儿指挥指挥就好了。」不停地一根烟接一根烟。妈

妈说：「人都走了，不说这些了。耀邦啊，你少吸几根烟吧！」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李昭阿姨就跟妈妈说：「他听见罗总走了，几天精神都恍恍惚惚的。」

耀邦当了总书记之后，我只陪妈妈去看过他一次。他一定要留我们母子吃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跟妈妈说：「罗总走得太早。要是罗总在，紫阳管政府，我管党，罗总管军队，那多好！」我后来想起他这个话，觉得那时邓小平把军队搞成一个独立王国，耀邦已经感到，他这个总书记难当了。

我自己十年左右，最多去看过他两次，每次见到他，他都说：「猛子，怎么好长时间不来看我啊？」我说：「现在不像以前了，你那么忙，你现在是我们的领袖了。」他哈哈大笑起来，说：「猛子，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吹吹拍拍了。你不是说，谁的思想你也不相信嘛！」这下把我也吓了一跳，没想到他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那不过是随便说说。」他说：「你来看我吧，我就听你随便说说。」于是，我还真认认真真跟他说过几件事，但都没结果。

2、反映核电站和买导弹不置可否

第一件是关于核电站选址的事，当时李鹏从水电部副部长提成副总理，非要去杭州湾的秦山建核电站。秦山有我们海军航空兵一个水上机场，海航告状告到总参，我跟胡耀邦说：

「我来可不是为海航说话，如果国家需要这块地，海航可以搬家，问题是李鹏他们要在这儿建核电站，可不是闹着玩的。看看世界核电站史，地大的国家，如美国，把核电站建在远离人口稠密区的岛上或沙漠里；没地的，如欧洲国家，为避开人口稠密区费尽心思，政府还天天挨老百姓骂。我们可好，放着甘肃、青海大片无人区不用，跑到杭州湾、大亚湾来建核电站，这简直是混蛋。就是因为李鹏手底下一帮家伙不愿去西北荒漠，所以就这么瞎胡闹，不要说可能出事，就是没事，也不能这么干，这是遗害子孙。专家论证，到处告状，没人听。李鹏一手遮天，他们找到我，也给了我一份资料，我说：紫阳我不认识，我给耀邦吧！」

他接过材料，说：「我也得给紫阳。」

我说：「你给当然不一样了。」

但这件事没下文，核电站还是建在杭州湾、大亚湾。切尔诺贝利的阴影笼罩着杭州、上海、香港、广州、这就是李鹏的罪恶勾当。

第二件事是「科学民主决策」，万里写了一篇文章，大家都很赞成。我跟耀邦说：「我们那儿是既不科学也不民主；有时根本就是阴谋诡计决策。」

他说：「你又有什么怪论？」

我说：「我刚刚经办的一件事：张爱萍的科工委要从以色列引进导弹技术。以色列人说，你必须先买一千发空空导弹，我才能卖技术。引进装备是我们总参装备部的事，用的是装备费。科工委只有科研费，于是科工委的邹家华（副主任，叶剑英的女婿）、张品（张爱萍的儿子）跟以色列人勾结，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把导弹的价格报的高高的，赚够钱，技术价格报低点，给我们点优惠，然后找装备部派人去谈判。装备部派我去，我跟邹家华说，以色列报的价是美国同类产品『响尾蛇』的三倍，这不合理，不可接受。邹家华、张品知道跟装备部说不通，于是他们秘密给军委写报告，说做这笔生意如何如何好，装备费一个亿美元，科研费两千万，不和装备部会签，偷偷送给张爱萍。张爱萍知道这不合程序，但大笔一批，批给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洪学智。总政余秋里、总后洪学智，事不关己，自然同意。」

「文件送到总参杨得志那儿，杨得志没看清文件没有装备部会签，秘书也懵懵懂懂，也就批了，送到尚昆那儿，当然也过关，军委批完了，文件送到装备部，等于科工委用军委镇压装备部。装备部一下炸了锅，这还得了。此例一开，今后这装备费还怎么管。当时装备部长是杜平，杜平找我，说这怎么办，你是代表装备部去参加谈判的。我说：这明摆着是张爱萍支持邹家华讹诈，可要推翻也很难，不管怎样，我得去找杨总长把事情说清楚。于最找到杨得志叔叔，说了半天，他总算听明白了。」

杨说：我刚来不久，情况不熟，以后凡有关装备费的事，没装备部会签，我不签。我说：这就对了，可现在怎么办？杨说：这次只好这么办了。我想了想，也只好如此了，否则怎么办？让杨把这一切推倒重来，这不可能嘛，大家脸往哪儿放？「你说，这是不是阴谋诡计决策？」然后我又补了一句：「尚昆刚来时，我还在杨尚昆面前说了爱萍的好话。」

耀邦听得很轻松，他只是笑笑；他对军队的事很少评价。

经济改革之初，赵紫阳不懂系统工程，无法预见某个单一政策对全社会的影响，弄得物价飞涨，又搞出一个价格双轨制，党、政、军都开公司做生意，

干部子弟一窝蜂跑到各个公司里去「官倒」，特别是倒卖批文，我意见很大，曾当面抱怨。

我对耀邦说：「文革时，把那么多人打成资产阶级。怎么昨天还是无产阶级，今天就成资产阶级？现在看，有些人还真是一下就变成了资产阶级。」

耀邦说：「你又乱说」。

我说：「我怎么乱说？你看邓家、王震家、赵紫阳家，儿子女婿都去官倒，这是谁赚谁的钱啊？一吨钢、一吨煤，都是两个价格，随便一个局长、部长，大笔一挥，就给亲戚朋友赚个几万几十万，这根本是瞎胡闹的政策。」

我看他听得很烦，面有难色，我知道一牵扯到「元老」，他就难办了，也就打住了，话题一转，我说：「农村改革，三自一包，当年毛泽东为这件事撤了邓子恢的职。三年困难时期又为这个事跟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结了怨。现在看，也只有三自一包才有饭吃；但城市经济改革就复杂了。现在赵紫阳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摇来摆去，又想引入私有制的活力，又不想放弃公有制的招牌，说党政分开，实际上分不开；中央都分不开，下面怎么分得开？」

在我的印象中，我在胡耀邦面前，主要是谈问题和不满，吹吹拍拍的东西实在没有；但牢骚多了，我看他也有点烦。我一看出他有点烦，就不再去烦他了。1986年我去美国之前，已听说在北戴河为了「终身制」的事，邓已经不高兴了。元老已达成共识，耀邦1987年底十三大下台。在去美国的飞机上，我还意外地碰到胡的二儿子刘湖（由于小时寄养在一个刘姓的家里，所以起名刘湖）。我还问起耀邦叔叔好吧，他说一切都好；可我到美国没二个月，1987年初耀邦就辞职了。在这场动乱（真正的动乱）中，薄一波起了最坏的作用。胡耀邦曾为解放以薄一波为首的61个叛徒，废寝忘食，薄一波于公于私，都是恩将仇报。薄一波只追求一己之私利，甘当邓小平的棍子，又拍江泽民的马屁，是老家伙中最缺德的。

3、谈到「新思维」的一丝微笑

从美国回国后，我又去看他，他可是明显地老多了，见面还是那句老话：「猛子，你可好长时间没来看我了。」

我说：「我八六年去了美国，刚回来。」

他说：「你去美国，我听说了。你给我说说美国吧，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说：「我从美国回来，你是第一个向我提这个。」

他说：「你怎么话里有话？」

于是我把杨尚昆莫名其妙调我回来的故事又讲了一遍，然后我说：「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还是讲讲我对美国的印象吧。」

我说：「美国什么最坏的事情都有，吸毒、卖淫、打劫、贪污、腐化、诈骗，但关键问题是这不是主流，主流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相对而言比较民主、自由、法制化。司法绝对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我们强百倍。政治透明，廉洁，媒体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政客、警方、司法的监督极为有效。思想、言论绝对自由，我赞成三权分立，只有三权分立才可有效地监督政府，有效的肃清贪污；只有三权分立才不会出现一手遮天的情况，想过去毛一手遮天，现在邓又一手遮天。」

耀邦阻住我，说：「你又乱说。」

我说：「我讲的是真心话。美国不是一个民族，是大杂烩，但她可以吸收百家之长，靠的就是民主、自由、平等。美国的精髓就在于自由竞争，无论政治，经济，任何领域，就是自由竞争，还特别有各种各样的反垄断法，就是限制已经竞争上去的人压制小萝卜头，即限制大资产阶级压制中、小资产阶级，保护自由竞争机制。资产阶级明白，进步的生命是自由竞争，一垄断，就停止，就死亡。所谓平等是机会的平等，并非财产的平等。美国社会主体是中产阶级，供养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于中产阶级；政客的选票也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在这种架构下，全社会就比较富裕，比较满意，比较安定。我们的呢？什么都是垄断，所以必然走向停止和死亡；发展是在机会不均等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全社会就不满意，不安定。」

我以为他又要阻止我了，但他却没吭气。我想：他现在也限于「比较不满意」的一群了。于是我继续说：

「一个社会最主要的是公平和公正。共产党过去受压迫，所以起来革命，但革命成功后，不能就压迫别人，尤其是不停的内斗，失尽了民心。经过文革，又经过这十年改革开放，我看我入不了共产党这教，毛泽东，我不满意，现在这三大女婿，我也受不了。我自己的这一套，任何时候反精神污染，反右，还不都得让我栽进去，我不想干了。」

他说：「这是什么话？你才四十刚出头，正是大干的时候。」

我说：「我是认真不想干了。你看我们装备部，所有的人都在集中精力做生意，不务正业。底下干部说：过去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现在可好，刀枪都卖了。我再干一年，争口气，就准备退役，南下，找个能自由竞争的地方。」

他并没劝我留下，只是说：「多想点问题可以，但说话千万要谨慎；有时候，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说：「我哪有什么大谋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我注意到了，他可能是大谋，我们有谁做得来？」

我说话无心，他听着恐是有意。我见到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微笑从他脸上滑过，这一丝笑容似乎显得那么苦涩，那么无奈。

没想到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面。不到一年，他就走了。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脑海里面总闪着他那一丝微笑，会不会我那句伤了他的心：他认为我说他也无大谋，为什么不把邓小平伺候到死再改革？或者他想跟我说：猛子，我并不要谋大位，我只想辅佐真正改革。却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胡耀邦走了，他走得匆匆。我又想起了那句老话：好人总不长命。他是忧心重重，郁郁而终，所以他不愿长眠在北京，而是回到江西共青团城。我没去吊唁过，他墓修好时我已辞职，一怒辞天阙了。

耀邦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少有的几个品德高尚的人之一，他是真心改革，真心想中兴。他不恋权，不搞权术，不搞阴谋诡计，所以他在中国政坛上就立不住，因为中国的封建政治，就是流氓政治。毛泽东是开国之君，邓小平是篡位之君，都是既无德也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文化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讲目的，不计手段。当然中国文化也有「得道者得天下」一说；此地「道」应指天时、地利、人和。「人和」中自然要有「德」「信」「义」，这是打天下的时候；坐天下时，就是开国皇帝杀功臣了。

开国皇帝是打天下，坐上皇位之后天天想的就是千秋万代。但是中国两千年历史，哪有千秋万代那回事？篡位之君是靠「谋」别人坐上的皇位，所以天天怕有人谋他。邓小平对几千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反应那么愚蠢过敏，就是他以为赵紫阳阴谋他；其实，赵紫阳如果真是谋他，不会是这样一个反应，赵紫阳可以像江泽民一样，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开坦克就开坦克，开机枪就开机枪，

我把你伺候到死再说嘛！所以邓小平是忠奸不辨，完全是昏庸无能，老年呆滞。杨尚昆、李鹏、陈希同这是真王八蛋，没事也让他们弄出事来。王震则是个胡涂虫，跟着起哄。

4、胡赵和毛邓的根本区别

我和耀邦的最后一席谈，并不只是比较中国和美国，真正重要的是比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其实真要去老祖宗那儿找「正宗」，「正宗」马克思就根本不认为俄国和中国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都是挂社会主义羊头，卖封建主义狗肉。相反，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五国，则基本上是社会主义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但他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因为这个词被俄国和中国用臭了，谁也不敢碰了，欧共体就在朝这个方向走，全社会比较和谐，比较均富，社会成员比较各尽所能。

其实，自有人类社会，政体只有两种：民主和专制。原始公社是民主政体；奴隶和封建社会是专制。资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民主革命；但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的初始阶段，有一段从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转换的过程，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它的专制特征强一些。但是资产阶级民主萌芽却是立国之本，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有一套完整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论，它不是骗人的，而是实实在在实行的。二战之后，民主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也是世界先进潮流。老牌帝国主义英、法自动放弃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改弦更张，自动进入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德、意、日也放弃专政传统，进入自由民主资本主义。

毛泽东并无意识到这个世界变化的大势，仍用德意侵略欧洲，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思维来对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实，朝鲜是金日成侵略南韩，越南也是北越攻打南越，并无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是民族内部较为专制的一方攻打较为自由的一方。由于专制的一方破坏了国际协议，所以才有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去维持这个协议。美国也并没有从战争中搜到任何殖民利益，从本质上讲，美国不是帝国主义政策。欧洲的斗争同样是民主和专制之争。

毛泽东所说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是走向了专政，或者是假民主真专制。凡是专制的国家，从东欧、苏联、中国到亚、非、拉总是动乱不断，就是因为政权是专制的。人民要民主，专制政权总是用民族主义做幌子，来掩盖它的专政的实质和转移人民的视线。这倒是成了一条规律，所以世界只

有两大阵营：民主阵营和专制阵营。至于民主阵营内谁左点，谁右点；专制阵营内谁的经济搞得好点，谁的经济搞得没饭吃，并无本质差别。第二世界落后，主要是落后于政治制度；只要放弃专制，走向民主政制，就打开了通往先进之门。

专制在历史上也有制造一个奇迹的时候，德国、苏联、中国都有这样的例子，但最终是不行的，因为专制从本质上讲是束缚了全民族的创造力。我之所以丝毫不为目前中国经济畸形高速发展所迷惑，而毫不含糊地认为，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是死路一条，就是因为专制的本质是反人民的。一个无全自由思维、自由表达意见，没有平等机会，没有基本人权的社會是无法安定和谐的。

胡耀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首先从平反毛泽东专制 27 年的大量冤假错案着手，企图建立一个比较公平和公正的机制，然后他和赵紫阳一起，想用党政分开的模式把经济解放出来。他是否意识到经济的自由化，必然冲垮政治上的专制，或者意识到什么程度，这我不知道，但我是明确地感觉到，胡耀邦并不赞赏毛泽东的专制，他也不谋求自己的专制，这是胡、赵和邓小平的根本区别。

邓小平、杨尚昆这些人是不喜欢别人去专制他，他则要去专制别人，所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搞民主的一派和搞专制的一派。我曾诚心诚意地跟我的同学谈心，我说：「如果我父亲在，谈多党制，恐怕一下谈不通；但是谈不向学生开枪，我想是谈得通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那一代人的局限性。他们的责任和功绩是赶走帝国主义、日本人、八国联军，他们都不会跟你讲民主，只有把他们打出去。而一个在封建社会环境中武装斗争产生的政权，又很难开启民主之门。

美国的华盛顿是一个特例，而且他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理论的背景，所以华盛顿赶走英帝国主义的武装革命，实际是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而毛泽东的赶走帝国主义的武装革命，开始还称之为民主革命，一旦建立政权，就叫人民民主专政，一旦巩固了政权，就叫无产阶级专政，谁是无产阶级呢？中国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所以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专政了。看谁不顺眼，就专谁的政。

邓小平的专制有了某种进步，这就是开放；开放了，人民就有了比较，知道自己落后，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社会政治专制制度的落后是根本的

落后，要赶上先进，超英赶美，首要条件是自由、民主、平等。开放了，再关上就不容易，特别今天信息如此发达，要禁锢人民的思想，已属不可能。中国加入 WTO，国际资本蜂拥而入，当权者可能沾沾自喜，以为可用资本主义的钱，救一党专制的命；但结果必然相反，资本主义的钱必将埋葬专制制度。经济的自由化，必将冲垮政治上的专制；所以，开放，国际资本涌入，两岸交流，香港回归，所有这一切，都是加速埋葬专制，这和专制者的期待正相反。

耀邦走了之后，李昭阿姨经常去看妈妈，谈到投机处，李昭阿姨曾感慨地跟我妈妈说：「我们耀邦当了总书记后，你怎么不经常来看我们了？」妈妈说：「耀邦当那么大的官，门口排满了人，我们就不便打扰了。」妈妈和李昭阿姨从延安就很熟，所以说话也随便。1999 年国庆五十周年，已经被邓小平禁止回京十二年的习仲勋终于获准进京参加庆典；活动完后，习仲勋摆了几桌酒席，请了一餐饭。当权者一个不请，只请了一帮老百姓。妈妈、李昭和习仲勋一桌，李昭阿姨对妈妈说：「你知道为什么邓小平不许习仲勋回京吗？就是因为 1987 年整耀邦时，习仲勋（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不同意，说耀邦是好人，一句话得罪了邓小平，就被禁止住在北京，只能住在广州、深圳。」宴请之后，习仲勋还是回了广州，直至去世。

读者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实在是什么宪法、人权都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得罪了毛泽东，什么「权」也没了。习仲勋、赵紫阳得罪了邓小平，也是什么「权」也没了。主席、总理、政治局委员尚且如此，一般小老百姓又能如何？

第八章 和杨尚昆父子的交往

「六四」后我辞职，离开总参，杨尚昆是清楚的，他只是没料到 I 申请到了护照。知道 I 已经离开中国后，贺平（邓小平的女婿）恼羞成怒，发文件开除我军籍、党籍，杨尚昆则指示公安部，说：「罗字再回来，就不要再走了。」这是公安部的人在杨倒台后告诉我母亲的。

从我记事起，杨尚昆（1907-1998）叔叔就是非常亲切的。从进北京开始，十年，每个周末我们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杨是中办主任，是组织者。小时候，一见面就抱啊，亲啊，喊我：「猛子师长」。那时有个电影《翠岗红旗》，

主角是红军一个师长「江猛子」（张伐饰）。直到我上大学，见面还是叫我「猛子师长！」

1、杨尚昆有小情妇，被夫人认可

杨尚昆一家住在「卍字廊」，离春藕斋一步之遥。他的二儿子「小二」即杨绍明，虽比我大三岁，但从小就领着我玩，经常去他家，一去就被留下吃饭。他们在中南海西楼吃饭。说是中办机关食堂。实际上，机关的工作人员在一边，另一边就是为首长开的，刘少奇一家就在此用膳，伙食非常好，所以我非常喜欢去。我是很馋的，后来妈妈感觉到了，说我：「你怎么老去杨叔叔家吃饭？以后不许去了。」

那时我还不到十岁，虽然听妈妈的话，也不再去，但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长大了才慢慢明白。中央这些主要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报，为什么进城之后，大家的关系都逐渐疏远了，只是开会时见面，去公众场合见面，私人之间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一开国就来了个「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把潘汉年也算进去，还牵扯了一大堆中、下层干部，罪证材料上都是，谁谁谁去了谁谁谁的家，密谋什么，密谈什么。大家为了避嫌，就不大互相走动了。

杨尚昆的夫人是李伯钊，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所以我们喊「李妈妈」，年龄和杨差不多，但显得老多了。我们很小就知道杨尚昆有一个小情妇，我们都喊她「小甲」，名义上是公务员，我们家都是男公务员，照顾爸爸的生活。杨尚昆家则是两个女公务员，小甲照顾杨尚昆起居，一个中年妇女照顾李妈妈的起居。小二会带我参观中南海「卍」字廊他爸爸、妈妈所有的房间。中式的正房，中间一个厅，两边两套一模一样的睡房。小二跟我说，爸爸睡一边，妈妈睡一边，我当时还挺奇怪，怎么爸爸、妈妈不睡一起？

后来才知道，李妈妈是完全认可小甲的存在。这在高层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也不是秘密。五十年代末，邓颖超就在这个小圈子里到处散布，他要给周恩来找个老婆，为周留后！邓颖超曾到家里来跟妈妈说这件事。妈妈告诉爸爸时被我听到，但我们小孩是绝对不允许议论这些事的。

1959年之后，爸爸离开公安部到军队工作，周末即不再去春藕斋看电影了，也不去春藕斋跳舞了，而改在大会堂参加为周恩来组织的舞会。我们逐渐长大，

父亲反倒不大带我们去参加舞会了；偶尔去一下，也是听听侯宝林相声。明令禁止我们小孩跳舞，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你可以跳，我们就不能跳？但嘴上不敢说。父亲在我心目中是绝对权威，说什么，是什么，不敢问为什么。

年轻人对异性自然越来越有兴趣、好奇心，但却没什么知识，也没人教。我第一次正式地学到两性的知识，是在初3的生理课上！从童年到少年、青年，看电影就成了我获得各种有趣知识的重要管道。杨尚昆不跳舞，只看电影，所以我最喜欢到杨尚昆那儿看电影。爸爸不去春藕斋后，我自己骑自行车去；而且和父母一起去看电影，限制的很严，光屁股的镜头是不许演的。当时国产片没这个问题，进口片公演的，就是已经剪好的了。

2、毛整刘少奇为何拿杨尚昆开刀？

「过路片」是不公演的，就是没剪过。跟爸爸看电影多，一听说是「过路片」，看有小孩在，就不让演。到杨尚昆那儿看电影，全是「过路片」。杨尚昆星期六晚上在西楼放电影，都是公演的电影，工作人员都可以去。星期日下午在春藕斋放「过路片」，没几个人。我的印象里就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着一帮孩子，刘少奇的孩子都喊杨尚昆「杨爸爸」，这大概也是毛泽东下决心整掉刘少奇，首先拿杨尚昆开刀的原因。

毛泽东觉得杨掌握着中央机要，他和刘少奇关系太密了。1965年秋天，毛泽东首先撤了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发配广东去当省委副书记，就是整刘少奇的信号。那时我在大学二年级，因为大学是住校，周末就回校，已经两年没去杨尚昆那儿看「过路片」了。紧接着文革第一冤案「彭、罗、陆、杨」，大家一起蒙难。林彪摔死以后，毛泽东逐渐给我父亲平了反，但至死没给另外三位平反。

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才着手为彭、陆、杨平反，但华、汪阻力很大，进展缓慢，到杨尚昆回到北京，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住在西山，听说杨在中组部招待所，我打电话过去，小二接的电话，我说：「这么多年了，杨叔叔还好吧，我去看看好吗？」就听电话里杨叔叔问小二是谁，小一说：「猛子要来看你。」紧接着就听到杨叔叔的声音了，说：「猛子啊，你来吧。」于是我就去中组部招待所，就在我们育英小学旁边。

去了一看，一间大房子，中间放两张床，乱糟糟的，李妈妈有点半身不遂

了，走路要人扶着，也去不了卫生间，只好在屋子里用屏风隔着，放个手提马桶，根本不成样子。我见到杨叔叔，眼圈直发红，泪就掉下来。杨叔叔则还是那样，还是笑哈哈的，还是「猛子师长」。我说：「这么多年，你可受了苦了。」杨则无所谓地说：「大家都受了苦，你不也坐了五年牢。」又说：爸爸也不在了。我说：「是啊，不该去德国治腿。」

然后我对杨叔叔说：「妈妈也想来，知道你这儿不方便，让我来接你们到山上吃个饭。」杨说：好啊。」于是杨绍京、杨绍明两兄弟陪二老一起上了车，就去西山，见到母亲，杨叔叔说：「大家都熬过来了，可惜没见老罗一面。」亲得不得了，一起吃了饭，喝了一点酒，现在还有照片在。又说到汪东兴阻拦分配工作，杨叔叔说：「我跟中组部谈了。我还回广州去工作，不留在北京。」没过多久，杨尚昆又回广州去当省委副书记。

爸爸突然离开人世，邓小平也是措手不及，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管军队的事。想来想去，还是回到了杨（得志）罗（瑞卿）耿（飏），邓说：「罗瑞卿不在了，调耿飏来。」当时耿飏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自进北京，耿飏一直在各处当大使，所以文革中也没受多大冲击，但耿飏已近三十年没在军队工作过，调来当军委秘书长后，不管事；三总部上报军委的事，他不议不决，就等邓拿主意。邓小平是一个不管具体事的人，对耿飏就很不满，于是又想到杨得志，就把杨得志调来当书记处书记兼总参谋长。

3、迟浩田阴差阳错当上副总长

邓说：「杨、罗、耿，罗不在了，杨、耿顶一个罗。」但还是不行，杨、耿还是等邓拿主意，很多事久拖不决；三总部反映很大，邓小平没办法，想到杨尚昆。杨尚昆在延安时就当过军委秘书长（但那时军委秘书长只管杂七杂八的事），于是把杨尚昆从广州调到军委当秘书长。杨调到北京后，住在董必武原来住的地方，在我们宽街后两条街。

我骑自行车去看他，他把我领进办公室，诚心诚意跟我说：「猛子啊，我来当这个秘书长，可不像爸爸啊。我这么多年没跟军队打交道，现在大军司令我都认不全。」我说：「你来当，我可是打心里高兴，什么事都可以跟你说了。」杨说：「现在最难的就是干部问题。你爸爸在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干部问题？」我说：「说过一些，也不多。爸爸只工作了一年，身体不好，很多文件

看不过来，有时只好我看看，给他讲一讲。」他显出非常感兴趣说：「你给我讲讲。」

我说：「泾渭分明的人，好办，比如陈锡联，谁都知道他是四人帮的人。难办的是，又整过人，又挨过整的人，比如杨武。上海会议，他揭发爸爸的发言是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文革开始，当代总长又挨了整；复出后，批郑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在总参又是打头阵。邓这次复出后，把他从副总长上拿掉，送福建当司令。他在福州住招待所，根本没打算长呆，一筐筐福建荔枝往叶帅家、聂帅家送，也给邓家送，还要把女儿嫁给邓的儿子，就是为了回北京当总长。聂帅跟邓提了几次，邓说：不行。东西送到家门口，邓说：东西照收，事情不办。」

杨听到这儿就笑了，说：「人家要嫁女儿，你也知道？」

我说：「他找人去说媒，卓琳阿姨就告诉妈妈。」

我看他知道我不是乱说，就继续说：「再说迟浩田，这个十三级干部，谁也不认识，当副总参谋长。爸爸来了之后就问，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别人说：邓推荐的。爸爸就去问邓：你认识迟浩田这个人啊？别人说是你推荐的。邓小平说：我不认识，是秦基伟推荐的。爸爸就找秦基伟来问。秦说：『唉哟，这可是大冤案。』爸爸不明白，说：怎么回事？秦说：我根本不认识迟浩田，只知道他是一个师政委，文革派去人民日报支左，土头灰脸给人赶了回来，待在家里没人要，就去找我说：『我是北京军区的，还是让我回北京军区吧。』我说：你要回就回来吧。」

「秦基伟继续说，有一次在邓那儿说起军队干部的事，提到一些支左的干部，地方不要，还可以回部队，我就说了一句：我们那也有个师政委，还可以，要回来就回来吧。邓老爷子可能听了一句：『还可以』，就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说：迟浩田。邓说：我这里就需要些还可以的干部，调来当个副总长吧。秦基伟说：我都大吃一惊。爸爸说：那你应该跟邓老爷子说清楚啊。秦基伟说：『罗总啊，我可不敢再去老爷子面前乱说了。』」

讲完这一段，我对杨说：「你看，就这么阴差阳错当了副总长了。爸爸把事情搞清楚了之后，就说：这样的人当副总长不大合适。」

正在这时，人民日报又送来了检举材料，附了五封迟浩田写给江青的效忠

信。爸爸在去德国治腿之前，就已决定把迟浩田拿掉，可是爸爸没回来，又拖了好长时间，直到杨得志来当总长，才把迟拿掉。迟浩田就在北京到处告状，说他冤枉，折腾一阵。现在送到济南军区去当政委了。」

4、耿飚当军委秘书长，也是不管事

杨又问：「爸爸有没有提到，有什么干部比较能帮忙？」

我说：「杨勇是三军团的大将，彭德怀倒台时，主席要团结三军团干部，亲口告诉爸爸团结三军团的干部，要以杨勇、王平、苏振华为代表。文革前，苏振华是海军政委，跟萧劲光也搞不好关系，跟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不合，又闹着离婚，跟海政文工团一个小姑娘结婚。四面楚歌，爸爸是总长，到处做工作保他，文革打倒了一下，林彪垮台后，又回到海军，还当了政治局委员。爸爸刚当顾问时，在京西宾馆碰面，都不打招呼，怪怪的。」

「但是杨勇和王平却大不一样，杨勇文革后一见爸爸，就总长长，总长短。批邓时，王平在武汉军区当政委，我刚去当兵，去武汉出差，司令是杨得志，我去看他们，杨得志还有点避嫌，拉了拉手就离开。王平则拉着我回家吃饭、喝酒。那时爸爸在福建养病，王平千叮咛万嘱咐：『给我带好啊，你爸爸受苦了，你爸爸是大好人。』」

我话锋一转，说：「恰恰是这三个人，在延安七大时写信，告爸爸在三军团乱杀人。当然，谁都知道，后台是彭德怀。」

杨叔叔一下没听明白，问：「什么乱杀人？」

我说：「延安七大时，主席告诉爸爸，杨、王、苏三人联署说你在三军团当保卫局长时乱杀人。爸爸对主席说，中央虽任命我去三军团当保卫局长，但我一天也没到任，我杀了谁？主席说，人家告状是有名有姓的。人家说杀了，你说没杀，那好，把问题挂起来。原来是要爸爸当中央委员的，这么一挂，就改为候补委员了。」

解放后，他们讲的那个人又找到了，活得好好的，实际上是长征路上脱逃的，解放后又来找彭德怀，说我在三军团干过，能不能给点钱。这下，闹个大丑闻。」

杨听得聚精会神，说：「我也风闻过，没你这么详细。」

我说：「这都是主席给爸爸讲的，爸爸又讲给我听。文革前，爸爸从来不

给我们讲你们当年的故事。文革后，受了那么多苦，在福建养病时，有时讲一点。」

我又把话题拉回来，说：「苏振华要拍华国锋的马屁，搞什么旅顺口检阅，要把东海、南海的驱逐舰调到北海，让爸爸教训了一顿，没办成。王平被爸爸调到总后当政委，部长是张震，都是三军团的干部。爸爸把杨成武调去福建，别人都说，罗总用人不唯亲，杨成武又是一军团的，又是老华北的。爸爸把杨勇从新疆调回总参当第一副总长，准备让杨勇当总长。杨勇就把张震从总后调到总参，准备自己当总长后，张震当第一副总长，没想到爸爸从德国没回来，邓老爷子就犹豫了。」

杨问：「犹豫什么。」

我说：「我也不清楚。但听卓琳阿姨说，杨勇是胡耀邦的表兄弟？」

杨也一愣，问：「表兄弟？」

我说：「是啊，这么长时间，两家都那么熟，我们也不知道。据说，耀邦的妈妈和杨勇的妈妈是姐妹，一个嫁给姓胡的，一个嫁给姓杨的。」

我接着说：「老爷子最后还是把总长交给了杨得志。其实，那时候我就跟爸爸提过好几次，为什么不找杨得志？」

杨问：「爸爸怎么说？」

我说：「爸爸说，用人要避嫌，杨罗耿，杨罗耿，不能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找人。」

杨又问：「怎么大家都说，耿当了秘书长后什么事也不做？」

我说：「耿飙也是莫名其妙。文革时晃了几晃，后来就当成了政治局委员。我从监狱里放出来，爸爸妈妈都还关着的时候，去找他，他和赵兰香阿姨也不避嫌，照样在家里坐。我们给主席写信，请他递，他也真递，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提别的，就提要去看，探监。主席还真批回来，所以人家耿飙是真办事，不是哄我们。爸爸出来后，也没见他有多热情。」

「爸爸走了之后，老爷子首先想到耿，让他接爸爸的秘书长，他当了秘书长后，也没来看过妈妈。耿麟在任上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改革收房租』，按他的办法，妈妈全部的工资都被扣下交房租。吃饭没钱了，要不就搬家；妈妈急了，就去找他，他躲着不见。妈说：好吧，你耿飙不管，我就去你家门口讨

饭。幸亏有个总政主任冯征，因为妈妈是参政顾问，冯征说：我们参政有笔『干部补助救济金』，他们扣你多少，给你补多少。参政在我们装备部楼下，所以每月1日，我就下楼领救济，领了一年半，耿麟的房改也改不下去了，不了了之，人家不扣妈妈的工资了，我也不去领救济了。

5、军队文革坏人多，清理「三种人」

杨听了确也一惊，说：「还有这样的事！」

我说：「是啊，我也不知道这耿飙是怎么了。他来军委后，一个星期开两次会，其它时间谁也不见，所有的事都是议而不决，他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决；但他也不去了解情况，别人要给他反映情况，他也不见，什么事都推到邓老爷子那儿，等邓拿主意。你知道，邓是不管具体事的，邓当然烦了，所以找你来，让耿去当国防部长，东逛逛，西逛逛。」

杨又问：「杨得志接总长后，情况好点吧？」

我说：「杨得志是好人。杨得志一到北京就来看妈妈，说：你有什么事就找我。妈妈说：你去问耿麟，他让我领了一年救济。」

我继续说：「杨总长是个好人，但软了点。」

杨问：「怎么软了点？」

我说：「比如清理三种人吧，爸爸在时就议过，耀邦来看爸爸，就谈起怎么清理三种人。耀邦是杨、罗、耿兵团的政治部主任，跟爸爸无话不谈，爸爸的意见是要好好清理。十年文革，军队那么多干部跑到地方去支左，有些家伙无恶不作，有欠血债的，有强奸妇女的，这些坏家伙不清理掉，后患无穷。爸爸特别强调，十年文革整死那么多人，不能就一句『林彪、四人帮』就完了。贺龙是怎么死的？给贺龙输葡萄糖的那个医生是不是杀人犯？该不该清理？耀邦犹犹豫豫，主要担心又扩大化，又整出一批冤假错案，耀邦说：建国以来整了这么多人，看起来除了高（岗）饶（漱石）那一摊，都得平反。」

我说：「耀邦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但不能因噎废食，军队内部就有一大批坏人，去地方支左的，更是横行霸道，蛮不讲理，地方告状信一麻袋一麻袋，都是有名有姓的，军队要不处理，如何平民愤？有些家伙对地方蛮不讲理，比如卫戍区占了人家地方的房子，中央三令五申，军队占地方的房子要还，它就是不退。爸爸找来傅崇碧，问他：『你为什么不退？』傅崇碧说：『我们

在那地下修了工事，花了好多钱。』爸爸根本不理他，简单明确告诉他：『你就给我退，什么也不用说。一个月交房。』傅崇碧屁也不敢放一个，还不就得乖乖退。

「有些更恶劣的，占着人家私房，有名有姓的民主人士，文革赶到农村去，这帮混蛋就住进去，现在人家回来，他还赖着不走，说什么你一半我一半。你跟他好好说，他当你是病猫；你跟他说，你一个星期不走，我找人来帮你，他三天就滚蛋了。现在风气实在坏，政治事故不断。过去哪听说过士兵开枪打干部；现在弄得枪和子弹不敢放到一起：武器库要连环锁，钥匙连长拿一把，指导员拿一把，一个人还开不开，无奇不有。」

「再说回清理三种人，中央文件是发了，但军队无声无息。我想耀邦犹犹豫豫，杨勇自然犹犹豫豫。杨总长来了之后，你知道，杨总长是不大得罪人的，也没什么起色；三年，也就是走个过场，不干不净的人太多，文革教坏了一批人，腐蚀了一批人。文革提上来的一批干部，巧嘴滑舌，八面玲珑，看风驶舵，精于钻营，现在充斥在各级机关里的，一大批这样的人。」

「军队复杂，地方也一样，好多大案不清不白，像公安部长李震、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官当得好好的，突然就自己去死了，现在就说自杀；为什么自杀就没人说了，干了多少坏事？这种人，我们要不清理，还不就留下来了。我看汪东兴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说汪抓四人帮有多大功劳，我看他抓四人帮，多少是因为他和江青的恩恩怨怨，多少是为了人民，还不一定呢？」

6、向猛子探听军内高干情况

由于杨尚昆对汪东兴、江青是太知道了，所以我也不再班门弄斧。然后，我又试探地问了一下，我说：「杨叔叔，我觉得抓四人帮好像有点违宪。」

杨尚昆听了大吃一惊，说：「猛子，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还是把我的话说完，我说：「那四个都是政治局委员，能说捉就捉？」

这下杨尚昆可不高兴了，他严肃地议：「猛子，你可不能胡思乱想，四人帮不捉，哪有我们的今天？」

我说：「这我明白，邓小平拉爸爸出山，就是为了夺中央警卫团的权，可我总觉得，党内还得靠说理斗争，捉来捉去不正常。」

杨尚昆几乎要发火了，他瞪着我，说：「猛子，你可要注意呢，你这些想

法都不对。说理，彭、箩、陆、杨，怎么说啊！」然后又重重地加上一句：「好多事，你可不能到外边乱说！」

我看话不投机，就打住了，我说：「我不会在外边乱说什么，只是在这，我说什么都行，反正说错了，你也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

杨尚昆这下哈哈大笑起来，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咱们都刚刚当过十年反革命。」（罗注：你看，他还真没说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不到十年他还真把我打成了反革命。）

我又问他：「杨叔叔，主席怎么就弄出个彭、罗、陆、杨？」他非常警惕的看了我一眼，斩钉截铁地说：「主席的事，我是不会跟你们小孩说的。」

我说：「还小孩呢，我都四十了，你在延安当秘书长的时候，还没四十呢！」

他笑眯眯说：「你还什么都知道。」

我说：「当然了，你来当秘书长，我们那儿就有人问，怎么突然调个杨尚昆来当秘书长。我就说：怎么啦？杨尚昆在延安就当过秘书长，还当过三军团的政委。」

杨尚昆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秘书长是真，三军团政委嘛，和你爸爸的三军团保卫局长一样，一天没到任。」

（罗注：这是杨尚昆亲口告诉我的。《长征》那电影胡编乱造，好像长征就靠三军团。三军团就是彭德怀、杨尚昆，其实真实情况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为一、二军团团结，互相调派一些干部，命令是下了，军委档案里也有，但那时天天行军打仗，根本没法到任。谁不知，三军团政委是谁。电影上还有什么刘少奇当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草地背伤员，根本就是瞎扯淡，谁听说过刘少奇走过长征？红军长征时刘少奇在华北，营救文革中的「61个叛徒。」）

杨又问：「谁问的？」

我说：「王尚荣的儿子。」

他说：「谁是王尚荣？」

我说：「王尚荣是二方面军一个少将，文革前的总参作战部部长，随贺老总给打倒了，现在是副总长。王尚荣我们不熟，但王尚荣的夫人是妈妈抗大最好的朋友，我们蒙难时，给我们好多照顾。」

杨戏弄地说：「还挺复杂。」

我也借题发挥，我说：「是啊，现在什么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就难办。这十年文革，真是自己把自己搞乱了。」

杨又问：「爸爸有没有说过什么人比较能干？」

我说：「洪学智是三军团的干部，跟着彭德怀一起倒台，受了多少苦。爸爸说，这个人比较能干，也比较正直，所以爸爸一当秘书长，就打电话把洪学智从东北一个什么山沟里叫回来，当了国防工办主任。那时贺平还在国防工办，邓毛跟我说：洪麻子就听罗叔叔的。我还说她：你这是什么话？大家还不是都听老爷子的。那阵子，洪学智还经常找我去他办公室，工办和总参在一个大院，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去了。爸爸走了之后，再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也不止一个，比如余秋里，我们住在京西宾馆时，天天来，说不完的话，爸爸走了之后，再没见过余秋里。」

听出我的不满，于是说：「我是问你有没有什么人比较好？」

我说：「我觉得张爱萍比较正直。爱萍是新四军的，文革前也是副总长，对父亲是敬而远之：从不说心里话。文革中大家都受了那么多苦，爱萍才觉得罗瑞卿这个人比较正直，不搞小圈子，否则林彪怎么会整罗瑞卿。爸爸刚解除监护住在三所张爱萍隔壁，张爱萍从福建回来，没进家门就来看爸爸。张老头的腿也让造反派打断了，持着枝拐杖，一进门扔了拐杖跪在地上就来看爸爸的伤腿，一边摸一边落泪，说：『去福建治，福建的中医有办法。』我们就拼命拉起他，满屋子的大人孩子跟着落泪，爸爸也扶爱萍说：『快起来，快起来，坐下慢慢说。』那时爱萍已经复了职，爸爸什么也没有，就靠爱萍跟老爷子通消息，给主席打报告，都是靠爱萍传的话，带的信。爸爸当秘书长后，爱萍没事从来不来找爸爸。爸爸还经常说：『怎么这两天又没见爱萍？』爸爸突然走了，爱萍伤心得不得了，一不小心，还把手摔断了。」

7、杨绍明在其父死后，疯了

杨尚昆看我说得如此激动，似乎也受了感动，秘书三次来催，都被骂了出去。我就主动说：「杨叔叔，天晚了，你休息吧。」他则说：「猛子，你常来看你杨叔叔。」我说：「那还不容易，就隔两条街。你找我，让小二打个电话就行了。」后来也确实热乎了一阵。那时小二还没结婚，妞妞还找我，说：「你也不帮忙。」我说：「现在还用我帮忙，姑娘还不得排队等小二拣。」她说：

「你就是只说空话，不办实事。」

后来小二很快结婚，又很快离婚，传说这病，那病。那时，为了我不同意军队做生意，和杨尚昆的关系已经疏远了，我更没心听了。但小二的哥哥杨绍京的两个孩子，却都不健康，一聋一哑。

杨尚昆还在台上时，绍京就一下没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1992年倒台。1994年，我送我弟弟从新加坡去香港，在飞机上我弟弟碰到杨小二。杨小二一把抱着我弟弟，说「了子，好久不见。」我弟弟吓了一跳，心想，你老子当副主席时，我们也见不到你啊。小二还问：「猛子在哪儿？」我弟弟说：「他刚送我上飞机啊。」小二说：「告诉猛子，1992年在香港他给我的条子，我收到了。很抱歉，忙，没和猛子见一面。」我弟弟在电话里告诉了我，我说：「那时我在香港，看报纸小二在举行摄影展，即写一便条让人送去。我见他是因为我辞职，杨白冰批了，我走了，一切合手续，工资停发，脱党自动。到1991年，贺平发一个文件，开除罗宇军籍、党籍。我找小二，是找杨尚昆论理。现在杨尚昆倒台已两年了，小二还不忘做这个戏。」

1996年，妈妈来马来西亚看我，跟我说：「杨倒台之前，从来见不到，倒台之后，在301医院，老远就大叫一声：『郝治平，好久不见了』，大步跨来，双手紧握，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说：唉哟，我们可做不来。我说：没问猛子师长？妈妈说：「没有。现在北京只有两个人一见我就问猛子好，一个是陈云的夫人大于阿姨，一个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一见我就问，猛子好吧？我就说：还好，谢谢。」

杨尚昆死后，小二疯了，经常住精神病院。

2002年，301医院一个医生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六四」，说杨尚昆1996年跟他说：「『六四』是我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错误，现在我无力纠正这一错误，但相信将来一定会纠正。」（按：美国之音报导，这位医生是蒋彦永。）

我的老天，我真佩服杨尚昆的老奸巨猾，他想了多久才想出这最后一招。他根本不想为「六四」平反，如果他想，他应该自己去跟邓小平说，即使他不敢跟邓小平说，他也应该在邓小平死后向中央说，即使他不愿意打扰自己晚年的清静，他也应该写张字条留给他儿子，在他走后他儿子递给中央——但他都

不做，他只是把一番老百姓希望听到的话告诉一个医生，在他死后四至五年后公布出来；他知道，如果当权者仍有力不平反「六四」，首先会说医生造谣，他的小二、妞妞也不会受损；如果当权者决定平反「六四」，那他杨尚昆就是大家应该缅怀的先贤了。

8、迟浩田成为第3号六四战犯

多少年来，每当忆起我自己和杨尚昆在他家那场促膝谈心，我都觉得好笑，觉得自己是那么傻，我对杨尚昆谈「用人避嫌」，人家没用六、七年时间，就把自己的弟弟杨白冰从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推到政治局委员、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邓小平还出来讲了两句「举贤不避亲」的昏话，紧接着又自打嘴巴，把杨家兄弟赶下台。）

我跟杨讲「党内斗争靠枪杆子，不大正常」，人家几年后把坦克开上天安广场去对付学生，不知他下令开枪时有没想到「猛子师长」的违宪之说。

我跟杨讲，迟浩田怎么阴差阳错当了个副总长，肯定给他很深印象，所以他1987年把迟浩田从济南调回总参当总长。当时秦基伟是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迟没当过大军区司令，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但秦这个国防部长可不能跟彭德怀、林彪比，根本无权，所以也没人听他的。杨所以选迟，是由于迟一点资格都没有，肯定好使；果然，迟视杨为知遇之恩，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迟当总长一年多就「六四」，于是迟浩田成为继邓小平、杨尚昆后的第三号「六四」屠杀平民的战犯。（屠杀平民在国际法中为战争罪行，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只要屠杀平民即为战争罪行。）

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下令军队向市民开枪，国防部长在他面前拔枪自尽，拒绝受命，士兵也拒绝开枪。罗马尼亚是东欧最落后的国家，普通士兵尚有如此的人民意识；从这个角度比较，中国的军队还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这支军队所以愚蠢，是由于它大部份成员来自贫困的农村，他们没受过基本的教育，不懂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因为他们自己在农村就没有人权，和城里的人也不平等。因此他们天生仇视城乡差别，不怕造成最悲惨事件。

历朝历代，城里人剥削乡下人，共产党也一样。这一天，穿上军装的乡下人进城了，而且邓小平、杨尚昆说可以开枪，这集乡下兵兴奋到何种程度，从电视画面上可见，这些士兵像狂欢节一样向人群开枪。接下来几天，军车在北

京城里横冲直撞，车上的士兵发疯一样朝天开枪。我在巴黎对着电视画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六四」之后，很多人见到我都说同一句话：如果罗（瑞卿）秘书长在，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从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我总是说：第一，历史没有如果；第二，如果有如果，恐怕也会有很多；第三，「六四」表明，中共还是封建主义的党，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如果不走出这个封建圈圈，党无望，国无望。

现在回忆起来，我实在是太信任杨尚昆了，对他推心置腹。比如他刚上班，给三总部一个「指示」，说：「什么事，你们三总部商量好了，到我这儿来。如果没商量好，就别来。」此指示传达后，大家都摇头，有些敢说话的老参谋就在我面前发牢骚，说：「我们都商量好了，还要你干嘛！」我实在也觉得这个指示欠妥，于是我找个机会很轻松婉转地对他说：「杨叔叔，现在最难的就是大家商量不一致，所以才盼着你能来拍案定。」他根本没应我。

9、1987 年洛杉矶最后一次见面

我看他的样子，是很烦听这种话。以后为了军队做生意的事，互相已经很不高兴了。他把他的女婿调到「保利」之后，我们就越来越疏远。1986 年我去美国，1987 年他以候任国家主席访美。我去洛杉矶看他，参加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欢迎他的宴会，大厅里那么多人，他可一眼就看到了我，大面上还是非常热情，一把把我拉过来，对身边的大使说：「这是我们罗大将的儿子。」周围美国的记者、特工劈里啪啦一通乱照相。

他问我：「你怎么样啊？」我说：「还好，我是从东海岸过来看你的。」他说：「好，好，宴会完了，你来我旅馆。」然后又大呼小叫他的卫士，说：「我的旅馆怎么走啊？」我赶紧拉着他，说：「你别管我了，我找得着你。」宴会完，他前呼后拥地走出去，还专门回过头来跟我招招手。我赶紧去拿车，跟上他的车队，一溜烟就到旅馆。他前脚进他的总统套间，我后脚就跟上了。

他看到我，有点吃惊说：「哎哟，你怎么这么快。」我说：「这还不简单，跟上你的车队就行了。」然后他说：「唉呀，这道洋饭还是不行，我没吃饱。」这时大使、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来了，大使一听，说：「正好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定了一桌中国酒席，给你祝寿。」杨马上说：「不能祝寿，不能祝寿。」

大使：「好，好，不说祝寿。你刚才说没吃饱，咱们打打牙祭。」杨尚昆也是四川人，四川人吃点好东西，叫「打牙祭」。杨尚昆说：「打打牙祭还可以。」

于是大家又入座，于是大家都敬酒，我也敬了他一杯。他的女婿还给我们照了照片。由于菜都冷了，杨也只随便吃了一点，就说：「休息了。」于是众人退去，杨拉着我走到旁边一个小偏厅坐下，说：「你是不是又有什么话要说？」

于是我对杨尚昆说：「我来美国后学习了一点美国的『对外军事销售法案』。按美国法律，由于对外军售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所以购买方可以使用美国政府贷款，最多可以使用 80%。我们这个项目要 2 亿美元（200million），可以贷 1.6 亿。」

杨说：「报告我是看到了，但别人都说：为什么要用美国人的钱？」

我说：「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用美国贷款的好处是：（1）这个项目风险很大，美国的系统，中国的飞机，现在又加上意大利的导弹，将来精度达不到，扯不完的皮，真要赔，美国赔 80，我们赔 20。（2）我们现在钱紧，美国政府贷款息很低，将来慢慢还嘛。」（说实话，当时说的风险，主要是指技术风险，没想到政治风险，后来「六四」，「和平珍珠」砸锅，我们赔四千万，美国赔六千万。）

杨尚昆看我说话斩钉截铁，有理有据，一幅「天下老子第一」相，就无可奈何地说：「你个猛子，得理也不能够不饶人。好吧，我回去让他们再研究研究。」但此事再无下文。我后来想想，我这个人也是不行，这种态度，在父母面前可以，在外人面前，邓小平、杨尚昆海量再大，也容不下我。

（罗注：细心的读者恐怕会有疑问，帐对了吗？按着你前面讲的 2：8。一个亿应是 2 千万、9 千万。你怎么说 4 千万、6 千万？实际情况是，按美国法律，2 亿可贷 1.6 亿。我为自己出 4 千万，但是要先用这 4 千万，这 4 千万用完了，再用美国的钱！所以按我的建议办，也是 4 千万，6 千万。）

这次说话，我自己还感觉良好，还谈了一点人事上的事（第一章有详述），但实际情况是杨尚昆对我极为不满。不到半年，杨得志退休，他让徐信（总参管情报的副总长）把我调回来，而且不是光明正大的调，是要了个骗局（第一章有详述），这就说明，他是以我为敌的。一般人可能以为这是祸，其实以后来的经历看这件事，才明白祸福相依。如果我们关系很好，到「六四」才发

生正面冲突，我可能会措手不及。1988年1月他无故整了我一下，使我对他已彻底失望。

「六四」后我辞职，离开总参，他是清楚的，因为报告是他弟弟，当时军委秘书长杨白冰批的，他只是没料到一下子申请到了护照，就跳出了他的手心。1991年新加坡航展，我遇到了装备部几个人，大家互相问了好，这几个人回去后写了报告，他们才知道我已经离开了中国。贺平（邓小平的女婿，1991年已当了装备部长，恼羞成怒，发了个文件开除我军籍、党籍，杨尚昆则指示公安部，说：「罗宇再回来，就不要再走了。」

这是公安部的人在杨尚昆倒台后告诉我母亲的。这又是违宪之举，他有哪些法律依据可以禁止我自由出入？所以中国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赵紫阳都没有人权，何况我呢！

后 记

我写邓小平，就是邓家的人也不能驳我；比如，我说邓对毛泽东说：「永不翻案。」对华国锋说：「坚决拥护……！」这都是中共中央文件载明的。邓小平对我的家庭，对我个人，都有恩，但我不能以个人恩怨论英雄。

255

我会全心全意支持邓小平，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儿子（这是没选择的，我也是非常骄傲的），我支持邓小平，是支持中共中兴。什么是中兴？中兴就是逐渐放弃一党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自由选举，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民主、法制的社会，像战争年代那样，得到人民拥护，而绝不是今天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

帼馨离开我五年多了，她的寝衣一直伴在我的枕边。漫漫长夜，无限思念。

同学介绍我认识了金钟先生，本书才得以出版。

很多敏感话题，都是我一家之言。如有严肃的读者愿意讨论，我留下一个邮址：yuluo261@gmail.com

我支持习近平反政变，江、曾、周、薄要杀习，习当然要先杀他们。现在的问题是，粉碎了政变之后，中国向何处去。一个比当年国民党还腐败的共产党，有无可能变清廉？

唯一的出路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现在还看不出苗头。

罗宇 2015 年 8 月 22 日 美国

再版启事

本书初版匆忙，图片部分有遗漏和说明错误。

谨此补正，并致歉意。

本书海外代理，请与总经销田园书屋联络。

邮购服务，请到开放网上书店(<http://www.open.com.hk/book.php>)
以 PayPal 或信用卡付款或 电邮收货地址到 openmagazine852@gmail.com 及邮寄支票到香港轩尼诗道邮箱 2Q064 号。

开放出版社编辑部

2015-10-11

罗 宇 简 介

小名罗猛猛，中共大将罗瑞卿次子。

1944 年生于延安。1963 年入读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文革期间被诬陷入狱 5 年，父亲复出军委，1975 年 10 月加入总参谋部装备部空军处。1984 年入高等军事学院大学生班，毕业后重返总参。

257

1986 年任总参航空装备处处长（师级），赴美任战机改装联络组长（准将级）。1988 年回国授大校衔。1989 年出席法国航空展。被装备部领导指责逾期不归，乃告辞职，获准。1990 年随团赴欧洲，和中共体制分手。1992 年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颁令，开除罗宇军籍、党籍。

1990 年和香港影视明星狄娜（梁帼馨）结婚，参与其贸易公司业务，并撰写个人回忆录。隐居狄娜葡萄牙南部名苑，2010 年狄娜病逝香港后，移居美国。夫妻恩爱，罗宇视此来自不同世界的姻缘是上天的眷顾。

六四槍響結奇緣



羅宇告別總參謀部後
應愛妻狄娜請求拍下
這幅最後的軍裝照

我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從擁護到懷疑，到徹底拋棄，用了半生時間。文革之後，我想這架機器是出了問題，但還想把它修好。「六四」之後，我知道根本沒可能修好，只能把它徹底砸爛。我無力砸它，只能逃跑，否則就會被它吞噬。共產黨是那可怕的機器，它無情地吞噬著敵人，也無情的吞噬著自己人。

一幫有崇高理想和獻身精神的男女建造了這架機器，一旦建成，這架機器就不再受這幫理想主義者的控制，而是受駕駛座上的某一個人控制。毛澤東坐穩了駕駛座後，得到人民擁護，駕駛這個機器殺了劉少奇、林彪、彭德懷、賀龍……，準備殺掉周恩來，幾乎殺了鄧小平，也幾乎殺了羅瑞卿、羅猛猛。（本書第6章）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120